

P.891121



K313.42

1
2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日〕井上 清著

宿久高 林少华 刘小冷译

孙连璧校



人民出版社

B189913

目 录

绪 论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	(1)
1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	(1)
2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	(15)
第一章	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与日本·····	(30)
1	围绕控制朝鲜的日俄抗争·····	(30)
2	马关条约与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	(44)
3	出兵镇压义和团, 占领厦门计划的失败·····	(58)
4	太平洋争霸与日本·····	(70)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	(77)
1	资本主义产业的确立·····	(77)
2	资本主义与地主制的结合·····	(90)
3	侵略与从属的经济结构·····	(97)
第三章	天皇制的变形·····	(106)
1	天皇制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同盟·····	(106)

2	治安警察法与帝国主义.....	(121)
第四章	帝国主义思想及其批判.....	(131)
1	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131)
2	民众与帝国主义批判.....	(148)
第五章	走向日俄战争.....	(157)
1	是日英同盟还是日俄协商.....	(157)
2	日俄开战.....	(176)
第六章	日俄战争的结局及性质.....	(195)
1	战局的发展和日军的困境.....	(195)
2	朴次茅斯和约.....	(205)
3	日俄战争的性质.....	(216)
第七章	殖民帝国的形成与民族运动以及同列强的 对立.....	(228)
1	合并朝鲜、形成殖民帝国.....	(228)
2	对台湾、库页岛、朝鲜的统治.....	(240)
3	经营满洲与列强以及中国民族.....	(254)
第八章	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时期的政治结构.....	(271)
1	“军部”的形成.....	(271)
2	垄断形成的开始及政党与民众.....	(290)

结 语	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及其各种矛盾·····	(316)
1	第一次大战与日本帝国主义·····	(316)
2	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328)
3	各种矛盾的展开·····	(333)
参考文献说明·····		(344)

绪 论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 与近代帝国主义

1. 天皇制的侵略主义

近代日本史上帝国主义思想最有力的鼓吹者、从甲午战争后至太平洋战争失败前经常同日本统治阶层中最为帝国主义化的一派勾结在一起的德富苏峰，一九一六年（大正五年）在其自办报纸《国民新闻》上连载了《大正青年与帝国前途》的长篇文章，继而把它作为单行本发行，使之很快成为当时最大的畅销书。在该书序言中，苏峰说道：自己的立场一贯在于“君民一德、举国一致之帝国主义，即对内实行平民主义，对外实行帝国主义，并一贯以皇室中心主义统辖二者”。这里所说的平民主义，并不是他曾在一八九〇年前后提倡过的平民主义（原话为“个人平民主义”），而是“国家平民主义”，即名为平民主义，而实为“天皇臣民主义”。

按照苏峰在该书正文中基于这一立场的说法，“日本近代帝国主义的急先锋”虽是丰臣秀吉，但“至为遗憾”的是，在德川幕府的统治下，日本国民的帝国主义“雄心”暂时地受到了压抑。不久，到了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其“复兴的第

一声”从本多利明的《西域物语》中有关入侵堪察加、库页岛、满洲的论调上发了出来。在下一代的佐藤信渊那里，“日本帝国主义这一只有在皇室中心主义之下才能被有效地和充分地付诸实践的真理”，得到了阐明。信渊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一八二三年）一书中宣称：“皇大御国乃天地间最初成立之国，为世界各国之根本”，因此，皇国号令世界各国之天理”是不言而喻的。根据这一天理，皇国要首先并吞满洲，继而将中国全部领土划入日本版图，而后从东南亚进军印度，“合并世界各国”。

接着，苏峰介绍并赞赏了桥本左内、吉田松阴、佐久间象山及其他幕府末期思想指导者的五花八门的“帝国主义”。就连幕府末期名流中唯一的非“帝国主义”论者横井小楠，当时也被他当成“精神帝国主义”论者。在苏峰看来，优秀人物必然是帝国主义者。

近代帝国主义是以世界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为基础的，是它的必然产物。在这个意义上，它同古代、中世纪及资本主义初期屡见不鲜的帝国主义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既具有各国间共同的本性，同时也因各国历史条件而带有各自的特征。苏峰上述的议论，最充分地表现了日本近代帝国主义在政治、意识形态上的特征，透露出近代帝国主义同天皇制侵略主义、军国主义之间的历史关联。

一八六八年打倒德川幕府后建立的天皇政权，从一开始就是极富侵略性的。早在天皇政权将反对派大名的武力抵抗基本镇压后不久，即同一年底，政府首脑部门便制定了侵略朝鲜的计划。参议木户孝允在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回答议定岩

仓具视关于“前途事件”的谘询时对其中几项作了说明。他在那天的日记中这样写道：

“至关紧要之事有二，一望迅速确定天下方向，二望向朝鲜派遣使节，责其无礼，若其不服，则兴问罪之师，以伸张神州之威。彼时，一举改变天下陋习，确定目标于海外，故百工杂艺须齐头并进，监视国内各部，一扫讥人之短、责人之非而不自反省之恶弊。必将大益于国家。”

木户说要“责问”朝鲜的“无礼”，然而这时朝鲜国既同天皇政府尚无任何关系，又无旧幕府时代遗留下来的日朝间的纠纷，“无礼”从何谈起？天皇政府通知朝鲜，日本已变革政体，以及对马藩士将要求新政府同朝鲜建立邦交的国书递交给相当于朝鲜对日交涉窗口的釜山的官厅一事，发生在十二月十九日，即木户向岩仓提出征韩为当务之急后的第五天。釜山的朝鲜官员发现这个国书以及由对马藩主以事前通知的形式递交的日本国书的文件格式，不符合日朝交往文书的先例，而且文中出现了只有大清国皇帝才能对朝鲜使用的“皇”、“敕”的字样，认为这是日本对朝鲜的蔑视，因此，就连将国书转呈朝鲜中央政府一事都予以拒绝了。日本政府方面视此为“无礼”，把它当作征韩论的借口，而在为这种借口没找到任何材料的情况下，木户便如上述主张征韩了。

在木户和岩仓以及军务官副知事、当时政府军事方面的最高实权人物大村益次郎之间，从这时起便就征韩认真作了计划，这可以从一八六九年（明治二年）一月至二月的木户

的日记和信件中详细地看出来。据推测，在这年二月上旬木户写给大村的长信中说：“自一月一日大体商谈以后，仍反复考虑将来之大势”，望军务官制定远大方略，在平定函馆的榎本武扬等旧幕府军队之后，整顿朝廷独自の陆海军备，不依靠诸大名而以朝廷兵力来“开辟”釜山。所谓“开辟”，大概指的是“开发”，但作为其前提，则必须占领，因此，木户也对武力征服的顺序作了如下说明：

“主要以武力开辟韩地釜山。吾知此举非但无物产金银之利，反将蒙受损失，但为确立皇国之远大方向，使亿万苍生瞩目内外，切实提高海陆诸般技艺等，并使他日皇国振兴，历经万世而不衰，则舍此别无他策。有议论曰，至今尚未能开辟虾夷之地（北海道），故不宜染指他方等，此乃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之见……。依愚见，以建立皇国国体而论，细推宇内事理，韩地一事乃生光辉于东海之端始。万一交戈之时，切勿急进；规定年年所需费用；占领一地之后，熟虑日后攻占之策；持之以恒，努力不懈，不出两三载，天地必能大改其观，一旦付诸实施，则万世不拔之基将愈趋巩固”。（《木户孝允文书》第三）

木户、岩仓等人，从这时到一八七一年（明治四年）十一月赴欧美之前，一直在寻找机会实施这一计划。日本政府方面，把朝鲜对日本国书中“皇”、“敕”字眼的指责，视为对日本有利，日本一直坚持使用此种字眼，对待朝鲜较之旧幕府时的交往还“低贱二三等”，企图使朝鲜“成为属国”。一八七〇年，政府开始同清国交涉建立邦交，当时的重要目的是，通过打开日本与清国的对等交往的大门而为和清国一样骑在

朝鲜头上的主张制造根据。^①

据推测，在一八七一年以前，木户、岩仓等是狂热的征韩论者，而在野的西乡隆盛毋宁说是反对征韩的。从一八七二年末到一八七三年（明治六年），岩仓、木户同大久保利通一同出巡欧美，留守政府中的参议兼禁卫都督、元帅西乡是最大的实权人物。以他和参议板垣退助、外务卿（后兼参议）副岛种臣等为中心，最初计划侵略台湾，随后计划侵略朝鲜。众所周知，西乡等人的征韩论，由于受到从欧洲回国的岩仓、大久保、木户等人的强烈反对而告失败。然而在那以后掌握了政府实权的大久保等人却于一八七四年（明治七年）实施了西乡等制定的远征台湾计划。接着，翌年（一八七五年）九月，日本海军对朝鲜江华岛的炮台进行非法挑衅，使之开炮，遂以问“罪”为由准备战争，恐吓朝鲜政府。一八七六年二月，迫使朝鲜在最初的日朝修好条规上签字。一八六八年以来的征韩论，至此实现了其目的的第一阶段。

日朝修好条规第一条“朝鲜国为自主之邦，拥有同日本国平等之权”的规定，引起了征韩激进派的不满，但政府的目的在于首先明确朝鲜不是清国的属邦，以为日后将朝鲜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创造一个前提条件。这一条约本身确实是不平等的，第十条规定了侨居朝鲜的日本人具有当时日本受尽欧美各国百般欺侮的治外法权与租界地。在这里，日本已成为把欧美各国强加给日本的不平等条约同样强加给邻国的国家。而且条约中规定“两国政府不得修改此约”，以使之成为

^① 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一年政府征韩论的具体事实，在我的论文《征韩论与军国主义的确立》（载井上《日本的帝国主义》Ⅱ）中有详细论述。

永久束缚朝鲜的桎梏。

不仅如此，在根据该条约于同年八月签定的两国贸易章程，其第七条还规定“日本国人民可用日本国各种货币交换朝鲜国人民的所有物”，并在其附件中规定日朝两国“数年间”均无进出口关税。

谈到日朝两国的均无关税，形式上虽然是“平等”的，但这个条款若同日本可以用包括银行券在内的日本“各种货币”，无限制地购买朝鲜物资这一贸易章程联系起来的话，那末，由于这时日本已经在经济上、商业上把朝鲜变得完全无异于国内市场的一部分，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从此也就肆无忌惮地长驱直入了。朝鲜的金银通过同本来没有价值的日本纸币的交换而大量流入日本，朝鲜农民被日本商人将稻米和大豆用廉价一购而空。强有力的商业资本同贫穷的小生产者之间的交易，即便是“公正地”进行，也是绝对不利于小生产者的。况且日本商人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有恃无恐地胡作非为。因此朝鲜的小商人和小生产者，很快就变成了以三井物产合股公司及第一银行为首的日本商业高利贷资本的牺牲品。

在六年后的——一八八二年（明治十五年），日本迫使朝鲜政府同意雇用其军事教官。朝鲜士兵对此抱有的不满情绪同身受日本商业资本无情掠夺的朝鲜人民的不满情绪一起爆发了。这年七月，汉城发生了兵变（壬午兵变），士兵和市民袭击了日本公使馆。日本政府索性以此为良机，威吓朝鲜政府，迫其向日本道歉并赔偿损失，还迫其承认为警卫公使馆而在汉城驻扎若干日本军队的权利。就是说，伴随着经济侵

略，迈出了政治侵略的第一步，军事侵略也已萌芽。从此，日清两国在朝鲜的势力争夺开始公开化，并一年比一年激烈。

接着，一八八四年（明治十七年）十二月，日本政府作出支援朝鲜统治阶层内部民主改革派政变的姿态，企图使可能在成功后出现的朝鲜政府从属自己，但政变在得到清国援助的保守派的反击面前很快就失败了（甲申政变）。于是，日清两国出兵朝鲜，甚至产生了战争危机，但日本政府尚无充分准备，所以一八八五年四月，首相伊藤博文自任大使，在清国天津缔结了妥协条约。天津条约第一条规定日清两国同时撤出军队；第二条规定今后日清两国均不向朝鲜政府派遣军事教官；第三条规定：“将来朝鲜若有重大变乱事件而须日清两国或一国派兵时，应先互行文知照，其事件平息之后，当即撤回，不再留防。”第三条等于日清两国根本无视朝鲜国的主权而相互承认出兵朝鲜的权力。所以，这是日本对朝鲜的政治侵略的第二步。另外，从一八八〇年开始进行的、以与清国交战为目标的军备扩张，在天津条约后更加迅速地、大规模地展开。九年后发动了日清甲午战争。

何以说明天皇政权诞生以来一贯的、如此明显的侵略主义呢？逐一地详细考察，如一八六八——一八七一年的木户、岩仓政府时期，一八七二——一八七三年的西乡、板垣政府时期，其后的以大久保利通为最高实权人物的政府时期以及继任的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掌握领导权的政府时期等，每个时期都各有其特殊的国内或国际的情况。

就木户、岩仓而言，六八年内乱中拥护天皇政权的诸藩，

不肯轻易服从中央政府的威令，而中央政府又不拥有强制其服从的兵力和财力。在这种情况下，其征韩论的直接目的，是为迅速加强中央的军备，建立威信，削弱诸藩力量而将诸藩与普通民众的注意力集中于对外战争。西乡、坂垣为了安抚士族大众——天皇政府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生存不得不实行各项资本主义改革，使他们日趋没落——的不满情绪，用西乡的话来说，作为“将希冀内乱之心转移于外、行兴国之远略”，而急于征韩；同时也是为了反对岩仓、大久保和木户等建立起来的官僚独裁，成立以士族为中心的政权。大久保政府的远征台湾，是企图缓和前年被他们逐出政府的征韩派，特别是萨摩士族的激愤。江华岛事件与以此为借口强加给朝鲜的不平等条约，也发生在大久保政权之下，其直接目的仍在于将怀有不平情绪的士族的注意力引向朝鲜，以及通过镇压邻国来树立政府的威信。

然而，即便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将屡次出现的政府反对派的注意力转向出征外国这种直接的动机和目的以外，还有什么“伸张神州之威”（木户）、“振兴国家”（西乡）“耀皇威于海外”（大久保）等各种样式的、天皇制统治阶层中共同的侵略欲望。这是天皇制官僚、军人对封建领主阶级所固有的领土扩张欲望或“金银财宝”的占有欲的继承。经济上，是同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攫取“金银财宝”与攫取殖民地的欲望相互交织、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在政治上，这种侵略主义和这样一种要求同出一辙，即自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一直侵略东洋，日本本身也被强加给不平等条约，受其压迫，对此日本无法直接向欧美各国反击。因而，它企图通过大力压制弱

小邻国来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

这种以屈服于欧美和侵略邻国为日本出路的想法，在幕府末期就已经由长州的吉田松阴——后来成为明治政府领导人的木户孝允、伊藤博文的老师——明确地阐述出来。一八五五年（安政二年）他在狱中写给兄长的信中，作为“同志一致之意见”写道：“俄美和亲条约一定，我方便绝不可破坏之而失信于夷狄。只宜严守章程，加深信义，趁此时机培养国力，分割易于攻取之朝鲜、满洲^①、中国，将同俄、美交易中之损失，复以鲜、满土地补偿之”。另外，佩里来航前的佐藤信渊等人单纯地幻想由日本先征服周围各国以对抗欧美列强对东洋的侵略，但后来觉察到在现实中日本也受着欧美的直接压迫，难于同其抗衡，却又不满足于一味屈从，从这种立场出发，出现松阴那样的想法也是理所当然的。

比松阴更为通晓世界形势，企图通过主君松平庆永撼动幕府政治的越前的桥本左内，一八五七年（安政四年）提倡独特的日俄同盟论。此论认为，争夺将来世界霸权的将是英国与俄国，因为日本单独无法抵抗西洋列强，所以应向俄国遣使，“乞求和亲”，结成同盟，接受其援助。这样一来，在尚未达到“托国于俄”的期间里，外国便将干扰日本，因而，“在此之前尽量依赖美国，竭力阻止英夷跋扈。”为此，就必须同意哈利斯向幕府提出的签定通商条约与派驻公使的要求。于是，“视美国为一东藩，思西洋为我所属，以俄国为兄弟唇齿，掠夺邻国乃当务之急”（《桥本景岳全集》资料二

^① 满洲，指我国东北地区，与其他国家并列不妥。——译者

五二)。这种说法虽比松阴更为软弱，然而在同强大的欧美各国结成同盟或和亲的同时，侵略日本邻国，由此补偿对欧美的屈服所带来的损失这一基本想法上是一致的。

左内、松阴的观点，被他们的直接或间接的弟子——明治政府领导人——继承下来。以守“信义”为理由屈从于欧美列强，同时在其支持下侵略朝鲜、台湾，可能的话，甚至侵略中国本土，这点一直贯穿着明治政府的对外政策。例如，一八七二年以来制定的、一八七四年付诸实施的远征台湾计划，就是由于受到了美国驻日公使及其推荐的外务省顾问江道尔（美国退役将军）的指导才做到的。西乡、坂垣一伙的征韩论是在得到俄国驻日公使的默许的基础上制定的计划。一八七四年以后大久保政权的侵朝政策是英国驻中国公使等人暗示给为远征台湾处理善后问题而去北京的大久保利通的。大久保死后，主要由伊藤博文、山县有朋等推行的征伐朝鲜到甲午战争的侵略主义，也没有偏离在对近邻的侵略当中找回从属于欧美的损失这一念头。但在这一时期实行的侵略主义是从属于英国而同俄国敌对的。在国内关系方面，同将反政府派的注意力转向对外战争这一政治因素相比，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掠夺朝鲜这一经济因素更为强大起来。实际上，通过用日本纸币交换的方式从朝鲜掠夺金银和粮食，对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已经是必不可少的了（中冢明《日清战争研究》）。

那末，在十九世纪以来欧美各国不断侵略东亚的形势下，日本除了明治政府所选择的道路以外就不可能维护本国的独立和谋求繁荣了吗？明治维新的变革，没有成为资产阶级民

主主义革命，而成为在半封建专制的天皇制国家统一下培育半封建寄生地主制和资本主义。若以自由民权运动亦归于失败为前提，则大致可以说，在对外政策方面也只能采取现行政策。可是，自幕府末期以来，也还是存在着与此不同的、寻求国内变革与国际路线的思想和运动的。

在桥本左内将日俄同盟论写给同藩的村田氏寿一个多月后的一八五七年五月，村田访问了肥后的横井小楠，那时小楠对村田这样说道：“道乃天地之道，非为我国、外国所独有。中国虽为外夷而为有道之地。若无道，虽我国、中国亦即为夷，并非开始即有中国、外夷之分。国学者之流，其见识大为谬矣。（中略）此时，宜兴仁义之大道于日本，而勿为强国。强则必衰，务明此道而应有助于世界。一炮毙一两万人性命之事，务令停止。故我日本或为印度，或为世界一等仁义之国，惟此二策，舍此无他。”九年后的一八六六年，小楠在送其外甥赴美学海军时说：“明尧舜孔子之道，尽西洋器械之术，何止富国，何止强兵，布大义于四海而已（山崎正董编《横井小楠传记与遗稿》上卷）。

德富苏峰以此认为小楠是“精神帝国主义者”。实际上恰恰相反，其反对“强国”之道、追求世界一等仁义之国的主张，没有任何意义上的帝国主义和侵略主义。小楠的“仁义之国”，上溯古代，则是指儒教理想的“尧舜之世”，在近代，则指为摆脱英国争取独立而战的美国的独立民主革命的理想，他在理解上，把华盛顿比作尧舜。从这些抽象的理想论中，虽不能称他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但可以说，作为哲人而非现实政治家的小楠，是不自觉地以民主主义革命为理

想，反对任何侵略主义，争取建立人道主义世界的。也许是由于他在言行中不时流露出其理想，一八六九年一月，任天皇政权参议的小楠，被保守派士族以提倡共和制、传播基督教为借口给暗杀了。

即使象小楠那样的现实政治家，也只是极其慎重的渐进改良主义者，仅仅由于怀有远大的民主主义、和平主义的理想便遭到暗杀。在这样的时代里，是无从在现实中开展旨在把日本变成“仁义之国”的民主革命与和平外交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自由民权革命运动中，小楠式的理想进一步放射了光芒，不仅被作为理想论来提倡，而且还作为同明治政府抗衡的现实政策论而开展起来。关于这点，松永昌三的《扩张主义还是和平主义》（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论点》上）列举了不少史料。

在革命民权论者当中，有人举出处于欧洲大国强国中间的丹麦、瑞士、瑞典巧妙地保持中立、繁荣昌盛的事实，说明在强兵强国之道以外也有生存的道路；还有人在一八八二年朝鲜的壬午兵变时，批评日本对朝鲜国的责难和压迫，认为正应该深感悲愤的，乃“今我日本虽问罪朝鲜，然未能雪耻于欧美，虽于朝鲜证明自己之独立，然未能扩张国权于世界”，反对在侵略朝鲜当中找回受欧美压迫的损失这一政府的基本路线。《近事评论》、《自由新闻》、《土阳新闻》等民权派机关报的不署名社论不仅如此发表言论，而且作为民权派、是不彻底的改良主义改进党的最高领导小野梓等还在壬午兵变刚结束后的“外交论”中主张：日本政府不应从朝鲜索取赔款；而应当致力于日、朝、清三国的团结合作，以保卫东洋

不受西洋侵略。

将这种立场最纯粹地发展到理论顶峰的，是中江兆民的《三醉人经纶问答》中“绅士君”的理论。绅士君说：象日本这样的“弱小之国”，想要同欧美的强大国家竞相加强军备、成为大国，是根本竞争不过的。这是用简单的算术就明白的。日本不应走这条路，而应遵循历史必然进步的规律，成为比欧美民主国家更为先进的、自由、平等和友爱的彻底的民主共和国。发展科学和艺术，振兴产业，举国为“道德之园”、“学术之圃”，废除一切军备，只依据“文明本质的真理正义”来同国际社会相处。

这同小楠的“世界第一等仁义之国”的理想是相同的。但这时的日本，就连走与此相近的路都是不可能的了。在兆民写这本书的一八八七年初，自由民权运动虽尚未最后失败，但已遭受了重大挫折。与此同时，壬午兵变时从正面反对政府侵略政策的自由党员和改进党员也在八四年末的甲申政变时——那是在自由党解散后不久——狂热地鼓吹起政府煽动的排外主义。而且，兆民也在《三醉人经纶问答》中滔滔不绝地谈论“侵略家”的“豪杰君”。豪杰君的主张是：处于俄、英、法、德都以强大的军备侵略亚洲，向世界各地开辟殖民地的环境中，日本应选择的道路，惟有征服中国而成为大国，拥有强大的军备。兆民在说绅士君的主张“纯粹正确”的同时，又说豪杰君的主张“豪放、超群”。

兆民被绅士君的理性与豪杰君的心情所吸引，但他认为这两种主张在现实中都无法实行，便叫“南海先生”来说明现实政策。这种政策认为，两君都过分担心欧洲强国侵略日本

而提倡极端论，但在现实的国际关系中，暴力主义正在渐渐衰落，道德主义正在逐步发展，并不象两君所担心的那样。南海先生的这种认识是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而世界史的现实，则正是以从这一时期开始形成的暴力主义即帝国主义为基础的。在这种认识基础上制定的具体政策是这样一种极普通的改良渐进论：建立立宪制，上显天皇尊荣，下增万民福利，设置世袭贵族的上院和由国民选举的下院，外交以和睦友好为主……。但在这一段的上边，兆民自己写下了“南海先生骗人”的眉批。

甚至象兆民这样一贯的民主革命家都不能全面支持绅士君的理想而在心中部分地受到了豪杰君的侵略主义的影响，最后在进行现实的带有主观愿望的观测之后，以骗人的改良论而逃之夭夭。这里边有日本现实的难处。而且，兆民这本书写完不久，革命民权运动就以反对井上外相的修改条约案为契机，又一次急剧地高涨起来。在国际政策方面，也结合确立民主政体的要求，强烈主张反抗欧美的压迫，而不侵略邻国。但这也只有四个月，就在政府的坚决反击下夭折了。此后，就连类似南海先生的欺人之谈那样的改良道路也被截断，基本上确立了豪杰君的侵略主义和军国主义，其另一面对欧美妥协、屈服作为天皇制日本唯一的前进的道路。

就是说，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日本在面临着和朝鲜、中国一同受着欧美压迫，而负有民族解放的课题这种国际关系时，日本的政治、社会体制的民主主义革命却无法取得胜利。随着专制天皇制度的胜利，用革命的、民主的方式完成民族独立的任务已不可能。因而继承了吉田松阴和桥本左内

等人的思想的天皇制度的对外路线就取得了最后胜利。日清甲午战争也是由于在修改条约时向英国让步、依靠其支持才能够进行的侵略战争。并且，这种天皇制侵略主义同近代帝国主义是一直有直接关联的。

那末，天皇制侵略主义同近代帝国主义是怎样相互区别，而又相互关联的呢？什么是近代帝国主义呢？

2. 军事封建帝国主义 与近代帝国主义

帝国主义一词，其本来的含义是什么呢？按照矢内原忠雄的说法，“帝国主义一词原是一种政治运动的口号，它始于（英国）政治家迪斯累里——原自由主义者，对占有殖民地表示明显冷淡——一八七二年在伦敦郊外的娱乐场所水晶宫的演说。在演说中，作为扭转即将来临的大选局面的新政治纲领，他转而主张帝国的维持和帝国联合”。这时的“帝国主义”，指的是“由本国和殖民地结合成的帝国的维持、扩张及保护关税的政策”（矢内原忠雄《关于超帝国主义》，载《帝国主义研究》）。

另外，在霍布森的《帝国主义论》（一九〇二年）这部批判近代帝国主义的古典著作中有这样一段论述：“民族主义，即争取在民族的基础上建立政治结合的斗争堕落了，越过自然的堤坝溢流而出，不管远近，企图兼并反抗的、非同化的国民的领土。这种企图正是民族主义一方面向不纯的殖民主

义，另一方面向帝国主义发展的特征”（矢内原忠雄翻译）。显然，这种“帝国主义”，指的是对于他国、他民族的侵略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

在日本，帝国主义一词是什么时候开始使用的呢？对其首次出现的时间我不准备予以断定，但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三年）三月的《太阳》杂志上登载的高山樗牛的论文《帝国主义与殖民》，该杂志同年七月“政治界”栏里的《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以及同年十月的高山樗牛的《时势与诗人》等文中所使用的，大概是早期中的一例。从这时开始，日本也同欧美一样，十分流行对于帝国主义的美化。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人理解帝国主义就是“皇帝主义”，即君主专制主义，是对政党政治和议会政治的否定，错误地高兴什么只有欧美正十分流行的帝国主义才是最适合日本的主义。^①但这是例外，一般人的理解是：帝国主义就是将殖民地牢固地同本国相结合的主义，是谋求扩张殖民地和属地的主义；更通俗一点的是认为与扩张主义和侵略主义相同。

高山樗牛在上述《帝国主义与殖民》中说：“历史研究使吾人断言如下曰：凡实行帝国主义、不同时进行扩张领土和殖民地的国家，它必然衰亡”。并给帝国主义下定义说：“吾人所谓帝国主义，乃是不以同本国人相同之权利给与属邦或殖民地异人种或异民族，决然根据权力关系在异邦人与本国人之间规定本支主从差别之主义。换言之，若给予征服得来

① 幸德秋水在《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九〇一年）中列举了这种误解。本文中提到的《太阳》杂志的论文《帝国主义与日本帝国》，也谈到有人认为帝国主义同“民政主义”正相反。

之属国之民同征服者一样之权利，则非吾人所谓之帝国主义。”这就是说，帝国主义就是征服、统治、控制和剥削他民族，舍此则必亡国，这就是日本初期的最为露骨的帝国主义者所直言不讳地下的定义。他还在这年四月的《太阳》随想栏《詹詹录》里写道：“帝国主义即排外主义、垄断主义、侵略主义与非人道主义，英国人之殖民策略及北美合众国之占领菲律宾，均非此意义之帝国主义。”

即便是在充满自信的初期帝国主义美化者当中，象樗牛这样露骨地吹捧侵略主义的，也还是少数。高田早苗在其抄译美国政治学者赖因施的《受东洋问题影响的十九世纪末的世界政治》^①而以《帝国主义论》为名出版的书中说：“人口之增加使土地之增加成为必要，因此使彼等（近代民族国家）不能不以帝国主义取代以往之民族主义。亦即所谓帝国主义，无非彼等在力量与机会所允许限度内分割大量领土之一种希望。国际政治策略中此种新态度，于最近二、三十年间格外明显……”。此处将帝国主义美化成民族国家不可避免的进程。书中还说什么，在矿山及其它资源“白白掌握于劣等种族手中”而无法开发的情况下，那些“劣等民族”便“应于其他优等民族之指挥监督下增加生产”；什么“民族帝国主义，由于其根本乃民族国家，故须对其他民族之政治存在予以尊敬，因而在兼并其他未开化地方与劣等人种，努力增强其力量之同时，不应致力于对文明民族进行政治驾驭”；什么帝国主义具有开发“劣等民族”和“未开化地方”，将其居民带进文明的

^① P. S. 赖因施：《World politics at the End of the Nineteenth Century as influenced by the Oriental Situation》。

任务以至权利等等。尽管帝国主义被如此地“正当化”了，但归根结底，这一名词的最普通的用法还是：一国或多或少地对他国、他民族进行控制，割取其领土，剥削其居民，进行势力扩张的侵略主义、殖民地主义和领土扩张主义。另外，他们还滥用社会达尔文主义作为使帝国主义“正当化”的论据，说什么为给工人提供职业和食物，帝国主义是必要的等，但说明这些不是本文的主题。

这种一般的、超历史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既可以在奴隶制的基础上建立起罗马的帝国主义，也可以在封建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丰臣秀吉的帝国主义。在由封建制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时期和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时期里，欧洲各国大力征服亚洲和拉丁美洲作为自己的殖民地。离开对殖民地的掠夺，欧洲资本主义是建立不起来的。

产业革命以后，在产业资本的全盛阶段，对他国、他民族的侵略没有原始积累时期那样频繁，甚至出现了如同英国资本主义那样，别说获取殖民地，就连对维持都变得冷淡起来的情形。然而就是在这阶段，资本主义国家也并非完全放弃获取殖民地的要求。即便在英国产业资本家大言不惭地宣称他们只希望进行和平、自由地贸易，而不希望征服的时期里，他们仍然对中国挑起鸦片战争，从中国手中夺取香港岛，把旨在对中国进行殖民地式的掠夺，使之隶属自己的不平等条约强加于人。日本也被产业资本全盛期的欧美资本主义用武力威胁和欺骗强加给了不平等条约。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从先进的资本主义各国开始的新帝国主义，在统治、剥削他国和他民族，扩张领土这点

上，同以前的帝国主义没有什么区别。可是，这种近代帝国主义，是在同以往的帝国主义根本不同的经济基础上必然地建立起来的，其政策也有着几点全新的特征。

按照我的理解表述的话，列宁关于近代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众所周知的定义是这样的：

一、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生产和资本趋于集中，以致发展到了垄断组织对社会经济生活起决定作用的阶段。

二、在这一过程中，垄断产业资本同银行资本融合在一起，形成金融资本。少数的金融资本家不仅控制经济生活，而且“全然不管其国家政治组织及其它任何具体情况，进入公共生活的全部领域。”此即金融寡头统治的发生。

三、这种发达的资本主义，不仅输出商品，而且输出资本，以此获得比在本国通常可以获得的利润更高利率的利润。不仅如此，还对资本所输出的国家或多或少地具有政治的、经济的控制权力。亦即与商品输出不同，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四、这样，各国的金融垄断资本进入世界各地，在激烈竞争的同时，形成国际性垄断资本家团体——国际卡特尔、托拉斯和辛迪加，在他们之间瓜分世界。

五、而且，几个强大的资本主义国家，这时已经把世界所有的地方分割成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或势力范围。世界领土就此瓜分完毕。

简言之，用列宁的话来说，“帝国主义是发展到垄断组织和金融资本的统治已经确立、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国际托拉斯开始分割世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已把世

界全部领土分割完毕这一阶段的资本主义。”列宁还“给帝国主义下了一个尽量简短的定义”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①

在这样的经济基础上，势必产生政治上的“统治的趋向而不是自由的趋向”，以及“力图施用暴力和实行反动”。这种冲动在国际关系上，表现为民族压迫、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扩张及其它帝国主义政策；在国内政治上，表现为“在一切政治制度下都发生全面的反动”。^②

而且，在世界领土瓜分完毕的阶段，旨在压迫其他民族、扩张领土或势力范围和推行垄断的政策，已经不能象以前那样对尚无他国动手的地区，在摧毁其居民软弱的、或轻微的抵抗之后，便可肆意掠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为重新分割世界领土和在经济上的争夺必然变得激烈起来。在这种斗争中，甚至经济价值低然而可以成为称霸世界的军事据点的小岛，也会成为争夺的对象。这种斗争有时是为了不使之落于竞争者之手，而并非是出于本国的直接需要。不仅未开化人居住的地区，就是具有悠久的文明、但不拥有足以独自战胜列强帝国主义的力量的国家，最明显的如中国和朝鲜，都成了帝国主义入侵的最大目标。

列强斗争的目的，除了为扩张领土之外，还在于为积累起来的过剩的、已在本国找不到有利可图的投资对象的资本，寻求有利可图的输出地，并防止竞争者的闯入。为垄断后进地区的铁路铺设权、矿山开采权及其它原料资源而进行的斗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80页。

^② 同上书第111、82、111页。

争，是帝国主义最卖力气的。帝国主义阶段前的资本主义，据说是“国旗跟着贸易”，而如今则是“贸易跟着国旗”。向弱小国家提供贷款成了帝国主义列强的惯用伎俩。它不但可以获得高于借款价值的利权，而且即便在不能马上获得这种利益的情况下，也可以使对方在金融上进而在政治上从属于自己。这种不用直接军事手段的侵略，以前未曾有过，而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则成了最普通的伎俩。当然其背后是准备着武力威胁的。

上述的帝国主义政策，不但是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侵略主义和殖民地统治所没有的新特征，而且是垄断资本主义必然实行的帝国主义政策。除此以外的政策，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础上是不可能产生的。垄断阶段以前的资本主义曾有过不采取帝国主义政策的情况。但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政治上则只能是帝国主义。因此，列宁把帝国主义这一本来表示政治特征的名词规定为：资本主义垄断阶段。列宁严厉地全面地批判了考茨基的论点。这种论点把帝国主义的政治同帝国主义的经济（垄断资本主义）割裂开来，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而不过是金融资本“情愿采取”的一种政策，即便是在金融资本这一经济基础上，也仍然可以有非垄断的、非暴力的、非帝国主义的政策。如果把垄断资本主义同帝国主义政治视为不可分割的同一事物的话，那末，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也好，说它是垄断阶段的帝国主义政策也好，都不过是用词上的争论，列宁也说这是“无所谓的”。而且他自己在根据上下文可以明了帝国主义是一种带有什么样经济实质的东西的情况下，也常常以政策的

含义来使用帝国主义一词。

既然近代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是垄断资本主义，那末，就垄断阶段以前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不管它怎样实行侵略主义，都不能称它为帝国主义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不想只将它作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概念的解释提出来，而想作为研究日本帝国主义形成的方法问题提出来。

前面已经说过，近代天皇制自诞生以来就带有侵略倾向，但在甲午战争以前，不言而喻，天皇制的对外侵略并不具有近代帝国主义的任何特征。甲午战争虽然是一场以驱逐清国在朝鲜的势力而将该地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为目的的侵略战争，但日本资本主义在当时不仅谈不上是垄断阶段，甚至连产业资本都尚未确立。甲午战争并不是以资本的要求为原动力而发动的。它是前面已详细阐述过的半封建的、专制的天皇制固有的侵略主义所发动的。这同成为俄国沙皇主义对外政策方面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相同的。

在这里，让我们回顾一下列宁就沙皇制度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所作的论述吧。列宁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年一九一五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战争》（大月书店版《列宁全集》第二十一卷）这篇论文中，清楚地指出，当时正在进行的大战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战争，接着写了在这场战争中“俄国为什么作战？”一节：

“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但是一般说来，在俄国占优势的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象在俄国那样，国内的大多数居民是受压迫的。大俄罗斯人

只占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三，即不到一半，而其他一切民族没有任何权利，被当作异族看待。（中略）沙皇政府进行战争是为了夺取加里西亚，彻底摧残乌克兰人的自由，夺取阿尔明尼亚和君士坦丁堡等等。沙皇政府把战争看做转移国内日益增长的不满情绪和镇压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手段。现在，俄国平均每两个大俄罗斯人摊到两三个无权的‘异族人’。沙皇政府还力图通过战争扩大俄国所压迫的民族的数目，巩固对他们的压迫，以便破坏大俄罗斯人本身争取自由的斗争。”^①

从以上引文来看，显然，由于所说的是沙皇政府的“政策”中存在着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和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所以，这种场合的两种帝国主义指的都是政策的性质，而不是就体制而言的。而且，显而易见，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同垄断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是有着明显的区别的，而同垄断资本主义并没有关系。其次，列宁在这里作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以下简称军封帝国主义）的内容，列举了沙皇政府为保护封建专制的权力（不是为垄断资本）而采取的压制、掠夺异民族的政策。

列宁还在同是一九一五年十一月所写的《论革命的两条路线》一文里，在批判托洛茨基的过程中谈到军封帝国主义，针对托洛茨基从“我们是生活在帝国主义时代”，但“帝国主义不是把资产阶级民族同旧制度对立起来，而是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民族对立起来”这一概念出发，来否定农民在俄国革命中的作用的论调，列宁首先斥责道“这真是一个‘玩弄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1卷第285—286页。

字眼’（帝国主义这个字眼）的可笑例子！”接着展开了具体批判，其中有这样一节：

“无产阶级现在为夺取政权、为建立共和国、为没收土地而斗争，也就是说，为争取农民、为尽量发挥农民的革命力量、为吸收‘非无产阶级的人民群众’参加使资产阶级俄国摆脱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的解放运动而斗争，将来还要为此英勇忘我地进行斗争。”^①（黑点系原文所加）

这里，采用的是把沙皇制度这种国家权力本身同军封“帝国主义”等同起来的说法。在这篇论文的约前一个月写的《革命的无产阶级和民族自决权》一文中，列宁使用“俄国是各族人民的监狱，这不仅是因为沙皇制度具有军事封建性质，”^②（下略）以及用“军事的封建的”这一说法概括了沙皇制度的基本性质，但不应把“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沙皇制度）”^③这一上述说法解释为把军封帝国主义同沙皇制度这种国家权力本身等同起来，在批判托洛茨基滥用“帝国主义”大放厥词的文章中，在修辞上，通过沙皇制度同“帝国主义”之间的关联，指出沙皇制度性质的特征，而采用了军封“帝国主义”的说法。

使用“军封帝国主义”这一词的例子，从大月书店出版的《列宁全集》所见，除上边引用的以外，还出现在《用国际主义词句掩饰社会沙文主义政策》这篇文章（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上。其中写道：“即使某个大国中军事独裁的、封建的帝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1卷第398、399页。

② 同上书第392页。

③ 同上书第399页。

国主义很快被打倒的话，资产阶级的和帝国主义的大国之间的战争的性质也不会有丝毫改变”。^①在这里，除军封的以外，还加进了独裁一词，明确指出这样的帝国主义就是独裁的。而且，很明显，军封帝国主义一词在这里也不是指国家权力本身，而是指其性质或政策。

以上是列宁著作中的“军封帝国主义”的用例，这些指的都是沙皇制度的性质或其政策的特征。而例如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时沙皇制度（或一般所说的独裁）才能成为军封帝国主义之类的话，列宁在任何一处都没有说过，甚至未明说而可以那样解释的话，也未曾有过。按照苏联历史学家的说法^②，在近代帝国主义时期以前，军封帝国主义也曾在沙皇对外政策及殖民地政策中出现过。

那末，甲午战争（一八九四——一九五年）的天皇制侵略主义，虽然可以称其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但却同近代帝国主义没有关联。可是，在甲午战争期间，资本主义的世界体制，迅速向垄断阶段 = 帝国主义过渡。并且，从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结束后，即以俄、法、德三国对日干涉这种形式开始的欧美列强及日本瓜分中国的斗争——可划为一个阶段的一九〇四——〇五年的日俄战争，同被认为标志着世界史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美西战争（一八九八年）和英布战争（一八九九——一九〇二年），大体处于同一时期，这也宣告了世界史的帝国主义时代的开始。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 21 卷第 415 页。

② 岩村登志夫译：A. L. 西多洛夫《弗·伊·列宁的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论》（桃山学院大学《国际关系研究》第 5 号）。

就是在这一时期里，日本资本主义仍离垄断阶段相当远，刚刚费力地确立了产业资本。当时几乎没有输出资本的余力，对在甲午战争中夺取的台湾也缺乏资金经营，甚至对其占领也感到是一种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样的日本却同垄断资本主义各国争夺瓜分朝鲜和中国，这样，难道还能称日本只是军封帝国主义，而不是近代帝国主义吗？

如果下定义说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这一社会经济结构的话，那就等于说，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就是日本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形成，而关于对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作用的分析等全都是无用的。可是，前面已经说过，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所必然采取的、而且是唯一可以采取的政策，并且这种政策具有同垄断阶段以前的资本主义的政策不同的独自的特征和性质。从这一方面来看，日本资本主义本身虽然尚未发展到垄断阶段，但日本已经成为近代帝国主义阵营的一员，它若实行近代帝国主义政策的话，难道还不可以称其为帝国主义吗？

近代帝国主义，首先，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是世界体制。少数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在地球各处，同某些国家相对抗，又同某些国家结成同盟，而且这种对抗和同盟不断变动，昨天的敌人是今天的朋友，反之亦然，这就是它们经常采取的世界政策。即便本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垄断阶段的国家，也被吸收到这种帝国主义体制中去，同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勾结在一起，并通过这种勾结，加入近代帝国主义剥削、统治的行列，如果这样作，这种国家就是帝国主义国家。作为其中的一例，列宁举出丹麦帝国主义。在《整

整十个“社会主义的”部长》这篇在第一次大战的第三年（一九一六年）写的文章里，列宁批判丹麦社会民主党向资产阶级政府输送大臣，以“保持中立”为借口赞成军事公债。其中这样写道：

“丹麦形成为民族国家是在十六世纪，丹麦的人民群众早已进行了资产阶级解放运动，丹麦有百分之九十六以上的人口是在本国出生的丹麦人。侨居德国的丹麦人不到二十万人（丹麦的人口共二百九十万）。因此可以断定，丹麦资产阶级关于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是当前任务的言论，是多么拙劣的资产阶级欺人之谈！这是二十世纪占有殖民地的丹麦资产者和君主派说的，他们所占领的殖民地的人口几乎等于侨居德国的丹麦人的数目，而且丹麦政府现在正在贩卖这些殖民地的人民。（中略）

此外，丹麦帝国主义的特点是依靠乳制品和肉制品市场的有利的垄断地位来获得超额利润，把乳制品和肉制品通过运费最低的海路运到伦敦这个世界最大的市场去销售，因此，丹麦资产阶级和富裕农民（不管俄国民粹主义者怎样胡说八道，他们是最纯粹的资产者）就变成了英国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走运的’寄食者，变成了特别稳当、特别优厚的利润的分享者。”^①

列宁还论述了“瑞士的帝国主义”。“瑞士社会民主党人要使自己承认国际主义不致成为毫不负责的空话（象‘中派’的拥护者和第二国际时代各社会民主党人始终表现的那样），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33—134页。

第一、必须彻底地不断地使外国工人同瑞士工人从组织上亲密起来，并且融合在共同的组织中，为他们的完全（公民的和政治的）平等而奋斗。瑞士帝国主义的特点恰恰在于：瑞士资产阶级对毫无权利的外国工人的剥削愈来愈厉害，他们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这两部分工人的疏远上。”

瑞士的资产阶级政府“（1）同帝国主义‘大’国的资产阶级有着极其密切的经济联系和财政联系，并且完全依赖他们；（2）它的整个方针早已在国际和国内事务中转而实行反动的政治（政治警察；对欧洲反动派和君主国卑躬屈膝等等）；（3）它多年以来的全部政策（一九〇七年的军事改组等等；厄格利、德-洛‘案件’等等）证明，它愈来愈变成反动透顶的瑞士军人派和军人集团的傀儡。

因此，瑞士社会民主党最迫切的任务就是揭穿向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和军阀卑躬屈膝的政府的实质”^①（下略）（《瑞士社会民主党齐美尔瓦尔得左派的任务》一九一六年）。

不仅如此，列宁还在批判瑞士的“拥护中立”这一骗局的论文中指出：“帝国主义的利益不仅表现在领土扩张上，而且也表现在财政收益上。”瑞士资产阶级的资本输出至少不下三十亿法郎，瑞士的银行资本同各大国的银行资本保持着错综复杂的紧密联系，瑞士的《Fremdenindustrie》^②等等“表明瑞士同各大国一起经常瓜分帝国主义财物。”并说不要上瑞士资产阶级的“实际的帝国主义政策”^③的当。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146、137页。

② “为外国人服务的工业。”——译者

③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267—268页。

其次，列宁又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九一六年）一文中说：“简单地说，在帝国主义（即压迫许多异族人民，用依赖财政资本等等的密网缠住他们）列强之间进行的或它们勾结在一起进行的战争，是帝国主义战争。”^①

对于进行帝国主义战争的国家，当然要称其为帝国主义国家，以上的引文说明，强调帝国主义的经济实质就是垄断资本主义的列宁，是承认有这样一种现象的，即无论是尚未达到资本主义阶段的国家还是小国，都可以同帝国主义大国相勾结，从属于它们而成为帝国主义。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基本已经不再是被压迫的国家；它把原属于中国的台湾、澎湖列岛作为殖民地据为己有，对朝鲜进行半殖民地式的压榨和掠夺；随着世界史向帝国主义过渡，同欧美列强进行竞争，并同其中某些国家——英国和美国——相勾结。它带着这些恰恰是近代帝国主义政策的各种特征，向瓜分朝鲜及中国挺进。通过这些，日本也就变成帝国主义国家。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第23卷第25页。

第一章

列强瓜分东亚的 竞争与日本

1. 围绕控制朝鲜的日俄抗争

日本在甲午战争时的首要目的，是为了使朝鲜完全同清国脱离关系而置于日本的垄断势力之下。胜利后的日本做到了这一点，把清国势力从朝鲜彻底赶了出去。紧接着，便势必要同比清国强大得多的俄国帝国主义较量。

俄国在一八八四年七月首次同朝鲜缔结了通商条约，但在这以前就一直窥伺入侵朝鲜的机会。这种最初的机会在这年十二月朝鲜发生甲申政变时来了。朝鲜政府担心这时日清两国的冲突将使朝鲜沦为战场，因而向东京的俄国公使请求援助。朝鲜国王还向海参崴派遣密使，乞求沙皇的保护。俄国从此开始对朝鲜政府产生了影响。

日本从明治初年起就警惕俄国入侵朝鲜，英国也早想在对俄抗争中利用日本。一八七六年日本之所以能把江华条约强加给朝鲜，也是因为英国的对俄政策支持日本入侵朝鲜。同时，英国之所以在甲午战争即将爆发之前同意日本修改条约的要求，是企图把日本拉到英国一边以对抗俄国。英国已

经看透：俄国正在修筑的西伯利亚铁路一旦竣工，其在东亚的势力将更加强大（井上清《条约的修改》）。

一八九四年八月一日，日本向清国宣战后，便立即迫使朝鲜政府于同月二十日在《日朝暂定合同条款》、二十六日在《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上签字。前者内容是将汉城——釜山之间及汉城——仁川之间的铁路铺设权让给日本；后者内容是朝鲜为日军的行动及准备粮食等提供一切方便。日本还进一步口称朝鲜的“改革”，而实际上强制推行一种变这个国家为日本半殖民地的政策。这种极为强制的作法，理所当然地激起了朝鲜人民公开的抵抗和统治阶层暗中的反对。统治阶层便暗中投靠了俄国。

日本虽然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但由于屈服于三国的干涉，在朝鲜统治阶层中威信扫地。在朝鲜宫廷中，有势力的王妃闵氏一族更加接近俄国。一八九五年七月，闵氏一族在俄国驻汉城公使魏巴的支援下发动了政变，将亲日派朴泳孝等赶出政府，由亲俄派取而代之，日本军官训练的军队也被解散了。

这时驻汉城的日本公使是井上馨，他在闵派政变前两个月向伊藤首相建议：日本“独霸东洋而策划国家利益之事，不仅已非易举，且劳而无功，可否与俄密议提携方针。”甲午战争结束后的日本在朝势力已倒退到了如此地步。政府中似乎也存在着井上那样的想法，在六月四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对韩政略”中规定：日本的对韩政略，在于承认朝鲜的独立，使之见于成效，甲午战争也是为了这一目的。就此已发表过数次宣言，并使俄国承认，因此，“将来之对韩政略，

应采取尽量停止干涉，使之自立之方针。”（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以下简称《外交年表》）在这种时候发生了亲俄派政变。井上见无计可施，便辞去了公使。

后任是退役陆军中将三浦梧楼（八月任命）。三浦公使无论如何非要在朝鲜政府内恢复亲日派不可，便与汉城守备队长楠濑幸彦共同策划，在上任不到两个月的十月七日夜至八日黎明前，强行发动了极为残暴的政变。即三浦等人给同闵派势不两立的大院君配备了日本守备队与持刀的老百姓，令其于八日黎明前闯入王宫。日本人闯入王妃的卧室，砍杀了三个王妃模样的妇女，当确认其中一人是闵妃时，凌辱其尸体后将其烧毁。

这样，在大院君的执政之下，拼凑了以总理大臣金宏集为首的亲日派内阁。三浦吹嘘自己愚蠢的野蛮行径时说：“这回朝鲜可真成了日本的了。总算放心了。”然而，对于日本人这种虐杀闵妃的全部野蛮行径，不但王宫中的朝鲜人，而且住在王宫里的俄国人和美国人也都有目共睹。事件很快被汉城市民和全体朝鲜人民得知，反对日本和金宏集傀儡政权的舆论在整个朝鲜沸腾起来。

日本政府也对过于没有常识的三浦公使感到吃惊，十月十七日将其召回，给予免职处分。为了在外国人面前保全体面，将三浦、楠濑以及有关人员全部交付完全是形式上的审判，又以所谓“证据不充分”为由而全部免于起诉。

干出这种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侵略外交中都没有先例的事情，怎么还能将朝鲜民心笼络到日本方面来呢？三浦被召回后，井上馨马上做为全权大使赶赴汉城，向大院君说明

原委，劝其下野，並施行了种种安抚反对派的政策。同时，政府也在十月二十五日将日本不干涉朝鲜的方针通告各国，但无人相信，就连亲日派贵族也都对日本有所恐惧。闵派贵族感到有生命危险，逃进美国和俄国公使馆请求保护。金内阁並没强烈要求引渡他们。软弱的国王也暗中庇护反日派。十一月二十八日，闵派的一部分贵族企图杀掉金内阁的所有大臣，将李王及其世子领进俄国公使馆而袭击了王宫，但未获成功，反而被逮捕。

在这期间，朝鲜各地发生了武装反抗日本与傀儡政权的、被称为“义兵”的人民自发的起义。其起因是反对金内阁企图效仿日本风俗，强制朝鲜人民剪发而发布的剪发令。义兵在朝鲜各地展开了历经数月的游击战争。春川的义兵力量最强，曾一度传说要攻进汉城。在冠以这年干支而称为乙未义兵的斗争中，朝鲜地方官有十几人被杀，被捕。日本人被杀事件也达四十三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朝鲜近代革命运动史》）。

日本越受到上下的反对和仇视，俄国便越可以毫不费力地插手朝鲜统治阶层。俄国公使魏巴极力支持反日派贵族，同闵派残存的李范晋等一同策划将国王带进公使馆。九六年二月十日，公使从仁川俄国军舰上调遣百余名陆战队开进汉城示威，在当晚深夜即十一日黎明前，李范晋成功地使国王高宗及世子从王宫脱身，将其带进公使馆。国王本人也希望这样。正是因为朝鲜贵族和人民都憎恨日本，才使国王从日军名义上是“警备”而实际上是占领的王宫里脱身的计划获得成功。这在朝鲜近代史上称为国王的“蒙尘俄国使馆”。

国王当天即在俄国公使馆发出布告，将金总理大臣作为逆贼逮捕，当场杀了金与另一大臣，一度逃亡的前代理军部大臣鱼允中也被抓住杀掉。其他金内阁的大臣好不容易流亡日本。另一方面，组成了以金炳始为总理大臣的新内阁。从这时一直到一八九七年二月末的整个一年时间里，国王与政府在俄国公使馆内执政。名义上是执政，但实际上则成了俄国的傀儡政权。两个俄国顾问监督财政与军事，二十个俄国军官训练朝鲜军队。在汉城还建立了俄语学校（山边健太郎《日韩并合小史》）。

俄国缺乏独自向朝鲜输出资本的力量。其主要目标在于从政治上控制朝鲜，把它作为入侵太平洋的据点。因此，便积极引进欧美各国的资本，出卖朝鲜的利权，以防止日本势力的进入。下表就是在蒙尘俄国使馆期间出卖的主要利权：

第1表

年 月	利 权 的 内 容	出 卖 给 何 国 何 人
1896年 3 月	汉城——仁川间的铁路铺设权	美国人 毛尔斯
1896年 4 月	咸镜北道庆源、钟城的矿山开采权	俄国人 尼西金斯基
1896年 4 月	平安北道云山的金矿开采权	美国人 毛尔斯
1896年 7 月	汉城——义州间的铁路铺设权	法国人 顾留埃尔
1896年 9 月	茂山、鸭绿江流域及郁陵岛的森林采伐权	俄国人 布留涅尔
1897年 3 月	江原道金城郡的金矿开采权	德国人 奥尔塔

。 据山边健太郎《日韩并合小史》。

上表中，汉城——仁川间的铁路铺设权虽是日本在甲午

战争中强加给朝鲜的暂定合同条款而夺取的利权，但以日本长期不动工为理由，转让给了美国人。日本对此无法抗争。驻汉城公使小村寿太郎试图找到打开现状的线索，便同魏巴公使会谈，一八九六年五月十四日，双方签订了《备忘录》。其要旨如下（《外交年表》）：

（1）朝鲜国王完全出于自己的意志来到俄国公使馆，但“如无须对国王之安全抱疑虑时”，则日俄两国代表忠告国王返回王宫。“日本国代表在此保证对日本壮士采取严密取缔措施”。

（2）两国代表之目的乃劝告国王任命宽大温和之人士为大臣。

（3）在现实情况下，俄国亦承认有必要为保护釜山——汉城间的日本电信线在特定地点驻扎日本国卫兵，但现在由三个中队组成的卫兵应尽快撤回，而代之以宪兵。但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而且，宪兵亦应从朝鲜政府以自己的力量恢复秩序的地区依次撤回。

（4）为保护汉城及各商港的日本侨民，可以在汉城驻扎两个中队、在釜山驻扎一个中队、在元山驻扎一个中队的日本兵。但每一中队人数不得超过二百人。俄国也可在上述各地驻扎不多于日本兵人数的卫兵。两国士兵——俟朝鲜内地完全恢复稳定，即行撤回。

这是日本对俄国的全面让步。第一项简直等于日本承认了威胁朝鲜国王的安全，而是否将国王从公使馆送回王宫也是俄国一方说了算。第三、四项完全是为了限制日本驻兵，并使日本承认俄国在此以前所没有的驻兵权（只是其人数与

日本相等)。小村公使不久便调任他地，原敬接任(九六年六月)。他在给西园寺外相的《关于朝鲜现状及将来趋向》的报告中写道：“就朝鲜现状概括而言，非但一般官民，甚至包括外国侨民，排日风潮亦颇盛行。不论我行何事，皆欲反对。此种形势，系因一两年来干涉内政之反作用及去年十月八日杀害王妃事所致乃自不待言。”实际上也完全如此。

按照原的观察，现在朝鲜政府有两派，一派是既可以称作美国派，又可以称作开化派的军部大臣李允用，外务大臣李完用和内政大臣朴定阳等；另一派是可以称为守旧派的财政大臣沈相薰和法务大臣韩圭高。当然，两派都在俄国势力之下，但其斗争也还是激烈的。守旧派沈、韩，也暗地里打发心腹与原秘密勾结。他们认为，朝鲜的现状已令人目不忍睹，而现在首先应让国王返回王宫，不然则一事无成。他们正在为此寻求对策。他们说：若国王返回王宫，便装扮成亲俄派入阁，“暗地与日本结合，谋求巩固朝鲜之独立”。这并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另外，对于朝鲜内政，“当日本表示冷淡而不介意时，俄方亦似无意进一步干涉”。从上述看来，“现在之情况迟早生变已无疑问”，那时，有可能出现多少夹杂有日本派的内阁。在此之前，日本应该“采取除确实难以置之不理之事件外，一概不予介入之政策”。——这是原公使的提案。

原公使在十月十二日因临时回国述职而返回东京，会见上月下旬接替西园寺当上外相的大隈重信，汇报了朝鲜情况。但大隈外相没有采纳原的建议，并夸口说，关于日本在朝权益，打算采取强硬方针，已将此事通知了驻东京的俄国公使

《原敬日记》)。但终于没能实行。

在这以前，山县有朋前首相参加了俄皇的加冕典礼，作为特命全权大使在莫斯科同俄国外相罗巴诺夫进行谈判，六月九日签定了《关于朝鲜问题的日俄议定书》。

第一条，日俄两国政府以救济朝鲜财政困难为目的，劝告朝鲜政府注意节约，保持年度收支平衡。若朝鲜政府出于万不得已而需要求助外债，则“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后”援助朝鲜。

第二条，两国政府将于朝鲜在财政经济可以不依靠外援足以保障国内秩序的情况下，“一任朝鲜国”创建和维持由本国人组成的军队及警察。

第三条，日本继续管理现已占有的电信线。俄国保留从汉城到国境的电信线架设权。这些电信线，朝鲜政府“一俟具备赎回手段”，即可赎回。

这一表面看来似乎真是援助朝鲜独立自主的协定，其中附有两项秘密条款。第一条，“无论内外原因如何，若朝鲜国出现骚乱或即将有扰乱安宁秩序之危险，”且两国政府“一致同意”认为有必要派遣军队时，为避免军队之间发生冲突，两国军队均设非军事区的缓冲地带。

第二条，在朝鲜国组织本协定公布的第二条的军队之前，关于日俄在朝鲜国驻扎军队人数相等的《小村·魏巴备忘录》仍然有效。“关于朝鲜国大君主警卫一事，在由本国人所组织的特别负责此项任务之卫队建立之前，均保持现状。”

山县·罗巴诺夫协定，不但是对日俄两国正式的权威代表小村·魏巴备忘录的确认，而且是日本对俄国的新的让步。

以《关于朝鲜问题的议定书》为题、据推测大概是合乎前外相陆奥宗光的意见的文件，猛烈地批评了这一协定。

据此文件，山县在从日本出发时接到了应按其旨意与俄国谈判的训令：无论是只由日俄两国共同扶助朝鲜独立，还是“另外再怂恿其他有关国家扶助其独立”，日本都完全同意。

然而，在议定书中，除规定必要时在日俄同意的基础上出兵朝鲜以外，关于朝鲜将来的根本问题丝毫没作规定。换言之，没有打破俄国统治朝鲜的现状，开辟有利于日本的道路。“俄国通过议定书得到了新权利，而帝国以往所保有之权利却有被削减之感。”

议定书秘密条款第二条，“公开承认俄国留朝鲜国王于其公使馆内之权利”。而且，在小村·魏巴备忘录中，规定驻扎朝鲜的日本士兵，在达到日本人“无受朝鲜人袭击之虑时即行撤回”，因此，对于有无其虑，日本尚可自由认定，而新议定书秘密第二条中，则规定日本军队在朝鲜军队创立时即行撤回。可是，朝鲜军队的创立是由俄国一手承担的，所以，那就是说，日本军队撤出朝鲜的时间是受俄国左右的。另外，日本在朝鲜的电信线，是在日本同朝鲜的谈判中取得的权利，不存在应同俄国重新协商的问题。然而由于这个特意写上去的第三条，致使日本承认了俄国在此之前所没有的电信线架设权。而且日本还承担了他日将电信线卖给朝鲜的义务，这是对日本既得权利的某种削弱。“总而言之”，山县侯爵签署的议定书，“丝毫不能谓之帝国政府已达到预期目的。”（《日韩并合小史》）

可是，长期将国王扣留般地留在俄国公使馆内，不但有损于俄国的国际声誉，而且朝鲜统治阶层也担心长期下去会引起国民日益强烈的谴责。当时在朝鲜，以从美国留学回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为首的民主民族主义势力也正在成长，他们开展了排除俄国、日本，争取朝鲜真正独立的运动。鉴于这种情况，九七年二月底，国王返回到王宫，但俄国控制朝鲜政府的实际情况并没有变化。四月，朝鲜缔结了雇用俄国军官一百六十人的合同。日本政府曾劝告俄国政府不要这样做，但俄国未予理睬。

日本在朝鲜政治上被俄国压倒的同时，贸易上自一八九六年开始也出现了倒退的倾向。九五年以前，日本占朝鲜国出口的百分之九十五点三，进口的百分之七十二点二，到一八九八年则分别下降到百分之七十九点二和百分之五十七点四(参照第二表)。如果日本统治阶层的对朝政策是致力于在经济上把朝鲜变成日本资本的垄断市场的话，那么达到这一目的大概并不困难。但是日本对朝鲜肆无忌惮地进行政治压迫，甚至屠杀王妃，这就使朝鲜民心完全脱离了日本，因而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经济上的倒退。但是，下表的对朝贸易是以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掠夺为主，而不是建立在日本近代产业资本等价交换的原则上的，这种贸易也就不会产生和平政策。不仅如此，日本的目的在于谋求在政治上、军事上控制朝鲜，对仅仅进行贸易是丝毫不能满足的。与贸易和扶植政治势力有关的是获得铁路、矿山的利权以及资本的输输出。但日本无论如何也没有可供输出的民间资本。

一八九七年，先前获得汉城——仁川铁路铺设权的毛尔

第2表 各国对朝鲜国进出口价格的比率 (1893~1904)

年 度	日本	清 国	俄 国	英 国	美 国	其 它
1893 { 进 口	50.2	49.1	0.7	0	0	0
	90.9	7.8	1.2	0	0	0
1894 { 进 口	62.5	35.4	2.1	0	0	0
	88.8	7.0	4.2	0	0	0
1895 { 进 口	72.2	26.2	1.6	0	0	0
	95.3	3.7	1.0	0	0	0
1896 { 进 口	65.8	33.0	1.2	0	0	0
	93.0	5.6	1.4	0	0	0
1897 { 进 口	63.9	35.1	1.0	0	0	0
	90.2	8.2	1.6	0	0	0
1898 { 进 口	57.4	41.7	0.9	0	0	0
	79.2	19.8	1.0	0	0	0
1899 { 进 口	65.1	33.9	1.0	0	0	0
	84.2	13.7	2.1	0	0	0
1900 { 进 口	75.3	23.6	1.1	0	0	0
	76.6	20.9	2.5	0	0	0
1901 { 进 口	61.6	28.2	0.2	0	0	0*
	87.5	9.5	3.0	0	0	0
1902 { 进 口	64.2	35.7	0.1	0	0	0
	78.5	16.4	2.8	0	0	0*
1903 { 进 口	63.3	29.4	0.7	4.3	2.2	0
	80.2	16.3	3.5	0	0	0
1904 { 进 口	70.9	18.9	0.3	2.9	6.8	0.2
	82.2	17.8	0	0	0	0

据林光彻《朝鲜历史读本》。(※与引用书完全相同)

斯已经开始动工。日本政府认为，无论如何也要把这条具有重大军事意义的铁路掌握在日本手中，于是以涩泽荣一、益田孝（三井）、中野武营（股票交易所长）、井上角五郎（北海道煤矿汽船社长）、大三轮长兵卫（银行家）、竹内纲（自

由党干事)等官僚资本家为发起人，成立了其后三井、三菱、安田和大仓各公司也参加的“京仁铁路承办组合”，并由日本政府拨给了巨额的补助款，九七年五月八日从毛尔斯手中买下了京仁铁路利权。这条铁路于一九〇一年十月竣工。

另外，日本通过一八九四年的暂定合同条款从朝鲜攫取的汉城—釜山间的铁路铺设权，也将要在日本尚未开工期间失效，而转让给法国资本家。因此，日本政府与参谋本部惊恐万状，便向朝鲜施加压力，在一八九八年九月重新确保了这条铁路的铺设权（下边马上就要谈到，这时俄国正把全部力量投入满洲，所以在朝鲜便向日本做了一些让步）。但是，由于资金困难，在未能开工之际，日俄间的对立日益激化，参谋本部便强烈要求上述铁路公司提前建设这条铁路，好不容易在一九〇一年八月动工修建。后来甚至发出了补助该铁路公司的紧急勅令，投入大量的政府资金，该路才于一九〇四年十月即日俄开战八个月后全线通车。

一八九八年三月，俄国向中国租借旅顺、大连，还得到了两年前攫取的中东铁路满洲支线的铺设权。从这年至翌年，是欧美列强为瓜分中国竞争得最激烈的时期，俄国也不得不全力以赴。而且在这一时期里，以朝鲜独立协会为先导的朝鲜人民的民族主义运动大力发展起来。一八九八年秋，独立协会在汉城街头举行“万民共同会”的人民集会，谴责卖国政府，在决议中提出了不得同外国人擅自签定利权合同，整理国家财政，以及尊重言论自由等六项要求。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也不得不考虑对朝鲜做一些让步。一八九八年三月，朝鲜政府要求俄国撤走军官和顾问，俄国答应了。出现了原

公使曾预想过的情况。根据俄国的提议，一八九八年四月，外相西德次郎同驻东京俄国公使罗森签定了关于朝鲜问题的新协定，其要旨如下：

第一条，日俄两国政府确认韩国^①的主权及完全独立，两国均不直接干涉该国内政。

第二条，韩国向日本或俄国要求协助时，若非日俄两国事先相互达成协议，不就任命军事教官或财政顾问作任何处理。

第三条，俄国政府承认日本政府在韩国大力发展的工商业企业及日本侨民的为数众多，因此不妨碍日韩两国间工商业关系的发展。

这样，日本在韩国总算在条约上同俄国处于平等地位。这当然是俄国的一大让步，但在第一条中，也反映了朝鲜民族运动的压力。可是，在谈判当中，西外相向罗森提议若俄国将韩国委于日本的话，则日本承认满洲为我利益范围之外。对此，罗森回答说：不能同意将俄国势力完全从韩国排除。由于俄国改变了态度，日本取得了上述的京釜铁路利权。在这前后，日本购进了马山浦的土地，这是日本取得的一项重要军事、政治利权。

根据中日甲午战争经验，日本军部痛切感到战时没有在朝鲜单独占领军队登陆点的不利与不便。于是，从一八九五年末政府开始同朝鲜政府进行在木浦和旗津浦开辟“特别居留地”的谈判。这里所说的特别居留地，即在那里日本政府

^① 朝鲜国于一八九七年八月改国号为韩。

完全独揽行政权和警察权，其费用也不是从侨民中征收，而是由政府开支，具有足以供战时用为军事基地的空间与设施。这同列国在清国攫取的“租借地”一样，只是小一些而已。这同以往为商业和贸易而设立的外国特权的居留地有本质的不同。

这样的要求理所当然地遭到了以俄国为首的各国的强烈反对，朝鲜政府在它们的支持下，一直拒绝日本的要求。接着发生了国王蒙尘俄国使馆事件，就连交涉也都无法进行了。但是，俄国越是凌驾于日本之上，日本统治阶层也就越想在朝鲜取得军队登陆地点，以备一旦有事之用。一八九八年朝鲜政府开辟马山浦、群山浦和城津商港，陆军便趁机策划在马山浦购入五万坪^①土地。同年七月，桂陆相向大隈外相提出了这项要求。桂说，马山浦具备在朝鲜东岸登陆作战的最有利的地形与空间。并说，要以个人、公司等老百姓的名义将此地买到手。政府同意这一主张后，便事先向韩国政府进行活动，以便使日本预定收买的地区不致被划入各国居留地。于是便开始了收买韩国官吏和有权势的贵族及其他活动，终于在年末完成了预定的收买。其费用据说是把临时军费挪用为机密费而筹措出来的。^②

这块土地，是俄国驻汉城公使巴甫洛夫于这年（一八九八年）四月在赐假归国途中，乘军舰靠近马山浦立桩拟行收买的土地。如上所述；对此感到惊慌的陆军则买下了此地，

① 每坪为三·二四平方米。——译者

② 藤村道生：《日本在朝鲜的特别居留地的起源》（名古屋大学文学部研究论文集第三十五期）。

这是日本在朝鲜最初的对俄反击。但是，俄国也向朝鲜政府继续要求转让马山浦的土地，一九〇〇年三月三十一日，朝鲜同俄国缔结了转让马山浦附近土地及其他的秘密协定(《外交年表》)。日本政府为与之对抗提出租借巨济岛的要求，但被拒绝了。由此可见，俄国对朝鲜政府的政治影响依然很强。并且，这年结合镇压中国义和团，俄国向满洲进驻大批军队，对朝鲜也采取了压制的态度。由于以上这些原因，日俄间的紧张关系突然升级了。

2. 马关条约与列强瓜分 中国的竞争

甲午战争作为近代国家间的战争，算是小规模。日本陆军动员兵力约十二万人，包括占领台湾战争的死者在内，这场战争中日军的死亡数为一万七千零四十一人，其中死于赤痢及其他原因的病死者达一万一千八百九十四人之多，战死者不过五千一百四十七人。由此可知，几乎没有进行激烈的战斗。将这一数字同日本在一八六八年内乱中，天皇政府的兵力总数约为十二万人，而战死者约三千六百人，战伤者约三千八百人相比，不论是陆战规模还是激烈程度，可以说都相差无几。虽然是一场小规模战争，然而其结果却有着巨大的意义。这场战争使东亚的政治史一举进入了新的时期，即帝国主义时期。之所以这样是由于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从清国获得领土、赔款、通商三个方面的特权的巨大

的利益和利权。而这种利益和利权在当时的欧美列强中是任何一国也未曾从清国取得过的新性质的利益和利权。

在领土方面，日本不但从清国割取了孤岛台湾与澎湖岛，而且还攫取了接近清国本土中心地区的辽东半岛的广大地区。攫取中国的边境与孤岛，这是英、俄、法已干过的。但是，作为外国攫取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在政治、军事上都属于中国基干部分的地区，这还是第一次。这一地区包括：东从鸭绿江口溯流而上至安平河口，在丹东的北侧向西横穿辽宁省，通过凤凰城、海城、营口的北侧到达辽河口折线以南的地区和位于辽东湾东岸及黄海北岸，属于辽宁省的诸岛。对位于中国中心如此广大的地区，不用说是割取，就是租借也是空前绝后的。列强蚕食中国的新阶段从这里开始了。

辽东成为日本领土，这对早就想割取接近西伯利亚的中国东北边境、进一步南下将满洲与朝鲜控制在自己势力下的俄国，是一个沉重打击。俄国早在马关条约签定六天后的一八九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便怂恿法国和德国干涉日本，认为日本占领辽东“不但经常威胁清国首都，而且与之同时使朝鲜之独立有名无实，此将长期对远东永久和平有所障碍。”因而要求日本“放弃对辽东半岛之实际占领”。而德国驻日公使露骨地谋求本国的帝国主义利益，竟说：“我认为，现在日清媾和的条件实在太苛，有损于欧洲各国及德国的利益，尽管德国受害的程度较小。因此，现在本国皇帝陛下的政府也必须一同提出抗议”，并以武力干涉威胁说：“而且在必要时，将使这种抗议见诸实效。”

对于可能出现的俄国的干涉，日本政府也有所意料，但

没有想到竟会来得如此迅速，如此强硬，而且是同法国和德国共同的干涉。政府为了对抗三国干涉，便想仰赖在东洋同俄国激烈对立、而又同日本友好的英国，但英国外相由于不能不考虑本国利益的缘故，不仅说“不能帮助日本国”，而且还暗中流露出劝说日本听从俄国“劝告”的口气，说“俄国似乎确有采取行动之决心”（四月二十八日）。这样，政府回答三国说，在辽东半岛，除包括旅顺港的金州厅外，其他全部放弃（四月三十日）。三国没有就此满足，这就是说，日本政府应通告三国说全面听从三国的“忠告”而放弃辽东（五月五日）。但放弃的形式，并不是修改已经签定的马关条约，而是照旧批准条约（五月八日批准），即辽东半岛割给日本，然后再还给清国，作为赔偿，索取库平银三千万两（其归还条约于十一月八日签字，同月二十九日交换批准书）。

日本割取辽东半岛，三国对此举的干涉以及英国对三国方面的支持，无非就是日、俄、法、德、英带有新性质的瓜分中国领土斗争的开始。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的各国，没过两年，便分别以“租借”的形式瓜分了中国一些重要地方（后述）。

日本从清国索取的赔款包括：战费赔款库平银二亿两，归还辽东半岛的代价三千万两，以及在上述赔款付清之前而由日本占领威海卫作为保障期间的军费一百五十万两，总计达二亿三千一百五十万两（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日元）的巨款。还没有一个外国从中国攫取如此庞大的现金的先例。当时的清朝政府，财政的穷困已达到极点，根本无法支付这笔巨款。俄、法、德、英便趁此机会向清朝政府提供支付赔

款。一八九五年七月从俄、法借款四亿法郎（利率四厘），九六年三月从英、德第一次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利率五厘），一八九八年三月又从这两国第二次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利率四厘五）。清国用这些借款从一八九五年十月至一八九八年五月付清了对日赔款的总额（换算成英镑为三千八百零八万二千八百八十四镑）。

这年借款的利率并不算高，俄、法借款的偿还期限也长达三十六年，但各国当然并不是出于关心清国而借给巨款的。因为第一，清国是不愿意借也得借。第二，此项借款并非一般的金融交易，而是政治交易。俄国和法国所提供的借款是以海关税这一清国唯一可靠、明显的财源为担保的。俄国企图以此削弱英国人占据的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地位，或取而代之，另外还可以扩大对清政府的政治影响。英、德两国也同样取得了海关税的担保，英国并得到了将来还继续垄断总税务司这一掌握海关实权地位的保证。这两个集团之所以作出“关心”的姿态，无非是为了争夺海关控制权和捞取今后利权的优先权。第三，这笔借款虽然是用于支付对日赔款，但其总额的百分之八十七，实际上一次也没到清国手里，而被借款提供国直接交给了日本。因此，这笔借款丝毫没发挥增强中国国库或经济的作用，只是加大了其债务（雷马著、东亚经济调查局译《列国对华投资》上卷）。

若从另一角度看，就是英国、俄国、法国和德国的金融资本利用日本以赔款的形式大肆掠夺清国之机，对中国开始了新形式的剥削和政治渗透。一八九五年以前，清国政府根本不依赖外国银行或外国金融市场。可是，在因对日赔款而

借款之后，清国政府（还有清朝被推翻后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则被来自世界主要垄断资本主义国家的借款牢牢地束缚住，与此同时，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也日趋严重。到一九〇二年末，清国政府的外债总额达二亿七千九百七十万美元，其中英国占百分之三十九点四，德国占百分之二十八点四，法国占百分之二十二，俄国占百分之九点四，美国占百分之零点八。在这期间，日本对清国尚无一元债权（雷马，前引书）。

在掠夺领土和赔款的同时，马关条约还给了清国第三个新的打击：日本通过该条约第六条取得了欧美列国至今尚未取得的以下四项利权：（1）为日本人新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四市的商港；（2）为日本轮船将长江航道从宜昌延伸至重庆，开辟从上海进入吴淞江和运河而达苏州、杭州的航道；（3）日本人在清国国内购买物资或将日本人的进口货物运往清国内地时，免除存栈税；（4）日本人可在清国的开放城市和开放港口自由从事各种工业活动，并只付所定的进口税，即可自由输入各种器械。关于其产品的国内运输税，其他税及存栈等，应享受与日本人的进口货物同等待遇。

以上的（1）（2）（3），可以说是迄今为止各国从清国所得到的权利的量的扩大，这使各国的贸易和商业活动更加深入广泛，并进一步任意进入到清国内部；而（4）则是取得了资本输出的自由这种质上的新特权。日本所取得的这些通商上的新权利，由于欧美各国与清国所定条约中有无条件享受最惠国待遇的权利的条款，所以很快就适用到各国了。马关条约之所以规定这些条款，特别是第四条，并不是日本资本

主义内在的强烈要求，而是如同陆奥外相所说：“为了各国普遍的要求”所致。日本政府以此期待着欧美诸国、特别是英国对整个和约的支持（前引《中日战争研究》）。

从这时起，英、俄、法、德和美国的资本开始对中国进行事业投资。其中，俄国的投资虽然是采取民间投资的形式，但事实上，由国家资本经营的、军事和政治目的很强的铁路事业几乎占了整个投资的全部。

日本民间产业资本对中国的输出，在日俄战争前只有过试探，而未成功。即一八九五年十一月由涩泽荣一等发起，在东京创立了资本额三百万元的东华纺织股份有限公司，十二月由益田孝等三井集团资本在大阪成立了上海纺织股份有限公司。然而东华纺织公司建厂后一年零七个月未能开工便解散了。上海纺织公司也未能在上海建厂，而以“分工厂”的名义在兵庫建立了纺织工厂，这个厂也于一八九九年七月被合并到钟渊纺织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实在没有输出资本的力量。所以，资本家们甚至反对马关条约第六条第四项。例如，益田考曾向即将赴任的驻清公使林董问道：“清国政府禁止外国开设纺织公司，此大有利于我国，若得以用外国人之熟练技术与清国之低廉工资从事制造，则我国纺织业无论如何难以与之竞争，而马关条约中却有解除此禁条款，是为何故？”（林《后为昔日之记》）。

另外，涩泽荣一以东京商务会会长的名义，就清国政府准备对在清国的外国人制造业的产品课以重税、而上海商务会的外国人对此反对一事，一八九六年十月向政府提出，迫

切希望日本政府支持清国政府的措施。他认为，如果对清国内的产品课以重税，则清国内的制丝、纺织及其他工业便不能发展，而日本的棉纱及其他产品便可进入中国“这一大市场”，日本生丝便可不受中国丝的竞争向欧美出口。因此，日本政府支持清国政府的重税方针，以期阻止清国工业的发展。“夫身为我国人而欲创办工厂于清国者，实为少数，此等少数人之利益应为国家整体之公共利益而牺牲乃自不待言”。（《外交年表》）

因而，不仅马关条约第六条第四款暂时有碍日本资本，而且其它三款日本资本也缺乏利用的力量。一八九七年停泊在清国的贸易船舶的总数中，日本船舶仅占百分之二（雷马，前引书）。就是说，马关条约不论在日本要求辽东半岛方面，还是在捞取赔款方面，以及在开辟外国资本进入中国的道路方面，都为列强帝国主义蚕食和瓜分中国的激烈斗争提供了“起跑”的信号和良机。

由于提供偿还对日赔款的借款而开始在金融上束缚清国政府的各国，又向租借要地和取得铁路、矿山及其他利权进行激烈的斗争。

俄国一马当先于一八九六年五月同清国缔结了下面的秘密同盟条约（李鸿章·罗巴诺夫条约），在建立对日军事同盟的同时，获得了东清铁路铺设权。该条约规定：针对日本国对俄国领土、清国以及朝鲜的任何一方“策划的一切侵略”，俄清两国竭尽陆海军的全部力量互相支持（第一条）；在军事行动中，清国的所有港口在必要时为俄国军舰开放，俄舰在其港口由清国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第三条），同时第四条还

规定：

“清国政府为使俄国陆军顺利靠近受侵略威胁的地点，并确保其抵抗手段，同意建设一条横贯清国黑龙江省及吉林省通往海参崴方向的铁路。

该铁路同俄国铁路之联络，不得成为损害清国领土或清国皇帝陛下主权之借口。

该铁路之铺设与经营，交由俄清银行，为此而缔结之合同条款，由俄国驻清国公使同俄清银行正式协商”（外交时报社编《中国关系条约集》）。

为实施这一条约，同年八月设立了俄清银行。资本为六百万金卢布，其八分之三在俄国募集，八分之五在法国募集，理事会由五名俄国人与三名法国人组成。俄清银行获得商业金融、发行钞票、铸造地方货币、建设铁路及电信的特权，并具有经营商业、一般保险业、运输业及其他各项事业的权限。一八九六年九月，为经营东清铁路的铺设，同清国签定了设立东清铁路公司的合同。其内容有：

“第六条，为铁路的建设、经营及保护，为取得所需土地及沙土、石块、石灰（煤？）等，其所需铁路沿线土地，若为官有地则应无偿交给公司，若为私有地则以时价收买”。

“对公司所属土地免除一切不动产税。

公司对其土地拥有绝对的、排他的行政权。（中略）

对公司的收入，有关旅客、货物的运输及电信等的收入和使用费，免除一切附加税款。但矿山不在此例，有待签署特别协定。

第七条，对于铁路的建设，经营及维修所需要的一切物

品与材料，免除一切关税及一切国内附加税金”（前引《中国关系条约集》）。

这实在是令人吃惊的特权。这样一来，铁路沿线地带简直成了俄国领土，可以用所需物品或材料的名目，不受任何限制进行无关税的输入。而且俄国或清国对该公司不征收任何税款，仅此一点，就比俄国国内公司远为有利。其免税期限规定以全线开通、开业之日起计算，达八十年之久。

俄清银行以东清铁路的修建和经营为中心，开展其章程范围内的各种活动，眼看着日益发展壮大起来。据推测，一八九九年资本达到了九千万金卢布。发行的股票总数六万股中，已有一万六千二百股为俄国政府所有。不仅如此，银行还认购了东清铁路公司的所有股票，并将其全部转交给了俄国政府。这样，东清铁路实际上已为俄国政府所有，但形式上却一直一直是俄清银行所属的“民间企业”（雷马，前引书）。

一八九八年三月，俄国又攫取了日本曾想占据的辽东半岛南端，旅顺、大连地区及其领海的二十五年租借权，取得了在租借地的北方设中立地带（行政权归清国），将旅顺口作为俄国专用军港，将东清铁路由哈尔滨延至大连的满洲铁路及由满洲线至辽东半岛的营口和鸭绿江之间适当地点铺设支线的权利。这样，俄国在一九〇四年拥有了在满洲里同西伯利亚铁路相接，再经哈尔滨至南乌苏里俄清国境的绥芬河的东清铁路干线，包括由哈尔滨至大连、旅顺的支线（南满铁路）在内，共计一千五百九十六英里的铁路。

交付俄清银行八分之五资本的法国，采取的手段则与此不同。一八九七年三月，让清国保证不割让海南岛，翌年

(九八年)四月,在约定不割让邻接越南东京的中国各省的同时,取得了由东京至清国云南府的铁路铺设权,并达成了在清政府邮政业务方面任用法国政府推荐的职员协议。接着又在同年十一月,租借广州湾九十九年。取得了在租借地建筑要塞、驻扎军队、设置其他军事设施及在同邻近的清国领土之间铺设铁路和架设电信线的权利。不言而喻,法帝国主义的用心,就是以当时已经被它占领的印度支那为据点,进而蚕食中国西南部,一边同拥有香港的英国抗衡,一边将中国南部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法国在此之前曾企图占有台湾,但它已被日本占据了。

三国对日干涉之中的另一个国家德国,也不甘落后。一八九七年七月,德国同俄国秘密缔约,德国支持俄国占据旅顺、大连地区,而俄国支持德国占据山东省的胶州湾。一八九七年十二月发生了德国传教士在山东曹州府被中国人杀害的事件,德国舰队借此机会占领了胶州湾。翌年(一八九八年)三月,租借该湾的全部水域与湾口地区九十九年,并攫取了由青岛经潍县至济南及山东省界线和由青岛向西南沂县、转而经莱芜县至济南线这两条铁路的铺设权,以及两条铁路沿线两侧三十华里以内的矿山开采权,规定在山东省内如清国就资本或材料寻求外国援助时,则有优先向德国人提出的义务。德国人租借胶州湾一事,由于俄、德事先的密约而成为俄国迫使清国承认其租借旅顺、大连地区的借口。

英国在列国中获得中国的各种各样的利权最多,垄断了中国进出口贸易的大半。从马关条约第六条中,英国也攫取了最大限度的利益,但对于俄、法、德帝国主义的活动,还是

不甘心袖手旁观。首先，在一八九八年二月迫使清国答应不租借、抵押或割让长江沿岸各省的任何地区给别国。同年六月，攫取了香港对岸的九龙半岛的九十九年租借权，继而又于七月以“旅顺口处于被俄国占领期间”为名，租借了渤海对岸山东省的威海卫，并获得了在与租借地接壤的地区建立要塞及其他军事设施的权利。除以上各国政府的租借地和利权之外，自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〇年的五年期间，以英国为首的欧洲各国资本纷纷涌进清国，并争先恐后地签定了遍布全中国各地的铁路铺设合同：京奉（北京—山海关—沈阳）、京汉（北京—汉口）、津浦（天津—浦口）、沪宁（上海—南京）、陇海（兰州—海州）、同成（大同—成都）、浦信（浦口—信阳）、宁湘（南京—长沙）、沙兴（沙市—兴义）、钦渝（钦州—重庆）、哈尔滨—海兰泡、吉长（吉林—长春）、四郑（四平街—郑家屯）等。但这些铁路的建设并未立即着手，而是在包括日俄战争在内的一九〇二年至一九一一年间逐渐建设起来的（雷马，前引书）。

当时，“铁路是资本主义工业的最主要的部门即煤炭工业和钢铁工业的总结”，关于它“同大生产，同垄断组织，同辛迪加、卡特尔、托拉斯、银行，同金融寡头”是如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问题，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有充分的论述：“建筑铁路似乎是一种简单的、自然的、民主的、文化的、传播文明的事业。在那些由于粉饰资本主义奴隶制而得到报酬的资产阶级教授看来，在小资产阶级庸人看来，建筑铁路就是这么一回事。实际上，资本主义的线索象千丝万缕的密网，把这种事业同整个生产资料私有制联系在一起，把这种

建设事业变成对十亿人民（殖民地加半殖民地），即占世界人口半数以上的附属国人民，以及对‘文明’国家资本的雇佣奴隶进行压迫的工具。”^①

当时，日本的记者也注意到了铁路的这种意义。《太阳》杂志一八九九年七月号“时事评论”的《各国铁路政略》说道：“以干戈征服他国乃十八世纪以前之事，今则不动一兵一卒而扩张领土，这一绝妙手段正盛行于各国之间，即铁路政略是也。试看列国之中国计划。英国现首相索尔兹伯里侯爵近日于伦敦某地演说道：‘铁路技师之远征，延伸国家势力之功，远胜于政治家，外交政略几乎无不借助铁路技师之力，尤其对清政略无非铁路政略而已。’实乃言之有理也。”

在列强如此迅猛地瓜分中国的争霸战中落在后边的，只有欧美列强中的意大利和美国。意大利在一八九九年三月向清国要求租借浙江省三门湾，被拒绝了。这大概是因为它并没有象英、俄、法那样在金融上使清国从属自己，以及不拥有可在东亚炫耀的军事力量的原故。美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中最典型，最早地发展了托拉斯，于十九世纪末达到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它将中、南美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大量投资，但自九十年代以来，也逐渐增加了对中国的投资。据雷马估计，一九〇〇年，其事业投资、证券及清国政府债务和传教财产总额已达二千四百七十万美元。美国金融资本虽一再努力要获得铁路、矿山、森林等利权，但因遇到俄国与英国的阻挠，在日俄战争前已全部归于失败。

^① 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人民出版社 1964 年版第 6 页。

在此期间，美国于一八九七年六月兼并了夏威夷王国，迈出了向太平洋扩张领土的第一步。从这时起，开始拒绝接收去夏威夷的日本移民——当时夏威夷总人口的三分之一是日本人。从一八九九年起，开始排斥美国本土加利福尼亚州的日本移民。对中国移民的排斥则早就开始了。美国资本家在东洋可以肆意横行，却连东洋人在美国劳动的权利都不承认，这就是美国帝国主义的逻辑。那时，美国在中美洲企图利用西属古巴人民的独立斗争的发展，声称帮助古巴人民的独立来夺取该地。一八九八年二月，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发生原因不明的爆炸而沉没。这次军舰沉没，大多怀疑是美国自己炸沉的，但美国政府却捏造说是西班牙干的，硬是挑起战争，不但夺取了古巴和波多黎各，还夺取了关岛和菲律宾，迈出了向太平洋进行领土侵略的第二步。在菲律宾，美国同样口称帮助独立斗争，利用这种手段战胜了西班牙军队，之后比西班牙还残酷地镇压了菲律宾的独立运动。

挑起美西战争的美国海军上校马汉，在以一八九〇年的《历史上的海上权力》开始的一系列著作中，认为只有掌握海上霸权的人才能是世界竞争中的唯一胜利者，露骨地主张帝国主义和扩张主义，受到了美国及外国帝国主义的狂热吹捧。日本海军大学也热心讲授马汉的著作。^①美西战争时的美国海军次官西奥多·罗斯福，是马汉的忠实信徒，他促使对关岛和菲律宾的占领，将菲律宾作为侵犯邻近的中国大陆的据点（之后不久，他当上了副总统、总统）。

^① 海军中校佐藤铁太郎在海军大学的讲义《帝国国防论》，就是马汉理论在日本的翻版。参阅佐藤《帝国国防史论》一九〇八年版序言。

可是，如上所述，这时欧洲各国在中国的势力日益根深蒂固，美国若与之为伍，挤进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竞争，那末在某种情况下甚至要有不惜一战的决心。作为美国，当时不得不竭力确保古巴及中美南美；在东洋，已经为镇压菲律宾的独立斗争忙得不可开交；所以，它不得不暂且放弃以武力加入列强瓜分中国的斗争。这样，九九年九月，国务卿约翰·海向日、英、俄、德、法、意各国政府提出了有名的“中国的门户开放”的建议，其主要内容如下：

美国政府热切希望在中国版图内、特别是在各国的所谓“势力或利益范围内”得到通商与航海上完全同等的待遇。为此美国政府建议在清国“要求利益或势力范围的诸国”，（1）在其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域内，完全不干涉“条约港或既得的利益”；（2）关于装卸在“利益范围”内各口岸的商品，对任何一国的商品均同样适用清国协定上的税率，并由清国征收；（3）以上诸国对航行于“利益范围”内任何港口的船舶课税时，不得超过课于本国船舶的税额，对“利益范围”内的铁路运费，从任何国民所收运费不得高于本国国民的运费，“再三希望”“公开保证”作到以上三条。

总而言之，就是说“在榨取中国油水方面勿另眼看待后来者”，但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承认了这项建议。只是英国说什么门户开放不适用于九龙租借地，法国说什么此原则的束缚力仅限于租借地，各自附上了有利的条件。英国希望扼制俄国进一步侵略中国，俄国也想压制英国，德国觉得同英国相比不利而希望对英国利益范围进行“门户开放”，就这样，各国各怀鬼胎地承认了约翰·海的原则。这本身就是帝国主

义列强之间斗争的一种形式。

而且，在列强之间，即便是为干涉日本而联合的三国之间，也充满矛盾，在对清国提供借款时，德国同俄法对抗而与英国联合，却又在背后援助俄国使之同英国对抗，英俄在激烈对抗的同时又企图联合瓜分、垄断中国的铁路利权，等等，它们的斗争因同在非洲和中近东的势力争夺有关，其表现极为复杂。但对此作全面分析不是本书的主题，故下面只看一下同日本直接有关联的情况。

3. 出兵镇压义和团，占领

厦门计划的失败

日本的统治阶层，由于自己向列强出示了日本通过马关条约弄到手的猎获物，以及提供了猎取的机会与手段，因而不得不暂时咬牙切齿地看着各帝国主义野兽凶猛地扑向中国，瓜分利权和势力范围。

在屈服于三国干涉之前、马关条约尚未签定的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陆军大臣兼监军山县有朋，向天皇理直气壮地上奏说：“臣以为，我国应以本次战争为机取新领地于海外。果如斯，则为其守备必须扩张军备，更何况欲乘连捷之势趁机成为东洋盟主者乎。盖以往军备皆以维持主权线为本，然若欲使本次胜利不致徒劳无效并进而为东洋盟主，则须谋取利益线之扩张。”

山县所说的“利益线”，指的并不是经济利益，而是企图

扩张主权线——在本国领土以外设立的垄断势力范围。然而，就连日清战争的直接目标朝鲜，都未能成为日本的垄断势力范围。虽然取得了一个台湾，但最大的战利品辽东半岛却在为其已经到手而得意忘形时又被打掉了。由于三国干涉而放弃辽东的当时（五月十二日），明治天皇向宫中顾问官兼枢密顾问官佐佐木高行谈道：

“朕意若领有辽宁省半岛将会如何。据闻，该地收入甚微，实不足以供行政与国防之用，若无本国资助则一事无成。或曰台湾有利可图，以其利可充为半岛费用。但难以肯定立即得利，纵令得利，台湾所需费用亦颇巨。”佐佐木听到这里刚要出宫，天皇又接着说：“昨向伊藤（博文，首相）戏言，半岛可不必急取，此次战争已通晓其地理人情，为时不远，或从朝鲜或从某地再战之期仍将来临，彼时取之亦可。”天皇说完“大笑。”（津田茂磨《明治圣上与臣高行》）

天皇谈话的前半部是不甘心认输，后半部则是可怕的“戏言”。有一种说法认为天皇这段话的意思是：尽管天皇本来反对占据辽东，然而伊藤首相出于“外交上的原因”不得已而占据，随后又放弃了，对此伊藤首相痛感自己的责任。天皇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安慰伊藤。听到天皇这番话的佐佐木本人说：“圣上高瞻远瞩，明察他日必有战事发生，至为紧要者乃其精神准备。”因而，天皇政府为了来日的复仇将不折不扣的“卧薪尝胆”的痛苦强加给了国民。

这样，日本的统治者们把重新占据辽东的希望寄托于来日，暂且把着眼点放到新攫取的殖民地台湾的对岸福建省。第二届台湾总督桂太郎中将，九六年七月在递交给政府的长

篇意见书中说：“清国一朝有事。强国将竞相割据其领土以达多年之欲望。当斯时也，苟欲乘风云之变而伸张国势，则事先必有所准备，即将南清福建一带之地归我所有是也。”桂预料了这种反对论，即：如此强行入侵，将会同列强接壤而引起纠纷，辽东半岛已有先例，还是作罢为好，接着对其加以反驳说：“纵然与列强接壤，强国亦不过是扩张版图、造成殖民地而已，其本国主力远在欧洲，且列强之间相互仇视，窥伺时机，处于不能苟安一日之势……乃一目了然，不能扩充其主力于隔绝之异域，……凭借台湾之地利而扶植我之势力于南清，此非惟不难，亦乃地势使之然也”（德富猪一郎《公爵桂太郎传》）。

这个意见书的气魄虽好，但根本不是依赖日本自身力量，而是指望欧洲诸国不向远东派遣主力。以这种实力，无论怎样逞强，所能作到的也不过是于九八年四月，迫使清国答应不向别国割让福建省罢了。企图同列国一样得到该省的铁路铺设权，但未获成功。

在伦敦的驻英国公使加藤高明，为列国入侵中国的激烈情况焦躁不安，九八年四月，当接连地签定了长江沿岸不割让的英清协定、德国租借胶州湾和俄国租借旅顺、大连的协定时，他向本国政府质问道：“帝国政府拥有东洋无比之势力，为何此时却沉默不前，是否于五月收到赔款（从中国）后有采取一雄飞之积极方针？”根据加藤公使的报告，在这以前的三月十七日，英国殖民大臣张伯伦向加藤说：“英国就威海卫承认贵国有优先权。英国不仅对贵国继续占领该地无任何异议，反认为此举同英国政略并行不悖”（加藤传记编纂委员

会：《加藤高明》上）。

当时，威海卫已是日本作为清国付完赔款前的保证而占领的地区。不过退还辽东条约中规定日军在清国付清赔款后三个月内撤出该地。以日本的实力，无论如何也不敢违背这一条约。尽管张伯伦说了以上那番话，但并没有保证，在日本违反条约继续占领、俄国等国再次强烈抗议时，英国坚定地站在日本一边。由此看来，不外乎日本撤兵，而同意由英国租借该地而已（四月二日）。当时，充其量不过似乎取得了一点儿英国的帮助，即：“同时，日本政府希望英国政府在日本政府为自身的稳固、或增进其利益而有所需求时表示同情并给予援助”。但对于日本在这时正在进行的上述不割让福建和取得该省铁路铺设权的谈判，英国却丝毫没有支持日本提出的铁路利权的要求。

日本在此期间得到的唯一利权，就是一八九九年四月官营八幡钢厂长官同清国招商局长官签定的合同，这项合同规定：在今后十五年间日本每年优先购买（清国在向日本出售前不得售于他国）大冶铁矿矿石五万吨（或更多）；清国汉阳铁政局及其它官营工厂每年从日本进口三——四万吨煤。由于比利时、德国、英国的资本与技术已深入大冶铁矿的生产经营中，所以在日本缔结上記条约后，一直企图垄断该矿的德国便向日本提出了抗议，同时向清国提供了年息四厘的四百万元借款，以期垄断大冶的利权。日本为与之对抗，终于在一九〇四年一月（日俄战争即将开始时）由兴业银行提供了三百万元借款（年息六厘，期限三十年），从而签定了“不得把大冶矿山租借、割让给列国或出售其矿石”、“日本

不得购买大冶矿山以外的矿石”的合同。日本之所以能以远远苛于德国的借款条件签定这项合同，据日本方面指导这次谈判的元老井上馨的传记记载，归根结底是由于“强调同文同种日中亲善这一大义而成功”的（井上馨侯爵传记编纂会编：《世外井上侯爵传》五）。即便果真如此，其“大义”的根本亦在于：一九〇〇年的镇压义和团，已经实际证明了当时日本在东洋可以立即动员的兵力是最大最强的（后述），英国由于欣赏这一力量，才缔结日英同盟，在这次大冶谈判中才得到了英国的支持。

尽管日本统治者插手于列强瓜分中国斗争的力量是如此之弱，但他们丝毫没有为此而消极，虎视眈眈地窥伺着“扩张利益线而为东洋盟主”的一切机会。在他们看来，这种机会在一九〇〇年列国共同镇压义和团反帝斗争时来到了。

随着日本与欧美列强对中国侵略的扩大与激烈，中国人民对侵略的反抗也扩大与激烈起来。清朝皇帝和高官们除保护自身权势以外，对其它概不关心。他们比起害怕外国帝国主义来更害怕本国人民，甚至毫无顾忌地为镇压人民的斗争而接受外国的援助（如太平天国起义时）。因此，清朝政府俯首帖耳地屈服于外国，而以农民为主的中国人民大众，却自鸦片战争以来不断加强了对侵略者的反抗。在列强的侵略进入新阶段的甲午战争以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也进入了新阶段。一八九七——九八年在安徽、江苏、河南一带，一八九八年在广西，一八九八——九九年在四川和浙江，都发生了大规模的农民反帝起义。山东与河北农民的骚动也日益加剧。

在山东的农民中间，十八世纪末兴起了一种叫“义和拳”

的咒术，人们相信在使用这种咒术时，虽刀枪子弹亦不能伤害身体。因为义和拳使农民们团结起来，发展了对清朝和地主阶级的武装斗争，所以清朝政府屡次出兵讨伐，几年来似乎已经绝迹。可是，由于胶州湾与威海卫被德国、英国夺去，外国帝国主义在山东飞扬跋扈，外国人的极其残暴，致使农民时常袭击外国人，捣毁或烧毁基督教堂。每当发生人民与外国人冲突的事件时，当地官员经常偏袒外国人而镇压本国人。即便是处理中国的基督教徒同非教徒之间的民事诉讼，官员也害怕基督教徒背后的外国神父而作出对非教徒不利的判决。人民看出只有通过自卫的道路，用武力同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进行战斗。这样义和拳便复兴了，于一八九九年五月前后成立了名为义和团的组织。

一九〇〇年初，在胶州附近的高密县，为阻止德国铺设铁路，发生了以义和团为主力的数千农民的起义。之后，义和团斗争很快由山东发展到河北省一带。山西、陕西、广西、福建和云南人民也揭竿而起。不久，义和团为了横扫一切外国势力，高举“扶清灭洋”的大旗，开始向各国公使所在地的北京进击。五月末逼近北京。欧美各国与日本四月初在大沽集结舰队。五月二十八日，驻北京的列国公使团决议从舰队调兵到北京。三十一日，作为第一批先遣队，俄国、英国、法国、美国、意大利和日本的总计四百五十人（日军二十五人）的军队到达北京。兵到不久，北京便被义和团包围。六月十日，驻北京的外国使团同外部的铁路联系和电信电话全部被切断。十一日，日本公使馆书记员杉山彬出去迎接列国陆战队，在出北京永定门的地方被清兵杀掉。十三日，义和

团进入北京市内，把各国使馆区围得水泄不通。

日本政府（山县内阁）从一开始便针对义和团制定了同各国协作联合的方针，令日本士兵参加了五月末派入北京的各国联合部队。六月八日，当英国向各国提议置清朝政府于不顾，而以各国联军镇压义和团时，日本政府也立即表示同意。但山县首相和桂陆相，一方面担心被各国撇在一旁，另一方面又看透了这样一种情况：如果各国为镇压义和团而需要大批部队的话，便不得不依赖距中国最近的日本。为使日本的出兵尽可能以高价卖给各国，故不轻易出兵，而坐待各国前来求援。桂认为，只有各国乞援之时，方是日本出头之日；只有日本成为镇压义和团的主力，“才是将来掌握东洋霸权的开端”。

参谋本部早就制定了出兵动员计划，作好了准备。在特地让参谋总长列席的内阁会议上决定了派遣陆军部队。当时还准备讨论派遣兵力的数量，但参谋总长大山岩坚持，“关于是否出兵，固然应由内阁作出决议，但关于其兵力及编制等，应委任本职调查决定”，终于没让政府讨论兵力的数量（陆军省编《明治天皇传记资料明治军事史》以下简称《明治军事史》）。而且，在决定出兵后，参谋总长立即将事先准备好的临时派遣部队编制要领递呈天皇，得到批准，编成了二千五百人的清国临时派遣部队，任命福岛安正少将为司令官。部队自六月一日起依次离开宇品港开赴大沽。

在上面提到的《明治军事史》中，记载有十五日内阁会议后山县首相“因有辞职之意蒙赐优渥圣旨”，编者对此解释说，“大概是在出兵华北问题上同大山参谋总长意见不合之结

果”。具体是什么缘故搞不清楚，或许是由于山县对参谋总长没让政府讨论兵力数量一事甚感愤慨而欲辞职的。关于对外出兵应该多大规模，政治观点比军事观点更为重要，尽管如此，就连身为陆军缔造者的山县大将，以首相的资格都压制不了总参谋长，竟然声称不让政府介入一切有关部队的编制和动员事宜，可以说，这是后来军部独裁的开端。

与东京决定派遣陆军部队同一天的六月十五日，在中国的各国舰队一齐开始攻击大沽炮台，日本有三艘军舰和三百名陆战队参加。十七日占领炮台，进而开始进攻天津，但联军的兵力显然不足。于是日本在福岛部队尚未离开日本的六月十八日，决定动员临时派遣部队编制的全部兵力；六月二十六日，将铁道大队与野战炮兵大队配备到第五师团，派往大沽。在此前后，英国在六月二十三日、二十七日和七月五日三次强烈要求日本增派部队。日本虽然如上述那样，独自进行了增兵准备工作，但在接到英国的请求之后，才装出慨然应允的姿态让部队出发。这样，日本的出征兵力达到二万二千人。七月八日英国向日本政府提议说：“日本国乃唯一为达到救援北京外国公使馆这一紧急目的能采取有效行动之国家”，因此，日本若能迅速增兵，英国将提供财政上的援助。接着在七月十四日又提议：若日本立即再增兵二万，英国将提供援助资金一百万英镑。正中山县和桂的下怀，政府便开始准备进一步增派一或二个师的兵力。

英国如此强烈要求日本大规模出兵，美国也予以支持，但俄国和德国、法国并不愿意。俄国于六月末发兵六千，之后又从西伯利亚向满洲派遣大军，大量屠杀起义的中国人，

七月末占领南满的牛庄，继而占领营口。其投入主力的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营救在北京的公使馆，还不如说是为了整顿在满洲的阵势。这时在清国的德国军队仅有五百人，但预定将由瓦德西元帅率领一万五千人来，德国得到俄国的支持后，要求任命该元帅为联军总司令官。德国的这项要求得到了各国的同意，但瓦德西和德国大部队到达大沽时，已是攻下北京城后的九月二十五日了。

七月十五日，联军占领天津，七月末，日本、俄国、英国、法国、美国、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八国联军总数三万三千人（其中三分之二是日军）开始向北京进击，八月十五日占领北京。至此，营救公使团的目的已经达到，但联军连续三天在北京肆意放火、凌辱、掠夺。而且是在军队司令官们与公使团的承认之下！构成联军主力的日本军，在这场掠夺中也同样是主力。

日本政府想趁此机会一举挽回迄今在瓜分清国过程中的落后处境。早在这以前的六月十八日，驻北京的西公使就向青木外相建议说，结合追究杉山书记员被清兵所杀的责任，一举取得自本年四月向清国要求的横贯福建、浙江、江西三省的铁路铺设权^①。另外，驻上海代理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也向青木外相提出了迫切的希望^②：对于长江一带及沿海一带的“警备”，除英国和日本以外，任何国家都无力担当，

① 河村正夫《庚子事变与日本》（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一九五七年秋季号）中有详细记载。

② 《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三卷别册《庚子事变》上。另外，此项所引史料，除特别注明者外皆据此书。

因此，“为趁此空前大好时机……伸张帝国于该国之势力”，日本应向该地增派军舰，并根据形势“先于他国采取适当措施”。

北京陷落五天后的八月二十日，山县首相在作为“庚子事变善后对策”与各国“共同处置”清国的同时，作为日本的“单独处置”主张：除已迫使清国宣布不割让福建省之外，进一步“将浙江划入我势力范围”，并根据形势把江西的一部分也包括到势力范围中去。把朝鲜也务必置于日本势力之下，但为此“须有同俄国一战之精神准备”，彼时英国“是否以干戈助我”也有疑问，故入侵朝鲜应期于他日，而现在要谋取“北守南进”。这时，政府、陆海军及台湾总督府已制定了占领厦门的计划，只是在等待着将其付诸实施的机会。

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与民政长官后藤新平，自去年六月以来一直强烈主张占领厦门，说将福建省置于日本统治之下是统治对岸的台湾所必不可少的。他们按照这一方针，一九〇〇年一月在厦门设立了台湾银行分行，四月后藤民政长官在厦门、福州地区巡游了一个月。当义和团斗争发展起来和福建地区的民众也开始奋起反抗时，儿玉、后藤企图趁此机会实现由来已久的野心。虽然不清楚他们同本国政府和陆海军之间密谋的经过，但于八月十二日，山本权兵卫海相除已在厦门的“和泉”军舰之外，又向厦门方面增派了两艘军舰，十四日向“和泉”舰长训令说，要事先制定厦门炮台的占领计划，若该地区发生“不稳情况”或有“可乘之机”，即迅速占领该港。这项训令通过陆军大臣传达给了台湾总督。接着在二十二日，大山参谋长把准备发给台湾总督的训令上奏天皇，

得到了批准。这项训令的内容是：若和泉舰长请求时，应迅速将台湾军的步兵一营、炮兵二连、工兵一连以内的兵力派往厦门，协助海军占领该港，为此要作好准备。翌日，这一训令由陆相以“奉诏”之名传达给了儿玉总督（《明治军事史》鹤见祐辅《后藤新平》第三卷）。

翌日上午一时许，厦门的本愿寺传教所不知被何人烧毁。日本方面认为这是“暴徒”所烧，令“和泉”陆战队立即以“保护侨民”为借口登陆。第二天（二十五日），又从“高千穗”增兵，二十八日向三艘军舰发出急航厦门的命令。当天上午九时，台湾也依照预定计划令二连士兵从基隆港出发。按计划，后续部队将继续出发。

被烧的本愿寺传教所是租的房子，而且在事件发生前两天，传教僧也携带所有家当转移到其它地方去了。所谓被暴徒所烧是弥天大谎，实际上是传教僧自己按照儿玉总督的密令放火烧的。日本的捏造已经为清国的官宪和美国及其他各国领事所识破（铃木良《走向帝国主义之路》；《近代日本的争论点》中卷）。在台湾军出发的二十八日，厦门的英国、德国、美国三国领事向日本的上野领事提议：清国官宪已采取保护该地外国人的一切必要措施，希望日本的军队与大炮立即撤回。同日，清国的闽浙总督也向日本政府拍发了严重抗议的电报。

政府慌了手脚。元老伊藤博文早就强烈要求山县有朋首相在北京陷落后尽快撤回日本军队，在得知出兵厦门后，表示了强烈反对。就连山本海相也开始反对。他认为自己发给“和泉”舰长的训令的意思只不过是命令他们预先研究好需要

占领厦门炮台时的行动方案，因而强烈反对陆军出兵，这在海军大臣官房编纂的《山本伯爵实历谈》（一九二六年）有记载。但海军参与此项计划一事，即便从《后藤新平》第三卷的各种资料来看也是没有疑问的。不能令人相信首相、陆相、参谋总长全部误解了海相发给“和泉”舰长的训令。但不管怎么说，在各国的抗议面前慌了手脚的海军方面开始反对出兵，大概是事实。这样一来，山县首相和桂陆相等也只好死心作罢。二十八日夜十时许，儿玉总督收到了陆相的电令：停止实施占领厦门炮台计划，撤回已经派出的部队。儿玉、后藤虽深感愤慨，但也只好停止出兵。

三十日，厦门的英国领事在市区张贴布告说，“由于日军登陆造成人心恐慌，故英国已派陆战队登陆”，美国领事也说将派陆战队登陆，并传说美、法、俄三国的军舰今明日内开进厦门港。儿玉总督向政府发电说，“如今帝国威信扫地，已无应付外交局势之人。”

占领厦门的失败，重重地给了日本统治者当头一棒。他们认识到：桂那种从台湾开始行动则占领福建易如反掌，欧美列国无从阻挡的以往的不可一世的想法，是一个严重的错觉，日本若无欧洲某一强国的支援，不可能向中国扩张领土。而且这时，俄国已向满洲派遣了大军，甚至企图统治整个满洲和朝鲜。日本的统治者们便暂时放弃了南进，而竭尽全力地去阻止俄国势力向朝鲜和满洲渗透。

山县内阁在这次失败的打击下，于十月总辞职，由伊藤博文组阁，外相由早就强硬主张与英国结成同盟而对抗俄国的加藤高明担当。

4. 太平洋争霸与日本

日本在二十世纪初期的处境是，无论在邻近的朝鲜还是中国，都无以单独同列强对抗。然而即便在这期间，日本统治者也决没有白白地放过任何一个他们认为可以向太平洋扩张帝国主义势力的机会，哪怕这种机会再小。他们的帝国主义积极性不亚于任何人。这一事实，可以从日本政府、陆海军在一八九七年美国兼并夏威夷时以及对美西战争和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态度中看出来。

前边已经提过，当一八九七年美国兼并夏威夷时，日本的新移民不仅在事实上被拒绝，而且当时占夏威夷人口三分之一的日本人的财产及其它条约上既得的权利和利益也受到了威胁。于是，政府在一八九七年四月二十日以保护侨民为名向夏威夷派遣了“浪速”军舰。这是日本反对美国兼并夏威夷的强有力的示威，至少美国是这样认为的。在此以前，政府认为夏威夷现状的改变不应由美国独断专行，而只能在与太平洋有利害关系的各国协商后才能进行，因而反对美国兼并夏威夷。三月三十日呼吁英国政府对美提出联合抗议，但英国没有同意。于是日本竟单独采取了示威行动。

不仅如此，驻美公使星亨在夏威夷兼并条约已经签字的六月十六日，还向本国政府拍发密电说：“就唯一可以遏制兼并夏威夷国方法提供愚见，即利用日夏两国目前关系，以要求赔偿损失为名迅速派遣强大军舰占领该岛。”政府认

为，此策即便有效，也为时已晚，如若蛮干，“则恐有促使日美两国冲突之后果”，因而没有采纳（《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卷。《大隈侯爵八十五年史》二）。结果，关于赔偿居住夏威夷日本人的损失及确保其既得权利的问题，决定在国际法庭争辩，“浪速”军舰于九月上旬返航。当时作为同日本实力相应的结局，也仅能如此。然而竟敢远向太平洋东岸派军舰进行反美示威，这说明在帝国主义竞争中不甘落后的天皇制度的积极性已经相当可观。而且，这时的内阁首相是松方正义，外相是大隈重信，据说是在三菱的后援下成立的、同大资产阶级密切结合的内阁，而并非军人内阁般的“勇敢”政府。

下边看一下菲律宾问题。在美西战争约二年前的一八九六年八月，菲律宾人民在阿奎纳多的领导下举行了最初的争取独立的武装起义。这一斗争于同年底已一度达成妥协。这时日本刚刚占领台湾，但独立起义发生后，台湾的陆军参谋部便派楠濑幸彦中校去菲律宾进行实地调查。楠濑在进行了几个月的调查归来后，决定为今后经常弄到菲律宾情报而派遣人员，任命他的土佐同乡、当时的台湾铁道队会计员坂本志鲁雄（弔民）担当这个工作。坂本在九七年三月去当地任职。

一八九八年四月，美国开始对西班牙作战，五月，在菲律宾也将杜威提督指挥下的舰队开进了马尼拉湾。日本政府一边于四月三十日宣布局外中立，一边在五——六月声称“观战”，将“秋津”、“浪速”、“松岛”三艘军舰派往菲律宾方面。这显然是为了监视美军。

杜威提督五月十九日在旗舰上邀请流亡的阿奎纳多，一本正经地约定说，美国保护菲律宾人，承认其独立，决不会取代西班牙变菲律宾为殖民地。阿奎纳多欣然上陆，立即将人民组织成军队，到处击败西班牙军，六月二十三日在卡维泰宣布成立“菲律宾共和国临时政府”。到七月末，阿奎纳多军解放了除马尼拉及其周围以外的吕宋岛全境，八月一日各州代表在卡维泰举行庆祝典礼，宣布“菲律宾群岛人民独立”。然而，八月十二日，在菲律宾人民一无所知的情况下，美西之间宣告停战。翌日，美军占领马尼拉市，禁止菲律宾军开进市区。

九月一日，大隈外相向驻美代理公使中川发训令说，赞成美国统治菲律宾，可提议日本也将协助美国。训令很显然是说，“纵然成立无外国保护、纯粹土著居民组织之政府”显然也是无法维持秩序的，“其结果，（菲律宾）必将成为食欲强烈之其他外国之良饵”，并接着提出下列建议：“帝国政府虽无向菲律宾群岛方面扩张领土之野心，然也切望维持东洋和平与远东权力之正常平衡”。因此，“完全同意”美国统治菲律宾。但若美国政府对单独统治感到犹豫，则日本“因与菲律宾领土接近而利害相关，故希望在两国或三国担保之下，按适当条件，就该领土计划组织政府一事，单独或与同样有利害关系之其他国家一起同合众国合作”（《外交年表》）。

其意是，日本也参加对菲律宾的统治。美国对此不予理睬。十二月十日签署了美国·西班牙讲和条约，菲律宾成了美国领土。

阿奎纳多等菲律宾革命党对美国的失信感到愤慨，展开

了摆脱美国、争取独立的新的武装斗争。在大隈外相发出上述训令同一天的九月一日，革命党代表向马尼拉的日本领事请求援助（《外交年表》），但领事没有答复。在这以前的八月十五日，坂本志鲁雄向台湾陆军参谋部建议：“我国今日如不占领马尼拉而扶植皇威于该地，则美国之势力将蔓延诸岛，必将有损于东亚神国之自由与发展。宜迅速寻求计谋，援助阿奎纳多军，以帝国之力完成其独立”，“若有帝国军部之承认，委小官以陆战队一大队，则唾手立食之间即可取马尼拉城”。对此，台湾军也听取了中央的方针，中央指示说：“南方经营此时尚系理想而不宜实际着手”，要始终严格保持中立（尾崎卓尔《弔民坂本志鲁雄》）。

这是日本政府、陆海军公开的态度。但参谋本部在暗地里却有援助革命党的事实。

一八九九年二月，在菲律宾独立军开始对美战斗的同时，“在外菲律宾委员会”书记阿里阿诺·彭赛来日本筹集武器弹药。当时中国的孙文也在日本，他认为率领兴中会的同志援助菲律宾独立军，是有利于中国革命的。一天同彭赛会谈后，二人共鸣之处颇多。从此，孙文最信赖的日本人宫崎滔天、平山周等便与彭赛亲密起来，共同为筹集武器而展开活动。

在日本，要筹集武器只有接受军部的支援。于是，犬养毅、志贺重昂等出面，林学博士中村弥六通过犬养的介绍参加这一活动。中村与陆军次官中村雄次郎商谈，并与参谋总长川上操六接头。川上支持这一运动，不顾外相青木周藏的强烈反对，把武器弹药由陆军处理给大仓组，大仓组将其转卖给中村的熟人、名叫温伯格的德国人，再由他转交给彭赛。

彭赛等人在武器确实到手时，从三井物产买下“布引丸”轮船，等待装船的良好时机。

在武器装船之前，台湾陆军部的参谋大尉原禎（近藤五郎）——曾在美军攻下马尼拉时同坂本一起去该地活动——脱离军籍，同陆军预备役军官、下士官四人及平山周一同去马尼拉参加阿奎纳多军。

一八九九年七月十二日，布引丸载着武器弹药从神户起航。但于二十一日在上海港外遇暴风雨而沉没，人员、武器和轮船全部沉入海底。

彭赛、孙文和宫崎并没有甘心作罢，再一次到处活动筹集武器。在眼看就要成功的时候，菲律宾独立军被麦克阿瑟将军指挥下的美军打败。一九〇〇年三月阿奎纳多被捕，不久便全军覆没。

以上筹集武器之事主要依据《东亚先觉志士纪传》上卷，参考了入江寅次的《明治南进史稿》。《纪传》的记事，时间、地点不明确，多有“暧昧”之语，故不能全部相信。《南进史稿》的记述是科学的，只不过里边完全没有关于参谋总长和陆军次官参与的记载。可是陆军首脑参与其事是有确凿证据的。《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二卷“布引丸事件”中，有一八九九年五月三十一日大浦警视总监写给青木外相的秘密报告。其梗概是：东京摄影师铃木真一受彭赛委托，请求川上大将筹集武器弹药，大将同桂陆相和福岛上校商谈后决定拨给毛瑟枪、施奈德枪总计六万支。但到十二月下旬，政府接受了美国不要援助菲律宾人的请求，因而取消了上記拨给枪支的决定。铃木委托胜海舟再次向川上、桂做工作，领取了报废

的旧枪的样品。这个报告说川上、桂等应政府的要求停止了拨给枪枝，不知是否果真如此。

另外，根据警察的调查，中村弥六所有的布引丸轮船，七月十三日从神户起航，在门司装载航海用煤五百吨和弹药约三百吨，经长崎开往上海，二十一日在上海附近因海难沉没。其弹药是大仓组转卖给横滨温伯格商会的。对这一事实，外相在寄给驻美公使的文件中最后这样说道：“该船是否确有向菲律宾叛军提供弹药之目的，至今亦无从判断”。并且文件还说，因布引丸是被指定为沿海航行用船，故门司、长崎海关没对其货物作任何检查。布引丸是否只装弹药而没装枪？是否实际上枪也装了，然而由于不愿说出离港前没有扣留装载非法枪支弹药的轮船而只说装弹药的呢？

武器弹药的筹集，即便只是弹药，若无陆军的支援也是不可能的，只能说参谋总长和陆军大臣至少是默认了的。台湾军参谋脱离军籍去参加独立军一事也是如此，即便不能说是上边的命令，大概也是在得到其承认的基础上才可能作到的。在军队最上层的暗中支持下，象原那样的天皇制军国主义尖兵、象宫崎那样的真正为亚洲民族解放而战斗的人士、再加上投机者——在《太阳》（九九年九月）上发表什么：若日本以六亿元从美国承揽下征讨菲律宾的任务，则可捞取三亿元并可同时扩张军备和减税——中村，各自怀着不同的目的进行的冒险，这就是布引丸事件。而且政府的公开态度是同意美国统治菲律宾，期待着美国对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也表示好感，但在背后却默认上述那样的民间活动。若将这一事件从它同后来的桂·塔夫脱协定（参照本书 215 页）及政

府、军队、“大陆浪人”之间的对中国的活动的关联来看，则这一事件作为日本帝国主义形成方式的重要特征，有很大的意义。

第二章

资本主义的确立

1. 资本主义产业的确立

天皇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甲午战争中取得了胜利，从而呈现出列强瓜分东亚的新形态，即近代帝国主义形态；同时，它本身也一头闯进了这种新的瓜分争霸的斗争。不仅如此，它对同美国在太平洋的势力争夺，也表现出一定的欲望，尽管是被动的。并向镇压中国民族伟大的反帝斗争——义和团起义——的八国联军，派出了主力部队。以山县为首的执政者们为这次日本也能加入“列国同盟”、列强“伙伴”而感到心满意足。就是说，在这种时候，日本也不折不扣地加入了近代帝国主义的“同盟”、“伙伴”之中。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可以说日本自这时起也成了帝国主义。

可是，毋庸赘言，当时的日本经济尚远未发展到体现近代帝国主义经济实质的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因而在政治上也无从出现金融寡头制。那末，难道说日本的“帝国主义”，只不过是采取了近代帝国主义的行动方式，而在定义上则单纯是以前的天皇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世界史上的帝国主义阶段吗？难道说资本家阶级在国内国际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只

是停留在同甲午战争前没有本质区别的尾随绝对主义吗？不是的。日本资本主义以甲午战争为转机取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从而自己站立起来，资本主义本身有了向海外扩张的要求，资产阶级给天皇制以强有力的影响，而天皇制也离不开资产阶级的协助。

甲午战争的战费，包括善后费在内，约为二亿三千万元，其中百分之七十五为物件费。战费支出使以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和大仓为首的大官僚资本家获得了空前的巨额利润，这笔收益为他们在战后扩大、创建事业奠定了雄厚的资金基础。而且政府和议会一致推行的大规模的扩张军备，也促使特权资本家进一步壮大起来。

山县总参谋长在甲午战争尚未结束时就主张战后扩大军备，以作东洋霸主，而以天皇为首的政府、陆海军首脑、统治阶级由于三国干涉而被迫归还辽东半岛时，就进一步一致坚定了扩张军备以待来日的决心。一八九五年十一月召开的第九届议会通过了这样一项提案：从九六年度开始，陆军新设六个师及骑兵两个旅、炮兵两个旅，使现役兵力为甲午战争时的二倍以上；海军方面作为第一期扩军计划，通过了建造大小舰艇三十九艘的提案。陆军的扩军计划到一九〇二年全部实现，部队的装备进一步得到了改善。至于海军，紧接着第一期扩军计划之后，在第十届议会上决定了第二期扩军计划。按照这一计划，在一八九六年至一九〇五年的十年期间，建造装甲战舰四艘，一等巡洋舰六艘，加上其它舰艇共计九十四艘，还有辅助船舶五百八十四艘。预算总额为二亿一千三百一十万元。这项计划同样出于对俄关系上的原因

提前付诸实施，到一九〇四年三月舰艇建造超额完成。战舰和一、二等巡洋舰与原计划相同，驱逐舰约为原计划的二倍，建造了二十三艘，其它多少有所变动，总计建造舰艇一百零六艘，总吨位约为十三万吨，继英、法、俄之后为世界第四海军大国（俄国约为二十万吨）。

在进行上述直接军备扩张的同时，政府还在“战后经营”的名义下为加强、扩大军备产业基础投入了大量的经费。例如，从一八九七年开始，以一千二百五十万元着手建设国营八幡钢厂，一九〇一年五月投入生产。八幡在投入生产的第一年度生产的生铁和钢，分别占国家总产量的百分之五十三和百分之八十三。所用原料是以帝国主义手段霸占的中国大冶矿石，这在前边已经说过。但是，在一九〇一年至一九〇五年期间的国内平均自给率，生铁为百分之四十五点二，钢仅为百分之十四点五。对以八幡为首的国营军工厂的投资总额，自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三年，从三百一十七万元增加到二千三百四十四万元。国有铁路从一八九四年的九百二十九公里延长到一九〇四年的二千二百八十六公里，同时期私有铁路从二千四百七十三公里增加到五千二百五十三公里。另外，造船奖励法和航海奖励法（均为一八九六年立）规定，对吨位一千、时速十海里以上的铁皮船的建造和海外航线的开航提供补助金。这里面也有加强战时军事运输能力的目的。

以大规模扩军为中心的这些所谓“战后经营”，其所需费用的第一来源，是从中国索取的赔款。包括归还辽东半岛的补偿费在内，赔款总额为三亿四千七百二十五万元。其中：

二千万归为皇室私有财产，二千万用于备灾款和教育基金（各一千万），一千二百万元补助九八年度一般支出，总计五千二百万元。其余的二亿九千五百二十五万元，全部转入临时军费特别支出，用作陆海军扩军费、钢厂创建费及其它直接军费；就连备灾基金在必要时也可挪用为军费。因此，可以说，甲午战争的赔款全部用于增加皇室的财产和下次战争的准备了。

这些还不够用，政府、统治阶级便叫国民大众饱尝“卧薪尝胆”之苦。一八九六年，除增收酒税外，还增收了营业税，即无论工商业者有无收益，一律征收以资金、营业所面积、职工人数和其它项目为基础的税款。还征收其它新税，并将卷烟改为政府专卖。通过这些，平年度增收税款二千六百万。另外，九八年政府还进一步计划大幅度提高地租（从地价的百分之二点五提高到百分之四）和增征酒税，这些于九九年实施。翌年又以酒税为中心，在甲午战争后第三次强行增税。这样，战前一八九三年的七千万余元的税收，到一九〇三年增加了一倍，为一亿四千六百一十六万元。

此外，政府还从甲午战争后到日俄战争前发行了总额达三亿八千万余元的铁路公债、事业公债和其它公债（其中包括下面将要谈到的外债）。九六年末尚未偿还的国债为三亿五千一百万元，而一九〇三年末竟达到五亿三千八百万元，增加了约二亿元。

第3表

军费比率

年次	一般支出与临时军费的纯计	直接军费	比率 %	
1893	84,582	22,832	27.0	
1894	185,299	128,427	69.2	} 甲午战争
1895	178,631	117,047	65.5	
1896	168,848	73,408	43.5	陆军扩军十年计划, 海军第一次扩军开始 海军第二次扩军
1897	223,675	110,543	49.2	
1898	219,758	112,428	51.5	
1899	254,166	114,308	45.0	
1900	292,750	133,174	45.5	出兵镇压义和团
1901	266,857	102,249	38.4	
1902	289,227	85,763	29.6	日英同盟条约
1903	315,969	150,915	47.6	
1904	882,218	672,960	81.8	} 日俄战争
1905	887,937	730,580	82.3	
1906	696,751	378,728	54.3	

据大藏省昭和财政史编辑室《昭和财政史》IV“临时军费”。

这样，甲午战争后，国家预算规模逐年膨胀，其中军费所占的比例，只有一九〇二年不到百分之三十，其它年度通常均为百分之四十五至百分之五十。第三表中，将陆海军省费、临时军费及征兵费的合计作为直接军费，表示出了同一般支出和临时军费的纯计的比率。

这种不断地增税和发行公债，压迫了金融市场，使之在一般情况下难以进行民间的资本积累，因此帝国议会曾反对

过增税和扩军，而从民间——以农民为主的广大劳动群众与中小业主——搜刮到政府手中的货币，再向民间——但不是农民和中小业主、而主要是以特殊官僚资本家为中心的大资本家、大商人，以华族为首的全国的大地主——回流，成为企业资本。这样，由国营企业和同政府结合的特权资本的企业作为先导，资本主义产业迅速发展起来。第四表归纳表示的，是自甲午战争前一年的一八九三年到日俄战争前一年的一九〇三年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主要指标。

第4表 资本主义发展的指标（1893—1903年）

指 标	1893年	1903年	增加率
公司总数（家）	2,844	8,895	3.13倍
资本金额〔缴纳〕（万元）	24,500	93,100	3.80
雇用10人以上民营工厂数	3,740	8,274	2.21
以上工厂中使用动力机工厂数	675	3,741	5.54
民营工厂工人人数（人）	285,478	483,839	1.69
矿山工人人数〔当6月末时〕（人）	未详	163,530	—
国营工厂工人人数（人）	11,859	61,876	5.22
铁路开业英里数（英里）	2,039	4,495	2.20
轮船总吨数（吨）	110,205	656,745	5.96
出口贸易金额（万元）	8,971	28,950	3.23

据《日本帝国统计年鉴》《统计全书》《明治大正国势总览》。

第 5 表 各业缴纳资本金增加指数

年次	总数	农业	水产业	矿业	工业	商业	运输业
18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897	134	163	92	59	136	134	146
1898	156	167	111	89	152	155	174
1899	172	175	78	137	175	173	175
1900	196	170	137	116	196	201	203
1901	209	169	121	115	207	215	216
1902	221	232	169	100	221	228	232
1903	223	212	171	117	211	234	231
1904	234	223	201	121	199	237	273

据内閣统计局《企业的发展与资本的积累》。

甲午战争后的公司资本金（缴纳或投资）的累年各业增加指数（第 5 表）与各业比例（第 6 表）如表所示，增加指数中，运输业最高，商业次之，而各行业间的比例中，商业在任何一年都占资本金总额的百分之四十八以上。而且在“商业”中，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业资本的增加率为最高，其比例自一八九八年以来超过八成（第 7、8 表）。铁路与海运，无论是国有还是私有，都具有军事、政治意义，是由国家特别扶植起来的，且同民办产业的发展互相促进。

第6表

各业缴纳资本金比例

年次	总数	农业	水产业	矿业	工业	商业	运输业
1896	1,000.0	2.5	2.2	50.2	177.0	482.1	285.9
1897	1,000.0	3.0	1.6	22.0	179.3	483.1	311.0
1898	1,000.0	2.7	1.7	28.5	171.6	477.6	318.0
1899	1,000.0	2.5	1.1	40.0	180.0	486.1	290.4
1900	1,000.0	2.2	1.6	29.7	177.0	493.7	295.8
1901	1,000.0	2.1	1.4	27.5	175.7	497.2	295.9
1902	1,000.0	1.9	1.8	22.8	176.6	497.3	299.6
1903	1,000.0	2.6	1.8	26.2	167.2	505.9	296.3
1904	1,000.0	2.3	2.0	25.9	150.0	486.9	332.8

出处同第5表。

第7表 商业公司各业类缴纳资本金增加指数

年次	总数	物品贩卖业	金融业	保险业	其它商业
1896	100	100	100	100	100
1897	134	125	139	139	104
1898	155	131	167	125	100
1899	173	154	188	133	96
1900	201	167	219	140	118
1901	215	166	239	116	123
1902	228	179	248	120	163
1903	234	228	249	129	196
1904	237	208	254	146	165

出处同第5表。

第 8 表 商业公司各业类缴纳资本金比例

年 次	总 数	物品贩卖业	金融业	保险业	其它商业
1896	1,000.0	93.7	764.0	38.6	103.6
1897	1,000.0	87.0	792.3	40.1	80.6
1898	1,000.0	79.3	822.9	31.1	66.6
1899	1,000.0	83.3	829.6	29.6	57.5
1900	1,000.0	78.2	834.0	27.0	60.7
1901	1,000.0	72.3	847.6	20.8	59.4
1902	1,000.0	73.4	832.2	20.3	74.0
1903	1,000.0	91.3	812.7	21.2	74.8
1904	1,000.0	82.4	821.5	23.8	72.3

出处同第 5 表。

纯民办产业中，银行资本的增加，不论实际数量还是增加率都最高，但据估计，这项资本中，以资本主义企业本身的基金为来源而增加的部分并不多，而多数则是转化成银行资本的贵族、地主的公债券和他们用出卖从佃农身上搜刮来的地租所得的货币与高利贷资本。每家银行平均缴纳资本金与公积金的合计，在一九〇四年以前不足二十万元。其中还有三万元以下的小银行。在银行数量最多的一九〇一年，全国二千三百五十九家银行的平均缴纳资本金与公积金的合计为十八万二千元，自翌年开始，银行数量虽说逐渐减少，但少于二千家则是一九二二年（大正十一年）的事。而且据估计，六大城市的一百七十几家银行公会的会员行凌驾于二千

余家银行之上，全国存款的三分之二集中于十数家大银行。其中第一、十五、三井、三菱、安田、鸿池、住友和正金八家银行的总存款额，在一九〇一年已占有所有银行公会的会员行总存款额的百分之五十一。也就是说同政府、日本银行有联系的少数特权大银行，与同政府联系密切的企业勾结在一起，发展了半官半民的铁路、海运和机器制造大工业，而以地方高利贷者和地租为来源的小银行，则同缫丝、棉织品、丝织品和各种生产地方特产的家庭手工业和制造业结合在一起，后者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从属于前者。

一九〇二年创立了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向各种工业、铁路、港口等企业提供以有价证券作抵押的长期低息贷款，拥有为获取资金而发行债券的特权。不必说，这是只有大资本企业才能利用的银行。该行的最大特征在于它是外资输入机关。此外，劝业银行、府县农工银行吸收农村资金，将其提供给大资本家与地主（下述）。

资本主义确立的主要标志在于机械制造大工业的发达。工业公司的总数从一八九六年的一千二百二十七家增加到一九〇四年的二千二百五十七家，其缴纳资本金总额从七千零三十七万元增加了近一倍，约为一亿三千九百七十六万元（其在公司总数与缴纳资本金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参照第5、6表）。在工业公司资本里边，从行业类别来看，棉纱纺织资本最多，煤气电气自来水次之；从增加率来看，机械工具工业仅次于煤气电气自来水业（第9、10表）。如前边第4表所示，自一八九三年至一九〇三年，使用动力机的工厂增加了四点五倍，从占工厂比率的百分之十八增到百分之四十五，

第9表

工业公司各业类缴纳资本金增加指数

年次	总数	纺织工业	缫丝业	纺织业	织物业	机械工具工业	密业	化学工业	印刷装订业	煤气电气 自来水电业	其它工业
1896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897	138	85	85	119	233	111	186	143	123	121	153
1898	152	137	103	127	219	129	230	189	150	140	170
1899	175	142	118	123	209	158	233	181	144	171	269
1900	196	153	121	140	176	221	254	199	225	238	286
1901	207	162	146	147	197	245	259	214	243	278	284
1902	221	160	124	150	164	263	239	248	268	330	326
1903	211	148	119	138	174	255	215	229	262	383	309
1904	189	148	107	134	164	276	205	241	274	444	214

出处同第5表。

第10表

工业公司各业类缴纳资本金比例

年次	总数	纺织工业	缫丝业	纺织业	织物业	机械工具工业	密业	化学工业	印刷装订业	煤气电气 自来水电业	其它工业
1896	1,000.0	53.5.5	55.0	408.9	61.9	75.7	43.2	89.4	9.8	65.7	170.7
1897	1,000.0	51.4.2	34.5	357.2	106.5	62.1	59.1	104.8	8.9	58.8	192.2
1898	1,000.0	48.4.5	37.4	342.7	89.5	64.2	65.4	124.0	9.7	60.8	191.5
1899	1,000.0	43.5.8	37.0	288.6	74.6	68.5	57.4	102.9	8.1	64.3	263.1
1900	1,000.0	47.7.6	34.0	292.5	55.6	85.2	56.0	101.0	11.2	79.8	249.5
1901	1,000.0	41.9.6	38.7	291.0	58.9	89.6	53.9	102.5	11.5	88.4	234.5
1902	1,000.0	38.8.8	30.9	278.4	46.1	90.4	46.7	111.7	11.9	98.4	252.0
1903	1,000.0	37.5.1	31.1	267.4	50.2	91.6	44.0	107.9	12.2	119.2	250.0
1904	1,000.0	38.5.5	29.7	275.0	51.3	105.2	44.5	120.6	13.5	146.8	183.8

出处同第5表。

使用动力机工厂的大部分为纺织、缫丝和机械工具工业。

据一九〇〇年对民间工厂的调查，纤维工业占工厂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占动力机马力数的百分之四十六，占职工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七。特别是纺织工业，已经作为大机械工业确立起来，公司数最多时为一八九七年，达八十五家。第二年开始逐渐减少，至一九〇四年减到四十六家（之后也一直减少到一九一一年）。但在这期间里，纱锭数却从六十九万余锭猛增到一百三十一万弱锭，公司资本金总额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公司数的减少，表明纺织业进入了第一次集中期。

缫丝业方面，自甲午战争以来，无论是在锅数上还是产量上，机器缫丝都压倒了手工缫丝。虽说是机械缫丝，其规模也不大。一八九三年，平均每家工厂为三十三锅，到一九〇〇年才增加到五十九锅左右，生产的基本操作仍以女工手工操作进行。而且，由无数农户生产的生茧的质量参差不齐，又不能跨地区来大量集中收购。所以，缫丝业还没有向大工厂发展。在这一时期，机械、手工共计有二千六百家至三千家以上的工厂散在全国各地。

纺织与缫丝是这一时期民营工业的主力和中坚。其产品大半是供出口用的原丝，生丝制作的纺绸及其它丝织品，棉纱也被织成白市布、斜纹布、细白布等棉布出口。包括供出口用的在内，这些纺织品，除纺织公司兼营的军用纺织品以外，都是由无数农户和城市劳动人民副业性家庭手工业和制造工业生产的。除去自用纺织品制作者和兼业者，一八九九年明确统计出专门从事商品生产的户数，据此，同年的纺织

业户数为三十九万一千五百一十七户，职工约为八十二万人，其中女工为七十八万人。纺织户数、织机数虽因销路的好坏有所增减，但从这时到世界大战前夕一直是增加的。其中六成以上是租机业者，手织机占百分之九十七左右（森喜一《日本工业构成史》）。

前面已经说过，在比率上，增长率极高的机械工具工业方面，象三菱造船厂、川崎造船厂那样的从一开始建厂就受到政府特别保护的大公司，住友铸钢厂（一九〇一年创办）和芝浦制造厂（一八九三年创办、三井系）等特权大资本经营的公司得到优先发展。长崎的三菱造船厂于九八年建造了日本第一艘大型轮船（六千一百七十二吨的常陆丸）。但在这一部门中，以吴的海军工厂、东京、大阪的陆军炮兵工厂为主的国营军工厂，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以前压倒了民营。机床和蒸气机自不必说，就连纺织机械也是依赖进口的。

工业生产的发展，同在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从中国、朝鲜获得广大市场相辅相成，进出口贸易也飞快发展起来。最大的出口货物是输往美国和欧洲的生丝和丝织品，合计占出口总额的三成左右。其次是主要向中国、朝鲜逐年增加出口的棉纱和棉织品。棉纱出口的金額在一八九五年还只是进口的七分之一，而到一八九七年，其出口（一千三百四十九万元）第一次超过了进口（九百六十二万元），以后逐年激增。一九〇三年，棉纱出口金额为三千一百四十一万余元，相当于同年国内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十（这年，生丝、碎丝头类出口额为八千一百三十八万元）。即出口生丝、丝织品和棉纱、棉织品两大工业产品以及铜和煤，进口原棉、铁类、机械类、

大米等生产手段和食粮，日本资本主义从而发展壮大起来。

从各对方国来看这一时期的贸易，在出口方面以生丝为主的对北美洲的出口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到三十二，比率最高；其次以棉纱棉布为主的对中国的出口，一八九三年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八点六，一九〇四年一跃增到百分之二十一点三。与此相反，对香港和法国出口的比率则逐渐减少。在进口方面，从印度、美国、埃及和中国进口原棉，从英国、美国、德国等国进口机械、钢铁及其它重工业产品和军需品，从中国进口铁矿石，从中国、朝鲜、印度进口大米等等，以原料和粮食的比重为高（参照第11表）。

2. 资本主义与地主制的结合

资本主义的发达对农业和农民的影响日益加深。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历史学研究会编《近代日本的形成》）一文中作了相当详细的论述。现在，我订正一下不明确的地方，同时把要点叙述如下。农户数自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甲午战争前，其绝对数有所减少，所以，其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率，也以相当的速度降低下来。一八七三年农户数约为五百六十四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百分之七十八点七；而一八九一年则为五百四十九万户左右，占百分之七十三点三；一九〇三年就很快减少到五百三十六万户，占百分之六十四点一（此后实际数量开始稍有增加）。由此可以得知，农业人口在资本主义的形成确立期向农业以外——其绝大部

第11表 主要对方国进出口金额与比率 (1893—1904年)
(单位千元、括弧内为百分比)

年次	总 额		中 国		香 港 ^①		印 度		北 美 洲		英 国		法 国		德 国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出口	进口
1893	89,713	71,326	7,714	17,096	15,689	8,268	2,471	8,679	29,460	6,107	4,986	27,980	19,532	3,305	1,380	7,318
	(100)	(100)	(8.6)	(24.0)	(17.5)	(11.6)	(2.8)	(12.2)	(32.8)	(8.6)	(5.2)	(39.2)	(21.8)	(4.6)	(1.5)	(10.3)
1896	117,843	171,874	18,824	21,345	19,966	9,134	4,538	22,517	33,126	16,425	9,012	59,252	19,027	7,682	2,972	17,184
	(100)	(100)	(11.7)	(18.1)	(16.9)	(5.3)	(3.8)	(13.1)	(27.9)	(9.6)	(7.6)	(34.5)	(16.1)	(4.5)	(2.5)	(10.0)
1899	214,930	220,402	40,257	28,688	34,281	7,338	6,062	43,884	66,287	38,398	11,271	44,837	29,248	5,768	3,797	17,613
	(100)	(100)	(18.7)	(13.3)	(16.0)	(3.3)	(2.8)	(19.9)	(30.8)	(17.4)	(5.2)	(20.3)	(13.6)	(2.6)	(1.8)	(8.0)
1902	258,303	271,731	46,838	40,590	25,876	2,455	5,067	49,303	83,620	49,172	17,346	50,364	27,283	4,746	4,737	25,813
	(100)	(100)	(18.1)	(15.7)	(10.0)	(0.9)	(2.0)	(18.1)	(32.5)	(18.1)	(6.7)	(19.5)	(10.6)	(1.7)	(1.8)	(9.5)
1904	319,261	371,360	67,986	54,810	28,160	2,495	9,405	68,012	104,606	58,963	17,844	74,993	36,320	3,334	4,104	28,697
	(100)	(100)	(21.3)	(17.2)	(8.8)	(0.7)	(2.9)	(18.3)	(32.7)	(15.9)	(5.5)	(20.2)	(11.4)	(0.9)	(1.3)	(7.7)

据《明治大正国势总览》。

① 香港是我国领土，与其他国家并列不妥。——译者

分为资本主义企业——相当迅猛地移动。另外，一九〇三年，农户的百分之三十点四为兼营。兼营的农户也并不是都在资本主义企业作工。

另一方面，城市人口增加了，特别是六大城市的人口增加得特别快。非农业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的增加，致使对稻米等农产品的需求急剧增多，并促进了其商品化。在这种刺激下，稻米播种面积增加了，农具改良了，施用肥料增多了。特别在甲午战争以后，从满洲进口的价廉效高的豆饼压倒了以往的鱼肥，以过磷酸石灰为主的化学肥料也开始普及了。硫酸的进口、使用虽然是少量的，但也开始了。在政府有力的奖励下，改革了共同秧田、直线插秧的技术。通过这些，增加了每反^①的产量，因此总产量从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七年的五年平均年产三千三百七十八万石增加到一八九八年至一九〇二年的五年平均年产四千二百四十七万九千石，增加了百分之二十六。

旱田作物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棉花、甘蔗、叶蓝这种以往最重要的工业原料作物，在进口货的冲击下几乎灭绝。一八九六年，由于纺织资本家的要求废除了棉花进口税，这对棉花生产是一个致命的打击。叶蓝由印度进口货取而代之。本土的甘蔗被冲绳糖和进口糖所压倒。并且，使用国产原料的农村手工业、制造业也消声匿迹了。甚至在杂粮中，农家自用的粟、稗等生产也稍有减少。而在另一方面，城市近郊的蔬菜、各地的马铃薯、甘薯的生产则急剧增加，除虫

① 日本土地面积单位，一反合991.7平方米。——译者

菊和啤酒用麦作为新工业用作物投入生产，苹果、柑桔、桃等果树栽培也作为商品生产开始发展起来。特别是由于生丝出口的增加，养蚕的发展更为迅速。

农作物的商品化和商业性农业的发展、旧有的家庭手工业的没落，给农户自给经济带来了根本性的破坏，造成了农民与农业被卷入资本主义的局面。以通晓农村实况而出名的农林省技师斋藤万吉，在《实地经济农业指针》（一九一一年）中说：农户购买品的价格逐年上涨，非米价腾贵可比，而且“子女教育及其它社会交往等需要巨大费用”，农户无法仅靠以往的农业维持生活，“事态已至无暇论及将来如何，只是一味致力于可增加现金收入较多之任何工作”。所谓可以成为“现金收入”的工作，是商业性农业，是取代老家庭手工业的新家庭手工业，是季节性临时工及其它挣工资的劳动，是女儿当纺织、缫丝女工，是其它各种各样的“农户副业”。这样，出现了贫农和小农的半无产阶级化、上中农的小商品生产者化的倾向。

可是，农业并没有向资本主义方向进一步发展。作为日本农业基干的米麦生产依然在寄生地主制与国家重税的压力下，没能从主要由自家劳力从事的小规模经营中解放出来，自耕地主的寄生地主化倾向也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的发展日趋明显。这是因为，随着农户的次子、三子和女儿去城市工作的日益增多，农业工人的工资、待遇也势必要比以前稍有改善。对地主来说，与其付出比过去高的工资，进行大规模经营，不如当寄生地主袖手坐拿近收获量六成的地租更为有利。

据后来一九〇八年的统计，在所有农户之中，百分之三

十七点三的耕种面积尚不足五反，百分之三十二点六不满一町^①。农户总数的百分之二十八为纯佃农，百分之三十九为自耕农兼佃农，纯自耕农仅占百分之三十三。据估计，这些数字在一九〇〇年前后也没有多大变化。对经营不到一町的佃农和自耕农兼佃农，以及所谓“五反农民”的自耕农来说，资本主义对农业的渗透，成了生活下降而不是提高的条件。这正如斋藤技师所说的现金支出增多而收入没增加的原因。增征的土地税被转嫁给佃农，国家通过专卖卷烟、征收酒税及其它间接税的办法进行的剥削，又极严重地损害了佃农和贫农的利益。他们甚至不得不卖掉自家的大米，而用粟、稗和薯类充饥。

按照横山源之助在《日本的下层社会》（一八九九年）中的论述，耕种五反的佃农，从一年的毛收入中扣除地租、肥料费、种子费后，仅剩下五十元。较之年收入九十元至一百元的卯子工，佃农的收入真是少得可怜。并且，他们难于脱离地主自立，因为他们大多数都被地主用债务束缚住，而本身除作农工外，又不具备当工业工人的技术。至于自耕的“五反农民”，其情形也同佃农没有什么差别。他们的土地经常被用来作借债的抵押，不久就得归别人。小农脱手的土地，不断集中到已经拥有三町、特别是五町以上的地主手中，出现了三十町、五十町的大地主。

现在已经到了任何一种小农经营，没有现金都无法维持下去的地步。一八九六年，以国家资金成立了中央劝业银行

^① 町——日本土地面积单位，约合9,918平方米。——译者

和府县的农工银行，说是经营以不动产作抵押的低利长期贷款，以振兴农业和农村工业。但是，劝业银行自不必说，就是农工银行，也未能成为给小农提供贷款的机关。由于小农的土地不是用来作抵押，就是信用极低，故这些银行在农村成了专门为地主——往往身兼缫丝、酿酒等制造业资本家——服务的金融机关。地主借得低息长期的大笔资金，将其投入到农业以外的企业，或者以高利贷转借给农民来赚取利息差额。而另一方面，通过发行银行债券而将农村的资金越来越多地抽往城市。接着，一九〇〇年开始实施产业合作法，信用合作社虽然打着小农通融资金机关的旗号，但基本上仍以上述同样的理由来搜刮小农的零碎资金，用以买债务和股票，帮助将农村的资金抽往城市。就是说，不论是不动产银行还是信用合作社，都成了城市资本家及其勾结的大地主剥削小农的机关。因此，小农的金融只有依赖地主、肥料商和粮商等的高利贷了。

根据产业合作法，形形色色的购买合作社、贩卖合作社在农村时而出现，时而消失，逐渐多了起来，它虽多少有助于作为小商品生产者的上层农民适应资本主义而地位上升，但对小农、贫农却没有帮助。况且，如果它与农村中的身兼商人的大地主的利益搞对立便无法存在下去，若避免与之对立，则必然成为大地主操纵下的机关。

“农会法”与产业合作法同时实施。“农会法”只允许法定地价四百元以上的土地（平均一町二反稻田）的所有者入会。对这种地主与上中农的公开机关，不仅村，就连县、国家也支給补助金和予以保护，以使之“改良农事”。所谓“改

良”，不过是一种稻谷检查，检查的目的，在于为地主生产优质的、包装完好的稻米。

地主与城市资本，就是通过不动产银行和产业合作社勾结起来，并且地主还直接向股票和债券投资。这成了甲午战争后以铁路热为中心的企业热资金的很大来源。这以后，地主的投资也是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地方上无数的小规模企业、制造业，通过地主的直接投资或地方银行的投资兴办起来。而且其产量的总和占工业总产量的一半以上。通过控制、榨取这些小银行和小企业，大银行和大企业也可以维持了。

另外，资本主义产业的劳动力也是由挣扎在地主制残酷压迫下的小农、贫农家庭提供的。纺纱、缫丝女工就是其代表，而铁路、港口的土木工程的工人以及煤矿、金属矿山的矿工也同样主要来自占有所有农户半数以上的贫农阶层。而且由于把农民的悲惨生活作为样板，资本家便可以把殖民地式的低工资、长时间劳动、极为恶劣的待遇强加给工人，以保障资本家的高额利润。

这就是说，无论作为资金的来源，还是作为劳动力的来源，寄生地主制对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都是不可少的。女工和青年男工由于工资低得可怜和劳动条件恶劣而无法自立，被家长制束缚住了。而且，由于有他们的汇款，贫农父母才能交纳高额地租，让地主赚钱，才能让子女接受义务教育。即资本主义产生的低工资和恶劣的劳动条件，对寄生地主也同样是必不可少的了。

这样，资本主义与地主制，以高额地租与低工资的相互

依存为中心相互利用，紧密勾结而发展起来。一方面地主身兼资本家，另一方面城市资本家在农村购买土地而成为不在地主的人数也增多了。大地主身兼商业或工业资本家而大大发展起来，其代表人物有：信州的片仓（缫丝大王）、冈山县仓敷的大原（纺织资本家）、名古屋的伊藤（百货公司）等。新潟的大地主市岛经营银行，山口、内藤成为石油资本家，还身为新潟铁工厂的创立者。一九〇一年九月的《时事新报》，列举了日本全国五十万元以上的资本家的姓名、职业，在总数四百四十一人中，有八十八人（百分之二十）的头衔是“农业”“林业”“大地主”。旧诸侯贵族六十三人（百分之十四点三）和“贷款业”、“酿酒业”也大多身兼大地主，故资本家的大半是地主兼资本家。而且，天皇就是身兼超大地主和超大资本家的超大资本家。在这个意义上，天皇正是“臣民”的“资本家”的理想典型。

3. 侵略与从属的经济结构

日本资本主义同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的寄生地主制结合在一起，相互依存，于一九〇〇年前后确立起来。它同地主制结合成的基础结构，作为资本主义，具有怎样的基本特征呢？第一，军事意义非常大。八幡钢厂、陆海军工厂以及虽是民办、但为特权大资本的造船业等军事生产，牺牲了生产一般生产手段的发展。无论是铁路还是海运都是军事目的优先。生丝、棉纱及纺织品的生产也有很大意义，其意义在于，

可以通过出口产品来赚取外汇，以便进口军舰、武器及其制造所需要的钢铁和机器等。

第二，前面已经说过，银行资本、商业资本不但占了公司资本金的绝大部分，而且还使工业资本从属于自己。在多数为小本经营的缫丝业方面，生丝出口批发商借得京滨、阪神的大银行的贷款，多少赚取一点利息差额后预借给缫丝业者，缫丝业者用这笔钱购买生茧，将其作为抵押而从当地银行借得高利息贷款，每年在搞到足够的所需生茧以前，据称是“辗转不停挪用，此乃实地手续”（前岛省三《明治中末期的官僚政治》第三论文）。即使是拥有较大资本的纺织业，在一九〇〇年经济危机时，不少纺织公司也由于这种贷款支付棉花款及其它债务而受到银行、商社的查封，成为投机的对象（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现代史大系》〕）。

与此相关，三井、三菱、住友、安田、古河、大仓、涩泽等很快就与政府勾结在一起的特权大资本过早地膨胀起来，在经济界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些大资本很快就在金融与产业的主要部门占据优越地位，他们在同一系统的资本下结合起来，开始形成财阀。

三井，自德川时代最大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家三井行在维新内乱时钻入天皇政府的财政以来，便同政府高官、特别是井上馨等长州派保持密切的关系，接二连三地取得政府的利权，从而一天天发展起来。到一九〇四年前后，以三井银行与三井物产公司为两大支柱，将钟渊纺织厂、王子造纸厂、芝浦制造厂和北海道煤矿轮船公司等各业最大的公司置于自

己的控制下，并拥有数家缫丝公司和三池煤矿及其它最好的煤矿，在贸易界拥有最大的市场占有率。三井系统各公司在三井合股公司的势力下完全形成为财阀组织是在一九〇九年，但在一九〇〇年前后基本已具规模。

三菱，是岩崎弥太郎在废藩置县时与同藩的重要头目后藤象二郎将土佐藩的轮船不清不白地据为岩崎私有财产之后，以经营船舶运输业起家的。在一八七四年台湾远征和七七年西南战争时，三菱同政府官员、尤其是大久保利通等萨摩派及大隈重信等肥前派紧密勾结，垄断了军事运输，在政府给予的得天独厚的保护下，垄断了日本的远距离海运，并进一步打进海外航线，同时兴办仓库业、海上和火灾保险业、造船业等有关海运的产业。还从后藤手里接收了政府拍卖给后藤象二郎的高岛煤矿，着手从事煤矿业。这样就将事业扩展到了各个方面。一八八五年收买了第一一九国立银行，继续以其字号经营。一八九三年三菱公司改组为三菱合资公司，这就成了财阀总公司，第一一九银行也成为其银行部。这样，在一九〇〇年前后就以下各行业的特大公司都置于自己势力下：银行、海上保险及生命保险、海运（日本邮船）、造船（三菱造船）、仓库、铁路（山阳铁路、九州铁路）、煤矿、金银铜矿（尾去泽、佐渡、生野等）、造纸、不动产业（东京丸内街的建设）。

住友，同天皇政府相勾结，在维新以后，仍保住了自德川时代从幕府取得的别子铜矿山的开采权，大规模地向前推进事业。以出口铜为开端进入外贸业，然后扩展到缫丝、樟脑业、煤矿业、林业，一八九五年创建住友银行。甲午战争

后创办了制铜、钢管（九七年）、电线（九七年）、仓库（九九年）、铸钢（一九〇一年）等公司。安田，是安田善次郎从幕府末期一小钱庄开始，在明治初年币制混乱时期从政府方面得到灵通消息，以投机赚取巨利，通过经办政府资金迅速发展起来的。一八九六年创立第三国立银行，七九年将其改组为安田银行之后，到一九〇一年已把地方十二个中等银行置于自己的控制下，并打入保险业。甲午战争后还打入了不动产业和铁工业（春秋社版《日本康采恩全书》财阀卷）。

从上述看来，银行资本与产业资本早在一九〇〇年前后便融合在一起，并形成在产业各部门占据了垄断地位的金融垄断体制，而且好象是以四大财阀的形式形成的。对此，我本人也曾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这篇论文中认为这是金融垄断资本的早熟的萌芽，但这是错误的。其原因在于，这种“垄断”并不是生产与资本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高度发展、通过产业资本家的自由竞争而趋于集中所形成的。相反，它是以尚不发达的资本主义生产为前提，通过同国家权力的勾结以及国家保护的“垄断”，而不是通过生产的集中所形成的。因此，在这种“垄断”之下，没有出现近代垄断资本下的那样高度的生产社会化。通常雇用十人以上的工厂的工人人数，包括国营、民营，一九〇〇年前后尚不过五十万人左右。另一方面，例如占工业产品首位的纺织品，则是由八十万人的家庭手工业工人以至手工工场工人所生产的。

然而，这种“垄断”体制也主导了日本资本主义后来的发展，同时发展成为近代垄断体制。这种因素从当时就已经有了，也就是说这些财阀在此以前并不单纯是高利贷资本和国

家御用商人，即使没有国家的保护，他们也照样是近代银行资本家——通过向资本主义产业提供贷款来间接地剥削工人阶级，养肥自己，同时在基干部门也是大产业资本家——通过直接剥削工人阶级来积累日益增大的资本。而且，由于他们的资金在起点上就比别人大得多，所以在以后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中，他们也经常继续保持最大的优势，愈加走在别人前面，而形成近代垄断体制。虽然在这个意义上可以将财阀称为垄断体制的萌芽，但却不能称其为日本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萌芽。

最能直接反映财阀“垄断”体制同近代垄断体制不同的，是当时的日本资本主义并不是由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结果，拥有在国内已找不到有利投资场所的过剩资本而要求输出资本，而是在体制上苦于缺乏资本，迫切希望输入资本。这里存在着当时日本资本主义的第三个基本特征。

尽管产业尚不发达，不，毋宁说正是由于其不发达，资本家才强烈地怀有在海外获得领土和资源的欲望。出于这种欲望，他们也曾再三勉强地响应政府的要求而输出资本——强行获得了京仁、京釜铁路的铺设利权和大冶铁矿的利权。但作为日本资本主义产业的体制，所要求的不是资本的输出，而是输入。大隈内阁时期，在一八九九年十月召开的第三次农工商高级会议上，政府强烈要求实业资本家奋起向中国输出资本。实业家们说，“值此为振兴内地事业而需求外资之时，欲使众多商人投资于外、兴事业于租界，乃颇为难事”，双方发生了正面冲突（《第三次农工商高级会议议事速记》）。

政府于一八九七年断然实施金本位制，这也是为了“从其它低利息金本位国招徕资本以弥补我资本之缺乏”^①，尤其对政府来说，是为了募集作为扩军资金的外债，和“使公债便于销售海外”（《田口卯吉全集》）。并在实施金本位的同时，向外国卖出了一亿元的内债。

由此进而产生了第四个特征。即，日本资本主义一方面不得不在金融上依靠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在另一方面又具有掠夺朝鲜、中国的强烈要求。甲午战争后的日本资本主义，靠中国赔款发展起来。它之所以能够断然实施资本位制，也是由于可以用中国赔款作现金准备的缘故。但是赔款不会总有。特别是赔款主要被用为扩军资金，养肥了特权大资本家，大大助长了他们的“垄断”。但军需品在结局上不能回流再生产，因此作为以扩军为动力的产业的发展，迟早将走进死胡同。在扩军经济之下，生产资本的不足是不可避免的。于是，一方面产生了外资输入论，另一方面又被驱使去掠夺弱小邻国。这正是幕府末期的吉田松阴所提倡的一边从属于欧美，一边在朝鲜、满洲找回损失这条路线的世界帝国主义阶段版。

一八九四年至一九〇三年，日本商品贸易的入超和国家实施金本位制而从朝鲜“输入”黄金的入超，总计已超过五亿三千万元。为弥补这一巨额外汇逆差，用上甲午战争的赔款及以义和团事件为由从清国攫取的赔款（库平银三千四百七十九万多两，三十九年付清），仍然不够，又从九七年至一

^① 那须宏《关于农工商高级会议》（《同朋学报》第十二号）。

九〇二年分三次引进总计达一亿九千四百八十六万元的外资（向海外卖内债、募集外汇债券），才勉强把亏空补上（外务省特别调查部《日本的外国资本》）。

一边在金融上依靠欧美，一边为侵略朝鲜和中国强行扩军，振兴产业，这种想法，在自由党前总理板垣退助于一八九八年四月在大资本家们的引进外资同盟会上的致词中说得最典型。他说：“本来相信现内阁（第三次伊藤内阁）的经济政策由于扩张军备将会取积极方针，不料近来情况却愈加消极，缺乏资金，无以兴业……故此时谋求引进外资是理所当然的。为此，想把铁路收归国有，以作为可靠的抵押”。当时的板垣与自由党虽是国权主义、扩张主义者，但反对伊藤内阁为扩军而增征土地税，却又不反对扩军本身，说以铁路为抵押，也就是招引欧美对日本进行帝国主义式的经济渗透，以借用其资金。在政府内部，农商大臣金子坚太郎似乎同在野党遥相呼应，热心提倡“亚洲的日英工商同盟”论。他说，英国有资本与机器，日本有劳动力与煤，这样，若将英国的资本、机器弄到日本，而用日本的劳动力与煤来兴办产业的话，则“亚洲工商业归于日英两国手中”（《明治中末期的官僚政治》第三论文）。可以说，用从英美资本家借来的近战费一半的资金所进行的掠夺朝鲜、满洲的日俄战争，就是金子这种同盟论的政治实践。

日本资本主义进入朝鲜、中国的要求，从别的方面来看也是很迫切的。对于连年都是大入超国的日本来说，只要不停止扩军，扩大出口便是至高无上的命令，只能主要期望向中国、朝鲜增加棉制品及杂货的出口。最大宗的出口货物生

丝的生产，由于依靠零散农户家庭养蚕，及其它落后的各种生产条件的限制，因而不能指望大幅度的、持续性的增产，而且其价格又取决于买主市场，受美国行情变动的影响特别大。至于铜和煤，日本本身的产业愈发达，便愈没有出口的余力。能寄以希望的，只有输往朝鲜和中国的棉纱、棉布。一九〇〇年以来，日本对朝鲜和中国的出口额，分别占出口总额的百分之二十以上，占生丝类以外的出口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而且其发展速度也很迅速。对中国的出口大半是棉纱，一九〇三年有人叹道：“数量仅仅为十七万件至二十万件棉纱的出口，在经济稍趋萧条时便给国内纺织业带来非常大的困难”。而且棉纱出口的四成以上，是输往华北和满洲。棉布的出口，在日俄战争前三年，平均百分之六十九以上也是输往华北、满洲（三瓶孝子《日本棉业发展史》）。

另外，中国和朝鲜作为进口稻米、大豆、肥料用豆饼（满洲）、铁矿石（大冶）、黄金（朝鲜）等日本资本主义所需要的粮食、原料的来源，也具有重要意义。米的进口于一九〇〇年为一百四十多万石，一九〇三年以后，则一下子进口五百六十万石左右，即占本国产量的一成以上。其进口国中也有英属印度和暹罗（泰国），但朝鲜和中国作为日本商人可以在治外法权的保护下直接进行交易的地方，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

这就是说，甲午战争造成了日本商品如洪水决堤般地流入朝鲜和中国，同时使日本可以从朝鲜和中国捞回大量的粮食和原料，以致日本资本主义完全依靠朝鲜和中国的市场。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

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这点已被镇压义和团的行动证实了。当然，为此必须利用外国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并在金融上、政治上依赖矛盾中的一方。

以这种日本资本主义结构为基础，展开了上一章叙述过的日本统治阶层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这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表现，并不单纯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且，这时天皇制已经同大资产阶级处于这样的关系之中：大资产阶级从天皇制保护的垄断中取得最大利益，同时，天皇制也不得不依赖资本主义。关于这一点，只从一件事中便可以一目了然：公债的发行只有得到大资产阶级的赞助才可能作到。而且倘若没有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作为天皇制牙城的军备也无从谈起。前边已经说过，作为天皇制的固有阶级基础的地主阶级，其大多数也具有资本家的一面，而天皇本人则兼超大资本家与超大地主于一身。资本主义发展到如此地步，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与作用，便早已不同于甲午战争以前了。关于这一点，在另一章再作论述。

第三章

天皇制的变形

1. 天皇制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同盟

资本主义一经确立与发展起来，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势力也就必然增大。日本资本主义是在专制天皇制的培育下，同半封建式的寄生地主制相结合而成长起来的。因此，虽说资本主义已经确立，但资本家阶级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来取代天皇制而掌握国家政权。尽管如此，甲午战争后资本主义生产仍然在日本经济结构中占据并不断巩固了主导地位，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势力强大起来。其结果，不只是资本家阶级依赖天皇制，而且天皇制也不得不依赖他们了。

进行了甲午战争的伊藤博文内阁，到了战后的九六年，在内政方面，为所谓“战后经营”募集公债，因没有得到大资本家们的协助而失败；在对外方面，则失败更惨，竟在朝鲜招致了国王的“俄使馆蒙尘”，于是终于在八月辞职。后任内阁，是松方正义和领导进步党——这年三月以改进党为中心集结反伊藤内阁各派改组的党——的大隈重信合作组成的。这时，促成松方与大隈携手合作的，是以前便同大隈来往密

切的三菱的统帅、当时的日本银行总裁岩崎弥之助。关于当时“三菱派”的势力，《世界之日本》杂志的评论家这样说道：“若欲募集公债以助松方伯爵，则一声令下即可募集数千万元；若欲妨碍渡边子爵（伊藤前内阁的藏相渡边国武子爵）募集公债，则一声令下可动全国。此势力使政治家生畏，政治家势力更使实业家生畏。今助松方、大隈二伯爵以组新阁，谁人不惊叹其势力之大”（弘田直卫《内阁更迭五十年史》）。

这位评论家在叙述了不仅三菱、而且以三井和涩泽为首的大资本家们同官僚、政党干部之间的关系，并表明其影响之后，作了这样的总结：“此等商党势力日见增加……简言之，若彼等联合，则可立法、废法，或倒阁。彼等所缺，唯执行权而已。……故若划分明治史，则截至明治二十二年为藩阀时代，截至二十六年为党阀时代，二十七年后则为财阀时代。此后恐愈加如此。但政党与商党绝不会长期相互分立，如同藩阀与政党长期相争而终致两者精华合一而呈新志那样，两党精华亦必将合二为一而渐展新容，此乃必不可免。”

这段话，通过列举大资本家们同藩阀巨头和政党领袖相互勾结，从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中捞取最大利益的事实，夸张得就象资本家左右国政一样。但不能否定，大资本家由于加强了对财政、经济政策的发言权，对整个国政施以强有力的影响，而且正如笔者所料，官僚、政党同资产阶级的同盟逐渐向前发展。

在三菱系资本家们的支持下，与进步党联合成立的松方内阁，当大隈与进步党在政府内增强其势力而与松方对立时，便只好辞职了（一八九七年二月）。之后，成立了第三次伊

藤博文内阁。这届内阁任命同三井关系密切的井上馨为藏相，一八九八年三月，他在三井集会所同三井、三菱、安田、涩泽等二十二名大资本家召开“经济恳谈会”，就军备扩张及为此而增征土地税问题，请求资本家们协助。

大资本家们直接同藩阀巨头进行交易，向政党领袖提供（或拒绝提供）选举费及其党羽的豢养费，对政党施加影响，但整个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势力，在制度上要通过政党与议会来发挥作用。然而按照当时的选举法，议会成为对地主阶级绝对有利的机构。有选举权者必须是直接缴纳十五元以上国税的人，与所得税和一八九八年一月开始实施的营业税的纳税者比较，土地税的纳税者占绝对多数。议员定员三百人之中，由城市选区选出的议员，六大城市才只有十七人。可是，农村选区选出的议员，也并非全部是封建地主。前面已经说过，地主阶级在高额地租同资本制产业低工资的相互结合上，同资本家有共同利害的一面，而且，特别是大中地主，他们作为公债券和股票的所有者，具有资本主义吃利息者的一面，一部分人又同时是资本主义企业的经营者。尽管如此，议会中，代表地主的议员仍多于代表资本家的议员。一八九六年，议会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废除棉花进口关税法案，即通过了给予棉农及以国产棉花为原料的家庭手工业者和手工工场经营者的地主以致命打击的法案，可以认为，这是议会中资产阶级势力增加的一个例子。

最尖锐地表现地主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利害冲突的，是土地税问题，在这点上也仍然是资产阶级利益取得了胜利。以扩军为中心的“战后经营”的财源，仅靠通过增税、新征酒税

及其它间接税的办法让劳动人民负担是不够的。或者增征土地税，或者断然对资本家亦课以重税，已势在必行。但松方内阁试图避开对资本家课以重税而增征土地税。对此，进步党也予以反对，成了内阁倒台的一个原因。接任的第三届伊藤内阁，一八九八年春，说服了自由党干部，以该党为“雇佣兵”，向第十二届议会提出了这样一项议案：土地税由地价的百分之二点五增到百分之四，增征一千七百五十万元，此外，增征所得税一百六十四万元、酒税一千二百一十一万元。

对此，干部同伊藤通气的自由党的议员，赞成者和反对者各占一半，而进步党的大多数则强烈反对。该党干部的着眼点，与其说是反对增租本身莫如说是反对伊藤内阁。而且，该党的增租反对派在五月三十日提出了严厉谴责政府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中落后的提案。此案由于自由党和国民协会的反对而被否决。但自由党也单独向政府提出了另外的质询书，敦促采取帝国主义政策。质询书说，“为在东洋保持同欧洲诸国之均势，我国政府欲对清国采取何种措施与态度？”这种鼓励帝国主义竞争的基本政策，是同否定增租、否定扩军格格不入的。

政党的反对，是受占议员多数的地主势力的牵制；而资本家们的大多数则支持增租案。他们所持的观点是：可以通过增征无须自己负担的土地税，来加强财政的基础，并易于募集外债。但结果，增税案在进步、自由两党的联合反对下被否决了。

增税案的被否决，形式上是“实业界”在地主面前的失败，

但并非决定性的失败。其中也有这样一个不小的因素，即一般舆论对藩阀元老内阁的反对，同时导致了对伊藤内阁的提案本身的反对。被自由党出卖而失败的伊藤，由此深切感到，“雇佣兵不足恃，而非亲兵不可”（林田龟太郎《日本政党史》），便企图在三井系资本家们的资金援助下，组织作为亲兵的政党，但三菱系资本家对此不感兴趣，以枢密院议长山县有朋为首的天皇制官僚统治阶层也强烈反对。因此，伊藤在这时放弃了组党的打算，同时也放弃了内阁，向天皇推荐了宪政党——进步党与自由党在第十二届议会后共同组织的政党——的最高干部大隈或板垣为后任内阁首相。

这里，出乎意料，披有“政党内阁”外衣的以大隈首相、板垣内相的宪政党为基础的内阁成立了。山县枢密院长为阻止内阁的成立，与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共同策划，企图通过不出陆海军大臣的办法使组阁流产。但伊藤求助于明治天皇，请天皇下令让前内阁的桂太郎陆相与西乡从道海相在新内阁留任。两人以新内阁不改变军备扩张的既定计划为条件，答应留任。然而从即日开始便潜心于倒阁的阴谋。桂太郎在自传中夸口：“本届内阁，政党者流虽自称为政党内阁，但实际称其为以政党为基础之内阁为妥。因陆海军大臣系由党外人士所担任，亦可称之为以政党为基础、缺乏整体活动之半身不遂之内阁”。

为同口出大言的军阀相对抗，宪政党加强党内的团结，动员议会外的民主势力，但是万没想到，旧自由党系与旧进步党系却拼命地争分这种意外的收获。不仅如此，旧进步党出身的文相尾崎行雄在帝国教育会上发表指责“金权政治”的

演说中谈到：假如日本一旦实行共和制，则三井、三菱可能成为总统候选人；山县派官僚抓住这一句话，歪曲为尾崎宣传主张共和制，对他展开了猛烈的攻击。旧自由党的大头目星亨等作内应，终于把尾崎赶下台，不久便把党分裂成旧自由党系的宪政党与旧进步党系的宪政本党。因此，内阁成立仅仅四个月就倒台了（一八九八年十月末）。

之后由山县有朋自己组阁，请深得财界信任的松方正义为藏相。如同讨厌蛇蝎般讨厌政党的山县，知道要掌握政权也离不开议会、即政党的协助。因此，山县首相把宪政党拉拢过来，同宪政党发表了“为国家肝胆相照”的共同声明。并在这年十一月召集的第十三届议会上，原封不动地提出了半年前被第十二届议会所否决过的土地税增征及其它三个法案。同时提出了把国会议员的年薪从八百元一下子提到四千元的方法案。这也是伊藤内阁时期为收买议员曾经起草过的。

土地税增征法案成为议会内外的资产阶级同地主阶级激烈论战的焦点。反对派结成了以小农主义者谷干城子爵为干事长的“土地税增征反对同盟会”，赞成派以财界斡旋人涩泽荣一为会长，结成了“土地税增征促进同盟会”。反对派的急先锋是寄生地主化进行得较晚的东北、北陆和东山地区的地主们。寄生地主化进行得较快的近畿和濑户内海地区的地主的意见是，如果地价变动对他们有利，也可以赞成增税。而在“实业界”，不仅大资产阶级全部热烈支持增税，就连中小资本家也大部分赞成。政党方面，宪政本党继续持进步党时代的反对态度，宪政党则同自由党时代同样，赞成者反对者各半，星亨稳住赞成派，掌握着党的领导权。

宪政本党的干部同上次一样，并不反对导致增税的扩张军备和进入同帝国主义列强瓜分朝鲜、中国的竞争，为了争取作为党的势力的基础的党内外的大小地主阶级与小资产阶级而反对增税的因素加强了。而反对派方面的谷干城，同时也反对成为重税原因的扩张军备。这与其说是反对日本参加帝国主义竞争，毋宁说是出于长远观点，担心日本一直坚持同列国进行竞争而可能导致：现在的扩军→课农民以重税→农民疲弊→军队基础削弱。既反对扩军，也反对帝国主义政策的，只有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在议会里没有任何代表的社会主义者们。

反对派的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增征土地税坑害了农民。而赞成派的代表理论家田口卯吉说，现行地价为法定地价的五、六倍之多，土地税在实质上明显下降。然而地主却丝毫不减收地租，肆无忌惮地进行残酷剥削，通过提高地价获取暴利。因此，实际上反对增征土地税无非是对地主的拥护。宪政党主张不增征土地税而以间接税来筹措扩军资金，这样作才恰恰加重了贫农的负担，助长了贫富差别。赞成扩军，就不可能驳倒田口的论点。但田口避而不谈增征土地税不仅损害了地主，也坑害了自耕小农这一论点。

涩泽荣一等集中了全国商会联合会的全部力量，展开实现增加土地税的猛烈运动。一八九八年十二月，涩泽在帝国饭店的土地税增征促进同盟会总会上说，自己早已在政治上没有任何欲望，但不管怎样没有政治热情，也不能为国家而犹豫不前，因此参加了增加土地税运动，并阐述了资产阶级应付甲午战争后东洋局势变化的立场：

“纵令不能使我日本的工商业同欧美并驾齐驱，也要使其在东洋成为中心，这并非容易的事业，而且同政治的进步、军备的扩充相比，并无轻重之分。”

“二十七、八年的战争（甲午之战）之后，东洋的政治形势变化极大，与此同时，商业形势也一改旧观。我认为，如今在注意政治、注意军备的同时，我们工商业也是必须大鼓干劲、振奋精神的时期。如上所述，如果想要使日本的工商业至少成为东洋中心，那末第一，我想请诸君考虑：我们究竟有多少必须向中国、朝鲜进行的工作？”

“中国虽然战败，然而试看其后来情形，比如说，外国资本向矿山、向铁路长驱直入，五花八门的外国知识也在源源不断地输入。在我们议论纷纷、莫衷一是之间，该国的物产、该国的运输，也许将会出现使我们瞠乎其后的局面。面临此种形势，我国虽取得了战胜的荣誉，但若不能使实业呈现出与之相应的进步的话，我想那决不是我们一己的不幸，而必须视为是国家共同的不幸。（鼓掌喝采）”

可是，要想使日本资本主义进入中国和朝鲜，就必须加强国家财政，为此必须实现增税，这不是出于实业家的一己之利，而是为了国家——涩泽最后这样结束了讲话（《青洲先生六十年史》）。这段话很重要，它坦率地表明了日本资本家与天皇制并肩携手、积极参加列强瓜分中国和朝鲜的竞争的姿态。这时，涩泽不仅是财界的斡旋人，经常充当财界同政府的联络员，而且还是对朝鲜进行金融侵略的主要角色第一银行的总经理。另外，正在这时出现了京仁铁路和京釜铁路的问题，所以必须把这些因素都综合考虑进去。涩泽十分清

楚日本缺乏资本同帝国主义竞争。正因为这样，他才主张采用增征土地税或其它任何办法来巩固国家财政，在政府的财政援助下，强行进行资本侵略。对此，从全国商会聚集来的“实业家”们一齐拍手叫好。

山县内阁为收买反对派议员，除上述的将年薪一举提高五倍以外，还以各种利权引诱，如直接给每个议员钱，等等，用尽了招数。这笔收买费是由天皇支付的。枢密院议长、同官中关系很深的公卿贵族西园寺公望揭露说，在山县内阁期间（一八九八年十一月——一九〇一年十月），“由宫内省支出总计九十八万元巨款，可以认为，其款系将邮船公司^①红利当作五厘，其剩余皆用于此”。还说，“颇难相信山县将这些款仅用于操纵议会”，他叫天皇出钱收买议员与政党，而本身也揣入腰包一部分。原敬从西园寺口里听到这番话后，在日记中发牢骚说：“山县貌似清廉洁白，却有如此秘密，实令人吃惊”（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六日）。

这样，增税案经过协商，将增征率规定为地价的百分之三点三，而不是百分之四，并修改了地价等，于十二月二十日在众议院通过。贵族院的大地主们的反对也被击退了。议员收买费是由天皇从资本主义财产中支付的，而不是出自资产阶级之手，这表明了天皇制度对于资产阶级的相对独立性。但由于在资产阶级的热烈支持下才得以违背地主阶级的意愿而强行实施目的在于为帝国主义竞争提供资金的增税，则意味着天皇制与大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的集团的形成。同时

① 天皇是邮船公司大股东，其红利远不止五厘。——译者注

这一事件也反映出，地主阶级中的旧富农式地主同具有资产阶级一面的寄生地主之间的政治分歧已经加深，后者在“帝国主义”的追求上已和大资产阶级站在同一立场。

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这在修改宪法过程中，也表现在制度上。以前的伊藤内阁曾在提出增税案的第十二届议会上，同时提出了选举法修改案。修改的要点是：（1）将选举权的纳税资格，由以往交纳十五元以上改为交纳土地税五元以上者，交纳所得税或营业税三元以上者；（2）府县各为一选区，市为独立选区；（3）每十万人选出一名国会议员，但不满五万人的市也选出一名，超过时四舍五入；（4）由此，将议员规定人数由三百人增到四百七十二人。按这项法案，有权者人数将从四十五万人增至二百万人，仅城市部分，就将一下子选出一百人左右的议员。这项提案是在什么势力的推动下提出来的，尚不清楚。伊藤首相在提案理由说明中，说是为了“适应工商业的发达而特别增加市的代表”、“使之充分代表各类国民的意愿”。

对这一提案，众议院制定了修改案：财产资格虽与政府案相同，但原则上否决了市为独立区，只承认东京、大阪等八大城市为独立区，每八万人选出一名议员，投票采用连记、无记名方式等等。抽去了政府案的主要内容，然后交给了贵族院。但第十二届议会由于土地税问题被解散，该案也告吹了。

见此情景，新潟市代表斋藤己三郎率先和东京、名古屋、鸟取的代表一同策划，推进了“选举法修改促进全国各市联合会”的成立。山县内阁一成立，各代表便以重新提出伊藤

内阁的修改案为目标，对政府展开了强大的运动。山县内阁予以接受，在第十三届议会上，提出了原则上与伊藤内阁案相同的修改案。但众议院仍然同上次一样，在伤筋动骨地修改一番以后，送交了贵族院。贵族院在郡市议员人数上作了一个接近政府案的修改案，但贵众两院在协商时，没能达成协议，又一次告吹了。

于是，各市联合的修改运动愈趋激烈。聚集了全国六十一市所有代表的联合会，在召开第十四届议会的一八九九年十二月，向政府、议会、各政党等提交了要求修改的意见书，其要点如下：

“全国城市人口为五百一十六万余人，加上镇人口，达一千零六十万人，约相当于全国总人口四千五百万人的四分之一。但三百名众议员中，单纯代表城市部分的，只有东京、大阪等六市选出的十七人，这‘不符合使各类公民平均选出其代表者之议会政体本义之法制’。‘农业一向乃立国之本。使之为重点虽属无可争议，但今鉴于本国地方民众之现状与列国交通发达之现实情况，不应期望仅以农业伸张国运。工商业亦必须成为立国之本。因此，毋庸赘述，众议院代表必须打开以工商业为主之城镇地区选出多数代表之路’。因而希以一切施行市制之市为独立选区，各市至少选出一名议员，东京、大阪等大城市则按人口比例选出议员。”

山县内阁采纳了这一意见。向第十四届议会提出了基本与上次相同的议案。至于众议院与贵族院对原案作了怎样的修改，这里就不多说了。最后经两院协议会通过的修改选举法是这样的：（1）纳税资格为交纳直接国税十元以上；（2）

三万人口以上的市为独立区；（3）郡市均为每十三万人选出一名议员。纳税资格没有把土地税与所得税、营业税区别开来，而且降低款额也不多。作为独立区的，不是所有的市，而是仅限于人口超过三万的市。这些较之伊藤内阁的提案，都不利于工商业者，但由于总算通过了，因此，这是作为一个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的一个跃进，它反映了工商业同农业并列为“立国之本”的时代的到来（上述关于选举法修改的部分均据大津淳一郎《大日本宪政史》IV、V）。

可是，山县则为防止越来越趋于资产阶级化的议会与政党的势力进入天皇制权力机构的中枢而煞费苦心。对山县内阁来说，在第十三届议会上实现增税之后，宪政党便没有用了。议会结束不久，山县内阁便于九九年三月改革了府县制、郡制，加强了内务大臣的知事监督权，并不顾宪政党的强烈反对，修改了文官任用令，废除以往对简任官的自由任用，规定要有一定的资格，堵塞了没有官僚经历的政党人士进入官僚上层的道路。一九〇〇年四月，深谋远虑地将文官任用令规定为枢密院的谘询事项，使之即便出现政党内阁，也不能以内阁一方之见而予以修改。

另外，山县内阁又在同月修改了陆海军省官制，规定大臣、次官的任用资格仅限于现役将官。在制度上，自一八八一年以来没有限制，只不过是在事实上没有任用现役将官以外的人的先例，但现在则从制度上加以确定。这一制度有深刻重大的政治意义。据此，如果没有不受议会制约的陆海军最高首脑的同意，任何内阁都无从成立，无从存在下去。通过改革这一制度和最大限度地扩大解释由宪法规定的统帅权的

独立，陆海军成为专制天皇制的不可侵犯的牙城。它独立于政府与议会之外，必要时甚至可以使政府从属于自己。这点在后一章叙述。

山县企图这样加强天皇制的独立性，但官僚统治层的另一巨头伊藤博文，则企图将资产阶级政党作为天皇制的助手予以控制。他再一次着手组织自己曾尝试过的“亲兵”政党，开始向被山县抛弃而不知所措的宪政党做工作。宪政党应声而来，提出要拥护伊藤为总裁。伊藤担心驾驭原班人马的既存政党，会使自己对党的控制力受到牵制，便没有接受其倡议，而暗示解散党。宪政党竟然不顾体面地听从了。这样，一九〇〇年八月，成立了以旧宪政党为基础的“立宪政友会”。伊藤任总裁，原敬等官僚出身的伊藤心腹任干部，明文规定实行总裁独裁制。这次，不仅井上馨仍然四处奔走，三井系资本家提供资金，而且伊藤还从天皇手里领取了资金。伊东已代治、金子坚太郎等伊藤的老党羽，在官界、财界、政党方面到处游说。宪政本党的尾崎行雄，是该党自改进党以来的首脑，是众所公认的自由主义者，但是就连他也带领三十余名议员赶来拜倒在伊藤——直到昨天还“为国家”而攻击其为藩阀专制政府的罪魁祸首——的脚下。

伊藤要缔造一个“国家的政党”，即不拘于阶级利害和地方利害的、为国家而帮助天皇的政党。政党内阁制是伊藤所极力排斥的，他在政友会创立委员会上发表的“宣言”中极力主张说，“盖阁臣之任命系属宪法之大权，其选拔任用，或出自政党人员，或举党外人士，皆取决于元首之自由意志。因而既被举就辅弼之职，行赏罚之事，虽党员政友，亦不准

从旁置喙。”而且，宣言强调行政官资格任用制，不许以党员为由而任无资格者为官吏，从一开始就警惕政党猎取官职。总而言之，对他来说，政党虽然只拥有有限的权限，但其在存在议会的条件下作为顺利推行天皇制官僚政治的工具，也是必要的。

伊藤创立政友会的另一个目的，是从政治上把地主、资产阶级集聚在一起。他在创立委员会上的长篇演说，充分表现了这一点。他在演说中强调，“从事农工商者”应该抛弃以往那种认为政治是特殊人干的想法，要关心政治。并说，“今天，关于日本所谓实业的利害”，只有当事者才完全晓得，因此，迫切希望“就各类人民的利益”而立法的议会“能够代表各类事业”（《日本政党史》）。

这大概是出于伊藤多年的体验：没有资产阶级积极的协助，便无法行使国政去参加欧美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伊藤发挥资产阶级的政治积极性的意图，在提交给第十二届议会的选举法修改案中也有所表现，而且如前面所说，那时也曾作过组织政党的尝试。当时（一八九八年六月十八日），他同涩泽荣一恳谈，从涩泽手中拿到了表示支持的誓约书。誓约书的内容使我们感到，伊藤是怀着怎样的危机感来寻求涩泽的（即大资产阶级的）支持的。誓约书说：

“方今正值国家多事之秋，济时方策不一而足（方策之中包括经济财政及外交诸事）。然若左顾右盼而终不能决是非于甲乙之间，则恐已坐失时机，陷于难以救药之境地。故以为当务之急，乃须于现主张维护国家方策者中，选定其一。其结论如下，即：

涩泽同伊藤交换意见之结果

涩泽以伊藤所行政策为是（下略）”。（平冢笃编《伊藤博文秘录》）

伊藤在这次会议后不几天，便扔下内阁，经朝鲜去中国旅行，亲自目睹了列强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激烈斗争情形，于十一月上旬回国。接着，在十二月十日的宪政党招待会和十一日的实业家招待会上，希望一齐奋起以使日本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不落于列强之后。翌年（一八九九年）四月到十月，他积极到长野和关西、九州、东海、关东、北陆各地，号召“实业家”“权势者”们提高应付东洋形势的政治觉悟。其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七月十六日在宇都宫发表的题为“世界的进步与日本国民的觉悟”的演说，在演说中就近代帝国主义战争作了大体正确的说明。他说，现在各国正在进行世界性的商业竞争，最近战争发生的目的，大多是为了防止在向其他地区扩展工商业利益时来自外部的障碍，或者是为了主动地向世界上推进工商业，因此，不同于以往那种单纯为攻占国家或为名誉所进行的战争。并且，他还主张日本也要把“加强国内团结”、“与世界列强争雄”作为“日本全国的方针”，为此，就必须进行扩张军备。他迫切希望实业家认清世界与日本的形势，关心政治，将工商业发展到“对岸中国或朝鲜、南洋诸岛”（《伊藤博文演说集》，载于《续伊藤博文秘录》）。

就这样，为使日本在近代帝国主义竞争中不致落后，伊藤决心在官僚的领导下将“农工商”的代表，即地主与资产阶级、尤其是后者，从政治上、组织上团结起来。出于这一意

图，他辞去了与宫中有关的一切职务，创立了政友会，这一意图基本得到了实现。政友会的确作为“国家的政党”“敕许政党”而成为官僚制的补充物。然而，政党在本质上就是以执政为目的开展活动的组织，党代表的资产阶级利益越多，党的独立性就越强，虽说是官僚统治的补充物，但不可能永远停留在伊藤所希冀的从属物的地步，这在以后的历史中表现了出来。

总而言之，政友会的成立，是天皇官僚制同资产阶级及地主结成同盟的表现。在这一时期，同盟的主导权仍在官僚方面，但官僚却不得不组织这样的同盟。这意味着，从资产阶级方面来说，他们早已不是甲午战争前的那种天皇制的被保护者，而已经成为帮助官僚冲进帝国主义竞争场所的独立的政治势力。就连山县那样彻底排斥政党的人，也不能不利用政党，是因为他已经必须依赖通过政党表现出来的资产阶级的势力了。但这种“资产阶级”并非单一的政治势力，尽管它是被大资产阶级控制的，但其内部却蕴藏着特权大资产阶级同没有特权的中小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

2. 治安警察法与帝国主义

天皇制同资产阶级及地主阶级的同盟，不仅出于对帝国主义对外政策的追求，而且具有同随着资本主义与寄生地主制的发展而一起成长起来的工人、农民的阶级矛盾方面的因素。第十四届议会于一九〇〇年三月通过的治安警察法，就

是其法制上的表现。

石川旭山、幸德秋水在《日本社会主义史》(一九〇七年)一书中作了这样的论述：“甲午战争结束，社会运动的舞台揭幕。说企业热的勃兴，说大工厂的新设、工资劳动者的激增，又说军备扩张，说租税增征，说贫民工人的穷困，以致工人问题举世议论，社会问题为有识之士所注意”，战前一般包含在贫民问题中的问题，战后则作为工人问题从阶级上被提了出来。

据警察统计，在战后最初发生经济恐慌的一八九七年，大阪的天满纺织公司、群马的新町丝绸纺织公司及其它工厂的工人、各地矿工、制盐工人，还有造船工人、石匠、锯木工人等工匠的同盟罢工，有三十二起，参加者在六千三百人以上。一八九八年二月，日本铁路公司的机务工人八百余人，断然举行了极其有组织的罢工，要求改善待遇、更换职务名称和临时增薪，中断了东京至青森的铁路运输，震惊了全国。

在这种形势的基础上，从美国体验工会运动回国的高野房太郎等人，自一八九七年春发起组织工会的运动；七月，与片山潜等组成“工会促进会”；十二月，出版机关刊《劳动世界》，由片山潜任主笔。由于促进会的活动，同年底，以东京炮兵工厂为主，东京及其周围的铁工熟练工人成立了“铁工协会”。刚成立时有十三个支部、工会会员一千一百八十人，到翌年（一八九八年）末，把组织扩大到日本铁路公司各工厂及其它工厂，拥有三十二个支部、二千七百一十七人，次年又继续顺利发展。同时，在大工潮中取得了胜利的

日本铁路公司机务工人，其后组织了名称为“矫正会”的工会，每月积蓄一天的工资作为斗争资金，一八九九年末，拥有近一千会员和二万元公积金。此外，在活版印刷工人中间，从一八八九年春也兴起了成立工会的运动，一八九九年十一月正式成立活版工会时拥有近三千会员。

这些工会是仿效美国的 A F L（美国劳联）按职业成立的工会，是站在明确的劳资协调主义立场上的。《劳动世界》的创刊号社论说道：“劳动世界的方针，不是革命，而是改良；是完成真正的调和，而不是对资本家开展分裂斗争”。而且，以高野和片山为首的当初的工会领导人，都是民族主义者、甚至是国家主义者。

据过野功在其论文《黎明期工会运动中国家主义的转机》（《同志社法学》八十七号）中说，高野称自己在日本掀起工人运动的理由，并非出于对工人境况的怜悯和人道主义的同情，“我之所以主张此点，是因为它对国家将来的繁荣是必要的，对将来文明化是不可缺少的”。他把这篇文章用英语发表在美国的 A F L 机关刊上，因此很显然，他并不是考虑到政府的检查或者作为战术妥协才如此主张的。过野还列举了《劳动世界》第三号的“劳动问题是重要的国家问题”这一主张及其它主张，论证了《劳动世界》是怎样主张国家主义的，并说从这一立场出发必然产生劳资协调主义。农商务次官金子坚太郎象响应工人运动领导人的这种态度似地，他在对工人的演说中，竟以日铁罢工为例阐述了工人团结的力量，“加强职工团体就是加强一国的基础，故决非仅仅是职工的事”（片山潜、西川光次郎《日本的工人运动》，一九〇一年）。

可是，资本家与天皇制警察不准许工人们具有工人本身的权利这种觉悟，即不准许工人们不顾领导人当初的意图，团结起来，逐渐“从资本家那里取得应取得的东西，争取应争取的事情”，尽管是采用铁工工会运动方针中所说的“只以道理与法律所允许的方法”。例如活版工会，最初以每日新闻社长、众议员岛田三郎为会长的活版工同志恳谈会开始活动，但在其成为活版工会之后，即便打着劳资协调主义的旗号，资本家团体也还是明显地予以敌视，就连取得资本家团体的谅解而写入工会规章的“夜班增薪二成”的条款也被作废了（隅谷三喜男《社会运动的发生与社会思想》，载于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现代1）。

另外，象金子这样的中央官僚，则企图将工人运动在其萌芽时期便置于官僚的家长式的统制之下，在拥有工业城市神户的兵库县，他们不顾任何议论，在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县令八十九号的《职工营业主及介绍人管理规则》中作了这样的规定：

“第二条 职工对营业主不得同盟休业或罢工；

第三条 职工不得违背营业主或其代理人的适当命令，也不得采取强迫行为；

第四条 无论有期无期，雇佣期间的职工或雇工，在中止其雇佣之前，不得任意充当他处的职工或雇工。”（山中笃太郎《日本产业革命期工会法》，载《一桥论丛》二十之一、之二）

一八九九年，奈良县也制定了与此大意相同的《工厂及介绍人管理规则》（山中，前引书）。在这以前，于一八八〇

年制定的刑法中，已有惩罚农工业雇工以增薪、改善待遇等要求对雇主进行斗争的规定。不管这样的法令存在与否，反正日本资本主义是通过用国家权力把工人变成资本的奴隶而发展起来的。然而，工会在东京等地却开始迅速发展，对此，资本家不可能长期听之任之。

同时，在地方小城市和农村也发生了各种形式的居民斗争。在工人运动一齐爆发的一八九七年，无产阶级劳动人民苦于米价暴涨，以长野县饭田地方的二千人起义、山形县东根村的一千人起义为主，信越、东北、北陆各地都发生了米粮暴动，在农村人们结合租佃纠纷，袭击了地主的住宅（《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田中惣五郎《日本社会运动史资料》二等）。佃农协会也有了萌芽。片山潜在上述《日本工人运动》中这样记述道：“每年秋天，各地的地主与农民之间都发生冲突，而且逐年加剧。各地都有类似足利町（栃木县）助户地方的佃农于明治三〇年（一八九七年）组织的贫农共党协会、香川县阿野郡加茂村的佃农组织的人道会等那样的佃农协会，这就是佃农运动。它将成为后来轰轰烈烈展开的佃农运动的种籽。”

农民也直接受到资本家的损害。足尾铜矿的矿毒流入渡良濑川，坑害沿岸几十个村子的农民，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足尾的矿毒在一八九〇年就已经被查明，国会议员田中正造自第二届议会以来，一直要求政府救济被害农民并命令公司安装防矿毒设备，但政府置若罔闻。田中所属的改进党→进步党、自由党也不帮助农民而偏袒资本家古河市兵卫。不堪忍受的农民从一八九七年三月开始，于一八九八年三月、九

月、一九〇〇年二月份四次，派各村代表数千人进京示威，都遭到了警官队和宪兵队的镇压，不少人受重伤，在第四次，有三十余人被加以“凶徒聚众滋事罪”被捕下狱。农民这场殊死的斗争，没有感动冷酷的政府和资本家，但广泛地感动了社会上一般有良心的人们，促使人们用批判的眼光去看待资本家的残暴与保护他们的政府。

随着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的发展，基督教人道主义、社会改良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笼统混为一体的“社会主义”思想萌芽了。一八九九年，安部矶雄、幸德秋水、片山潜等建立了“研究社会主义原理是否适用于日本”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它于一九〇〇年发展成为以社会主义运动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协会”。统治者们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就害怕日本早晚也将象西洋诸国那样出现“社会党共产党一类的政党”。九二年，自由党也看到了社会主义的前兆，发表宣言说“社会主义与我党之自由主义背道而驰”。现在，在现实中出现了以“社会主义”为目标的派别，而且工人、农民都开始主张本阶级的利益并团结起来。政府、资本家和地主中有先见之明的人对这一事态抱有深刻忧虑，也就是当然的了。

他们企图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扼杀在其幼芽时期。一九〇〇年三月，政府与议会没有经过很好地讨论，便通过了“治安警察法”。该法同一八九〇年的“集会与政社法”，以及上溯到一八八〇年的“集会条例”是一脉相承的。第一，所有政治结社及政治集会也同非政治性结社与集会一起统统被置于警察官的任意取缔之下，授予内务大臣禁止结社权、授予警察官解散集会权。第二，禁止官公吏、

军人、教员、大中小学生、未成年者及妇女加入政治结社、参加政治集会或充当其发起人。这些同集会与政社法是一样的。而其和集会与政社法主要不同之处有两点：

(1) 集会与政社法禁止设立政治结社的支部，禁止政社间相互串联、结盟，还禁止政社利用文书或委员“诱导公众”。即几乎剥夺了政党活动的自由；而治安警察法则全部废除了以上规定，保证了资产阶级、地主政党的活动自由。

(2) 治安警察法制定了集会与政社法中所没有的新规定，或者可以称其为禁止工农活动的条项。该法第十七条第一项规定：“(一) 使之加入或妨碍其加入就劳动条件或报酬而协同行动的团体；(二) 为了实行同盟解雇或同盟罢业，让雇主解雇工人或拒绝从事雇佣劳动的申请，让雇工停止雇佣劳动或拒绝雇佣的提议；(三) 强迫对方答应雇佣劳动条件或报酬；不得用以上各款的目的对他人使用暴力或威胁，不得以第二款的目的诱惑或煽动他人。”第二项规定，“强迫对方答应用于耕作目的的土地租赁契约而使用暴力、威胁或公开诽谤者”，其惩罚与前项相同。第二项中虽没有明文规定禁止佃农组织协会的活动，但实际上援用了第一项的禁止工会活动的规定。

废除禁止资产阶级、地主政党活动自由的规定，而制定镇压工潮、佃农纠纷及其协会活动的新规定，这表明阶级关系已不同于制定集会与政社法的一八九〇年。对天皇制来说，资产阶级、地主阶级及其政党已是同盟者，而不再是敌人，为资产阶级、地主阶级而镇压工人、农民阶级，这是该法的着重点。因此，尽管在取缔非政务性结社和集会这一点

上仍同集会与政社法相同，但其含义、内容却不同了。集会与政社法对非政务性结社、集会的取缔，是针对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伪装的政务结社、集会以及狂信式迷信的团体和集会。治安警察法则不仅如此，而且还意味着取缔资产阶级、地主政党以外的人民，特别是工人农民的一切团体和集会。

至于该法的制定是否有着资本家、地主以某种具体事件为起因的强烈要求，尚不清楚，但在上一年一月，铁工协会在召开纪念一周年集会时有过根据集会与政社法被解散的事件。而且，有松内务次官在向众议院委员会进行说明时，说什么，公众由于日本铁路公司的罢工而遭受了多少损害和困难，这“在今天还有法律存在的社会里实在令人不胜叹息”，这清楚地表明了该法是基于政府、资本家共同对工人运动的恐怖而制定的。

有松还说道：“凡属大工业、矿山、船舶运输”的工潮，既损害公司，又损害社会，“特别是一旦供应军需品的制造者遇到同盟罢工，将给战役造成很大影响。比如，如果炮兵工厂的工人在战争中举行了罢工，则我国军队将蒙受极大的不利。而且，从国家经济方面来说，也将带来非同小可的损失，不仅如此，还将对贸易及其它关系产生巨大的障碍”（众议员委员会记录，引自前引中山论文）。这并非吓唬议员们——也没必要吓唬——而恐怕是政府当局者确实怀有这种恐怖感。炮兵工厂是铁工协会的据点。而且政府正在全力以赴地扩张军备以准备瓜分东亚的帝国主义战争，因此，他们一想到万一军工厂发生罢工，便不寒而栗。这就是说，治安

警察法既是帝国主义者的危机感的产物，也是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在天皇制的领导下为冲进帝国主义竞争场而共同采取的建立国内体制的一环。

对于治安警察法，在其审议已进行了相当时间后，幸德秋水和《劳动世界》才发出了反对的呼声，而群众性的反对行动尚无从产生，议会只作了法令条文技术上的问答和修改，两院便全体一致通过了。然而，他们“通过”的这种作法，作为反面教员教育了工人阶级。工会运动尽管因该法而一时受到了挫折，但炮兵工厂和日本铁路大官工厂的铁工协会会员们这些先进工人，支持片山、幸德、安部、堺利等社会主义者，促使他们于一九〇一年五月成立了社会民主党。虽然该党一创立就被治安警察法禁止结社，但社会主义运动并没有衰退。而且工人运动真正站到阶级立场上，为摆脱劳资协调主义作了思想准备。

记述得有点抢先，现在再说回来。一九〇〇年一年之中，相继修改了选举法和制定了治安警察法，创立了陆海军大臣现役将官制和政友会。这表明日本的阶级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即其基本结构是：天皇制在保持其独立性的同时，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结成同盟，来对抗工人农民阶级。而且，这种阶级结构是同日本派遣部队充当帝国主义联军的主力去镇压义和团反帝民族斗争这一事件所表现出来的日本的帝国主义行径相呼应的。也就是说，有着以下这种贯穿国内、国际的因素：正是为了参加列强帝国主义的竞争，天皇制与资产阶级、地主阶级才结成了同盟，统治阶级才在这个时候这么快地需要治安警察法；并且由于资本主义取得了一定的发展，

使天皇制主导的军备扩张成为可能，而资产阶级也与天皇制同样需要对朝鲜和中国进行帝国主义侵略，日本才因此参加了帝国主义联盟。

第四章

帝国主义思想及其批判

1. 帝国主义意识形态的流行

资本主义在国民经济方面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资产阶级和具有资本家那样的一面的地主阶级一起，通过政党和议会与绝对主义的天皇制官僚统治阶层进行交易，以至于构成资产阶级核心的大资本家阶层直接向官僚统治阶层施加影响，官僚统治阶层又必须取得资产阶级的支持，两者既在局部上相互对立，又在整体上结为同盟。在扩大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治自由和权利的同时，对工人、农民阶级加以新的剥削和压迫，在国际上一头扎进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东亚的竞争的行列——这是前章阐述的一九〇〇年前后的日本的阶级政治结构。竞争瓜分东亚的主要目的，就日本来说，正如伊藤博文露骨地指出的那样：和“仅仅为了侵吞国土或荣誉”的“昔日之战争”不同，“其目的在于消除向国外扩充工商业利益时的外来障碍，或主动地向世界扩展工商业”，即“必须带来资本主义利益”（《伊藤博文演说集》）。

这种侵略主义，正如其推行者代表之一的伊藤意识到的那样，已不是“昔日的”，即象甲午战争之前那种单纯的天皇

制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而是世界历史进入近代帝国主义阶段，在帝国主义列强拥进日本近邻中国、朝鲜那种形势推动下，离垄断资本主义尚远的日本也过早地迈出的近代帝国主义的第一步。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之后，产生了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两者溶为一体，互相壮大，后者逐渐占据了优势统治的地位。这也可以称为“双重帝国主义”，即指帝国主义政策中的绝对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两重性，而不是绝对主义和金融寡头制的权利和体制的两重性。我国帝国主义研究史上通常所说的“双重帝国主义”论，是就后者而言。因此，本书避开这一用语。

随着这种政治结构的形成，在意识形态领域，美化、巩固这种政治结构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占了上风。

甲午战争之前，《三醉人经纶问答》中“豪杰君”那样的侵略主义潮流曾风行一时，但那并没有反映资本主义的利害关系。“仅仅只是为了侵吞国土或荣誉”，即使潜伏着与欧美列强对抗的意识，也没有直接表面化，毋宁说是边对欧美“守信义”，即屈从妥协，边割取“易取的”朝鲜和中国。

但是，当时一方面有想通过国内民主革命的深入来促进文化、经济的发展，使这一小国毅然能与欧美大国并驾齐驱的“绅士君”的理想主义潮流在民间的有力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存在着这样一种思想：日本不应压迫中国、朝鲜，相反地，应共同做为亚洲的被压迫民族，团结起来反抗欧美。这种理想主义或亚洲联盟思想的基础，是反对专制天皇制，赢得对内的民权和对外的国权（统一于民权的优势之下）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不久，一方面，争取自由民权的革命运动遭到

挫折；另一方面，随着欧美列强侵略东亚愈演愈烈，在民权优势之下实现民权与国权统一的可能性日趋消失，国权主义日益占优势，逐渐压倒了民权主义。这种状况，作为政治实践，表现为一八八七年以反对井上外相的条约修改案为开端的民权派最后攻势的失败和一八八九年国权派领导的反对大隈外相条约修改案运动的胜利。与此同时，日、朝、清平等团结的思想，成了以日本为“盟主”的“联合”、似是而非的联合论（樽井藤吉《大东合邦论》，一八九一年），“盟主”论顷刻间又变成了“霸主”论（大井宪太郎“东洋俱乐部设立”的演说）。过去的许多自由民权左派的领导人，用这一理论充当了为甲午战争制造舆论的急先锋。此外，自称为“国民论派”，在国权优势下也曾某种程度地主张过民权的陆羯南等人，一八九二年以后，也强调起应实现神武天皇“并吞六合，席卷八紘”之圣旨的“皇国之使命”来了（《条约修改》）。

八十年代初，在自由民权运动的全盛期提倡“官民一体”，虽不主张与朝鲜、清国联合，但希望巩固朝鲜、清国的现代化与独立自由的福泽谕吉一派，一八八四年看到清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同时，当年自由党解散，改进党也名存实亡），印度支那被法国占领时，于一八八四年十月，也在自己主办的报纸《时事新报》上发表了题为《东洋之波兰》的社论，预料将来中国被列强瓜分的状况，期待那时日本也能占领福建省的一半和台湾岛。翌年，一八八五年三月，福泽在《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宣称“我国不应为等待邻国之开明，共振亚洲而犹豫不决，莫如摆脱当前之处境，与西洋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中国、朝鲜，也无须因是邻国而有所

顾虑，应按西洋人之对待方法而行。”主张与西洋列强一道侵略朝鲜和中国。对这一派来说，甲午战争是他们所持见解的实践。福泽感到“这次战争宛如自己发动的一样”，为之欣喜若狂（石河干明《福泽谕吉》）。

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八十年代的那种理想民主国家论也云消雾散了。但是，“八十年代的理想民主国家论”消失之后，又出现了二十世纪的那样的小小的萌芽。这将在下文中阐述。以改组、扩大玄洋社而成立的黑龙会（一九〇一年二月成立）的“大亚洲主义”为前奏，巧扮为亚洲联合论的叫喊声日益强烈，但这些叫喊，包括冈仓天心的著名的《东洋之理想》（一九〇五年）在内，连《大东合邦论》那种程度的联合起来的感情也没有，只不过是彻头彻尾的朝鲜合并论，中国瓜分论蒙上了一层黄种人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种族主义的面纱而已。日本已把朝鲜做为半附属国，割据了中国领土台湾，基本上从亚洲的被压迫国家变成了与欧美列强一同压迫亚洲的国家。因而，就失去了作为亚洲被压迫民族，站在共同的民族主义立场上主张联合的根据。联合论，就日本人来说，只有站在不是民族主义，而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立场上，最低也要站在绝对和平主义、世界大同主义的立场上，而且只有与反对本国统治者的侵略主义的斗争结合起来，才成为现实的东西。不坚决反对本国统治阶层侵略的任何亚洲主义，实质上就是鼓吹本国统治阶层侵略亚洲，而不可能是任何别的东西。不管反对白种人帝国主义的呼声多么逼真，也只不过是日本帝国主义与欧美帝国主义矛盾的表现，既不是亚洲的解放，也不是反对帝国主义。

有这样一种见解：不管其客观作用如何，主观上，“亚洲主义者”主张亚洲从白种人帝国主义手中解放出来，主张亚洲联合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这是蔑视中国、朝鲜，日本称霸的帝国主义心情。它和福泽谕吉出于这种心情，认为甲午战争并非侵略，而是谋求文明、开化与进步的日本讨伐阻碍这种进步的清国，将文明事业推向亚洲的论调是一脉相承的。

甲午战争以后，控制制造舆论的报刊、杂志和思想界的，是打着福泽式“推进文明”旗号的对帝国主义的赞美。从日本已经弱于欧美，就应征服比日本更弱的邻国而成为与欧美相抗衡的强国这一前代的“豪杰君”式的侵略主义摇身一变成为主张：日本既然已是“世界之日本”，“东洋之霸主”，而弱肉强食又是当今世界之大势，列强彼此竞相实行帝国主义，所以，日本也不应落后于人。这种主张，虽然由于陶醉于战争的胜利而被夸大，但无论如何是根据“力量”的自信、旨在向国民鼓吹这一自信，并与“扩充工商业利益”这一资本主义的要求结合在一起的。这是与战前侵略主义论的根本区别之所在。这一思想的具有代表性的鼓吹者，有主办并操纵着杂志《国民之友》和报纸《国民新闻》的德富苏峰，具有非凡的鼓动才能、使当代青年羡慕不已的东京帝大毕业的文艺评论家高山林次郎（樗牛），以及早稻田大学教授、早稻田出身者占多数的评论界的总负责人浮田和民等。他们活动的主要舞台是当时出类拔萃的两大杂志——《国民之友》和一八九五年甲午战争的胜利已确定无疑时创刊的博文馆杂志《太阳》。

在一八九〇年前后的革命民权运动失败后的思想界，德富苏峰曾作为“平民主义”、“和平主义”的首倡者，勇敢的战

士成为进步派的核心。二十四岁的青年苏峰，在他的著作《将来之日本》（一八九六年）中，极力主张将来的日本应是“和平主义的商业国”，“生产的平民社会”，坚决反对军备扩张和侵略主义。他断言，没有“居住于茅屋之中”的劳动人民的幸福，则“绚烂之军备，辽阔之殖民地与强大之帝国”均无任何价值。这一论断给了进步青年极大的影响。

他同他主办的《国民之友》和《国民新闻》，随着甲午战争的迫近，在“自由外交”的幌子下国权主义色彩日益浓厚。中日一开战，就紧跟政府和大本营，参谋次长上操六和苏峰成了密友。当年年末，苏峰著了《大日本膨胀论》一书，如书名所示，赞美日本的扩张，煽动战争热。从那以后，他经常充当统治阶级中极端扩张主义、极端帝国主义分子的吹鼓手。他曾热烈地支持发动了甲午战争的伊藤内阁，但当看到这个内阁屈服于三国干涉时，又成为反伊藤派，靠近萨摩阀的松方正义和改进党的大隈重信，为实现松隈内阁而奔走呼号。松隈内阁于一八九六年九月成立时，他正在国外旅行，翌年——一八九七年六月回国，七月就当上了这一内阁的简任参事官，大肆推行帝国主义政策。年末，松隈内阁辞职，他也弃官而去。不久又投靠山县有朋、桂太郎等军阀，而成了为他们出谋划策的一员。

苏峰进入政府，鼓吹帝国主义，使尊敬他这个曾是平民主义、和平主义者的人们大为惊讶，纷纷谴责他的“变节”。对此，他转而辩解道：我丝毫没有变节，提倡帝国主义是《大日本膨胀论》之后的事，当时没有任何人把此书看作是我的变节。那时，他看到日本不得不屈服于三国干涉，说道：

“无力之公理不能战胜有力之强权。欲实现公理，须有使之实现之实力。因而，予归依于实力之福音”（德富《时务一家言》绪言，一九一三年）。此外，苏峰在答复山路爱山责难他的变节的文章中说：“吾之观点由和平主义发展为帝国主义乃彰明较著之事实，但切莫忘记，此种发展（第一）与甲午战争前后日本之地位有所不同，（第二）与世界之大势日益趋向帝国主义此二事实紧密相关”（《致山路爱山》载于《社会与人》）。

苏峰主观上的确没有变节，而是“进化”了。这一进化，大概是他上面提到的“两个事实”推动的结果吧。他之所以提倡平民主义、和平主义、生产主义，是他断定那是“世界之大势”，考虑到日本也必须顺应这一大势的缘故。这一点只要读一读《将来之日本》就一目了然了。而且他对“世界之大势”做出的那种判断，是同当时日本是个小国，是个资本主义产业尚不发达的弱国，根本不能进入大国行列的事实相关联的。为探求这样一个弱小国家的生存之路，而且做为和平主义的使者的新岛襄的教导仍回荡在脑海的青年，目睹“世界之大势”，可能自然认为平民主义、和平主义、生产主义是未来世界的必然之路吧。但是，由于爆发了甲午战争，“大日本”抓住了膨胀的良机。由于在战争中取胜，进而获得了巨额赔款和新领土台湾，资本主义生产迅猛地发展起来。日本已不是昔日的小国、弱国。这时，从进一步谋求扩张的立场上看，三国干涉就意味着“世界之大势”不是和平主义，而是帝国主义。这样，“世界之大势”主义者、战争期间的军部御用记者德富苏峰“进化”为帝国主义也是必然的。多年以后，

他在晚年（一九三五年）的《苏峰自传》里，对于有人谴责他因甲午战争而与藩阀政府一个鼻孔出气一事写道：“既然作为公务员立足于世，顺应大势，引导大势乃理所当然。”确实，他从一个摇唇鼓舌者自问世之日起，可能就是一个“顺应大势”，站在“大势”之前的人物。

以上就苏峰的主观方面进行了分析。如果从客观上探讨一下他的阶级立场的话，那么，苏峰出身的家庭——肥后——自耕地主——那种富农的小资产阶级的一面，就是其平民主义、和平主义、生产主义的社会的、阶级的基础之所在。这种富农式的小资产阶级（不是德富家这一个体，而是阶级），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或成为具有资产阶级一面的寄生地主，或加入了产业资本家阶级的行列。而且，这个地主和资本家的阶级，趁甲午战争之机，与天皇制官僚、军阀抱做一团，互相依赖，狂热地追求帝国主义政策。苏峰的思想“进化”，可以看作是他所依附的阶级的“进化”的最典型的反映。

苏峰成了露骨的“实力之福音之信徒”，但这时还没有象晚年那样，把“万世一系之国体”论和日本人的“民族性”与帝国主义结合起来加以说明，使之合理化。这个工作由高山樗牛完成了。早在东大哲学科读书时，高山樗牛就以《泷口入道》当选为《读卖新闻》的得奖小说，作为小说家、文艺评论家扬名于世。一八九六年大学毕业后，出任第二高等学校教授。九七年进博文馆当了《太阳》杂志的主编。其后，他主要致力于在《太阳》杂志上发表以时事和思想问题为内容的篇幅不同的论文和随笔。而且自发表论思想问题的第一篇论文《日本主义》（一八九七年）以来，他一直提倡“日本主义”。据他解

释，那是战前的国粹主义系统的延续，但与国粹主义者所说的“国粹”主义是暧昧的、恣意的、从兴趣出发的不能等同。“日本主义”明确规定是“根据国民特性之独立自主精神，旨在发挥开国当初所抱负之道德原理”。

若从这篇论文以及他相继发表的《我国体与新版图》（一八九七年十月）、《明治思想之变迁》（一八九八年四月）等文章来看其“日本主义”的话，第一，它首先是以大日本帝国宪法的“万世一系”的天皇主权主义和教育诏书所教导的“国体之精华”为指导思想的国家主义。第二，它是在这种国家主义下完成了国民的政治、道德统一的日本的“国民思想”，探讨甲午战争后“日本在世界之地位及命运如何”时，才先“争于内者”而“今则转于外”的。也就是日本国民遵照皇祖天照大神的神敕，为使皇室与日月同辉，永世繁荣而发挥“君臣一体”，“忠孝不二”的国民特性，平素加强军备，进而实现神武天皇“并八纒为一宇”之圣旨的疯狂的海外扩张主义。据他解释，“国家道德之外无人类情谊”，“世上无人类，唯有国民”，“日本之国家，乃日本国民幸福之唯一且必然之形式”（《日本主义》）。这样，既然无“个人”也无“人类”，唯有天皇之臣民的“国民”是日本人唯一现实的存在，那么，对于日本人来说，皇祖的“发挥开国当初之抱负”的扩张主义、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就自然是唯一的道德和唯一的幸福。

这里没有一点能称之为理论的东西，有的只是神谕的结论。由此可以看到在多年之后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半期的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期间强迫信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国体”的原形。也可以说，日本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由此而

生，因此而亡。

樗牛宣称，“吾认为，我国民作为扩张之国民，具有最恰当之资格”（《我国体与新版图》），但并未举出象样的依据。他又说，“今日本人面临作为殖民之国民而必须认识自己天职之大好时机，国内人口之增加，工商业之发展，海运事业之进步，随同世界交通之发达，无一不促进此时机之发展。此刻，追忆吾人之祖先作为殖民之民族永垂于历史之最显著、最成功之光辉业绩、并非无关紧要”。所谓其历史上的业绩，只不过是指素盞鸣尊、神功皇后的传说，或战国时代南洋日本街的故事而已（《殖民之国民》一八九九年三月）。纵观日本的历史，这些不能驳倒日本人是特别非殖民性的这一事实。在他看来，史实只要有他可以用来为自己的结论涂上一片似乎有理有据的色彩的几个片断就够了。

最初使用了扩张主义和殖民主义提法的樗牛，在一八九九年三月的《帝国主义与殖民》一文中，第一次把殖民主义区别为帝国主义和非帝国主义的，并主张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他说：“殖民事业之扩张，以吾之见，乃国民性之正常发展之所在。”但是，“历史研究使吾得出以下结论，‘凡其领土及殖民地扩张不与之同时断然实行帝国主义，则国家必衰亡。’”那么，他怎样解释帝国主义呢？“吾须首先将最近颇受赞扬且又极其暧昧之‘帝国主义’之意义详加解释。吾之所谓帝国主义，乃不予附属国或殖民地之异种人或异民族以与日本人相等之权利，始终以权力关系规定此等属国人与日本人间本支主从之别之主义。……帝国主义非以附属国或殖民地其他民族为劣等人种，而只以非本国人之故规定其间之上

下主从关系而已。”

这一征服对象并非限于所谓的“劣等人种”的观点，正道出了近代帝国主义的一个政治特征。他在其他短文中，更直截了当地阐述了帝国主义的特征。“帝国主义乃排外主义，垄断主义，侵略主义，非人道主义。英国人之殖民政策及北美合众国占据菲律宾，均非此种意义之帝国主义。征诸近代历史，人道主义即亡国主义，而非帝国主义（《詹詹录》，载《太阳》一八九九年四月号）。

这样的帝国主义怎能在道德上予以肯定呢？樗牛避开了这个问题。他说：“吾在此不谈所谓帝国主义之伦理价值。”但是，不管他在伦理上肯定与否，它仍会因为是现代世界史的“原理”而正当化。樗牛接着说：“然而，历史向吾表明一原理，即不伴随帝国主义之征服或殖民，则常以失败告终”（《帝国主义与殖民》）。这个“历史之原理”，与德富苏峰的“世界之大势”如出一辙。而上边引用的一文中的“国内人口之增加，工商业之发展，海运事业之进步”，即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使日本迅速顺应“历史之原理”、“世界之大势”，使推行帝国主义成为可能，得到“促进”。这种自信乃至自负的依据，正是与以往的“豪杰君”式的扩张主义的区别之所在。

樗牛未能使帝国主义在伦理上正当化，欲使之伦理化的是浮田和民。浮田和民以及高田早苗等早稻田大学派的政治学，与东京帝国大学的德国国家学系统的国家学抗衡，沿袭了英美的政治学系统，其特点是企图把政治作为社会现象来对待。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针对天皇制官僚政治家的国家学说的改进党——进步党的资产阶级政治学。浮田关于帝国

主义论的主要论著，可以在《伦理帝国主义》（一九〇九年）中找到。这本巨著收集了一九一〇年由德富苏峰的民友社出版的《帝国主义与教育》，以及自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期间发表在《太阳》、《国民之友》、《丁酉伦理讲演集》和教育杂志等刊物上的论文六十余篇。在这些论文中，他从各个角度，用各种说法论述了帝国主义如何正当，如何富有伦理性，以及怎样使之正当化、伦理化（以下引用的，除《帝国主义与教育》之外，均是编入《伦理帝国主义》中的论文题目）。

根据这些论著，简单地再现一下他的帝国主义论。首先，关于帝国主义的定义，浮田说：“根据对帝国主义的不同解释其中确有令人甚为忌讳之处。”但他认为，“在国外扶植本国势力，即一个独立国一定要在整个世界上扶植本国的经济或政治势力”。这种一般意义上的帝国主义，“无论从历史趋势方面考虑，还是从伦理道德方面考虑，今天……为了自卫，都是不可避免的”（《帝国主义的政策与道德》一九〇五年）。

因为，第一，世界各个角落已被探查，列强竞相扩大其版图，或建立殖民地，或为本国产品开辟市场……仅满足于本国之独立之国家，当今已不能进入强国之行列”（同上）。他又说，“妄图否定帝国主义之作法，已为当今形势所不容。帝国主义实非‘主义’，乃‘事实’也”（《帝国主义之伦理》一九〇三年）。

此种“世界之大势”乃当时的事实，无须再废笔墨，但由这种“大势”的认识转而主张日本也必须是帝国主义这一点，的确是理论上的飞跃。其根据仍是“国家首先必须为强国，国

家愈弱小愈不能完成国家之任务，何况尚欲对外行仁义，此乃决无可能”这样的国家主义（《国民之品性（2）》一九〇二年）。这和德富苏峰的“欲实现公理，须有使之实现之实力”的论调是相通的。

其次，帝国主义在伦理上怎样正当化呢？正当化的根据之一是，上述非强国之国家不能保障国民之安宁与幸福、也不能“对外国施仁义”的国家任务论。他在《帝国主义与教育》中说，文明国“征服半开化之野蛮民族，或吞并本身无能力独立之国家”，并非不正义，因为那是“促进世界文明、人类福利”的行动。“促进世界文明，人类福利”，即所谓“对外国施仁义”。这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惯用词句。

但是，使浮田致力于帝国主义“伦理化”的，与其说是上述理论，莫如说是社会进化论。他自己解释说（《帝国主义之伦理》），他在《帝国主义与教育》中论述的内容，“无一不是在达尔文的著作中找到的”。他说，根据达尔文学说，“予之所谓帝国主义之伦理，唯将生存作为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为生存而竞争”。但他所说的生存竞争有两种，“一是自然生存竞争……，即所谓吞噬主义。”二是“合理或道义上之生存竞争，即所谓人道主义。”他当然要选择后者。“欲变自然变化为道义变化，人类非但应竭尽全力为生存而竞争，而且应树立理想，进而为高尚之生存而竞争，此乃帝国主义伦理之第三原则，为吾人理想之所在。”

那么，“为高尚之生存而竞争”应该怎样做呢？浮田并未从原理上论述。由上述第一个原则必然导出第二个原则，但第三个原则却不是由此导出的必然结果，而只不过是浮田对

第二原则从外部提出的要求和愿望。所以，也就当然不能从原理上论述。因此，还是看一看他所描绘的“伦理的帝国主义”的具体内容吧。

若对其做出结论，那就是和平殖民。他在上述《国民之品性（2）》中说，步列强后尘登上“文明竞争舞台”（实质上是帝国主义竞争）的日本，用黩武的帝国主义谋求领土扩张是十分危险的。日本人“分布”在朝鲜、满洲、南美洲、澳大利亚、南洋等地，“并安分守法地经营着文明生活，哪国国民敢排斥日本人呢？”仅这一段，确实符合伦理，不会被贴上“帝国主义”的标签。但是，他接着说：“当生活于国外之同胞比生活于国内之同胞多几倍时，平时，日本国民将于海外有购买本国商品之无数主顾；战时，将于海外有强有力之同盟者，其利益反而胜过日英同盟。伦理的帝国主义之功效有如此之大。”这种言词非但不符合伦理，而且是极端背信弃义的帝国主义。夏威夷及美国的日本移民不愿做移居地的和平市民，简直象日本侵略者伪装的先遣部队一样。这种牵强附会的说法，虽然是当时早已开始的美帝国主义排斥日本侨民的借口，但如果真的按浮田所说的那种殖民干的话，就等于使美国的排日借口变成了事实，而不是借口了。

浮田的“伦理的帝国主义”的另一个实例，可以在《帝国的社会主义》（一九〇四年一月）中找到。他在《帝国的社会主义》中说，“伦理地解释、经济地应用帝国主义之日，就会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充分协调。不仅能使之协调，而且二十世纪之政治若不对外奉行帝国主义，对内实行社会主义，任何国家将不能存在。”这种“社会主义”是“俾斯麦的国家社

会主义”，是“以社会公共福利为目的”，对资本家也要干涉的社会政策。这里所说的帝国主义，就是站在“政党早已到了必须停止高喊废除藩阀的时代，不应孜孜不倦地一味致力于国内问题，而应把宪法规定的日本之国家尽量向外扩张”，站在这一时代认识上，使日本人向南北美、南洋、澳大利亚“蔓延”。“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和平地、伦理地去做。……其方针是，始终根据国际法准则，并在国际法上尽量主张日本国民的权利，使之开放门户。”这里虽然没有与前例相同的、当地的日本人殖民战时就成为日本强有力的同盟者那样的记述，但因为这种殖民被作为“尽量把国家向外部发展”的政策，其目的是和前例完全一样的。

他所说的“根据国际法准则”的向外渗透，其国际法就是将义和团事件之后俄国事实上占领了满洲一事也正当化了的“国际法”（《国民之品性（1）》，一九〇一年六月）。例如，他说，俄国“按照国际法达成协议，获得了至辽东的铁路铺设权”；“在清国足以维持满洲秩序之前，俄国占领满洲，以保护本国的利益是完全合理的”。“俄国（向满洲）扩张，是民族的扩张，自然的扩张”等等。此时这样议论，如前所述在一九〇四年一月仍不赞成日俄开战论的浮田，在同年的十一月，也毅然决然地为对俄开战的日本搞起“伦理化”来了：（1）三国干涉；（2）将强迫日本归还的辽东半岛作为本国的租借地；（3）乘镇压义和团之机占领满洲，践踏撤兵协议。这样，俄国“企图将甲午战争之胜利果实化为乌有。既为独立国，实乃是可忍，孰不可忍！”俄国对日本犯下的这三大罪状中的（2）、（3），三年前，他还认为在国际法上是正当的。

总之，无论从哪方面看，这既不符合伦理，也不是理论上首尾一贯的。浮田早在一八九七年的《国民将来之命运》中就这样说过：“日本未来之重要任务与现在相同，即扶植朝鲜，防止中国被瓜分。”如果列强瓜分中国，“日本只有两条路，或与列强竞争，中原逐鹿；或于列强保护下维持独立。”在此种情况下，应断然选择第一条道路。“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即此之谓也。”这才是他日俄战争前的一贯主张。

七年后，他在杂志《时代思潮》一九〇四年二月号，即日俄开战月号（执笔是在此之前）上发表的论文《日本的外交政策》中也这样说：“吾国之利益在于将来逐渐确保朝鲜之独立与中国之安全，与此同时启发中国、朝鲜之改革与教育，并将吾日本之实力及资本投放于此，待使之经济及政治关系亲密无间时，避开吞并他国领土之不利政治责任，而得到与之相同之利益与效果。此乃予所谓之帝国主义也。”这正是地地道道的近代帝国主义的意识形态。所谓“扶植朝鲜”，事实上就是把当时的朝鲜垄断于日本势力之下；所谓“保全中国”，就是只要日本不能割据、统治这个国家，也就不许别国瓜分。当时的政府、资本家阶级的政策也是如此。

他在数十篇论文中大书特书的，归根结底是日本继欧美之后走向资本主义，在作为经济帝国主义尚缺乏实力的情况下，积极寻求和鼓吹与近代帝国主义竞争的最安全的帝国主义的前进道路。实际上就是改进党——进步党路线，和官僚政府的路线不过大同小异。

德富苏峰、高山樗牛、浮田和民这三个日本帝国主义形

成时期的大宣传家，虽然立论方法、世界观不同，却都以苏峰的“民友社”和新兴资产阶级大桥新太郎的“博文馆”为共同舞台，从“实力之福音”、天皇主义的“日本主义”、资产阶级利益三个方面组成了日本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樗牛全面否定民主主义。浮田在内政方面强调“立宪主义”——如上所述，认为现在是日本向外扩张的时代，而不是攻击藩阀政府的时代。虽然如此，其程度远不如进步党的立宪主义。苏峰则位于两者之间。这一差别，也是三人的帝国主义论的差别所在，但决不能否认三人都是帝国主义者这一根本的共性。

此外，浮田的同事高田早苗和毕业于庆应大学、曾在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当过记者、提倡过南进论和殖民主义的竹越与三郎，以及同是民友社出身的历史学家、记者山路爱山等人，作为和浮田同样的帝国主义的鼓吹者，也曾有过影响。爱山于一八九九年谴责了苏峰的“变节”，但是，一九〇三年一月，他在自己创刊的杂志《独立评论》上撰文阐述“予为何成为帝国主义的信徒”，“予之所谓帝国主义”等问题时，其论点却与浮田十分相似。他说，“予因固守人有生存之权力之信念而成为帝国主义之信徒。”“世界之大势”不是为什么，而是作为现实问题使日本也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有人谴责帝国主义是侵略主义，但忠义之国民打败自私自利之国民，勤劳之农民驱逐荒废土地之农民，乃“适者生存”，“社会发展产生的淘汰”，并非侵略主义。

以《太阳》、《国民之友》为首的大小杂志，几乎每期都登载这些著名评论家、学者以及尾崎行雄、犬养毅之流的其他在野政治家撰写的露骨的“瓜分中国论”，领土扩张论，或浮

成时期的大宣传家，虽然立论方法、世界观不同，却都以苏峰的“民友社”和新兴资产阶级大桥新太郎的“博文馆”为共同舞台，从“实力之福音”、天皇主义的“日本主义”、资产阶级利益三个方面组成了日本式的帝国主义意识形态。樗牛全面否定民主主义。浮田在内政方面强调“立宪主义”——如上所述，认为现在是日本向外扩张的时代，而不是攻击藩阀政府的时代。虽然如此，其程度远不如进步党的立宪主义。苏峰则位于两者之间。这一差别，也是三人的帝国主义论的差别所在，但决不能否认三人都是帝国主义者这一根本的共性。

此外，浮田的同事高田早苗和毕业于庆应大学、曾在苏峰主办的《国民新闻》当过记者、提倡过南进论和殖民主义的竹越与三郎，以及同是民友社出身的历史学家、记者山路爱山等人，作为和浮田同样的帝国主义的鼓吹者，也曾有过影响。爱山于一八九九年谴责了苏峰的“变节”，但是，一九〇三年一月，他在自己创刊的杂志《独立评论》上撰文阐述“予为何成为帝国主义的信徒”，“予之所谓帝国主义”等问题时，其论点却与浮田十分相似。他说，“予因固守人有生存之权力之信念而成为帝国主义之信徒。”“世界之大势”不是为什么，而是作为现实问题使日本也不得不成为帝国主义。有人谴责帝国主义是侵略主义，但忠义之国民打败自私自利之国民，勤劳之农民驱逐荒废土地之农民，乃“适者生存”，“社会发展产生的淘汰”，并非侵略主义。

以《太阳》、《国民之友》为首的大小杂志，几乎每期都登载这些著名评论家、学者以及尾崎行雄、犬养毅之流的其他在野政治家撰写的露骨的“瓜分中国论”，领土扩张论，或浮

权论为最大骄傲的中江兆民，一八九八年三月，看到强迫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的俄国人以租借为名侵占了旅顺、大连，德国占领了胶州湾，英国也要占领威海卫（七月租借）时，也不由自主地喊出了帝国主义的呼声。他说：“一听到旅顺口、威海卫、大连湾”，日本人无不想起“日本陆海军亘古以来之最大光荣。”但这些地方而今竟归于不动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炮之欧美列强之手，岂不是“近乎残酷之滑稽！”“吾日本之最大光荣竟化为最大耻辱！”并谴责曾屈服于三国干涉的责任者、现在第三次登上首相宝座、疯狂地推行反动政治的伊藤博文说：“罪魁祸首就是你。”

他在此文中批评欧洲的外交是“瓜分中国”，“打着和平美名的掠夺”的帝国主义，等等。同时，他又说：“彼等列强之外交如此，而我等之外交竟是大耻辱、大滑稽、大悲剧。”这虽然是在攻击兆民最憎恨的官僚专制的最高首领伊藤博文，但责备政府不能象列强那样圆滑地进行帝国主义外交的语气却充满于字里行间。

到底还是兆民，在瞬间的动摇时又站稳了脚跟，决不做帝国主义的吹鼓手。他在作为“生前遗书”的《一年有半》中，仍然强调民权和自由平等必然战胜帝国主义（井上清《兆民与自由民权运动》，载桑原武夫编《中江兆民研究》）。但是，就连他的得意弟子、走在恩师前边的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家的幸德秋水，在成为坚定的社会主义者之前，也曾为日本在瓜分中国的竞争中落后于列强而焦急不安，进而鼓励帝国主义的专制政府。九九年三月，他在发表于东京的报纸《万朝报》上的《意大利之要求》一文中提到意大利向清国提出租借三门湾

一事时指出，“瓜分清国之危机”及“整个东洋之危机”正在加深。他说：“贫穷软弱且在东洋没有什么利害关系的意大利都要开始他们外交上的大跃进时刻，我日本面临此危机究应如何作为？……今天，日本的舆论目的似乎在于保全清国，但我们确信，保全清国是极其困难的。即便可能，象今天的日本这样默然拱手是不能有所作为的，何况在清国的地图正要大变之时获得相当的利权呢。若这样说，政府一定会再度端出军备扩张论，而那正是没有外交手腕的自白。这次意大利亮出来的不就仅仅是三艘军舰吗？”

意大利与清国之争，窥其背后，却是英、德与俄、法之争。再进一步说，就是英俄两国之争。……但是，在英俄之争中，我日本之向背却能迅速决定其胜负。日本为何不抓住这一良机？……在肢解、瓜分清国之势急速进展之时，沉默一天不就落后一天吗？我们迫切请求当局注意。”（河野广道编《幸德秋水 评论与随想》）

这篇文章的署名若是德富苏峰就不足为奇了。秋水在此之前已加入了头年十月成立的社会主义研究会，开始接近社会主义思想，并在其后的一九〇〇年一月组织了以进行社会主义实践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协会。同年十一月，他在《万朝报》上批判了一般的帝国主义，同时，特别猛烈地抨击了日本的“军人的帝国主义”和“貌似强大的糖人式的帝国主义”。从这时到翌年一月，又在《千代田晚报》上发表了《大逆不道录》及其他批判帝国主义的长篇论文。后来把这些论文予以整理，于一九〇一年四月二十日出版了《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一书。可是，此书的校对工作大概还未结束，秋水就分别于

三月八日、四月十一日在《万朝报》上发表了题为《进忠言》、《第二个埃及占领》和《日本的责任》的评论（均收入幸德秋水编辑委员会编的《幸德秋水全集》三），举出当时俄国企图强迫清国接受将满洲殖民地化的新条约问题（参照本书162—165页），竟再次鼓励起日本政府的帝国主义政策来！

他在《进忠言》中说，为“阻止”俄清条约签字，政府不仅对清国，而且对俄国也要效仿俄国曾经对日进行三国干涉时那样“进忠言”。在《第二个埃及占领》中说，迫使俄清停止满洲条约的谈判（四月五日俄国政府宣布停止谈判），是日本外交的一大成果，但若仅局限于此，满洲现状不会产生任何变化。俄国既毫无损失，日本亦毫无所得。“满洲依然在俄国掌中。日本之危险依然丝毫未减。”国际政治史上与此相同的例子，就是围绕埃及问题的英法对立。“法国反对英国占领埃及，千方百计迫使英国撤兵，但因其尚无能使之下定最后决心之实力，英国以旁若无人之势统治、经营埃及长达二十余年之久。名义上虽属遗留问题，而事实上英国已为埃及之主获利至今。吾十分忧虑满洲占领会成为第二个埃及占领，日本将成为对埃及忍泣吞声之第二法国。”

头两篇及其后的《日本的责任》一文均无署名，也未被收入秋水生前编辑发行的他的任何论文集中，是现在正在发行的《幸德秋水全集》的编者根据秋水自制的剪报簿首次作为秋水的文章收录的。我曾怀疑它们是否果真出于秋水之手，但从文体、语法上看无疑是他的作品（我把本书引用部分的文字用法通俗化了）。仔细分析，可做出与他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并不矛盾的解释（理由后叙）。如果据此相信全

集的编者，这些文章特别是《第二个埃及占领》，不就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吗？再看一下第三篇《日本的责任》，全文这样写道：“废除满洲条约，主要乃由于日本对清国及俄国之警告。因此，今后处理满洲问题，对俄清两国以及对列强诸国之责任将日益重大。虽业已排除通过条约之瓜分，但仍应防止事实上之瓜分；既已防止其瓜分，则应进而维持满洲之和平与秩序；既已施行保全领土之规定，则更应期待实行市场开放之规定。此等事业，皆为增进东洋大局之利益与和平。故日本应首先肩负其责任。吾切望当局不屈不挠、认真完成此重任。”

仅凭这些，也许不足以称之为是帝国主义的。但是，这一篇和以上两篇是融为一体的。总起来看，不就是在反对俄国帝国主义独吞满洲的斗争中对取得初步胜利的日本帝国主义的颂歌吗。这里所说的日本的责任，是说日本有永远防止俄国独吞满洲的责任。事实上，就是日本负有将满洲变为日本与俄国抗衡的、日俄及其他列强帝国主义的共同剥削场所的责任。这是日俄帝国主义在满洲问题上互相对抗的一种形态，或者一个阶段。

对于虽不成熟、但早已成为社会主义者、毫不留情地批判帝国主义的幸德秋水来说尚且如此，那么，当时的工会活动家对帝国主义深信不疑，也就可以理解了。在俄、法、德、英等国集中于清国，瓜分“租借地”及其他利益和利权的一八九八年十月，《劳动世界》第二十二期发表评论《东洋的危机》说：“吾辈工人认为，日本政府应该始终不渝采取强硬政策，左右东洋之大势，为日本谋福利，以雪归还辽东半岛之

耻。”赤裸裸地暴露出了帝国主义意识。

日本人，不用说天皇制官僚和统治阶级，就连最先进的工人和社会主义者，也如此深入而广泛地被帝国主义的思想 and 心情所束缚。人民摆脱其束缚的困难可想而知。然而，在当时，虽不彻底，但已经出现了批判帝国主义精神的萌芽。山路爱山不仅叙述了内村鉴三对他已成为帝国主义者们的尖锐批判，而且还记述道：“以吾家为顾客之年轻卖鱼人，看了本刊第一期也责难道‘《独立评论》确有风趣，但帝国主义究系弱肉强食主义，先生亦为其信徒实出意外’”（载《我所谓之帝国主义》）。

此外，藤村道生在《军备扩张与阶级矛盾的展开》（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研究》）中，最先介绍了在新潟市发行、由带国粹主义倾向的编者主办的《东北日报》，自九九年二月二十六日开始，十三次登载题为“帝国主义”的评论。作者说：“以武装国家与列强对抗而苦心焦急，称之为战后经营，欲将大部国力用于强行军备扩张。此由先一步实行帝国主义国家观之，将笑之为邯郸学步之愚也”。以此坚决反对“战后经营”观点。他又说，日本若尾随欧美帝国主义追求帝国主义的话，最终必将“受列强命运支配，或被列强置于死地。”日本应“置身于帝国主义潮流之外，断然采取新步骤，洞开闭锁主义，开辟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之新局面”。象瑞士、比利时、荷兰、瑞典那样，“立足于帝国主义潮流之外，竭尽全力发挥个性，将感化波及面延伸至宇内各方。”

这比樗牛的日本帝国主义更发挥了日本的民族性。我没有看过这篇论文，不宜多谈，但它代表了苦于帝国主义→军

备扩张→增征土地税的农民及自耕地主的立场是一目了然的。

此外，杂志记者植松孝昭反对军备扩张和重税，认为其原因在于“国家全能主义”，主张现在的最大任务是打破“政治上对帝国主义的多年迷信”（《军备扩张与阶级矛盾的展开》）。这是反对农工商高等会议为向中国输出资本而通过的国家募集外债进行外资输入，但又同外资输入与日本之资本输出均应任凭经济之自然发展的主张有共同之处。这是非特权的自主产业资本家在这个时期可能产生的想法。只是，这些“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几乎是同义词。

这些城里的鱼店青年，地方的农民以及一部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呼声虽未广泛地为人所知，但著名的宗教家、激进民主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反战、反帝论却影响甚广。

纯正的基督教徒内村鉴三在甲午战争时曾是这场战争的狂热支持者，认为那是正义的战争。但是，当他看到战争的结果反而使作为战争目的的朝鲜独立受到威胁，瓜分中国的序幕已经揭开，日本国民负担加重，道德堕落时，便成了坚定的反战论者。战争的第二年，九六年年末，他“愤恨军人打了胜仗的骄傲”，创作了描写战争寡妇的诗歌《寡妇的除夕》（《内村鉴三思想文选》）。其后，他的以基督教为支柱的彻底的反战、反帝国主义立场始终没有动摇过。

幸德秋水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前面也曾谈到。他对当时的政府、统治阶级鼓吹的“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是对日本帝国主义不是象欧美帝国主义那样作为资本主义

高度发展的结果，而是在没有一点资本输出余力，连经营台湾都力不从心的情况下，硬实行“军人的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的批判，是彻底的，有独创见解的。

同时，幸德、堺利彦、安部矶雄、片山潜、西川光次郎、木下尚江、河上清等人，在先进工人的支持下，一九〇一年五月创立了社会民主党。他们在建党宣言中，虽未使用帝国主义一词，但主张以“实现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为目的，“理想”是全面废除军备，消灭阶级，土地、资本归国有，从而表现出从根本上全面否定、克服帝国主义的思想。

他们对这种帝国主义的主要性质之一，即军国主义和战争的批判是彻底的，但对于尚未形成军事对立的帝国主义垄断市场和利权的竞争以及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对后进国家的掠夺却没有进行批判。

幸德秋水的《二十世纪的怪物帝国主义》，及其前后对帝国主义的一系列激烈的批判，也没有真正洞察到英美之类的“资本富饶之国”的资本输出及垄断输出国的竞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军国主义和战争，而只把军国主义、帝国主义的根源最终归结为统治者的贪婪无厌。即，他批判了帝国主义最集中的表现军国主义，但没能进一步对军国主义形成的原因和基础进行批判。这就产生了这样一个问题：针对《第二个埃及占领》中的那种尚未进入军事斗争阶段的帝国主义间的斗争，尽管彻底地批判了“爱国心”的幸德秋水，却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民族主义，支持了日本统治阶级，进而担心起其落后和无能来。另一方面，他对“爱国心”的批判，把爱国心和爱乡心以及利己心看成一个同心圆，并把它们的原基形态和他认为

的利己心看作是人所共有的利己心，而未能进行阶级的社会的分析。因而，也陷入了把沙文主义和真正的人民的爱国心混为一谈的错误。

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缺陷和不成熟之点，但在日本刚刚迈出帝国主义的第一步时，他们就开始对帝国主义的集中表现军国主义进行针锋相对的批判，其历史意义是重大的。现在我们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容易的，但在当时，勇敢地指出、全面地反对“军人的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乃是日本思想史上的一大创举和最需要勇气的事。由于这些人的遗产不断地得到积累，今天我们才有可能批判他们。但是，对他们的真正的批判，只有用比他们面对当时的课题发挥出的力量更大，对待现代的课题做出独创的答案，更勇敢地同帝国主义做斗争时才能做到。

第五章

走向日俄战争

1. 是日英同盟还是日俄协商

一九〇〇年夏，日本派出的兵力占镇压义和团的帝国主义联军总兵力的一半以上，成为其主力。这使日本统治阶层相信：列强必须承认，在东亚能迅速出兵镇压反帝民族斗争的唯有日本。日本也由此跨入了列强的行列。但是，与此同时，从占领厦门计划的惨败中也得到了深刻教训：日本若不利用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联合其中一方，侵略东亚将一事无成。

据《公爵山县有朋传》（德富猪一郎）记载，这一事件不久，山县有朋便主张“与欧洲某个强国结成联盟，对付俄国的经营满、鲜，维护东方和平。”早在任台湾总督时认为欧洲诸国无干涉日本占领福建的军事力量的桂太郎，于一九〇一年六月第一次任首相后，作为国政的基本方针之一，也提出“因独自控制远东局势困难颇多，应见机与欧洲某国缔结某种协约”的意见。出兵镇压义和团时，认为现在正是列强求助于日本之时而得意忘形的桂太郎，可能也从侵略厦门的惨败中吸取了教训。伊藤博文等人得知政府侵占厦门的计划后，

担心各国干涉，立即向政府表示反对。

那么，和欧洲的哪个国家结盟呢？山县在镇压义和团、占领了北京后的八月二十日写的“庚子事变善后策”中主张：日本不仅要把福建划入势力范围，而且也要把浙江划进来。对北方的满洲则只字未提。关于朝鲜他说，东以大同江，西以元山为界分割朝鲜，北部为俄国的势力范围，南部为日本的势力范围的话，“将永远避免日俄之争，可达经营北方之目的。”他根据这一方针，紧接着实行了占领厦门计划，遭到惨败。其后，似乎放弃了入侵南方，而转为与俄国争夺朝鲜。伊藤博文在九月十日给井上馨的信中写道：“侵略朝鲜论日益高涨，政府内部，山县部下颇有极力怂恿之势，亦为长谷场（纯孝）暗中探悉，希勿出差错”（春亩公追颂会《伊藤博文传》下）。照此路线，或许会选定为对抗俄国而与英国结盟的方针，但明确这个方针还是以后的事。

山县受到伊藤等的责难：“镇压义和团，日本是主力，联军总司令却轻易地由德国出任，对此，日本没提任何条件就把天皇的军队置于外国人指挥之下”。再加上侵占厦门的失败，不得不承担责任，于九月二十六日辞职。几经周折，其后任才由当时为政友会总裁的伊藤博文第四次组阁。

第四次伊藤内阁，从组阁之日起就矛盾重重。最初，伊藤想让其密友井上馨出任大藏大臣、但创建政友会时曾助伊藤一臂之力的官僚出身的渡边国武，对自己未能当上藏相极为不满，大吵大闹。伊藤好不容易安抚住渡边，换下井上，任命渡边为藏相，于十月十九日勉强组成内阁。可是，政友会的其他干部排斥渡边。紧接着，十二月，邮政大臣星亨任

东京市参事会员时的贪污事件被揭露，贵族院的山县派议员首先倡议免去星的职务，发生了“忠告”伊藤首相不要把国党和党务混为一谈的骚动。其结果，星于十二月二十一日辞职，原敬^①继任。

这样起步的内阁，在第十五届议会（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一九〇一年三月二十四日闭幕）上，为克服由于镇压义和团的经费开支过多而给即定军事扩张计划带来的困难，提出了增征酒税、食糖消费税及关税计一千八百二十余万元的增税案。众议院以执政党政友会的绝对多数顺利通过，但贵族院强烈反对。由山县派控制的贵族院便要以此推翻伊藤内阁。因此，伊藤首相经天皇批准，自一九〇一年二月二十七日起休会十天。在此期间，请山县和松方正义二元老出面调停，二人无奈，和西乡从道、井上馨二元老一起，四人与贵族院各派代表交涉。但贵族院驳回了四元老的调停案。

在此期间，议会延长了休会期，伊藤再度恳求天皇出面。三月十二日，天皇召见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救命：“今筹措军费，并制订巩固财政之计划，实属国家当务之急”。“朕坚信，贵族院诸人之忠诚能分朕昼夜之忧，望速辅弼朝廷，切勿贻误国家于他日。”这样，议会完全失去了存在的意义。贵族院无奈，囫圇吞枣地执行了政府原案，增税案得以成立。

① 原敬生于岩手县，虽然不是藩阀，但当新闻记者时被陆奥宗光看中，调进外务省，曾被提拔为次官和驻朝鲜公使。陆奥死后，弃官而去，任大阪每日新闻总编。其后，任古河矿业副社长，北浜银行总经理，在财界占有牢固地位。曾协助伊藤创立了政友会，任干事长。

众议院的在野党虽然提出了弹劾政府决议案，但也以一百二十八票对一百五十五票而失败。在进行讨论时，伊藤首相趾高气扬地说，增税案问题乃政府与贵族院之分歧，众议院不必多嘴多舌，大臣之去留并不取决于议会之决议（《内阁更迭五十年史》）。这就是日本当时的“立宪政治”，这就是在天皇制统治者中，人所公认为最“立宪的”伊藤对议会采取的行动。

一九〇一年的预算就这样定了。虽然增了税，但由于多年搞军备扩张，已征税过多，加之一九〇〇年九月至一九〇一年末的一年多的经济萧条使岁入不足，预算难以实行。因此，渡边藏相提议，靠公债开支的政府企事业统统停办。伊藤首相同意此案，但政友会出身的五位大臣（末松谦澄、松田正久、原敬、金子坚太郎、林有造）反对此案。他们为排斥渡边藏相和扩大本党势力，力图用积极的方法刺激经济景气。经首相劝说，最后，内阁内部达成妥协，决定将约三千万元的公债开支企事业费缩减一千万元。

随后，如何制订一九〇二年度预算又成难题。渡边藏相主张：不批准新办企事业，不募公债，既定办的企事业也延期二年。五大臣强烈反对，伊藤的管制也不起作用。一九〇一年五月二日，伊藤首相承担内阁不统一的责任，提出辞呈，其他大臣也随之提出，只有渡边藏相一人默不作声。次日，天皇派枢密院议长西园寺公望动员渡边辞了职。第四次伊藤内阁这一自始至终的纠纷，虽说是集官僚一派的最高首领和政党总裁于一身的伊藤对政党与官僚的对立无能为力的表现，但其背后存在着无经济实力而强行推行帝国主义政策这

一多年来的矛盾却是显而易见的。

后来，六月二日，山县的代理人、陆军大将桂太郎进行组阁，除海军大臣山本权兵卫外，其他大臣全部选自山县系官僚。在叙述其内阁情况之前，先就义和团事件后的国际关系做一分析。

第四次伊藤内阁的外相是加藤高明。加藤是三菱的女婿，一八九四年七月甲午战争爆发时，被陆奥外相提拔为外务省政务局长，在陆奥的指挥下，为迫使朝鲜签定使朝鲜从属于日本的“暂定合同条款”和“大日本大朝鲜两国盟约”而奔走，其才能受到赏识。同年十二月调任驻英公使，在伦敦任职到九九年四月。在此期间，始终建议本国政府采取彻底的亲英反俄政策，主张日本也应积极参加日益激化的列强瓜分中国的竞争。因本国政府根本不采纳他的日英同盟论，他对政府极为不满，请求赐假回国。九九年五月被准予回国后，从十月初开始，约用三个月时间视察了朝鲜和中国。

他在视察中最关心的是日本人在朝鲜和中国的经济活动，特别对甲午战争后新获得的租界地经济不振深感遗憾。他对居住在上海的日本人以及回东京后在日本经济会召开的会议上都极力主张“应该排斥对中国空论，应该脚踏实地地发展贸易、工业、铁路、矿山等经济”（《加藤高明》上）。他主张不只是发扬皇威的“空论”而且要“发展经济”。这个三菱财阀的女婿，无论其阶级性和经历，还是思想，都是在帝国主义的道路上冲刺的日本外交官的一个典型。他旅行归来后，辞去官职，悠然地生活了一段时间。不久，第四次伊藤内阁组阁时，被任命为外相。当然事先得到了三菱的当家人岩崎

弥之助的同意。

加藤出任外相时，向伊藤首相提出四项条件，其中一项为：我再度重申自己是京釜铁路铺设论者。这就等于他的对俄抗争得到了事先承认。这项条件伊藤也接受了，让这位天下周知的亲英派外交官当了外相。这也表示出他的外交政策并不是世人所说的那种单纯的对俄妥协论。

伊藤内阁成立前夕的十月十六日，英、德之间就清国问题签署了一项协定。（1）清国各港口对任何国家应无亲疏之别一律开放，各国民可自由贸易和进行其他经济活动。（2）英德两国政府不得乘“当前之混乱”（义和团事件），在清国领土内为自己谋求任何领土上的利益。作为其政策，采取不改变清国领土现状的方针。（3）若他国乘眼下混乱之机企图在清国获得领土上的利益时，英、德两国政府就维护各自利益所应采取的措施进行磋商。（4）两国政府将本协定通知其他有关各国，劝告他们“承认”这种“主义。”这就是英德协定的内容。德国企图以此限制英国在长江流域获得新的领土利益；英国却想以此阻止俄国占领满洲。

英德协定也通知了日本政府。政府、特别是加藤外相承认这种“主义”，日本成了其加盟国（十月二十六日）。虽然日本占领厦门计划正适用于本协定第三条，但对于计划失败后，决心暂时不再动手的日本来说，这一协定是反对俄国侵占满洲的最有力的武器。

俄国从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波及到满洲时开始，以扑灭斗争火焰为借口，步步顺利地占领了满洲。它派出十六万大军，九月初从东清铁路沿线一带赶走清兵，到十月初就占领

1
2
3
4

了包括吉林、辽阳、奉天、铁岭在内的整个满洲。进而，十一月二十六日，盛京省（辽宁省）将军增祺与俄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长官阿列克赛也夫签定了秘密条约。条约将满洲置于俄国控制之下，把增祺作为俄国政府监督下的一名地方民政官，解除俄国占领区的清军武装，拆除俄军尚未占领的盛京省内的所有炮台和其他军事设施；并将此条约作为俄国与清国缔结国家代表间的正式条约之前的临时条约。

日本得此情报，立即发出了抗议照会，但俄国未予理睬，并于一九〇一年一月蛮横地说：满洲问题属俄、清两国间的问题，无须回答日本。另外，关于朝鲜，一九〇〇年十二月二十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向日本外务省提议，让韩国在俄、日的共同保证下做永世中立国。政府于一九〇一年一月十七日答复说：这个问题的谈判必须以俄国军队撤出满洲，恢复朝鲜周围的正常状态为前提而予以拒绝。但俄国非但不从满洲撤兵，而且自从一月以来，为把阿列克赛也夫·增祺条约变为正式条约，向清国政府强行提出了十二条要求。

第一条规定，俄国把满洲归还清国，使清国恢复昔日之行政。而第二条又规定，为保护东清铁路，俄国军队继续驻扎。进而第四条以下又规定：东清铁路建成前，清国不得组织任何军队。清国组织军队时，兵数须与俄国协商而定。武器弹药不运进满洲（第四条）。清国可以警察目的在满洲组织步兵和骑兵，其兵数须与俄国协商而定，这支部队不得配备大炮（第五条）。清国放弃金州的行政权（第六条）。清国在俄清国境各省的矿山、铁路及其他权益，未经俄国同意，不得给与任何他国。不经俄国同意，也不得自行铺设铁路（第

7
3
3
0

八条)。赔偿东清铁路的损失(第十条)。给俄国由满洲铁路干线、支线通往北京至长城的铁路铺设权(第十二条)。因此,事实上规定将满洲、蒙古全部置于俄国控制之下(《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四卷。载《大日本宪政史》V)。

日本企图以英、德协定为靠山与俄国对抗,但是,二月十六日,德国外务当局向日本驻柏林公使透露,英德协定不适用于满洲。接着,三月十五日,德国首相正式申明了一点。英国虽坚持英德协定也适用于满洲,但说由于目前英国无法从布尔战争中摆脱出来,不能在满洲问题上援助日本(三月十一日)。美国也很消极。显而易见,英德协定对日本已不起任何作用。因此,三月十二日,加藤外相要求召开研究对俄决策的内阁会议,“目前之状态,已无从任何国家得到有力援助之希望,故帝国政府不应有恃于此,而有必要制订独立处理此问题之方针”。其方针只有在以下三条中酌定其一。

第一,“公开向俄国提出抗议若不达目的,即直接以干戈决胜负。”“俄国侵占满洲本身与我利益本无甚大冲突,然而,其结果,俄国之势力扩大至朝鲜半岛,有对帝国之自卫形成威胁之可能。”另外,仅以外交手段阻止俄清缔结满洲条约,仍无法改变俄国占领满洲的事实。因此,对于“认为有充分战胜把握,即确定占领满洲乃日本永久之利益”的日本来说,这是上策。但获胜希望不大,且满洲的“丰富资源,能否补偿此项费用”也是问题。

第二,“对俄国宣布,为保持平衡和自卫,帝国将采取适当手段,不应对就韩国问题进行日俄协商持无视态度。”

第三，“对俄国之行为采取暂且抗议或保留权利，待后日随机应变。”“俄国占领满洲之结果，无疑会给帝国之自卫带来危害，但难以预言其危害在数年后抑或十几年后到来”，故当前暂且选择第三条（《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四卷；《加藤高明》上）。

加藤指出三者利弊，自己不加可否，任凭内阁会议研究其取舍。虽然得不到内阁会议决议的正文，但据《加藤高明》传记记载，其结果还是加藤的主张：“若帝国决然以对，俄国有自行屈服的可能。所以，还是先以强硬态度交涉为好。”因此，三月二十四日，政府劝告俄国政府，将其与清国的协定案改为“适应于其他各国的权利和利益”，并将此问题提交当时正在北京召开的各国代表会议（关于义和团事件的对清讲和会议）。对此，俄国做了独立国相互间的交涉不容他国置喙的强硬回答。此后，日本在继续抗议俄国政府的同时，极力劝说英美各国分别对清国政府进行威逼利诱，欲使之拒绝签定满洲条约。也许此举奏效，四月八日，俄国宣布停止满洲条约的对清谈判。此时，就连早就著书批判帝国主义的幸德秋水，也大肆鼓励起日本的帝国主义外交来了！

俄国暂且中止了对清谈判，但满洲事态并未因此产生任何变化。不久，各国与清国就义和团事件签定了“最终议定书”（九月七日）。据此，列强以赔款的名义从清国夺走了总额四亿五千万两的白银（三十九年付清，年息四厘），迫使清国同意不进口武器弹药及其材料。各国并以警卫北京的公使馆为名，获得了北京驻兵权。不仅强迫拆除了大沽炮台以及北京至秦皇岛、山海关间与海岸地带的支线上的军事设施，

各国协商后，甚至还夺得了各自占领其交通要地的权利。为了更残酷地剥削清国，还迫使清国同意缔结新的通商航海条约等等。这样，列强进一步加强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日本军队也从这时驻扎北京。各国的北京会议就此结束。从而俄国的行动也就无拘无束，十月五日，就归还满洲问题，又向清国提出了新的条件（后述）。

日本边抗议俄国占领满洲，边尽最大可能实行把朝鲜划为势力范围的政策。在反复声明自己是京釜铁路建设论者而入阁的加藤外相的指挥下，强迫韩国政府删掉日韩两国政府京釜铁路合同第十五条，即允许日韩两国政府以外的外国人也许可持有公司股份的权利的条款（一九〇一年一月）。五月，正式成立了京釜铁路株式会社，为自己获得利权并阻止俄国获得其他各种利权展开斗争。这方面特别重大的事件是，从一九〇一年二月就以“整理货币制度”为名，迫使韩国实行与日本一样的金本位制。以此为前提，令业已是韩国关税经办银行的第一银行发行钞票（涩泽荣一《韩国货币整理报告书》）。发行的钞票，只是日本政府单方承认，韩国政府并未承认，但却作为日本纸币的一种通用于韩国。这样，就进一步加快了掠夺韩国金融、使之从属化的步伐。

这时，日英同盟的问题第一次在政府间公开提出。前边已经讲过，自从日本幕府末期开放港口以来，英国一直采取了把日本当作在东亚与俄抗衡的前哨加以利用的政策，甲午战争后的日本，对英国有着更大的利用价值。《太阳》杂志一八九五年九月号报道，英国报纸《标准》上有人撰文反对俄国，赞成日英同盟论。《太阳》记者说，日本也存在日俄同盟

论和日英同盟论两种潮流。另外，加藤高明在伦敦任公使期间，一有机会就向英国当局试探日英同盟的可能性，据他推测，英国也有这种想法。义和团事件充分说明，日本作为帝国主义在东亚的哨兵十分有用。利用日本镇压中国的反帝斗争，再用来对抗俄国，对英国来说，简直是再好没有了。日本既无与英争高低的决心，也无这种能力，这已在厦门事件中得到了证实。这样，日英同盟倒有英国首先暗中试探的迹象。

据驻伦敦公使林董一九〇一年四月九日写给外务省的报告中记载，德国驻伦敦公使级代办埃加特斯坦“完全以个人意见”劝日本推动英国结成日、德、英三国同盟，以对抗俄国。据说，该代办时常讲，他在与英国当局接触过程中确信，英国一定会接受日本的提议。林公使和加藤外相一样，也是一个热心的日英同盟论者。因此，他对埃加特斯坦的话特别关心，加藤外相也对此事颇感兴趣。以此为契机，加藤和林开始相信实现日英同盟的可能性。四月十七日，林公使第一次向英外相兰斯多恩试探英方意向，得到良好反应。其后，林的对英接触活跃起来，谈判稳步进展。但如上所述，五月，第四次伊藤内阁垮台，加藤外相也辞职而去，林的活动也就暂时停顿下来。

桂内阁的外相，起初由曾祢荒助藏相兼任，九月二十一日，由驻清公使小村寿太郎任专职。

如上所述，桂内阁全由山县系官僚组成，被政界人士轻视为“次官内阁”，在众议院没有有力的支持者。以绝大多数的政友会员为敌的内阁能维持多久，桂自己也缺乏信心。正

因为如此，各大臣紧紧团结在桂首相周围，互相协助，对政府以外越发坚持官僚特有的秘密主义。下一事例充分体现了这个内阁的特性。内阁成立之前，以内务省地方局的名义，翻译了俄国宗教事务大臣包特诺斯切夫的著作《政党及议会政治之弊》，分发给各府县的警务处长。政党虽然在议会上对此进行了抨击，但对内阁却没有形成任何打击。

前任内阁因难以实行预算而下台，桂内阁继任后，试图以五千万日元外债应付当务之急，但没有成功。无奈，只好加强调整、延期既定企事业，其不足部分从存款和清国赔款中调拨资金弥补，发挥了官僚的事务能力。一九〇二年度预算案的编制，采取了与前内阁渡边藏相同样的紧缩方针，军费在甲午战争后第一次、而且只有这一年没超过预算总额的百分之三十（实数比前一年减少大约一千七百万元）。陆军增设师团和扩建海军的第一期、第二期工作因已接近尾声，才使缩减军费成为可能，并不是桂内阁格外温和的结果。政友会反对这种紧缩预算，但由于六月二十一日大头目星亨被暗杀，会内统制混乱，旧自由党派和伊藤直系官僚、资本家派尖锐对立，削弱了攻击政府的力量。伊藤总裁压服反对派，使其协助政府，所以，第十六届议会（一九〇一年十二月——〇二年三月）顺利通过了预算案。

在此期间，因政局变化一度中断的日英同盟谈判，一九〇一年七月又重新开始。此时，当初的日英德三国同盟案消声匿迹，只是就日英两国的同盟进行谈判。桂内阁从首相到外相以及其他大臣，都是热心的日英同盟论者。这一内阁的幕后指挥者山县，从提出日英德三国结盟之日起，也成了积

极的日英同盟论者。在此之前的四月二十四日，他在写给伊藤首相的“东洋同盟论”中说：“若欲维护东亚之和平，获取通商之利益，掌握铁路、矿山之实权，据要冲之地，徐待大势之发展，宁暂与俄国反目，亦与英国合作为上策。……我国与俄国之关系虽尚未严重决裂，但一大冲突迟早势不可免，彼若恃其强大，进而侵犯我权利线（指朝鲜），我亦须有所准备，坚决反击。因而，欲避免此冲突，防战争于未然之策，唯有借助其他同盟国之力，以阻止其南下”（《公爵山县有朋传》下）。

可是，元老中伊藤博文、井上馨等人怀疑能否真正结成有利于日本的日英同盟。他们认为，尽管有个日本也加入的英德协定，实际上对俄国旁若无人地侵略满洲不也是束手无策吗。还不如对俄国妥协，设法使其承认日本在朝鲜的垄断地位。这样做，即使承认满洲在政治上属于俄国的势力范围，但日本能在此从事经济活动不就足够了吗。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六日，伊藤在自己的别墅和井上及桂首相三人举行会谈，伊藤说：“与专谋私利之英国政府联合，效力薄弱，反被俄、法敌视。其结果必将遭受连满洲最有望之工商业利益亦被迫放弃之不幸。”井上也有同感，并将此事写信告诉女婿、外交官都筑馨六（《世外井上侯传》）。

井上尤为重视与俄协调。如上文引用部分所述（参照本书第31页），早在一八九五年五月，他就向本国政府建议：“不仅独占东洋谋求国利业已极为困难，而且劳而无功。密谋与俄协作之方针如何？”而后他一直坚持此见解，义和团事件后，越发成了对俄协商论者。就他看来，俄国似乎也在搞

对日友好。一九〇一年一月，他在给都筑的信中说，近来他观察到俄国已彻底改变了对日本的态度，而且“总之，庚子事变之际，我部队行动敏捷系纪律严明之结果，亦系于东亚获得有深交之友好国家之良策。”井上以此看法，与东京的俄国公使馆参赞保持接触，并想让他以个人的名义与首相伊藤私下会面。

辞去首相的伊藤，听从井上的劝说，决定以个人身份与俄国政府接触，在征得山县和桂首相的同意后，九月十八日由横滨启程，名义上是前往美国参加耶鲁大学创立一百周年庆祝典礼，接受名誉学位，然后漫游欧洲。他经由美国，十一月初到达巴黎，并在巴黎做了短期逗留。这时，驻在伦敦的林公使，根据本国政府的指令，十一月六日带着英国政府提出的最初的日英同盟条约文稿前来谒见，并向伊藤汇报了迄今为止的日英谈判情况。英国提案的主要内容是：日英两国为维持“东亚”的现状与和平，确保“韩国不被任何外国吞并”及清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在这个国家的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一）日英任何一方与第三国间发生战争时，另一方严守中立；（二）若他国支持敌国而参战，同盟国也共同战斗。此时，本国政府均倒向日英同盟，认为伊藤的俄国之行会成为同盟谈判的障碍，开始不赞成他的做法。伊藤看完英国提案后，虽然原则上同意，但在指出三点问题的同时，电告本国政府：“予未与俄国政府交换意见之前，最后决定延期为上策。”

十一月二十八日，伊藤到达彼得堡，十二月二日、三日、四日三次与威特财政大臣，拉姆斯道夫外交大臣交换意

见。^①他当时向俄方递交的备忘录，部分内容与一九〇三年六月之后的日俄开战外交有关，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以下五条：

“第一、互相保证朝鲜独立。

第二、互相保证任何一方不把朝鲜领土——那怕是一寸土地——用于战略目的。

第三、互相保证不在朝鲜沿岸设置任何使朝鲜海峡的自由通航受到威胁的军事设施。

第四、关于政治、工业及商业的关系，俄国允许日本在朝鲜自由行动，并承认日本为使朝鲜尽善良政府之义务，有通过指导和援助来帮助朝鲜的特权。但上文包括为平定内乱及其他扰乱朝鲜与日本之间的和平关系之类的事变而给予的必要的军事援助。

第五、以往的协定，由本协定取而代之。”

伊藤要求的重点是第四条，一目了然，若和第四条联系起来看，第一条是有名无实。需要注意的是第二、三条，这是伊藤完全同意拉姆斯道夫的主张而将其清楚地写在备忘录上的。不把朝鲜的一寸土地用于战略目的，也就是保证不把朝鲜作为侵略俄国控制下的满洲的军事基地。十二月五日，伊藤回到柏林，准确全面地向本国政府汇报了与俄国接触的内容要点，最后，“热切希望政府与俄国密切合作”，并说，日英同盟缔结后，合作是不可能的。

^① 伊藤随行都筑馨六作了关于这次交换意见的详细记录，包括伊藤在此行中与本国政府往返的所有电报（《伊藤博文秘录》附录《日英同盟与日俄协商》）。

这时，本国政府针对十一月六日的英国提案，起草了对英国提案作了重要修改的答复案，正呈报天皇批准。桂首相责成日本驻伦敦公使征求伊藤对此案的意见。伊藤指出五项中的要点，但原则上没有否认或提出重要的修改意见。最后，他在十二月六日发出的电报中说：“总之，务请阁下（桂首相）考虑将来与俄国之合作情况及德国将来之态度而慎重熟虑各条是盼。”但是，在电报到达之前的七日，桂首相、小村外相在东京就政府案召集了山县、井上、松方、西乡、大山岩五元老会议，得到包括井上在内的诸元老同意后，作为正式提案责成林公使交给了英国外相。伊藤得知后，立即致电天皇，请求暂缓批准日英同盟修改草案。接到电报后，政府和诸元老再次开会，坚持上次会议决定，再次得到了天皇批准。

无论是政府和山县等人的日英同盟论，还是伊藤的日俄协商论，在将整个朝鲜划入日本的势力范围，独占朝鲜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义和团事件之前，包括山县、伊藤在内的日本统治者们，曾考虑把朝鲜分别划入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上文例举的山县的“庚子善后策”也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其后，日本便试图独占整个朝鲜。这一目标的扩大，可能出于以下考虑：第一、目睹俄国顺利地控制着满洲，怕不久的将来朝鲜也被侵占，因而，在朝鲜国内决不允许任何俄国根据地的存在；第二、义和团事件以来，出现了英德协定，又要缔结日英德三国同盟或日英同盟，因此，断定英、德能牵制俄国。在上述两点上，伊藤和山县、桂是不谋而合的。但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之间存在着很大分歧。为达到独占朝鲜

之目的，伊藤原则上不反对日英同盟，但认为应先进行日俄协商，缔结不与日俄协商相矛盾的日英同盟。他认为，承认俄国事实上对满洲进行着政治统治也可以，日本只要在经济上能在满洲自由活动即可，而且能够通过日俄协商达到此目的。他在交给俄方的备忘录中，同意互相保证不把朝鲜的任何地方用于战略目的，说明他当时没有以朝鲜为基地用军事力量与俄国争夺满洲的意图。

山县、桂、小村反对伊藤的意见，他们断定，即使与俄国协商，第一，不能保证日本牢固地、永久地独占朝鲜；第二，即使由于协商，承认了俄国占领满洲的事实，其利益也并不大；第三，反而会使清国对日本日益好转的感情恶化。其结果，定会妨碍我们完成“通商、工业或文武顾问、教育等我日本人能在清国从事的”许多事业，即妨碍对清国进行帝国主义势力扩张。他们认为，日英同盟可以牵制俄国的野心，扩大日本在清国的势力，有利于解决韩国问题，进而能够在财政、通商方面得到英国的援助（十二月七日小村外相提交给元老会议的意见书《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四卷）。

不仅如此，他们还有决不让俄国独占满洲的决心，翌年一月末签字的日英同盟条约中也体现出这一点。条约第一条规定：

“两缔约国（中略）鉴于两国之特殊利益，其利益对大不列颠则主要系有关清国者；对日本国则除清国之利益外，特别于韩国拥有之商业及工业利益。两缔约国同意，若上述利益或因各国之侵略行动，或于清国与韩国发生暴乱，非镇压不能保护两缔约国任何一方臣民之生命财产不受侵犯时，

两缔约国均须为维护该利益采取必要措施。”这样，日本表明了不仅为了独占韩国、而且为了“在清国的利益”也要与俄国、或清国的反帝民族斗争对抗。条约第二条、第三条规定，其对抗发展为战争时，缔约国有责任援助。

日本独占朝鲜，隐藏着以此为据点威胁俄国统治满洲的意图。一九〇三年三月，桂首相对小村外相说：“我方如要求至鸭绿江之全部韩国领土，必使（俄国）之经营辽东半岛陷于危难，不能安然依靠一条铁路实施旅顺大连之计划。即所谓军事上，彼处于如同在我侧方占据阵地之处境”（桂《自传》）。所以，在本年六月以后的对俄谈判中，日本政府坚决拒绝伊藤在彼得堡同意的关于不将朝鲜用于战略目的的保证（后述）。这一立场，恰与伊藤相反，是先搞日英同盟。他们认为，若能加强日英同盟，日俄也可进行协商，但决不能以此取代或推迟日英同盟。所以，他们表面上尊重，实际上却无视伊藤在巴黎和柏林一再提出的日英同盟慎重论，而继续与英国谈判。

伊藤在柏林逗留期间，一九〇一年十二月十七日收到了俄国针对他提出的日俄协商案的对案。对案第一、二、三条与伊藤案异曲同工，但关键的第四条，删掉了伊藤案中“政治上”日本也可在韩国自由活动一句中的“政治上”一词，改为只限于工商业方面；还把伊藤案中的日本拥有对韩国进行“指导和援助”的“特权”一句改为拥有“事先与俄国协商后、再进行单独指导”、使韩国尽其善良政府之义务的“优先权”。完全抽掉了伊藤案的主要部分。进而，第五条规定，“沿俄国国境事先明确议定靠近国境地带之区域，日本军队决不超

越之。”以此限制日本的行动范围。第六条规定，日本承认俄国在俄清国境地带的“优先权”，保证不妨碍俄国的一切自由。日本政府由伊藤处得知此情况后，认为尤其第六条和日本的一贯方针势不两立。桂首相电告伊藤，以强硬的措辞表示反对（《伊藤博文秘录》附录）。伊藤也认为实在荒唐，便放弃日俄协商，前往英国协助林公使缔结了日英同盟条约。

日英同盟的形成，决定了日本对俄战争的方针。近年来，强调日本统治阶级的和平意图的说法多起来，说什么日本政府缔结这一条约正是为了防止对俄战争。但无论引用多少山县、桂、小村等人期待日英同盟收到不用战争可以制止俄国占领满洲之效果的言辞，也丝毫不能否认其期待无效时，就下决心以战争与俄国争夺朝鲜、满洲，而正是为了这一天才缔结了军事同盟这一事实。正如第一条所明文规定的那样，此条约也是镇压中国、朝鲜的反帝民族斗争的条约，虽然强调条约是“和平”、“防卫”性质的论者们完全回避这一点，但条约中有关这方面的内容，已公开说明日英同盟是极其帝国主义的。对英国来说，日本军队在镇压义和团时的使用价值是难忘的。日本和长期不与任何国家结盟的世界最富强之国，以平等的立场结成了条文明确规定把维护日本利益作为重点的同盟，使日本的国际地位提高了一大步，大大地满足了统治者和国民的帝国主义的自负心。事实上，日本由于充当了英帝国主义在远东的哨兵，才成了对朝鲜、清国强硬推行帝国主义的国家。

2. 日俄开战

日英同盟谈判正在进展时，俄国对满洲、朝鲜发动了新的侵略。一九〇一年十月，俄国驻北京公使提出了将满洲归还清国的新条件。这些新条件乃本年四月曾一度中止的十二条要求的改头换面的翻版，即俄国（1）本年内将整个东三省、包括牛庄港和山海关铁路归还清国；（2）本年内撤走盛京省的驻军；（3）黑龙江省和吉林省的军队，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两年内逐渐撤走；（4）清国新编军队要与俄国将领协商之后由盛京省将军决定，但该军队不得使用大炮。以上是俄国政府与清国政府的协议。此外，还以俄清银行与清国银行密约的形式规定清国政府，（1）赔偿山海关铁路的管理费及其损失；（2）由俄清银行垄断满洲的矿山开采权。这是俄国新提案的要点。但是，其细节——“细节”里确实隐藏着重大问题——日本和英美均未探知。日本政府以反对关于重新编建清国军队的条款和俄清银行的新利权为中心，一再要求俄清两国政府修改此协议，并鼓动英美政府协助，但英美两国，特别是美国没有表示积极态度。只是因为清国政府推动此协议的李鸿章于十一月七日死亡，俄清谈判才停顿下来。翌年（一九〇二年）一月末，因日英同盟成立，英国才积极向俄国抗议。或许由于这一缘故，俄国放宽了条件，一九〇二年四月，缔结了把满洲归还清国的条约。

俄国在条约中保证：（1）本条约签定后六个月内撤走盛京省西南部的俄国军队，并将铁路归还清国；（2）在其后六个月内，撤走盛京省剩余的部队和吉林省的军队；（3）在第三个六个月内，撤走黑龙江省的军队。但是，（1）俄军全部撤出之前，各省将军和俄军将领共同商定仅够“足以镇压匪盗，维护地方和平”的清国驻满洲军队的数量和驻地，清国不得组织除此以外的军队；（2）俄国全部撤军后，清国政府负有将满洲驻军的数目通知俄国政府的义务；（3）俄国归还的地区不许他国占领；（4）延长满洲南部的铁路或更换设施，须经俄清两国政府协商；（5）清国须偿还俄国为维修、经营本次归还的铁路所需的费用。

在此期间，一九〇二年一月，由于法国欲贷款给韩国政府，日俄在朝鲜问题上又产生了新的对抗。不言而喻，俄国政府是这次贷款的推动者。由于日本和英国反对法国贷款给韩国，对韩国政府施加压力，致使韩国政府谢绝了法国的贷款，另由日本第一银行向韩国政府以五年期限活期透支三百万元的形式，给予事实上的贷款。谈判时，韩国的海关总税务司布朗（英国人）协助日方做了大量工作，这也许是日英同盟的效果。当时，韩国的进出口贸易大都由日本商社经营。

日本政府从这些经验中，再次痛感到对朝鲜、清国发展经济的必要性。在十月召开的内阁会议上，小村外相要求在一九〇三年度预算中，列入四百七十九万元作为“清韩事业经费”，得到批准。这笔经费对韩国共支出一百三十九万元，用于补助京釜铁路株式会社迅速建成京釜铁路以及为获得京义铁路和马山——三浪津间铁路的修筑权的费用。向清国投

资两千万元，三百万元用于资助设立类似俄清银行的日清银行，三十万元用于在天津和上海建立商品陈列馆，九万元用于调查清国的矿山、铁路和水路。上记三百三十九万元计划在明年度预算中支出。小村在关于“清韩事业经费”的说明中说，只靠民间资本，根本不能与欧美竞争，政府必须给予比德、法更大的援助。

这笔国家资金从何处筹措？很显然，靠国内公债和增税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外债。同年（一九〇二年）十月，通过刚刚开业的日本兴业银行，把国内公债卖给汇丰银行，筹集了五千万。但这笔款被用于军备扩张，既未能协助建立日清银行，也未能充分资助京釜铁路。尽管如此，日本还是一方面输入外国资本，另一方面拼命搞资本输出，和俄国依靠法国资本开设俄清银行、修筑东清铁路虽有规模大小之别，但作法完全相同。列宁论述说：“在俄国，最新型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在沙皇政府对波斯、满洲和蒙古的政策中完全显露出来了，”把它与“军事的封建的帝国主义”严格区别开来（参照本书23页）。列宁的论述，对日本天皇制的上述政策也是适用的。

在此期间，俄国又在满洲赖着不肯走。一九〇二年十月为期的奉天省西南部的撤军只是给人以假相，实际上不过是把部队从西南部移到了东北部；而翌年（一九〇三年）四月为期的奉天省北部和吉林的撤军，根本毫无迹象。四月到期时，十八日，俄国又蛮横地向清国提出了七条撤军条件。

第一条，俄国归还清国的领土的任何部分，特别是营口和辽河水域，“无论出于何种情况”，决不得出卖或转借于他

国，否则，俄国将看作是对俄国的恐吓而采取“断然措施。”

第二条，不得改变整个蒙古现成的政治结构。

第三条，清国政府不事先通知俄国政府，不得在满洲新开放港口和城市，亦不得允许设外国领事。

第四条，清国因行政事务雇用外国人时，其外国人的权力不得超越包括直隶省在内的“北部地方”。比如，清国雇用外国人搞矿务，其权力不得涉及满洲和蒙古的矿务。“此等事务均应委与俄国技师。”

第五条，营口至北京的电信线，必须与俄国在营口、旅顺进行的盛京省内联络的电信线经常保持衔接。

第六条，营口归还清国后，营口海关税收继续存入俄清银行。

第七条，俄军撤出后，继续保护俄国占领期间俄国臣民及外国公司在满洲获得的正当权利。并且，归还营口后，为预防瘟疫由此传入北部，由俄国人在其附近设立检疫局。

日本政府是在十九日得知这七项条件的。这时，俄国以采伐鸭绿江沿岸森林的名义，已开始朝鲜同江左岸修建军事设施。元老和政府都大吃一惊，正值天皇去大阪，伊藤元老、桂首相、小村外相也随之前往。四月二十一日，山县、伊藤、桂、小村在京都的山县别墅无邻庵举行秘密会谈，商定了以下四条对俄基本方针。

“一、俄国不履行归还满洲条约，不从满洲撤军时，我方主动向俄国提出抗议。

二、乘满洲问题之机，与俄国谈判，解决朝鲜问题。

三、对于朝鲜问题，迫使俄国承认我之优越权，对俄国寸步不让。

四、对于满洲问题，我承认俄国之优越权，并以此为机，从根本上解决朝鲜问题。”

正如桂首相三月满怀信心地向小村外相说过的那样（参照本书第174页），日本若完全控制整个朝鲜，就会对俄国经营满洲时常形成威胁。根据这一估计，他们坚持日本独占朝鲜的主张，做出了“作为交换，在满洲承认俄国在其经营就绪范围内之优势”的让步（桂《自传》）。这决不是满韩交换，而是出于以下目的：考虑到当前彼此间的力量对比，暂且承认俄国在满洲的部分优势，作为其代价，日本独占朝鲜，不断威胁满洲的俄国势力，在不久的将来也准备插手满洲。

元老们在前年二月俄国向清国提出十二条要求时（参照本书第163页）说，日本不能单独与俄国抗衡，“此时，只有将我之行为尽量限制在英、德意图之范围内”，^①以能在韩国维持目前现状的乐观估计聊以自慰。但现在却如上所述，开始了积极竞争。或许是仗恃有日英同盟吧。其后，在四月二十六日，山县就向寺内陆相询问过对俄战备情况。寺内回答说，陆军已做好了七、八个师的动员准备，寺内并转达了山本海相的话：海军也已派舰队在対马、佐世保之间游

① 引自《伊藤博文传》中“三月十五日元老内阁会议之大意”。著者认为此文件为明治三十五年的备忘录，但文末没有年份记载。我在以前的论文《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见历史学研究会编《近代日本的形成》）中，相信了《伊藤博文传》的记述，但仔细分析起来，这个备忘录若不是明治三十四年（一九〇一年）三月十五日的，其内容就没有意义。

弋，并已训令随时作好战斗准备（见《公爵山县有朋传》下）。

元老和政府的方针就这样定了，但贯彻此方针，内政上存在一大困难。因为在前年二月召开的第十七届议会上，作为第三期海军扩建计划和财源，政府提出了延续山县内阁时争执不休、附带期限才勉强通过的土地税增征案，并将其作为永久化的预算案。虽然政友会和宪政党都一致赞成扩建海军，但认为不能再疲弊民力，强烈反对继续增税。在此之前，政友会总裁伊藤曾托山县劝告政府不再继续增税，被山县拒绝，造成政府和议会的正面冲突，政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解散了众议院。在其后的选举中，政友会仍占绝对多数。一九〇三年五月，举行了第十八届临时议会（五月十二日——六月四日）。在此期间，伊藤说服山县和政府同政友会妥协，停止继续增税，通过缓建铁路及缓办其他事业解决造舰费用。上年秋季引进的五千万元外资，使这一妥协成为可能，预算案得以通过。

议会结束后，六月二十三日，元老和政府举行御前会议，在无邻庵会议协商的基础上，决定开始对俄谈判，并立即通知同盟国英国，请求支援。但是，七月一日，桂突然提出辞职，他说，伊藤一方面以元老的身份指挥、监督政府，另一方面以政友会总裁的身份，在议会上为难政府，面临艰难的对俄谈判，我无能担当国政。这便引起了一场纠纷，结果，七月十三日，天皇命令伊藤辞掉政友会总裁的职务，任枢密院议长，山县、松方等任枢密院顾问官，元老一致协力帮助桂内阁。十五日进行了内阁改组，免去内海忠胜的内务大臣职务，由儿玉源太郎中将接替，集结了精明强干的官僚，全

力进行对俄谈判。西园寺公望辞去枢密院议长，取代伊藤接任了政友会总裁。

八月十二日，日本驻彼得堡公使向俄国政府递交了日本的第一个对俄协约案。全文共六条：第一条，尊重清韩两帝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保持各国在两国的工商业的机会均等主义。第二条，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之优势利益，日本承认“俄国经营满洲铁路之特殊利益”，并相互承认日本在韩国，俄国在满洲为保障两国各自利益而采取必要措施之权利。第三条，日俄两国不得干涉日本在韩国、俄国在满洲开展各自之商业及工业活动。并且，俄国保证今后不阻挠将韩国铁路延伸至满洲南部与东清铁路和与山海关——牛庄线衔接。第四条，为保护第二条之利益，为镇压民族运动，日本可出兵韩国，俄国可出兵满洲。第五条，“俄国承认，为促使韩国改革、行善政而给予指导与援助（包括必要之军事援助），属于日本之特权。”第六条，日俄两国间原有关于韩国问题的一切协定，均由本协约代之。

这个协约案与前年末伊藤提出的五条协约案（参照本书第171页）比较，大不相同。伊藤案中的不得把一寸朝鲜领土用于战略目的、不得设置妨碍在朝鲜海峡自由通航的军事设施两条，已完全消失，只是仅仅在经营铁路的特殊利益方面承认俄国在满洲的优势地位。日本以此甚至要求把韩国的铁路延伸到满洲南部的权利。桂在无邻庵会议上的豪言壮语决非空谈。

俄国对上次的伊藤案，尚砍掉了其中的主要内容而提出了对案，对于这个日本案，就更不可能接受了。俄国对谈判

本身已不感兴趣，提议把谈判地点移到东京。日本同意，但因手续问题等消磨了时间。十月三日，俄国驻东京公使好不容易才提出了其政府的第一次对案。此对案比以前针对伊藤案的对案更为苛刻。全文共八条，第七条规定：“日本承认满洲及其沿岸根本不属于日本的利益范围。”所以，此协约案的其他各条，只字未提日本承认或不承认俄国在满洲的权益，只专门规定了日本在韩国的地位和权利的限制。第一条，韩国之领土完整。第二条，俄国承认“日本在韩国的优越利益”，承认日本为“改良韩国民政”对韩国进行指导与援助之权利。换言之，即不承认日本要求的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为了“改革和善政”的指导和援助。此外，也不承认上述范围的“援助”是日本的“特权”。第三条，俄国不干涉日本在韩国的商业和工业企业，不反对日本为保护其企业所采取之措施。第四条，同意日本出于前条目的在“照会俄国后”暂时向韩国出兵。即，否认日本要求的为保护总的“日本的优势利益”和镇压民族运动的出兵，只承认为保护工商企业的出兵。而且，出兵时必须预先照会俄国。第五条，不把韩国领土的任何部分用于战略目的，不修建妨碍朝鲜海峡自由通航的军事设施。第六条，北纬三十九度以北的韩国领土为中立地带，日俄两国均不得派军队驻扎。第七条已在上文中提到。第八条与日本案第六条相同。

两国以上述各自的协约案为出发点进行谈判，双方在原则问题上都寸步不让。十月三十日，日本针对俄国的第一次对案，提出了第二次方案。其中对俄国作出的让步，只是增加了放弃将韩国铁路延至南满的要求，待东清铁路修筑到

鸭绿江时，再与之连接，与保证朝鲜海峡通航自由两款。同意设置中立地带，但要以满韩国境地带两侧五十公里为中立地带，实质上不能说是对俄国的要求做出的让步。方案对俄国提出的，不得把韩国领土用于战略目的的基本要求，完全不予理睬；对俄国关于满洲“根本不属于日本的利益范围”的主张，改为不属于日本“特殊利益的范围”，表面上作出了让步，但反过来却要俄国不得干涉“日清条约规定的属于日本的商业及居住方面的权利和豁免权”。

俄国方面的不妥协态度，较日本更强硬。针对日本十月三十日提出的第二次方案，俄方于十二月十一日才提出第二次方案。但主要内容与第一次方案完全相同。

在谈判期间，日本在满洲，俄国在韩国继续开辟新的势力据点。即日本伙同英、美向清国施加压力，使其拒绝了俄国四月十八日提出的七条要求（四月二十七日）。十月八日，日清两国缔结了通商航海补充条约，开放奉天市和大东沟，并在此两地设日本人租界地和驻在领事，断然做出了俄国在上述威胁清国的七条要求中决不能承认的事。同一天，美国也与清国签定了新条约，开放了奉天和安东。日美两国与清国签定的新条约，是英国一九〇二年九月与清国缔结的通商条约（马凯条约）的补充，实现了垂涎已久的目的。日美与英国密切合作，对俄国是个极大的打击（康特罗维奇著、堀江邑一等译《称霸中国之战与太平洋》上）。有人牵强附会地把这个日清条约说成是日本向满洲要求通商机会均等的和平条约，但实质上是日本与英美合作，阻止俄国独占满洲的帝国主义对抗政策，也是决心与俄国一战的挑衅。如下文所述，

这时的日本正热中于开战准备。

俄国也把四月二十七日被清国拒绝的七条要求改头换面，于九月六日再度提了出来（即日被拒绝）。七月一日，完成了东清铁路——纵贯满洲的军事大动脉——的修筑工程。七月以后，俄国进而以鸭绿江森林公司的名义，把在鸭绿江岸的龙严浦租借土地的合同强加给韩国，运进大量冒充公司技师或工人的军官和士兵，开始把这里变为军事基地。日本强烈抗议，八月十九日，迫使韩国政府拒绝接受租借合同，但俄国置若罔闻，进一步加快了基地化的步伐。这时的俄国，显然也在准备对日开战。在俄国政府内部，维特等对日慎重派——但决不是和平派，而是资产阶级的帝国主义派——被挫败，靠近皇帝的最富于冒险主义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者，掌握了对日政策的指导权（康特罗维奇，前引书）。

日俄开战，对双方都已是时间问题。日本的陆海军省、总参谋部、军令部的高级将领和外务省的局长们，从这一年春天起，就串通一气，在各自的部内煽动主战热（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以下有关军部的叙述，未特殊标明者，均系依据此书）。五月十日虽然是星期日，总参谋部各部长们照常上班，开大会就俄国形势和日本应采取的态度汇集意见。据此，总参谋长大山岩于五月十二日启奏天皇：目前之对俄战略关系有利于皇国，随着日月推移，今后之局势将倒转过来，故应迅速充实军备。同年五月（日期不详），大山总长又将《关于朝鲜问题之意见书》启奏天皇。意见书说，目前正是解决朝鲜问题的唯一良机。现在，日本军备能与俄国对抗；

越往后，它越发变为优势，所以，外交谈判也将无望。

值得注意的是，大山在这些意见书中没有要求马上发动战争，并在后一份意见书中写道：“我辈军人本不应置喙政治，亦不欲如此”，但筹谋国防乃军人之天职，故呈献国防计划及彼此兵力关系上不能坐视等事之意见。当时，他们虽然早把统帅权的独立做了扩大的解释和乱用（如出兵镇压义和团，参照本书第64页），但还不是象后来的军人那样，自己就决定和与战。大山总长的意见的基础，是总参谋部部长会议的意见。部长们在部内是强烈主张即刻开战论者，他们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强调，从战略上看，时间拖得越长，对日本越不利。不仅谩骂政府的软弱，还气愤地说总长、副总长无能，拖拖拉拉，不断向副总长和总长施加压力，但那仅仅局限于部内，并未联合外部势力向政府施加压力。从反面看，这也说明总长、副总长的统辖是得力的。

另外，元老和他们辅佐的政府，负责进行战与不战这一决定国家命运的最高政治判断时，未受军人左右。谷中将在他的《机密日俄战史》（一九二五年在陆军大学的讲义）中指責政府说，十月二十四日的元老会议，除诸元老外，只有首相和陆、海、外三相出席，藏相、总参谋部副总长和海军军令部长伊东祐亨均未被邀到会（大山总长作为元老参加），其后也同样，直到政府明确决定开战后的一九〇四年一月七日的内阁会议，才允许总参谋长和军令部长分别带领副总长和副军令部长列席。这种指责是不妥当的，应该说，当时的统治阶层很健全，还能由政府负责做出开战与否的政治决定。

但是，作为任务，总参谋部在义和团事件之后就开始正

式制订对俄作战计划，从一九〇一年八月前后，开始研究攻势作战，进入一九〇三年后，开始筹划制订“以在韩国拥有先发制人之重大意义为中心的具体作战计划”。十月一日，副总参谋长田村怡与造中将突然死亡，儿玉中将竟然辞去特任官内务大臣职务，担任比大臣低一级的副总参谋长，督促部下加快制订作战计划。田村是慎重派，而儿玉是积极的主战派，所以，总参谋部成员自不待言，社会上也都热烈拥护这一人事变动。

这时，议会和政府又发生了正面冲突。十二月五日召集第十九届议会，十日开幕。这届议会一反常例，议长河野广中没同各派代表协商，就独自起草，并在会上宣读了众议院对开幕式敕语的奉答词。和往常一样，议员们没有注意奉答词的内容就一致表示赞成。但是，奉答词中有弹劾政府“内政以弥缝为事，外交失去良机”一节。政府非常气愤，次日解散了众议院。这样，政府行动可不再受议会限制，毋宁说是一种幸事。预算方面，为非常准备，要求非常支出，经枢密院讨论后，以紧急敕令处理，所以，一切必要的事，无一不马上办成。

在此期间，元老和首相、陆海相等经常开会，十二月十六日的政府、元老会议决定对俄宣战。其后继续进行的外交谈判，仅仅是为了赢得陆海军的准备时间。二十日，伊藤在写给山县的信中说：“如按儿玉之见，在断绝外交之前争取一定时间，反而露出优柔寡断之态度，应令陆海协商，检查准备工作，欲采取间不容发之行动，尤有极力伪装镇静之必要。”不仅伊藤一个人，山县等其他元老以及政府大臣，

在这一点上也是完全一致的。不知真情的军人和民间狂热的主战论者，以为政府软弱怯懦，还在愤怒声讨，痛骂不止。

十二月二十八日，军方也解决了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这一拖了四年的难题，这意味着陆海军的妥协和完成开战体制。修改前的条例（一八九三年制订）规定，陆军总参谋长“制订陆海军的大型作战计划”，海军作战也须听从总参谋长指挥，剥夺了军令部的独立性。海军对此不满，一八九九年十一月，要求修改战时大本营条例，使总参谋长和军令部长处于平等地位，总参谋长反对修改，双方均将意见书奏呈天皇，请求裁决。但对政府和议会的对立一向简单地裁决为政府正确的明治天皇，面对天皇制权力机构中枢的这一对立，却不知如何裁决是好，只说“待朕熟览”，便将双方的奏折置于一旁。对俄开战在即，陆海军都迫切需要解决此问题，陆军就让了一步，总参谋长及海军军令部长作为各自的幕僚之长，以平等资格参与制订作战计划，谋求陆海两军策应合作。但战争开始后，陆海军的策应合作并不顺利，陆军只把海军当作自己的运输护航队；海军却乐于独自作战，对只是因陆军要求而参加的作战，总是寻找各种借口予以回避。只是这时的陆海军的分裂和对立，还不象后来的太平洋战争时那样严重。

政府拿定主意要开战，也必须确保战费来源。为此，只有得到资产阶级的支持。甲午战争时，政府独自决定开战后，强行向财界和国民发行战时公债。那时的募集人高桥是清（当时任日本银行下关分行行长）作证说，完全和封建时代

催征军费一样（《高桥是清自传》）。而日俄开战时，政府事先谋求了财界的支持。十月十六日，儿玉副总参谋长向总参谋部高级将领们发表演说，估计对俄战争时间为一年，费用约八亿元。他说，筹措这笔费用的一个办法，就是说服邮船会社以及各汽船会社、铁道会社，使之主动承担无偿运输。不过，这种无偿，只是暂时延期付款，而不是永远的无偿。他的方案被付诸实施（《机密日俄战史》）。

据涩泽荣一的《青渊回顾录》记载，儿玉曾恳托涩泽，“实业界人士若同意开战，则能立即出征讨俄。请说服他们支持战争。因为，若实业家们不愿意战争，出征讨俄是不可能的。”即使儿玉不是这样说的，最终也必须得到资本家的支持。

从一九〇四年一月开始，桂首相、曾弥藏相和在实业界拥有颇大势力的井上、松方二元老经常与全国的银行家、实业家们举行座谈会，为战时财政寻求支援。幸德秋水针对这一事实甚至这样评论：“实际握宣战讲和之关键者，非一种贷款者耶，其称为银行家者，非贷款业者乎”（《平民新闻》周刊一九〇四年二月七日）。

宣战的当天，农商务大臣清浦奎吾召集全国地方长官会议，训示说，要为振兴对清韩的贸易而努力。同一天在大阪工商联，次日又在神户商务会，发表演说，讲了对清韩贸易在日本贸易中的重要性，其中，特别以数字为例，强调了胶州以北，即清国北部、满洲的比重之大，请求资本家协助。他在神户的演说中说：“此次开战并非单纯出于政事之需要，对清、韩两国大力发展我工商业，亦系此举之主要目的。”

他把清韩地区称为“我之利益线”，宣称要垄断那里的商业权。同年六月，他向京滨的实业家发表演说时又说：“世间观日俄之时局，往往认为两帝国主义之所以冲突，系因日俄通商政策于清韩地区之冲突。”若此战获胜，显而易见，“我国之利益圈将越发扩张至清韩之地。诸位实业家们，努力吧。”清浦农商务相试图通过这些有力的活动，鼓动资本家不要因战争引起贸易的一时停滞而心灰意冷，同时，也是他对这次战争的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性质的自白（井上正明《伯爵清浦奎吾传》上）。

不仅政府向“实业家”做动员，象田口卯吉那样的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代表们，也极力鼓吹日俄开战论。日俄开战时的资产阶级，已不再是十年前那样的被天皇政府驱使只“奉献捐款”的实体了，而是天皇政府谦恭其辞地恳求援助的实力派。

战费和外债将在下章中阐述。

最后，事先向国民鼓动战争热是绝对必要的。在这方面，毋宁说政府为压制过分的战争热而煞费苦心。甲午战争以前，政党在内政上无法攻击政府时，经常列举外交问题，用比政府更甚的侵略主义的“对外强硬”攻击政府。但自义和团事件之后，随着俄国侵略满洲的急速进展，政党或报刊、杂志的对俄强硬论的调子逐渐升高。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和福泽谕吉的《时事新报》充当了急先锋。

一九〇〇年九月，贵族院议长近卫笃磨组织了“国民同盟会”，在“扶植朝鲜、保全中国”的口号下，痛骂政府的“软弱外交”，主张把朝鲜全部置于日本势力之下，反对列强瓜

分清国，强烈反对俄国占领满洲。这种反对，当然不是反对帝国主义，而是在日本成为主要瓜分者之前，决不许他国瓜分的帝国主义。国民同盟会与宪政党在对外政策上，紧密团结，共同战斗。该会于同年十二月在东京新富座召开了中央大会，来自全国各地的参加者达五千人。

从这时起，东京帝大法科大学教授户水宽人、富井政章、寺尾亨等所谓七博士，以对俄强硬论、主战论的鼓动者而闻名于世。一九〇二年四月，国民同盟会以俄国与清国缔结了归还满洲条约为时机，认为满洲问题已大致解决，同盟的目的业已达到，宣布解散，但会员的领导人头山满、佐佐友房、犬养毅等人，越发鼓吹起不负责任的强硬论和膺惩俄国论来。他们和七博士于一九〇三年八月九日，重新组成了“对俄同志会”，以近卫笃磨为会长，神鞭知常为委员长，展开了即刻开战的大宣传活动。

如前章所述，自一九〇〇年前后开始，帝国主义赞美论流行一时，而且存在着国民大众易于接受的历史社会条件。从一九〇二年秋到日俄开战的一九〇四年二月，对俄战争热日趋高涨。以内村鉴三、幸德秋水、堺利彦等为主要执笔人的《万朝报》，一直宣传非战论，但一九〇三年十月，该报社社长黑岩周六也终于成了主战论者。一直主张非战论的内村、幸德、堺等人于十月十二日退出该社。基督教徒内村因不能发表正论而折笔沉默，但社会主义者幸德、堺等人，于十一月十五日创办了“平民社”，发行机关报《平民新闻》(周刊)，高举非战、反战的和平主义和社会主义旗帜，坚持战斗。《平民新闻》的发行量最盛期竟达三千份。

非战论是国民中极少数人的立场。幸德秋水的密友田冈岭云，曾经作为通信员从军参加镇压义和团战争。他目睹战争之凄惨痛苦，写下了“不能不作非战论者”的文学家，两年后，就连他也成了出名的开战论者。“弱国日本欲使其势力与世界并肩，须采取非常手段”。现在，白种人蔑视黄种人，“日本作为东洋之先觉者向西洋人显示其国力，一者为世界文明，再者为招致大和平，都是必要的”。他以此为由，成了对俄主战论者。他在晚年直率地忏悔道：“然而，其理论的背后，隐藏着一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鼓动家的血气之勇和大帝国的梦想的虚荣心”（田冈《战袍余尘》、《数奇传》）。

几乎所有的日本人都这样陶醉在战争热中。可是，一般民众是正确地理解了战争的目的、从内心与之共鸣、积极地主张战争的吗？毋宁说是在富强和文明方面远远落后于欧美白种人的日本人的民族劣等感；在白种人的俄国旁若无人地侵略满洲、朝鲜的现实面前，被议会的在野党、国民同盟会、七博士和报刊、杂志等舆论制造者们巧妙地转化为帝国主义的焦急感；进而以狂热的主战论表现了出来。正因为如此，才如后所述，日本海军在宣战之前，进行了卑鄙的突然袭击，击沉了停泊在仁川、旅顺的俄国军舰而得意忘形。在宣战当天，俄国军舰就在津轻海峡日本海一侧击沉了日本船“名古屋丸”。消息一传开，据说，“居住于函馆者，狼狈不堪，手足无措。得此消息之全国民皆胆战心惊”（《机密日俄战史》）。

同年六月，俄国的海参崴舰队在日本海击沉了日本的运输船常陆丸等，进而，七月下旬，通过津轻海峡进入太平洋，

长驱南下至御前崎海域，击沉了日本、英国、德国的帆船和轮船数艘，使日本国民惊恐万状，完全失去了理性。他们对担负搜索、消灭海参崴舰队任务的第二舰队进行无情的非难和谩骂，甚至说司令长官上村是俄探（俄国侦探、走狗），并对其家属进行威胁。这种轻浮和狂热的开战论，其精神结构完全和煽动家们的鼓动同出一辙。

不管如何轻浮，总之把国民驱向了狂热的开战论。如上所述，其他准备已全部就绪，剩下的只是陆海军的具体细致的准备工作和等待战术上的良机。一九〇四年二月四日，元老、大臣召开御前会议，认为战机成熟，决定开始军事行动。五日向俄国发出了断交书，六日由驻俄公使递交给俄国政府。在此之前，日本的联合舰队分兵两路，一队前往攻打旅顺口的俄国军舰，一队掩护陆军先遣部队（二千二百人）在仁川登陆。八日午后，进入仁川港的日本舰队和运输船队，在两艘俄国军舰的眼皮底下，让陆军部队登陆。九日全部登陆后，要求俄国军舰撤走，在俄国军舰刚刚到港外时，出其不意地开炮轰击，当即击沉一艘，另一艘自行爆炸而沉没。在旅顺，日本舰队八日晚进行了突然袭击，击毁俄国战舰、巡洋舰各两艘。军人、官员和国民都沸腾起来，欣喜若狂，高喊“天皇陛下的神威”万岁！二月十日，政府才宣布对俄宣战。

践踏国际法的一切准则，宣战前搞突然袭击，十年前的甲午战争时就是这样干的。三十七年后的太平洋战争也是这样干的。若不这样在战争一开始就旗开得胜，就不能把国民长期拖入战争，就不能满怀信心地打好以后的仗。这是天皇

的陆海军的整个生涯的特征。这一特征，是没有帝国主义实力的国家硬要进行帝国主义实践这一矛盾的必然产物，不是真正出自国民自发的积极的战意，而是依靠统治阶级的煽动、强迫才有战意的军队的本质。

第六章

日俄战争的结局及性质

1. 战局的发展和日军的困境

日俄刚开战时，日本陆军现役军官为七千五百人，下士官、士兵为十九万人，加上预备、后备部队共计二十三万五千人。相比之下，日本参谋本部估计，俄国能用于远东的兵力约三十万人。并认为，越拖延开战时间，西伯利亚铁路、东清铁路的运输能力将日益提高，对日本就越不利。日本海军有战舰六艘，装甲巡洋舰八艘，巡洋舰十七艘，加上其他军舰，共二十五万八千吨，此外，再加上水雷艇和临时改装的军舰九艘，总计三十一万八千吨。开战之初，俄国在远东配备的舰艇有战舰七艘，装甲巡洋舰十二艘，巡洋舰九艘和其他舰艇。日本参谋本部判断，这样一比，日本可以四比三占优势，但俄国另有波罗的海舰队和黑海舰队，这两支舰队若开到远东，彼我之劣优将倒转过来。而且，海军当局认为，日本能牢牢地掌握住对马海峡的制海权，但黄海和日本海的制海权却没有把握。

战争就在这种情况下开始了。如前章所述，海军使用偷袭和突然袭击的战术，在仁川海域和旅顺口击沉、击毁了俄

国军舰，一时掌握了朝鲜西海的制海权，使陆军能在仁川和镇南浦（大同江口）登陆。接着，海军强行封锁了旅顺口，使陆军能在辽东半岛西侧登陆，从而为其后在朝鲜、满洲作战奠定了基础。

大本营的作战计划是，在第一期作战中完全占领朝鲜，同时进攻旅顺、大连地区，歼灭旅顺口的俄国海军。然后，第二期的主要作战在南满铺开，打击俄军主力。另外，如有可能，从朝鲜向俄属乌苏里地区进攻，开辟第二战场。但是，开战前，具体的作战计划只有第一期。以分头围攻辽阳为目标的第二期作战计划，到开战一个月后的一九〇四年二月，才好容易制订出“可观的方案”。谷寿夫中将在陆军大学的讲演中说：“翻开日俄战史，对其作战计划之远大最终目标，皆认为系在一贯且圆满之方针下所制订，但事实并非如此。占领奉天后之计划，系完全出自战争结束数年后战史编纂者之手”（《机密日俄战史》）。

参谋本部中最积极主张主战论的总务部长井口省吾少将，在开战八个月前的意见书中认为，打到哈尔滨是可能的必要的，但攻打哈尔滨以北将是不可能的。就是说，这次战争即使日方军事上万事如愿，也不得不受到限制，最多只能打到占领哈尔滨。正如小村外相所说，必须一开战就认识到：“此次战争，不能置敌人于死地。”就连这种估计都是非常天真的。俄国投入满洲的兵力，远远超出一百万；日本也把国内的后备部队一卒不留地全部投到前线，延长服役年限，到战争结束时，实际上动员了一百零八万八千九百九十六人，平均每八户就有一名军人或军队的文职人员被驱往战

场。如下文所述，即使这样，一九〇五年三月的奉天战役之后，日本陆军不用说北进，就连长期守住占领地区都很困难。坦率地说，守住占领地区都不可能了。

在兵力和军事生产力方面，从长远来看，日本根本不是俄国的对手。这一点，一开始就很明显。前景更坏的是军费，井口少将估计战争期限为一年，战费为五亿元，其中国库解决一亿五千万，其余的三亿五千万依靠同盟国英国的外债来解决。如前所述，参谋次长儿玉估计大致需要八亿元，当然这也是指望巨额外债的。当时，政府在开战前议会解散期间，通过紧急敕令，得到了一亿五千六百万的支出权。继而，经过开战后的一九〇四年三月的总选举，在同月二十四日召开的第二十届议会上，批准了临时军费和临时军事预备费计四亿二千万的预算。到战争结束，几次追加预算，在讲和之前计支出十五亿元以上。到临时军费特别财政结帐为止（一九〇七年三月），包括停战善后费，共支出十八亿二千六百二十九万元。其来源为合计十五亿八千四百零三万元的内债和外债——内债七亿八千三百四十六万元，外债八亿零五十七万元，其余部分主要是靠叫作非常特别税的增税、卷烟专卖盈利和其他捐税解决的。

整个日俄战争期间，日本自始至终依赖于英、美政府和两国的金融资本，没有这些援助，战争连半年也打不了。政府和陆海军一开始就认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战争目的也不得不限定在英、美容许的范围之内。开战前一年的十二月三十一日，政府责成驻伦敦公使林与英国政府谈判，要求英政府预先保证财政援助。当时，林强调说：“日本努力之成果，

由在满洲拥有商业利益之列强共同分享，”而并非日本能独吞的。谈判没有成功，但一开战，政府就派日本银行副总裁高桥是清以财务官的身份到英美募集外债，又派末松谦澄到英国，派和美国总统罗斯福是哈佛大学同学的金子坚太郎到美国从侧面协助高桥，并寻求政治支援。这时，他们仍然强调这次战争保证各国在满洲的机会均等。因此，日本在讲和时不得不要受到英美政府的意图的相当限制。

这样，一九〇四年五月和十一月，次年三月和七月先后四次募集外债，四次均为英镑债。第一次利息为百分之六，面额每一百英镑，日本实得九十英镑。第二次利息也是百分之六，面额每一百英镑，日本实得八十六英镑十五先令。第三、第四次利息百分之四点五，每一百英镑的实得数与第二次相同，为八十六英镑十五先令。利息高得惊人。第一、二次用关税收入，第三、四次用卷烟专卖盈利担保。

关于战局，在第一期的朝鲜作战中，俄国在南满集结了大量兵力，采取了在此决战的战略，根本不想在朝鲜交战。因此，日军第一军于四月下旬按计划开进鸭绿江右岸，五月一日渡过鸭绿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九连城、安东一带。在此期间，第二军集结于镇南浦，五月五日开始从辽东半岛的盐大澳登陆，二十五日对位于金州半岛最狭窄地带的南山上的俄军要塞发起正面进攻，一天就占领了南山。但是，仅仅一天的战斗，第二军就死伤四千三百人，和在甲午战争中死伤的人数相近，弹药也快用完，大本营不胜惊讶。

失去南山的俄军，一口气退到旅顺要塞，第二军便于五

月三十日占领了无人防守的大连。然后，第二军和第一军配合，北上直奔辽阳。在此期间，第十独立师在位于第一军和第二军中间的大孤山登陆，不久充实兵力，成为第四军。六月二十日，组成了以大山岩为司令官、儿玉源太郎为总参谋长的满洲军总司令部。在总司令部的指挥下，第一、第二与第四三个军约十三万五千人分兵向辽阳挺进，从八月末开始，向守卫在坚固阵地上的二十二万俄军发起了进攻。经过一周激战，俄军死伤二万人，退却北逃。日本也死伤二万三千人，死伤率远远高于俄军，加上缺乏炮弹，未能追击俄军而给以沉重打击。

在此之前，海军方面东乡平八郎司令长官的联合舰队，在黄海海面捕捉到八月十日逃出旅顺港、企图与海参崴舰队会合的由十七艘舰艇组成的俄国舰队，击沉、击毁了包括旗舰在内的九艘，使其向中立海域溃退，只有八艘逃回旅顺龟缩起来，取得了辉煌战果。继而，同月十四日，上村舰队在朝鲜的蔚山海域，发现以前因没捕捉到而被辱骂为“俄探”的海参崴舰队的主力舰三艘，击沉一艘，击毁两艘。这样，使黄海、日本海的制海权一时归为日本。但是，在这以前，俄国就决定把波罗的海舰队派往远东，七月初就已编成。因此，日本必须在该舰队到达战场之前，尽早地攻下旅顺口。

六月六日，大本营编成了以著名的乃木希典为司令官的第三军，急忙准备攻打旅顺，但一方面由于对旅顺要塞的坚固程度和敌情估计不足，另一方面，大本营和海军急于在波罗的海舰队到达之前攻克它，没有采取迂回到敌人背后的合

理战术，而是从地理上距离最近的正面拼命攻击。八月十九日开始，动用五万大军，发起了历时五天的第一次总攻击。其结果，只是以死伤一万六千人的惨败而告终。由于这次惨败，充分领教了敌军要塞的坚固程度，并知道了敌军有机枪这一日军闻所未闻的新式武器。但是，九月十九日，乃木将军又发起了第二次正面总攻，又以巨大的伤亡而失败。此时，作为支线作战，对俄军侧面的二〇三高地也发动了进攻，同样遭到了惨败。在大本营和满洲军总司令部那里进攻旅顺的主要目的是歼灭港内的俄国舰队，因此，希望避免伤亡过多的正面进攻，以攻克俯瞰整个旅顺口的二〇三高地为主线作战。但乃木根本不以为然，而自以为是。

不久，波罗的海舰队已于十月十六日驶出里巴雅军港。得此情报后，大本营和第三军越发急于攻打旅顺；十一月二十六日，又从正面向要塞发动了第三次总攻，不到一天的工夫，与上次同样地败下阵来。因此，次日停止正面进攻，转而全力以赴地进攻二〇三高地。二十八日夜，一度拿下了二〇三高地，但因后援跟不上，数小时后又被俄军夺了回去。这时，军司令部远离前线，设在敌人炮弹射程之外的地方，没有时时刻刻熟悉战况的准备；让预备队驻扎在远离前线一日行程的地方，连在部队占领二〇三高地后也应不断派增援部队巩固阵地的初步作战常识也未能运用。满洲军总司令部对第三军的丑态非常恼火，十二月一日中午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来到第三军司令部，让乃木承认其代理司令的身份，亲自指挥全军。在他的指挥下，加强了进攻前的炮击，十二月五日，终于攻下并守住了二〇三高地。然后，立即把二十八

厘米的海岸要塞炮^①拉到山顶，接二连三地击沉、击毁了旅顺港内的军舰，于十二月十日之前歼灭了旅顺舰队的主力。这样一来，已没有急于从正面攻打要塞的必要，于是才运用了挖地道、用炸药爆破要塞外壁后冲进去的合理战术。要塞的俄军，由于失去了应该保住的军舰，士气涣散。一九〇五年一月，俄军司令斯提塞尔向第三军司令部投降。日军这次攻克要塞，共投入十三万大军，付出了伤亡五万九千人的代价。攻克旅顺之战，典型地表现出司令部在安全的后方，只让士兵在枪林弹雨中肉搏冲杀的天皇军队的根本特征。

在此期间，攻克辽阳的第一、第二、第四军，向前推进到沙河。十月八日，俄军突然向日军右翼发起了反攻。日军迎战，激战到十七日，死伤两万余人，才击退了敌人的反攻。这时日军已缺少炮弹，未能给眼前的敌军以新的打击。其后，在隔着封冻的沙河与俄军对峙的情况下迎来了新的一年。一九〇五年一月二十五日，俄军突然在黑沟台附近以数倍的兵力向日军左翼发动了反攻。他们的计划是，突破左翼，继续向右翼、中路进攻。受到集中攻击的第八师，经过五天的雪中激战，虽然挫败了俄军的企图，但死伤者包括冻伤约九千人，死伤率超过百分之五十。

此后，日军令第三军由旅顺北上，并在此之前从第三军中抽出了一个师和一个后备师重新组成鸭绿江军，统归满洲军总司令官指挥。在总司令官的指挥下，二十五万大军分头向奉天挺进。三月一日，对三十二万俄军发起总攻，十日占

① 系从日本国内海岸要塞拆运来的、当时为最大口径的要塞炮。——译者注

领奉天。这时，日军的包围战即将成功，但由于兵力和弹药不足，使俄军只遭受了死伤六万、俘虏和失踪三万人的损失，未能达到全歼其主力的目的。日军死伤约七万人。

日军已没有再向前进攻的力量。三月十四日总司令大山向大本营总参谋长山县建议“要使政策与战略一致”时说，敌军弥补其损失甚难，我军于短期内弥补损失亦不可能，“故在我战力恢复之前，切不可妄动大兵”。进而他又说，战力恢复后，“或主动追击敌人，或采取持久战之方针，若不与政策一致，赌几万生命之战争亦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若欲以战略上之成功决定政策上应采取之方针，即不应使军队受无目的之损伤”（《明治军事史》）。战略应根据政策而定，从属于政策，而不应与其相反。确实如此。但大山现在这样讲，实际上无非是在早已无法制定任何战略的情况下，催促尽早谋求讲和而已。

三月二十三日，总参谋长山县有朋也向桂首相、曾祢藏相、小村外相提出了长篇的意见书，期望“确立国家之大政策”。他说，俄国以在国内尚有十几个军团的兵力，退到哈尔滨的俄军得到本国的增援后，东山再起几乎是无可置疑的。对此，日军不能坐视等待，因为俄军会在日军坐待之时集结大军。“我军久守阵地而无所事事，亦将有全军士卒逐渐厌倦之虞”。（实际上，自辽阳战役结束后，日军官兵中就充满了“战争到此结束了”，“总算熬到头了”的情绪。士兵把“进军号”说成是“冥土的钟声”。《机密日俄战史》中说道：“进军旅顺者士气低沉”，“吹嘘士气旺盛并非事实”。）另外，坐等敌军不能取得整个战争的胜利，所以，只有“主动进攻”，但此

乃“甚难之事”，“且夺取哈尔滨，攻克海参崴，仍不能予敌人以致命打击”，既要进攻，就要有进攻莫斯科、彼得堡之雄心。“唯敌国内部日益混乱，上下乖离已至其极，若至无力对外作战之时”，俄方也将谋求讲和，但决不能作为指望（这时，俄国第一次工农革命已经开始）。

“无论坐守阵地抑或主动进攻”，“第一，敌军在国内尚有强大兵力，而我已用尽全部兵力；第二，敌军军官未告乏人，而我军军官自开战以来已大量伤亡，今后亦不易补充。此两点，即或采取守势固守现在之阵地，亦须速觅补充手段，何况采取攻势乎。”

山县又说：打进攻战，“应在奉天至哈尔滨百余里^①间修筑复线铁路，以谋求辘重之充实，随兵站线之延长，不仅须增加守卫部队，而且须急增新兵，与之相伴随之军用器材之补充与增加，皆应速断速行。为实现以上各点，须投入庞大军费。虽国民之负担将会因此而加重，此乃出于万般无奈，亦为诸公应认真考虑者也。”

这样，山县三番五次地举例说明不能再继续战争。同时，又“望诸公确定国家之大策。今后数年内继续战争，尤其应消除参战者后顾之忧”，把全部责任推给政府，“但关于作战计划，吾等成竹在胸”，却在极力虚张声势（《公爵山县有朋传》；《公爵桂太郎传》）。

多么卑怯，又多么不负责任！如果是师长或军司令官还有情可原，作为过去十年间曾是首相、枢密院议长、元老和

^① 一日里约等于三点九公里。——译者注

军队老前辈、把日本拖入这场大战争的责任者，竟借总参谋长的官衔之便，采取似乎政治与军人无关的态度。不是直言不讳地提出战争已经不能继续，应尽早谋求讲和，而是泰然地撒谎说对作战有信心。不过，和后来的日华战争、太平洋战争时的将军、提督们不管吃多少败仗，仍以有胜利的信心欺骗国民比较起来，山县的这种态度，仅就列举了不能继续战争的事实这一点来说，还算是有责任感的。

三月三十日，大本营制定了其后的作战方针，令其主力北上占领哈尔滨，作为支线作战以配合海军占领海参崴，尽快地占领库页岛，如有可能，进而攻下堪察加半岛。但参谋次长长冈外史自白道：“因不能说战争结束，才扬言占领哈尔滨的”（《机密日俄战史》）。其中，只有占领库页岛的作战，作为讲和条件之一割取库页岛是早就拟定的。即作为保证占领，在日本海海战中全歼波罗的海舰队后的七月进行。库页岛上只有四千人左右装备较差的守备军，日军用一个师的兵力轻取之。

内阁接到军方上述应使“政策和战略一致”——实际是请求尽快讲和——的建议后，四月八日召开内阁会议，就“作战和外交步调的一致”进行协议，决定：作战方面，据守日军一直占有的地点，尽最大努力“占据更优势的地点”；外交方面，“只要情况允许，迅速且圆满地恢复和平”。继而，四月二十一日内阁会议研究了讲和条件。

2. 朴次茅斯和约

讲和问题，政府早已做了研究。一九〇四年七月，小村外相向首相提出了预定在八月占领辽阳和旅顺（以为八月中旬能占领旅顺）后与俄国讲和的条件草案。草案的纲领是：（一）“扩大我在满、韩及沿海州方面的利权”；（二）“从现在开始准备”参加将来瓜分清国的竞争；（三）韩国“事实上为我主权范围”，“满洲在某种程度上为我利益范围。”并把具体的讲和条件分别列为“对俄国要求条件”和“对清国要求条件”。

对俄国的要求是：（1）赔偿军费；（2）（3）承认日本把韩国完全殖民地化；（4）俄国从满洲撤军，将其占领地的行政权归还清国；（5）保证纵贯满洲的铁路只专门使用于商业目的；（6）转让哈尔滨至旅顺间的铁路与其支线以及其全部附属权利和财产；（7）转让辽东半岛的租借权；（8）保证在满洲的工商业机会均等；（9）割让库页岛；（10）承认沿海州的渔业权；（11）承认黑龙江的航行自由；（12）把庙街、伯力、海兰泡开为商港，日本向上述三港和海参崴派驻领事。

对清国的要求是：（1）不割让满洲；（2）“保证为维持满洲秩序及安宁尽全部责任”；（3）“为达到第二条规定之目的，保证改善行政、兵制和警察”；（4）承认转让哈尔滨至旅顺间的铁路、支线及附属权利等；（5）鸭绿江至辽阳的铁路和从哈尔滨——旅顺线到吉林的铁路的辅设权；（6）

承认辽东半岛租借地的转让；（7）为列国通商新开放十二个城市（地名略）；（8）辽河、松花江、鸭绿江的航行权；（9）鸭绿江及浑河沿岸的森林采伐权和矿山开采权；（10）盛京省沿岸的渔业自由。

这个草案，在与俄国讲和的同时，不仅向清国要求连俄国也尚未得到的权利，而且在（2）（3）中甚至要求干涉清国对满洲的统治。这就自我暴露出日本在战前、战争期间和战后一直向列强各国声明的，保证列强各国在满洲的工商业机会均等和满洲的领土完整，仅仅是口头上的。小村在此草案中说：战前，我曾提出“将韩国划为我势力范围，在满洲，满足于维持既得之权利即可。因俄国拒绝此稳妥之要求，终于导致战争。基于其结果，帝国之对满政策与昔日相比，理应不得不前进一步。”据此，有人认为日本垄断南满洲的要求不是战前提出来的。但是，在战前对俄外交谈判中，没有要求俄国转让东清铁路的南满洲线和辽东的租借权，是出于力量对比关系而迫不得已。外交谈判失败后，转为用实力争夺，而在胜败心中丝毫无数时，就产生了对清国的要求，这才是蓄意已久的、在可能的情况下垄断南满洲的铁证。明治天皇在屈服于三国干涉不久就对侍臣说过，将来要夺回辽东。如前章所述，在对俄谈判的最后阶段，日本把要求集中在全面统治韩国和维持在满洲的既得权利上，也意味着确保与俄国争夺统治满洲的据点。

政府为实现小村的提案，早就研究了对策，其中最重要的步骤是巩固统治韩国的既成事实。

日军于宣战前在仁川登陆，迅速控制了汉城，使之能阻

止韩国亲俄派的活动以及对韩国皇帝和政府施加压力。开战两周后的二月二十三日，政府就把“日韩议定书”强加给韩国。第一条，“大韩帝国政府相信大日本帝国政府，听从其关于改进设施之忠告。”第二条，日本政府确保韩国皇室“安全康宁”。第三条，日本政府“切实保证韩国之独立及领土完整”（！）第四条，“因第三国入侵或内乱，大韩帝国皇室之安宁或领土完整受到威胁时”，日本政府迅速采取临机必要之措施，韩国政府对日本之行动“充分提供方便”。此外，为达到上述目的，日本可临机征用“军事上必要之地”。日本仅根据以上四条，已经把韩国变成了事实上的保护国。日本立即没收了韩国自己修筑的京义铁路，并且大言不惭地说：“因系基于军事上之需要，无须征得韩国政府之承诺。”

三月，伊藤博文作为天皇特使被派往韩国，威压韩国皇室，试探其反应。根据他的汇报，五月三十日，元老会议决定了对韩方针。次日内阁会议通过，六月十一日由天皇批准。方针以“帝国对韩国在政事及军事上掌握保护之实权，在经济上应日益谋求我利权之发展”为主要内容，具体地规定了派军队驻在韩国（事实上的占领），监督韩国外交和财政，掌握交通、通信机关，获得和开发农林、渔业和矿业的利权等“对韩施政纲领”。监督外交、财政一项，通过八月二十二日的第一次“日韩协约”得以实现。根据“日韩协约”，韩国政府任用一名日本政府推荐的日本人为财政顾问和一名外国人为外交顾问。韩国政府与外国缔结条约，向外国人让渡特权，都必须事先与日本政府协商。外交顾问由外国人担任，是为了博得英美的好感。日本驻美使馆的美国人顾问担任了韩国的

外交顾问。一九〇五年二月，日本人被任命为警务顾问和教育顾问，韩国的警察权和教育权事实上移到日本人手中。继而，四月份接管了邮政、电信和电话事业。另外，在当年一月，第一银行与韩国政府签定了国库款使用合同，第一银行券从七月开始无限制地在韩国通用，该银行成了事实上的韩国中央银行。以此为开端，大仓、三井、浅野等财阀资本相继进入了朝鲜。

在军事方面事实上占领韩国，是随着日俄开战的炮声实现的既成事实。但第一军北进后，一九〇四年三月十一日，大本营编了五个后备大队的韩国驻军，直属大本营指挥，由此产生了军方和公使的权力之争。公使馆武官为“操纵”韩国宫廷和政府，“时常采取超越公使之行动”，驻军司令官也“认为有操纵韩兵、干涉韩国政治之必要，产生了公使、武官和司令官的鼎立，呈现出甚难统一的局面。”其结果，驻军关于“欲以威慑为主操纵当今之韩国，如不赋予军司令官凌驾于公使之上之权限，实行我之政策乃不可能”的主张获胜。八月二十一日，桂首相、小村外相和寿内陆相在大本营举行会议，赋予韩国驻军两大任务：（1）确保日韩议定书第三条规定的韩国的独立和领土完整；（2）对来自大陆方面的敌人的袭击充当帝国国防的枢轴。并决定把驻军扩编为由两个师和若干特种兵组成的一个军，让公使馆武官兼任驻军参谋。配备两个师的计划，虽在此后数年内也未能实现，但暂且扩编为十二个后备大队。九月五日，近卫师长长谷川好道中将晋升为大将，被任命为韩国驻军司令官，由天皇直辖（见《机密日俄战史》；《明治军事史》）。

因此，韩国驻军司令官不仅在官阶和勋位等级上高于公使，而且作为天皇直辖官也凌驾于公使之上，肆无忌惮地介

入了外交。这是极其重大的事件。此后，军方在对朝鲜、满洲政策上，从而在对中国总的政策上，也超越政府采取行动，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根本特征的首例。据说，这样的大事之所以没有遭到政府和外务省的反对，是因为伊藤三月份去韩国，亲眼看到韩国上下反日情绪极其强烈的实际情况才赞成采取这种作法的。

俄国方面，前财政大臣维特等人也于一九〇四年七月就讲和问题想与日本驻伦敦公使林进行接触，但遭到日方拒绝（《日本外交文书》《日俄战争》专集V）。同年十月，在美国的特使金子坚太郎在写给首相的报告中说：“如职多次呈报”，罗斯福总统愿为日俄两国政府出面调停，协助讲和。然而时机尚不成熟。旅顺陷落后，德国、法国、美国政府一致对日俄尽快讲和表示出积极态度。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以沙皇制度为其反动支柱，在欧洲得到了巨大的利益；就在此时，俄国的工农革命运动风起云涌，蓬勃发展起来，正如指导这一斗争的列宁所说，唯恐旅顺的失守揭开沙皇主义向俄国人民投降的序幕，所以，他们希望沙皇政府在对日战争中尚未遭到沉重打击之前尽早讲和。

一贯公开地或背地里支援俄国对日开战的德国皇帝，尤为热心地推动罗斯福总统帮助日俄讲和。俄国的同盟国法国，一开始就不赞成俄国和日本开战。法国因为与其头号敌人德国之间的对立日益尖锐，担心俄国把过多的力量投入东方会正中德国下怀，从而削弱俄国对德国的牵制力量。因此，旅顺陷落后，法国渴望俄国尽早地、以尽可能有利的条件与日本讲和。据美国的外交史家记述，美国总统罗斯福很相信

德国驻美国大使斯特伦堡，胜似密友。有被斯特伦堡欺骗而受德国皇帝摆布之嫌。^① 并且，作为他自己，认为日俄双方都不能在远东占绝对优势，这样对峙下去，可阻止任何一方独占满洲，正符合美国的愿望，希望日本被牵制在北方，使之无法实现对菲律宾的野心。他从这一立场出发，一直偏袒日本。但当他看到俄国形势恶化之快，远远超出他的预料时，便断定：出面调停的时机已经到来。

一九〇五年一月十四日，罗斯福对日本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说，我接到德国皇帝的来信，主要内容是：日俄战争结束之时，德国不要求在清国获得新的领土，也反对其他中立国提出新的领土要求，不过，两交战国也许希望本国获得领土。对此，高平提出了各种问题，从而了解了罗斯福的想法：即使日本主张占有旅顺，德国仍然不会提出新的领土要求，若日本占领南满洲，俄国也许要占领哈尔滨和其他地方，但这要看战争的进展如何。罗斯福又说：“余信日本有占有旅顺之权利，而且亦有将韩国置于日本势力范围之权利。关于满洲，应将其归还清国，使之成为各国保护下之中立地带。余已将此意见函告英、法、意三国。”

日本政府欢迎罗斯福的斡旋，但对满洲中立论感到意外。二十二日，小村外相向高平公使发出天皇批准的电令，指示高平向总统表明以下态度：第一、日本“把韩国完全划入势力范围”；第二、日本明确声明，在满洲采取机会均等主义，日俄两国均应有将满洲归还清国的精神准备，但“帝国以确

^① A. W. 格利斯沃德 (Griswold) 著、柴田贤一译：《美国远东政策史》(1939年)。译文错误甚多。

保稳定秩序、确保为足以适当保护生命财产而进行改革并施善政为条件，只要情况允许，即迅速将满洲归还清国。此方法较之不问其方法如何将满洲之行政置于国际中立主义之下，更为得当且有效。帝国政府对此坚信不移。”第三、继承辽东半岛的俄国租借地和附带的各项权利；第四、日本不能满足于不是确保永久和平的条件。

很显然，这四条和去年七月小村起草的讲和条件案同出一个模式。第二条中说的以保障清国的改革和善政为条件把满洲归还清国，正是去年七月案的对清国要求的第二、三条的变种。当然和满洲的行政应由清国自理这一前段的表白是矛盾的。二十四日，高平把这四条转告总统。总统说，因德国大使提议在俄国保护之下让满洲中立，作为对案，他才提出了国际中立化案。他认为：“不能以武力将俄国驱逐出满洲之时，国际中立主义实为驱逐俄国之捷径。”德国大使的提案云云是否事实，无从知晓。总之，罗斯福是不想放弃他的满洲国际中立化论。因为若是国际中立化，资本丰富的美国就能大举进入满洲。由此，围绕满洲问题，已经出现了日美对立的萌芽（《日本外交文书》《日俄战争》专集V）。

这时，俄国革命以一月二十二日的“流血的星期天”为转折点，以暴风骤雨之势迅猛发展，工人的罢工斗争，从经济要求转为推翻沙皇制度的政治斗争。在农村，农民到处烧毁地主庄园。三月，俄军在奉天大败，使沙皇威风一落千丈。五月二十七、二十八日，日本联合舰队在対马海峡全歼了去年十月从里巴雅港起锚，远绕南非的好望角，经过七个月的航行疲惫不堪，士气极为低落，好不容易驶入対马海峡的

波罗的海舰队。

日本海军击沉波罗的海舰队三十七艘舰艇中的十九艘，其中战舰六艘；俘获战舰两艘，其他舰艇三艘；两艘在溃逃中沉没或触礁，逃回海参崴港的只有一艘巡洋舰、两艘驱逐舰和一艘运输船。其余的逃进中立港，被解除武装。日本只损失了三艘水雷艇。驶往海参崴的俄国舰队是通过対马海峡，还是绕过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取路津轻海峡，还是继续北上经过宗谷海峡，预料中的这三条航线究竟走哪一条？为得出正确的判断，日本海军绞尽了脑汁。这时，联合舰队参谋长岛村速水和司令长官东乡没有采取分路迎击这一不彻底的打法，而是断定它一定取路对马海峡，并果断地把舰队的全部力量集结于此，取得了圆满的成功。另外，日本舰队都是新式舰艇，具有舰队的统一性，机动能力也比俄国舰队强，并利用其长处，采取敌前转弯的大胆打法，占据有利位置，首先击中指挥舰和二号舰，燃起大火，使敌人陷入混乱，从而决定了战局。

日本海海战的胜利，作为海战是世界战史上史无前例的伟大胜利。但从整个日俄战争的战略上看，对日本来说，虽然具有决定性的重大意义，却没有给俄国在满洲的作战力量以沉重的、直接的打击。如果日本在这次海战中失败的话，满洲的日军就会进退维谷，最后必然大败。然而，满洲的俄军即使没有玄界滩和日本海、黄海的制海权也无关紧要，因为当时俄国如有在满洲血战到底的决心，最后打败连山县总参谋长也不得不承认已深陷困境的日本陆军，是完全有可能的。

可是，那时俄国国内出现了“上下极度乖离，已不堪外战”的局面。山县口头上虽说不能指望，暗中却一直期待着的局面真的出现了。正值日本海海战时，俄国国内主要城市的工人举行了总罢工，其保卫罢工委员会开始转化为权力机关——“苏维埃”（评议会）。六月，黑海舰队的战舰“波将金”号的水兵起义，夺取了该舰。这样，革命以该年末的莫斯科暴动为先导，迅速走向了在全国各地举行武装暴动的道路。奉天战役之后，俄国统治阶级内部，维特等讲和派的势力增大，事已至此，沙皇也不得不考虑讲和了。

日本政府也趁机想搞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讲和，就加强了同罗斯福总统的联系。在此期间，象前边提过那样，在日本海海战前的四月二十一日，政府就秘密地内定了讲和条件：（1）韩国完全由日本自行处理；（2）俄军撤出满洲，日本也同时撤出；（3）得到辽东半岛的租借权和东清铁路南满洲线。以上作为“必不可少的条件”。（1）赔偿军费；（2）接收逃到中立港的俄国军舰；（3）割让库页岛；（4）获得沿海各州渔业权。以上作为在“尽可能的情况”下大力争取的条件。当时，日本“因不能置俄国于死地”，也考虑到实现要求将“异常困难”。连日本海海战的重大胜利都“不能置俄国于死地”，所以，日本的要求并没有发生变化。

由于罗斯福从中协助，七月中旬，在美国的朴次茅斯举行了日俄讲和会议，日俄双方分别由小村寿太郎和维特担任首席全权代表。如上所述，日本在此之前占领了库页岛，同时根据英国的提议，于五月中旬开始了修改日英同盟条约的谈判。英国建议把日英同盟条约的适用范围扩大到印度，并

把现行条约中缔约国一方与他国交战，只有在第三国协助其敌国参战时，缔约国的另一方才可参战一条，改为缔约国一方遭到他国非法进攻时，缔约国的另一方立即参战支援。日本在熟虑后，认为此建议在对付俄国的报复上有利，并抱着让英国在条约中承认日本全面统治韩国的目的，同意与英谈判。经过反复交涉，八月十二日两国全权代表在伦敦签定了为期十年的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

新条约在序文中规定，本条约的目的是：（1）确保东亚及印度地区的和平；（2）确保清帝国的独立、领土完整和各国在清国的工商业机会均等；（3）维护两国在东亚和印度的领土权和特殊利益。为实现以上目的，第一条，两国在序文中规定的权益受到威胁时，互相通告，共同保卫其权益。第二条，两国的一方在“没有挑衅”的情况下遭到一国或数国的侵犯，或为保卫序文中规定的权益而与他国交战时，另一方应即刻援助，共同战斗，讲和亦须双方同意。第三条，英国承认日本“在韩国拥有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的特殊利益”，为维护和扩大该利益，可对“韩国进行指导、监理和采取保护措施”。第四条，日本承认英国“关于与印度国境安全有关的全部事项的特殊利益”，并承认英国为保卫印度领地，在国境附近采取的一切必要措施。本条约丝毫没有涉及第一次条约中的日英两国在清国的“特殊利益”，好象日本的帝国主义政策后退了一步似的。这是因为序文中的第二项所说的保卫清国的领土完整和各国的机会均等主义，正意味着不许俄国再次侵略满洲，日本寄希望于第一次同盟条约的目的，在新条约中已得到实现的缘故。总之，新条约是以俄国为主要敌

人的日英在东亚的帝国主义势力范围协定和攻守同盟。

此条约正在谈判中的七月二十九日，桂首相和正在访日的美国陆军部长塔夫脱交换了秘密备忘录。桂首相在备忘录中，第一，用“最强硬的措辞”同意由“美国这样的强大且对日友好的国家统治”菲律宾，表明日本对菲律宾丝毫没有进攻的意图。第二，桂首相强调，维护整个远东地区的和平，是日本的国际政策的基本原则，达到其目的的唯一手段是日、英、美三国政府间的良好谅解。第三，关于朝鲜问题，桂首相强调，为事先排除朝鲜倒退到日俄战争前的状态、迫使日本不得不再度发动战争的可能性，日本认为采取某种决定性的行动是绝对必要的。对此，塔夫脱部长完全同意桂首相的意见，并阐述了他的个人意见：日本军队在朝鲜确立保护权，使朝鲜不经日本同意不得同外国缔结条约，是这场战争（日俄战争）的必然结果，它将直接对远东的永久和平做出贡献。塔夫脱部长还说，据他估计，罗斯福总统也会同意他的意见，但作为部长没有作出任何保证的权限。^①

这样，日本政府完成了与美国、英国瓜分东亚的帝国主义协定，统治朝鲜得到了两国的承认，在此基础上，出席了朴次茅斯会议。会上，俄国全权代表也同意日本对韩国“采取指导、保护和监理措施”，并同意在清国承认的基础上，把旅顺、大连地区的租借权及与其有关的一切权利，东清铁路南满线和其支线，以及其一切附属权利、财产等转让给日本；从满洲撤兵，把行政权归还清国；俄国保证满洲的领土完整、

^① 这部分资料的日文版据说在外务省烧失。本文是我根据《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中美国国务院文件的大意译的。

机会均等；其他日本政府内定的“绝对条件”，俄方也全部同意。讲和会议的最大难题是赔款和割让库页岛问题。俄国不同意以任何名义赔款一元，固有领土一寸不让，谈判接近破裂。最后由罗斯福出面调停，俄国将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割让给日本，日本放弃了赔款要求。于是，问题全部解决。九月五日，小村和维特在讲和条约上签了字。

3. 日俄战争的性质

小村全权代表和政府、大本营深深知道，日本不是在战争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只是勉强保持着优势，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优势将会丧失。所以，一开始他们就认识到，讲和谈判时要求赔款和割让领土极其困难，并没把它们作为“绝对条件”。会议因赔款问题陷入僵局时，满洲军总参谋长儿玉甚至说：“桂这个笨蛋，还要求赔款！”在儿玉等人看来，绝对条件全部得到满足，又签定了得到库页岛南半部的朴次茅斯条约是个大成功。

但是，因为政府从来不向国民大众以及政党和资本家们公开战争的实际情况，隐瞒日本的损失，只宣传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一个又一个的伟大胜利，使人们抱着讲和时可得到大量赔款，得到库页岛甚至整个西伯利亚领土的幻想而忍受了战争的一切痛苦和牺牲，所以，现实的朴次茅斯条约一公开，就激起了国民的愤怒，条约的批准不得不在首都东京的威严状态中进行。

实际上，日俄战争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痛苦。单是人命损失也是空前的。动员士兵约一百零九万人，其中战死四万三千一百一十九人，病死六万三千六百零一人，共死亡十万六千七百二十人，负伤者十七万人以上，除病死者外，患病者（主要患脚气）十四万人以上。这些全包括在内，总计四十一万人以上，即占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有余。伤亡比例之高，数量之大，实在是惊人的。

这一数字是日本士兵冒着枪林弹雨向前冲锋的忠勇无双、坚韧无比的战意的表现呢；还是象攻打旅顺时的第三军司令部那样，自己在安全的后方，只是把士兵驱赶到战场上送死的指挥官的非人性和无条件地服从指挥的奴隶性军纪的结果呢？

我看事实的真相是后者。奉天战役之后，满洲军总司令部对战果进行了总评。总评中说：“后备旅全然无用”，“总之，较之过去诸会战，部队运动迟缓，系因补充兵过多之故”（《机密日俄战史》）。后备旅“全然无用”，补充兵“运动迟缓”，是因为这些士兵尚未与一般的社会生活太隔绝，仍具有作为社会成员的健全性，理性还没有被奴隶性军纪完全麻痹掉。军官中，突然被从社会生活中召集来任职的比现役军官还多。所以，不能以职业军人的冷酷无情驱使士兵。如果日本国民、从而士兵坚信这次战争是为国家、为自己的正义战争，具有自发的、顽强的战意的话，无论是缺乏训练的后备旅还是补充兵，都会英勇作战。正因为士兵没有自发性，所以只有经过绝对无条件地立刻服从上级命令的长期训练，麻痹士兵的理性，使士兵成为奴隶性“军纪”的驯服工具，才能把他们驱

赶到战场上去冲锋再冲锋。此外，国民之所以热衷于战争，是因为他们丝毫不知道战局的真相，被节节胜利的宣传冲昏了头脑，从而被人操纵。前面讲过的“名古屋丸”事件和称舰队司令官上村为“俄探”时表现出来的那种轻浮的反面，就是只热狂于表面上的大胜利的夸张报导，而丝毫不存在自觉的、顽强的战意。

年富力强的男子被迫从军，只不过是作为消耗品去送死。他们留下的家，被重税和强制公债榨取得分文皆无。农家的牛马也被征用，最后连大板车都被拉走了。称作战时非常特别税的增税，从土地税到营业税、所得税、酒税、啤酒税、食糖消费税及其他原有的税，一律增征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二百。同时又增设了继承税、纺织品消费税、通行税和其他新税。因此，国家的租税收入总额，由战前一九〇三年的一亿四千六百一十六万元，增加到开战第一年一九〇四年的一亿九千四百三十六万元，第二年又猛增到二亿五千一百二十七万元。增税苛刻到连不满一石的家用酱油也要征税。家用酱油税总额，战前仅为二万四千二百零六元，非常特别税法实施后，一下子猛增了近三十六倍，达到八十六万元。盐也实行专卖，人民生存必不可少的盐和酱油也必须最大限度地节约。

与此相反，不但没设战时盈利税，反而把战时公债的利息的所得税给豁免了。同时，在第二十一届议会（一九〇四年十一月三十日——一九〇五年二月二十七日）上揭露出政府和勾结政客的商人在以三百八十五万元巨款建造的北海道上川的第七师兵营问题上合谋舞弊：勾结政客的商人大仓组

所承包的此项工程非常粗糙，工程费却比同种建筑高百分之三十到五十，而且政府在竣工之前就支付了全部费用。议会只指出此项支出不当，根本没有追究政府的责任。此外，本届议会上还提及了政府为救济大阪第一三〇银行，一九〇四年四月出面担保让日本银行向该行贷款一百万元（利息仅二厘），七月又为同一目的紧急支出六百万元一事。对此，政府辩解说，此项措施并非为保护该银行，而是为了保护八百万元的存款户。不言而喻，其存款户不是一般的民众，而是资本家、地主和官僚。对此，议会还是决定，鉴于“目前之时局”，既往不咎。

浸透着国民的血汗和泪水的苛捐杂税，就这样填满了以“目前之时局”为良机，公开进行贪污活动的政商、资本家和官僚们的私囊。例如，纺织联合会所属各社的纯利合计，一九〇三年下半年为一百八十七万元，一九〇四年下半年增加到二百八十六万元。据国有及私营铁路总括营业成绩累计年表统计，一九〇三年的盈利额为二千九百三十一万元，一九〇五年增加到三千六百八十八万元。平均每英里的营业盈利也由六千七百二十七元增加到七千八百零九元。同时期内，全国银行的公积金由八千六百六十九万元增加到一亿零十六万元；纯利由五千四百八十二万元增加到六千六百八十九万元（《明治大正国势总览》）。海运会社利润也很高，无须对各行业逐一阐述。到临时军费财政截止时的一九〇七年，他们的赚头每年以几何级数增加。大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大发横财。相反，被征收纺织品消费税的纺织品制造工业、家庭工业的批发商以及经营直接与民众消费有关的物资生产和流通

的小资本家、小商业者们，却随着民众的贫困陷入了极度不景气的窘境。

对政商的贪污行动采取宽容态度的议会，当《二六新报》批判将公债强加于一般民众过于苛刻时，便称该报社社长秋山定辅议员为“俄探”，并设立了调查委员会，但没有查出充当俄探的证据。最后，以鉴于时局，不适于担任议员为理由，令其辞职。国会议员都受到如此对待，镇压社会主义者的言论的程度就更可想而知了。周刊《平民新闻》因在一九〇四年三月第十二期上发表了幸德的社论《呜呼增税》，被认为违反出版法，第一审判决名义发行人堺利彦监禁三个月，报纸停刊。第二审时总算批准复刊，但其后相继被禁止发售，名义人被起诉。一九〇五年一月末，发行到第六十四期时终于被迫停刊。

就在这种镇压之下，社会主义者们还在《平民新闻》第十八期上发表了《致俄国社会党书》。片山潜在阿姆斯特丹的万国社会党（第二国际）大会上，与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握手，表示两国人民要团结起来，共同反对日俄两国政府和统治阶级的帝国主义战争。他们高举反战、和平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坚持斗争，成为日本近代史上的骄傲。平民社成员在《平民新闻》被迫停刊后，又创刊了杂志《直言》，坚持反战和反专制的斗争。

积极主张反战的社会主义者为数不多，《平民新闻》的发行量最大时才只有三千份。但国民中间，在表面的沙文主义狂热的背后，广泛存在着厌战情绪。例如，一九〇四年九月，与谢野晶子发表了“叹旅顺围攻军之弟”的激昂的厌战诗《君

勿死》，被军国主义者视为国贼，这反而成为一种宣传，使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了全国。在她的影响下，第二年一月号的《太阳》杂志——当时最大的鼓吹帝国主义的杂志——也发表了大冢楠绪子的厌战诗《虔诚祷告》。

为了消除厌战情绪，把冷却了的国民的战意煽动起来，使之忍受战争的一切悲惨和痛苦，一味隐瞒战局的失利，只宣传大胜利和战争胜利后的大利益的幻想。所以，当国民发现讲和条约这一无可争辩的现实时，对政府感到气愤是理所当然的。在野党的政治家和国权主义评论家，报刊和杂志的记者们，企图把国民的愤怒变为反对讲和条约、继续战争的呼声。尽管产业资本家在战争中大发横财，但对不能得到赔款也感到气愤。社会主义者以外的大多数进步人士，把反对讲和条约作为攻击官僚政府的最大武器。

对此，政府为说服人们应该满足于这个条约，无论如何也不能公开战局的真相。军方当然更是一言不发。一味地向国民夸大的“赫赫功勋”和朴次茅斯条约越来越矛盾。因此，政府和桂首相的御用宣传工具、德富苏峰的《国民新闻》等越对条约进行辩护，国民对政府越不信任。虽然军国主义者试图引导国民反对条约，继续战争，但是民众仍然把攻击的矛头对准政府。九月二日，桂在致山县有朋的信中说：“连车夫、马夫”等“下层人民”都动摇了。他们“把政事和社会混为一谈”，是最应该警惕的。必须把讲和问题拉回到“政治问题”上来。“把政事和社会混为一谈”，指的是人民不是把讲和问题单纯看作所谓政治家的问题，而是把它看作人民的整个社会的问题。对政府的攻击是带有阶级性的。桂所说的就是把

它尽快地拉回到只是政治家、政界的问题上来。

但是，桂的努力是徒劳的。日俄全权代表在朴次茅斯签署条约的当天，条约反对派的在野党议员和黑龙会一派，在东京的日比谷公园召开了反对讲和的国民大会，三、五万民众拥入会场。警察前去阻拦，参加者推开警察进入会场。大会很快就结束了，但群众久久不愿离去，警察队想用暴力强行驱散，致使群众对警察和政府的由来已久的憎恨爆发了。数万名群众冲出公园，首先捣毁了内务大臣的官邸，袭击了《国民新闻》社。它成为和鼓动家们反对讲和的运动毫不相关的群众的反权力暴动。国民大会的委员们为逃避群众的袭击，有的被警察保护起来，有的躲藏起来。此后，群众分成几路，又有新赶到的大批群众加入各路队伍，分别捣毁、烧毁了全东京市的警察署、分署和派出所，把市内的警察机关大部分捣毁后，群众又拥向各郡，袭击了一夜警察机关。有一路群众也袭击了警视厅，但受到了大队武装警察的阻拦。

六月，东京下令戒严，发布了取缔报刊、杂志的紧急敕令，出动了近卫师镇压群众。当天傍晚，群众自发地集合在日比谷公园，烧毁通行的电车，再次袭击内相官邸，烧毁了尚未烧掉的市内和近郊的警察机关。据《东京经济杂志》（九月二十三日版）调查，东京的十五个警察署和分署中有十三个被烧毁，另外有一百四十一个派出所被烧毁，二十八个被破坏。群众有九人死亡，八百人受伤。

烧毁整个首都的警察机关，震动了全国人民。京都、神户、大阪、横滨、名古屋以及全国各地纷纷召开反对讲和、弹劾内阁的国民大会和县民大会，有的地方还出现了街头示

威。其宣传和组织的中心，多半为地方报纸。它们论调的重点是弹劾内阁，其次是反对讲和。有的要求追究内阁的责任。九月中被停刊的报纸，包括同一报纸被停刊两次以上者，共达三十三家之多。^①

社会主义者的杂志《直言》把这次暴动和当时的俄国革命相比较，评价说：“俄国革命是统一的、自觉的，而这次行动是非统一的、非自觉的。然而，在实质上，这次行动与俄国革命确有共同之处。应该说，日本人民在无意中培养着革命的意识。”还赞扬了“多数”的力量伟大。最初被国家主义者、军国主义者煽动起来的民众，转眼间超出了鼓动者的意图，展开了民众独自的反权力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直言》的评价是正确的。日本的劳动人民为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走向街头，用自己的力量去斗争，这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

东京的戒严令持续到十一月二十八日，二十九日解除，但批准交换朴次茅斯条约是十一月二十五日。或许是为了保证条约交换不出问题，戒严令才持续了这么长时间。可以说是日本帝国主义出生的国际登记证的朴次茅斯条约，从签字到批准都必须在统治阶级对日本人民发布戒严令的保护下进行，真是帝国主义式的。接着，这个条约保证的日本对朝鲜殖民地化，租借旅顺、大连和继承东清铁路南满洲线，接收库页岛南半部等项迅速得到实现。小村外相预定的在日俄讲和的同时对清国提出的各项要求，也在军事压力下得以实现（后述）。

^① 据东洋经济新报社《索引政治经济大年表》。

这样，日本牺牲朝鲜和中国同俄国交易，日本独占朝鲜，把满洲分别划入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而且，这种交易与两个帝国主义交易——桂·塔夫脱协定承认美国对菲律宾的统治权；第二次日英同盟条约确保英国统治印度，并承认英国为此目的在印度国境自由行动——相结合，达成了日、俄、英、美瓜分东亚和中国的协定。

在这一事实面前，怎么能说日俄战争是将亚洲从欧美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圣战呢？只能说日俄战争是日本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即在金融方面依靠英美而进行的近代帝国主义战争。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这一结论，并非是单凭战争的结果得出来的。日本发动战争的目的，无论是从其本质上在于获得资本主义殖民地或者势力范围来看；还是从自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政治过程中，日本的资产阶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来看，这次战争本质上都是近代帝国主义战争。从俄国来看也是如此。

在战争前的日俄关系中，只是俄国单方面采取攻势。日本在对俄关系中经常处于被动的事实，丝毫也不能成为日本是爱和平的、是自卫的或非侵略性的论据。因为，新兴的帝国主义弱国日本，在与老牌帝国主义强国俄国的外交谈判中，不论怎样处于被动，两国所争的对象也始终是围绕在朝鲜和满洲的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利害关系上进行的这一根本事实是丝毫改变不了的。在强大的俄国面前处于被动，但对弱小的朝鲜却实行高压。因为高压竟然达到屠杀王妃的程度，才使朝鲜倒向了俄国方面。也就是说，俄国侵入朝鲜，是日本为其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机会。

在这次战争中，日俄各自奉行自己固有的侵略主义：日本是绝对主义天皇制；俄国是绝对主义沙皇制。从其沿革来说，绝对主义的侵略主义走在前面。一方面，世界史进入近代帝国主义阶段；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在日本和俄国都发展起来，在半封建经济制度——中心是地主制——还广泛而有力地残存在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中时，资本主义已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在帝国主义的世界性规律制约下，在本国的资本主义要求的推动下，尚未进入垄断资本主义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不仅要输出商品，而且要输出资本，垄断铁路、矿山等利权，要确立势力范围，与列强帝国主义、尤其与俄国抗衡。在镇压被侵略的朝鲜和中国的民族抵抗运动（如镇压义和团）时，则与列强共同行动，或彼此承认为镇压民族抵抗运动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如日俄关于朝鲜问题的协定），成为近代帝国主义的世界体系的一个积极的组成部分，并与先行的天皇制的侵略主义一脉相承，大大地增加了其侵略性。一九一六年，列宁曾经指出：“日俄两国拥有军事上的垄断权，他们占有极广大的领土和掠夺异族人民如中国人等等的极便利的地位，这就部分地补充和代替了现代最新财政资本的垄断。”^①这一英明论断（《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分裂》），也适用于二十世纪初的俄国和日本。

资本力量明显不足，其补充方法，俄国主要靠法国金融资本的援助，日本主要靠英国、美国金融资本的援助（金融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23卷第114页。

上从属于援助国)。而且掌握两国国家权利的都是绝对主义,而不是资产阶级。其权力又成为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政策的推行者。所以,日俄外交谈判时,以国家威信和安全为名对绝对主义冒险主义的维护,比计较资产阶级经济利害更引人注目。谈判时争论的焦点,客观上只不过是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的利害关系。这样,成为帝国主义世界的一份子的国家,即使权力仍然掌握在绝对主义手中,资本主义尚未发展到垄断阶段,也只有称其为帝国主义。一九〇〇年出兵镇压义和团,日英同盟,日俄战争,是形成这种日本帝国主义的里程碑。

有人企图引用列宁的论述,来强调和维护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进步”作用。关于日俄战争,列宁在论文《旅顺口的陷落》中说:“进步的、先进的亚洲给予落后反动的欧洲以无法补救的打击”。^①法国的盖得和英国的海德门这两个“革命的国际社会民主党的代表”“直率地表示他们同情击溃俄国专制制度的日本”,^②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确地指出了日本在这次战争中的“在历史上所起的进步作用”。^③但列宁在此文中是从旨在打倒欧洲的反动支柱沙皇制度这一革命家的实践的观点出发做出的政治评价,认为日本在击溃沙皇制度方面起了进步作用。他在此文中既明确指出“盖得和海德门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④又反复强调无产阶级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一切战争。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击溃了沙皇制度,在促进俄国革命方面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30页。

②③④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34页。

对打破白种人帝国主义灌输的亚洲的有色人种绝对不如白种人的迷信，也做出了一定的贡献。这就是其进步作用之所在。但并不是说日本帝国主义本身是进步的，更不是把日本帝国主义合法化和袒护日本帝国主义。这一点，如果站在朝鲜人和中国人的立场上看就清楚了。不，就是从日本人民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清二楚的。在俄国即将爆发打倒沙皇制度的革命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把出于推动革命的实践观点所做出的政治评价同其历史时期割裂开来，同当时的革命目标割裂开来，将其全面化，一般化，普遍化，当作历史的评价，在方法上是根本错误的。现代日本的历史学家要想从列宁的上述论断中学习历史学评价的话，我认为，列宁关于“并没有袒护日本资产阶级和日本帝国主义”，以及同一论文中的“这场殖民战争，它已变成新旧资产阶级世界的战争”^①的观点，才是应该学习的。

^①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8卷第35页。

第七章

殖民帝国的形成与 民族运动以及同列强的对立

1. 合并朝鲜、形成殖民帝国

在朴次茅斯和约上签字的全权代表小村于十月十六日一回国，政府便在当月二十七日决定了以下方针：名符其实地变韩国为日本的保护国，使清国承认日本在朴次茅斯条约里获得的在南满洲的权利，进一步在清国培植新的势力。

根据这一决定，特派全权大使伊藤博文于十一月到达汉城，同月十七日强迫韩国皇帝签订了第二次协约，即保护韩国条约。当时，伊藤一面派驻韩军队监视王宫和韩国大臣，一面竟威胁皇帝：日本的保护韩国草案已经是“毫无通融余地之确定方案”，陛下“可承认或拒绝该条约，但如若拒绝，帝国政府亦有所决心，其结果将不堪设想，而贵国政府将处于比缔结条约更为困难之处境，并须承担更为不利之后果。”

就这样，日本按照强行签订的《日韩条约》“监管”起韩国的外交及所有事务，一名代表日本政府的“统监”在汉城专门管理外交事务。条约上面关于统监的任务只限于管理外交

的写法，不过是为了“照顾韩国的面子”而已。在同年十二月日本政府公布的统监府官制里规定，统监直辖于天皇，不仅监督韩国的外交，而且第四条又规定“统监认为必要时，亦可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使用武力，以维持韩国秩序”。这就充分暴露出军事控制韩国的企图。第六条还规定：统监有权监督韩国政府雇用的日本官吏及其他人，还可以指挥在韩国政府内任职的财政、警察和教育等方面的“顾问”，统监府里还设置了有关韩国的财政、产业和警察等内政部门。就是说，统监实际上已经把韩国的全部内政、外交都置于日本的军事力量的威压之下了。

一九〇六年三月，伊藤作为第一任统监驻在韩国。当时出现与统监府官制第四条里统监行使军事权力有关的不同意见，认为伊藤身为文官而有权命令军队司令是侵犯统帅权的独立。主要反对派是参谋本部各部长及第一部员田中义一中校等人。据田中传记（高仓彻一著《田中义一传记》上卷）记载，海军也站在反对派一边，总参谋长山县代表反对派意见同伊藤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由于伊藤说，没有指挥军队的权力就不成其为统监，元帅大山岩和陆相寺内正毅出面调停，并把伊藤的要求拿到参谋本部讨论。一月十六日，天皇向陆军大臣和总参谋长下达了命令：“朕熟虑韩国之现状，……应予韩国统监以命令韩国守备军司令官使用兵力之权力。是以卿等勿负朕望，勿使国防用兵计划与上述兵力使用彼此妨碍”（《明治军事史》下卷）。即用天皇大权压制了陆军的主张。

日本和韩国政府都对朝鲜人严密封锁了签订保护条约一

事。但是人民已经觉察到此事，签字的当天晚上，就有人企图烧毁教育部大臣李完用的官邸，因为他第一个赞成这个卖国条约。侍从武官长闵泳焕等十名高官贵族以自杀来抗议条约的签订。韩国皇帝向这些人赠送加封勉忠的谥号，赐予葬礼用费和祭品，用以表示对日本的反抗。同年十一月，韩国宫内的美国宫廷教师哈尔巴特以韩国使者的身分求见美国国务卿鲁特，控诉日本的高压政策，并传说韩国皇帝于一九〇六年一月亲笔写信给俄国、德国、美国和法国元首，请求召开国际会议，帮助保护韩国的独立。然而，美、俄都已经承认日本保护韩国，德、法政府也丝毫无意支持韩国而同日本及英、美、俄对抗。

不久，保护条约便在朝鲜人中间传开。伊藤赴汉城上任之前的一九〇六年二月，忠清南道的儒生闵宗植，联合各地同志举行武装起义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些“义兵”深受人民拥护，并于五月占领了洪洲城。伊藤统监命令驻韩日军司令进行镇压，与此同时该道的崔益铉又同全罗北道的朴炳瓚等联合组织义兵。这些义兵虽然遭到镇压，朝鲜各地的儒生和人民的反日斗争却日益扩大起来。朝鲜人民唾骂李完用和另外四名赞成保护条约的大臣——内务大臣李址熔、军部大臣李根泽、法部大臣李夏荣、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是“乙巳五贼”（乙巳是该年的干支），深恶痛绝直到今天。

韩国皇帝及贵族们不依靠这些爱国人民，仍然幻想依赖俄国和英国政府，并于一九〇七年六月派密使前往在荷兰首都海牙召开的万国政府和平会议，要求大会干涉日本压迫韩国的问题。可是，俄国、美国和英国都闭门不见这位韩国密

使。

这一事件成为日本在法律上公开掌握韩国的内政全权和迫使皇帝让位的借口。伊藤统监遵照政府和元老的统一方针继续威胁皇帝，于七月十八日最后迫使皇帝宣布让位。汉城的人民群众连夜举行反日游行和集会，但手无寸铁的群众被日本警察和军队驱散。日军声称皇帝“同意”镇压“暴徒”，于十九日占领了王宫，在汉城市内布置了六门野炮及步兵部队，并且控制了韩国的弹药库。七月二十四日，日本在这种赤裸裸的军事占领下，强迫韩国接受了第三次日韩条约：统监拥有“指导”内政的权力，韩国制定法令和行政上的重要处理，事先须经统监认可，任免高级官员也要得到统监的同意。

该条约秘密商定自八月一日起解散韩国军队。当时，日本政府认为驻韩军队（当时是一个师）的兵力尚不足以镇压可能出现的反抗，便于七月二十四日向韩国增派一个旅，该旅于月末到达了韩国。

八月一日，按照原定计划举行了解散汉城的韩国军队的仪式。与此同时，韩国士兵开始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起义——义兵斗争，这场斗争迅速遍及整个朝鲜。“倭屡派精兵赶至，皆因不明地形而进退失利。义兵士气旺盛，锐不可当，妇女搬石运木，老弱箠食壶浆。义兵千里连环据险出没，故倭寇屡败。”^①正如朝鲜爱国者所写的那样，义兵已发展成全体人民的斗争，其中涌现出洪范图和车道善等猎户、农民出身的领袖（《日韩并合小史》，渡部学编《朝鲜近代史》）。

^① 引自黄珉《梅泉野录》和渡部学编《朝鲜近代史》。

日本于十月新增派一个骑兵团，翌年五月又增派了两个步兵团。另外修改了一九〇七年十月制定的驻韩宪兵条例，以少将为司令，把兵力从以前的八百人增加到两千人。即把事件发生前的一个师和后增派的一个步兵旅、两个团和一个骑兵团加在一起，兵力相当于通常的两个师。动用了这些兵力和两千名宪兵以及完全掌握在日本手里的日籍韩国警察，用了两年多的时间才把义兵斗争暂时镇压下去。据《朝鲜暴徒讨伐志》记载：自一九〇六年三月反对保护条约的义兵斗争开展以来至一九〇八年六月止，日本讨伐队阵亡一百三十六人；负伤二百七十七人，讨伐期间病死者亦为数不少，一般日本居民被杀害的达讨伐队阵亡者的数倍。这项记载大大降低了日军的死亡数字。另有朝鲜人的记载：“倭军于原州第一役死亡二百余人，第二役死亡四百余人，死于忠州四百余人。”^①关于义兵方面的伤亡统计，据上述日本方面的记载：“有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九人死亡，三千七百零六人负伤，俘虏两千一百三十九人，并且有大批暴徒被逮捕或自首投降”，“一般朝鲜人之伤亡数字无据可查，但其多于日人数倍则固不待言。”这份历史资料虽然声称一般朝鲜人的伤亡系由“暴徒”所造成，但是朝鲜人民不会在同日本帝国主义斗争的同时伤害自己的同胞，所以上述记载恰好说明了日军及宪兵、警察是怎样屠杀无辜的朝鲜人的。

伊藤统监靠这种血腥政策，基本上使韩国化为殖民地后，便于一九〇九年六月辞职，由副统监曾弥荒助升任为统监。在

^① 引自《梅泉野录》，《朝鲜近代史》。

此之前，桂首相（第二次内阁）和小林外相之间曾于三月底商定伺机并吞韩国，名副其实地消灭该国的方针和具体计划，并与四月十日到达东京的伊藤进行协商，得到了他的同意。伊藤原对合并并不积极，他认为使“保护”彻底化，事实上纳入日本版图即可，后因了解到国内的政治气氛才赞成了合并。七天之后，桂写信给山县，征求关于实行合并须先撤掉伊藤换上曾弥一事的意见，信中还说：“吾以为加速合并时机不需得力之人，使彼等韩国皇帝及政府人员等犯下过错，乃今后政策之最上策也。”^①从东京给昏庸的统监一一发指令，在此过程中促使韩国皇帝犯一些过错，利用这个时机进行合并，这是帝国主义政治的惯用手法，为此也必须撤销伊藤的职务。统监交接完毕，七月六日内阁会议第一次正式决定实行合并。在此之前政府内部对此一直绝对保密（《仓知铁吉备忘录》，《伊藤博文传》），后来只是等待合并的时机而已。

为了制造这一时机，统监府曾想依靠在日俄战争中神鞭知常和原对俄同志会会员出钱让朝鲜卖国贵族宋秉峻等主办的“一进会”大造希望日韩“合邦”的舆论，由黑龙会的内田良平出面领导。然而，一进会根本得不到朝鲜群众的支持，甚至在主张合并的侨居朝鲜的日本人中间也声名狼藉。当时在汉城经营棉布商社的西原龟三，曾在创办该会时当过神鞭的副手，他是合并时期的统监寺内正毅的一名得力助手，也批评说：“一进会已不再是一心为国的团体，而成了野心家的团

^① 引自上述《日韩并合小史》。《公爵桂太郎传》一书里故意将最重要的“使彼等韩国皇帝及政府人员等犯下过错”一句略去。

体”（《如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

伊藤辞去统监职务，于十月去满洲旅行，视察第一次日俄条约同俄国商定瓜分满洲势力范围后的情况，二十六日在哈尔滨车站被朝鲜爱国者安重根刺杀。政府认为良机已到，大造合并韩国的舆论。一九一〇年春，政府以实行合并的日期迫近为由，统一了各元老和政府的意见，于五月三十日撤消曾弥的统监职务，派寺内陆相兼任统监。接着于六月三日召开内阁会议，就合并韩国后应立即采取的政策作出如下决定：不在韩国实行帝国宪法，由天皇统治，朝鲜总督直属天皇，统管朝鲜的一切政务以及其它，等等（《外交年表》）。寺内统监赴任后不久，便于六月二十四日让韩国将整个警察事务“移交”给日本，八月十六日向韩国首相李完用递交了有关“日韩合并”的备忘录，二十二日迫使韩国在合并于日本的条约上签字。在此前后，汉城的各个城门、王宫、统监府、大臣官邸及市内的交通要道都处于戒严状态，分别由日本的步兵、骑兵部队担任特别“警戒”，日本宪兵在市内巡逻，两个人谈话也要受到宪兵盘问。

该条约正式称为“关于日韩合并条约”，是由当时外务省政务局长仓知铁吉起草的，用词不符合日语语法，含糊了是谁合并谁。仓知的备忘录上写道：本条约在制定时，力求避免使用日韩“合邦”或“合并”等听起来象日韩平等合一的字眼，“在明确韩国完全灭亡，已成为帝国领土的一部分的同时，又要选择语气缓和的字眼。”当帝国主义官僚在用词上大费脑筋的时候，帝国主义政治家则深谋远虑，想到日本对灭亡吞并韩国应采取“优美”的形式，说什么“韩国皇帝将有关

韩国的一切统治权力全部和永久地让与日本皇帝陛下”(条约第一条)，好象两个情投意合的皇帝在互相交换什么物品。日本皇帝还规定要使韩国皇帝和皇族“各自享有与其地位相称的最高尊称、威严及名誉，供应维持这一切所需的足够费用。”这不仅有损于韩国民族的威严和名誉，而且剥夺了朝鲜的独立。明治初期福泽谕吉曾强调应把民族的独立称为国体，而与君王血统区分开来，并告诫日本人民：必须警惕西洋人统治东洋人是采取保留血统剥夺国体的办法，例如象英国人留下印度的土邦君主而把其民族和国土变成了殖民地(福泽：《文明论之概略》)。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对朝鲜民族采取的正是英国式的保留君王血统，剥夺“国体”的作法。日本紧接着于二十九日废韩国国名，称之为朝鲜，设置了朝鲜总督府，于十月一日任命原统监寺内为第一任总督。总督府官制上明确记载着：总督直属于天皇，从陆海军大将或中将里面任命，有权统帅朝鲜境内的陆海军。这就避免了引起前韩国统监那样文官统帅军队与统帅权独立之间的矛盾。总督受天皇之命，拥有象朝鲜的天皇那样绝大的权限。朝鲜的法律事项均可按照总督的命令(制度和法令)规定。

在此期间，日清之间还缔结了新的条约、协定和密约：日本继承朴次茅斯条约中规定的俄国在南满洲的权利及从清国得到俄国所没有的新的权利。

一九〇五年八月，朴次茅斯会议即将闭幕的时候，清国曾暗示日俄两国，由于两国在清国境内开战，清国方面遭受到巨大损失，因而要求两国赔偿。日本政府一口回绝，并狡辩说，清国既然没有抗议两国在南满洲一带交战，事实上就

等于承认了那里是交战地点，所以无法答应清国的赔偿要求。后来清国政府又要求日俄两国立即全部撤出满洲，抗议借口守护铁路留下部队（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按照清国当时的实力无法实现这些再正当不过的要求，但义和团事件发生后，政府虽腐败无能，在民族抵抗的压力之下也不得不决心尽力收回以前被外国非法夺走的权利，因而提出了上述要求和抗议。

一九〇五年十月二十七日，日本政府在决定对韩实行保护的同一内阁会议上定出同清国交涉的基本方针，“此次同俄国讲和之结果，已将满洲之一部分划入帝国势力范围”，根本无视清国的主权和意愿。“故此帝国为维持巩固该势力”还决定了向清国提出要求的基本条款。“绝对必要之条件”是使清国政府同意将俄国租借辽东半岛的权利及将东清铁路南满洲线让与日本，此外还定出数条“尽可能”达到的希望条件。这些条件可以分为政治条件和经济利权，前者比较笼统：日俄军队撤出南满后，清国政府应立即“建立足以维持安定秩序之行政机构”，在满洲“着手改善行政管理，施行仁政。”目的在于为日本干涉满洲的内政铺平道路。在利权要求方面：新开放十六个城市和港口；为了日清两国共同经营东清铁路南满洲线和其支线及安东——奉天、奉天——新民屯的各条铁路，成立在日本法律保护下的相当于俄国的东清铁路公司的公司，该公司经营抚顺和烟台的煤矿，还经营和铺修长春——吉林的铁路；把鸭绿江右岸的森林采伐权给予日本等等。

日清两国于十一月七日在北京开始交涉。日本方面由小

村外相任全权，清国方面由军机大臣庆亲王担任首席，而实权却在末席的北洋大臣、直隶总督袁世凯手里。清国方面对会议的基本方针是首先明确清国在满洲的主权，然后从给予俄国的利益中分出若干给日本，强烈反对日本的帝国主义式的要求。日本已不能象对待韩国那样，派日本军队包围会场进行威逼，况且还有英美在一旁监视，不准许日本独吞南满——美国已采取过不让日本独霸南满铁路的尝试（后述）——因此日清交涉陷入僵局。

清国在会上提出：原则上承认将俄国租借辽东的权利和长春——抚顺的铁路权让给日本，但须先由清国收回俄国放弃的这些权利后，日清间再重新缔结条约。日本却一味要求清国原封不动地承认朴次茅斯条约中俄国让给日本的权利，甚至拒绝讨论清国的提案。交涉结果，日本终于迫使清国撤回提案，“绝对条件”达到了目的（日清关于满洲的条约，第一、二条）。在希望条件当中，开放城市、港口和日清间合办公司开采鸭绿江右岸的森林等条件达成了协议，但在铁路和矿山的权利方面出现了分歧。就安奉线达成的协议如下：日本军队在十二个月内撤兵，其后两年的改建期和以后的十五年将由日本经营，然后再由清国买回。新奉线由清国买回，吉长线由清国修筑，但其一半资金须向日本借款，因而日本保留了今后的发言权。日本并未能得到比俄国更多的新的矿山利权。

除此而外，最重要的还有：（1）日本不仅没有明确从满洲撤兵的期限，还使清国最终同意在长春——旅顺之间的铁路设护路队；（2）清国将不铺设与该线平行或有损该线利益

的支线；（3）清国答应不给予其他国家在吉林省内修建铁路的权利；（4）日俄两国撤军后，清国政府要保证“以万全之行政手段保障满洲之和平，兴利除弊，致力于恢复秩序，凡居住于本地区之清国人及外国人均由清国政府保护其生命与职业之安全。”

其中（1）是该条约的附属协议（公布）规定的重要权利，这是俄国也没有的。清俄间关于东清铁路的原条约规定保护铁路是清国的义务，俄国只在铁路附属地境内才有警察权。因而清国方面强烈反对日本设护路部队，并提出留下外国护路部队是再次发生满洲动乱的最大原因的合理主张，日本方面则提出俄国有对日发动报复性战争的危险。最后决定只要俄国撤出护路部队，日本也要撤军。小村全权已预料到这样一来俄国就不可能撤出保护东清铁路的部队，所以日本也就不需要撤军了。古屋哲夫的见解之所以高明，是因为他注意到“为对付清国收回利权的要求，已经同刚刚打完仗的俄国共同意识到彼此之间的利害关系（古屋哲夫《日俄战争》）。日本依靠这些建立了以军事威胁南满洲的据点，没有这条规定也不可能出现后来关东军蛮横无理的现象。（2）（3）（4）是秘密协定，后来竟成为日本对清国及后来的中华民国开发满洲经常不满的依据，特别是（4）成为干涉满洲内政的根据。甚至一九三一年日本全面占领满洲的战争，即所谓的“满洲事变”，也是以张学良政权违反了这一秘密协定为借口的（矢内原忠雄：《满洲问题》）。

条约正文、附件和秘密协定都于十二月二十二日签字，翌年一月二十三日交换了批准书。日清第六次会议期间（十

一月二十一日)，袁世凯提出日军违反了满洲中立，日本全权内田康哉反唇说因为俄国首先侵犯了中立，日本不得已才进行了防卫。袁“哈哈大笑”说：“大同小异。举例说来，就象以俄国拿走两支香烟为由，日本就拿走了一整盒。”（《小村外交史》）真是意味复杂。

日本应在朴次茅斯条约生效的同时，自动接管条约中规定的库页岛北纬五十度以南的地方。但关于划定边境自一九〇六年六月起就由两国全权委员开始进行实地测量和其他工作，十月下旬由于气候恶劣而停止。一九〇七年五月再次开始工作，并于十月七日完成（《划定日俄间库页岛国境一件》、《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九、四十卷）。日本政府早在这以前的一九〇五年九月就公布了库页守备队的勤务令，司令直接听从天皇的命令，掌管库页岛的警备和民政。这支守备队由陆军少将担任司令，以一个步兵营为主，加上兵站司令部、通讯队等组成。守备队在一九〇七年三月以前一直实行军管，直到同年四月设立了库页厅才转为民政管理。库页厅长官置于内务大臣指挥监督之下，不限于由武官担任，但该厅官制里还是规定“应由相当于库页岛守备队司令之陆军将官任之（长官）”，守备队司令楠濑幸彦被任命为第一任长官，第二任始由文官担任。

就这样，日本在日俄战争后取得库页岛南半部、合并朝鲜、以“租借”为名占领清国辽东半岛的一角，加上早已占领的台湾，已把面积为一万九千三百二十三万平方日里^①的土

^① 一平方日里约为十五平方公里。——译者

地——即相当于日本领土（二万四千七百一十八平方日里）百分之七十八的辽阔土地殖民地化，还把大于日本领土面积三倍的满洲——中国东北三省——的南半部置于日本的势力范围之内，形成了大殖民帝国。从人口来看，一九一〇年日本人口是五千零九十八万人，殖民地人口^①（除了日本人），朝鲜为一千三百一十三万人；台湾为三百二十四万人；关东州为四十六万人，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三万人。而且在中国的东北三省总人口（一九〇八年统计）约一千七百一十六万人当中，日本势力最强的奉天省人口占一千零八十万人。库页岛的居民几乎全是日本人，当地人只有两千人左右。

2. 对台湾、库页岛、 朝鲜的统治

日本是怎样统治这些殖民地的呢？这要从日本的第一个殖民地台湾说起。

台湾自一六八三年以来即归清朝领有并命名为台湾，系福建省的附属岛屿，由“巡抚”统治。那里的居民是由土著和来自福建、广东与其它中国南部的移民及他们的子孙构成的。土著处于未开化状态，汉族移民强夺了他们的土地，把他们逐渐赶向山地。清朝统治台湾，皇帝不过是封建土地的最高领主，通过大小汉族豪绅向居民征收土地税，保护豪绅的封

^① 主要引自《日本帝国统计年鉴》，仅满洲人口引自清史会编《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建土地所有。由于豪绅们在巡抚的保护下任意进行掠夺和压迫，汉族人和土著屡次叛乱，据说五年就有一次“大叛乱”，三年有一次“小叛乱”。

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的胜利刚一在握，政府便于一八九五年三月派出一支陆海军部队首先占领了澎湖岛，以便在讲和后割取台湾。四月十七日，由于签订日清讲和条约，台湾、澎湖岛归属日本已经确定，台湾巡抚唐景崧和汉族居民一道反对日本统治，于五月二十三日宣布成立以唐为总统的台湾共和国。当时讲和条约已经批准，日本派出一个师和五艘军舰企图用武力接收。五月二十九日在该岛东北部的三貂角湾登陆，六月三日占领基隆，七日进入台北，十一日击溃了台湾共和国的军队。唐景崧在这以前已逃走。六月二日于淡水冲，清国全权在日本全权、海军大将桦山资纪所乘的“横滨丸”船上签署了交接台湾的正式文件。十七日，桦山大将在台北举行了“始政典礼”（竹越与三郎：《台湾统治志》）。当时该岛的人口数字不详，十年之后经准确调查，汉人有二百八十九万五百二十一人、土著中总督府称之“熟蕃”、即半汉族化的人有四万五千四百三十二人、在山地仍过着原始生活的“生蕃”有三万六千三百六十三人。此外，据估计还有几万人生活在日本行政权达不到的山地原始部落（总督府《台湾统治综览》一九〇八年）。

共和国崩溃后，汉人仍然强烈反抗。日本动用两个半师的庞大兵力，直到十一月下旬才大致平定了整个岛屿。据说，日军在这场战争中死伤六百七十九人，患疟疾等病死亡的有四千六百四十二人，两万多人被送回本国医治，还有五千多

人躺在台湾的医院里。日军估计台湾方面死伤达七千人之多。以后，该岛大大小小的武装反抗连续不断，一九〇三年五月才大致把林少猫率领的台湾南部的起义镇压下去，基本上平息了汉人的反抗。但一九〇七年、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一四年又先后出现了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自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四年总督府用了五年的时间，花费了两千多万元巨款对土著进行野蛮的“讨伐生蕃事业。”

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是军事控制先于一切。占领后的第一年把全部精力都用在“讨伐”上，虽然自一八九六年四月开始实行台湾总督府官制，名义上转为民政，但军事行动仍然是总督府的主要工作。当初在制定总督府官制的政府内部会议上，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强烈主张由陆海军大将或中将担任总督，虽遭到全体其他人员的反对，但伊藤首相主张“应予考虑陆军之感情”，仍旧采纳了川上的意见（《原敬日记》一八九六年二月二十日）。因此规定总督受命于天皇，由陆海军将官特任，有权指挥台湾守备军。一八九六年其兵力是三个混成旅，一九〇七年后逐渐减少到两个步兵团和四个炮兵连，称作台湾守备军。不象以前那样在日本国内编成部队派去，而是把新兵送入台湾的部队里训练。另外，从一九〇三年起在基隆和澎湖岛设立要塞司令部，统统听从总督的指挥。这些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镇压岛上居民的反抗，另外象在义和团事件时众所目睹的出兵厦门那样，还起着充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南部的先锋队作用。

台湾统治虽以军事控制为基础，但又与其它殖民地的统治不同。从第四任总督儿玉源太郎中将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

搭配时起(一八九八年四月——一九〇六年三月),总督掌握政治,不再靠军队进行民政统治。即使在总督府政策审议机关高级官员们的评议会上,也不允许军队幕僚对非军事方面的事情发表意见(《台湾统治志》)。

然而这个“民政”却是地地道道的“警察政治”。关于台湾的警察人数,一八九六年规定警部^①和巡警的人数共计一千六百一十七人。一九〇一年五月,则有警部二百二十一人,候补警部三百零二人,巡警三千七百一十七人,即警察人数猛增到四千二百四十人,此外还有本岛出身的巡捕九百九十八人。同年十一月,全岛的地方行政区划分为二十个厅,下面设有分厅,厅里有警务课,由警部任课长,辅助厅长掌握实权,任命警部为分厅长,由总督府的警视总长和三名警视统一指挥全岛的警察。此外,沿着总督的行政达不到的山地的土著地带的边境设置了“隘勇”监视哨,由警官指挥。一九〇七年的隘勇人数是四千七百五十八人(《台湾统治综览》)。警察将管辖内的本岛人十户划为一甲,十甲划为一保,组成甲有甲长、保有保正负责的保甲组织,各家各户互相监视,互相负责,并强迫于清查户口、调查来往客人、警戒和搜捕“土匪”、征税、地区土木工程、卫生事业等各种辅助警察的行政事务。这一切费用都由保甲员负担。负责指挥的派出所巡警成了镇长和村长。“一般说来在台湾没有警察的协助办不成任何事。反之,靠警察的力量又没有办不成的事”。台湾实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纯粹的警察政治(矢内原忠雄《帝国主

① 日本警察职称,高于警察低于警视。——译者注

义下的台湾》)。

在这种彻头彻尾的军事和警察统治下,确立了以“土地调查”为名掠夺岛民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和靠国家资本建设纵贯台湾的铁路,修建港湾,扶植了靠引进本国资本的以制糖业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产业。

日本刚占领台湾的时候,那里没有近代的土地所有,也没有那种观念。实际耕种的农民上边有小租户,对耕种者收取实物的封建地租——小租。小租户上边又有大租户,从小租户收取实物地租——大租。有义务向统治者纳税的,有的是大租户,有的是小租户,没有明确的界限。总督府的“土地调查”一区一区地仔细测量了耕地和住宅用地的面积,小租户因有土地所有权也要担负纳税义务。大租权因另有代价(交公债)而抵消了纳税义务。这项工作自一八九九年开始,于一九〇四年结束。因此,以前一直隐瞒未交税的耕地、住宅用地也要全部纳税了。

第12表 “土地调查”后增加的纳税地

土地名目	调查后的面积	调查前的面积	增加面积
水田	313,693 甲*	214,734 甲	98,959 甲
旱田	305,594	146,713	158,881
建筑用地	36,395	—	36,395
其他	122,168	—	122,168
合计	777,850	361,447	416,403

* 一甲约一公顷。

摘自《台湾统治综览》。

如表 12 所示,纳税土地仅农地就比原来增加了百分之七

十以上，加上把税法改为以公定地价为基础而交纳现金，土地税由以前的八十六万多元猛增到近二百九十九万元，即增加了两倍半。接着从一九一〇年起又进行历时五年的林野调查，当局对一八九九年制定的“国有林野管理规定”中的“无证明其所有权的土地执照或无其它确证的山林原野全部归为公有”任意加以解释，将台湾百分之九十三以上的山林原野划为公有。国家经营管理林野或处理拍卖给资本家，就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上的。

总督府对上述土地和林野“调查”的结果，第一，奠定了财政基础（自一九〇五年起完全停止本国对总督府的财政补助）；第二，明确了地形和地籍，绘制成维持治安的战略地图；第三，确立土地所有权即确立了土地买卖的自由，为国家及民间资本主义企业得到不可缺少的建筑用地和农场等土地打下了基础。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建起了以总督府军事和警察目的为主、资本主义的经济开发为辅的台湾国营纵贯铁路（一八九九年动工，一九〇八年全线通车），培植了以糖业资本为本国资本。一言以蔽之，台湾的资本主义殖民地化得到迅速的发展。

刚占领台湾时，民间资本根本无力进入这里。例如一八九六年九月办起的台湾铁路株式会社，尽管政府补助利息和保障分红，仍筹不出资金，归于完全失败。一八九七年制定了台湾银行设立法，但股份应募者还是很少。一八九九年政府承担了该银行资本五百万元中的一百万元，并将其股息充作亏损准备金。另外，把相当于二百万元的银币五年无息借给该行，这才勉强出现股份应募者，于同年开始营业。

民间产业资本进入台湾最初是在一九〇〇年十二月，是以成立有资金一百万元（实缴五十万元）的台湾制糖株式会社为开端的。这也是由政府着手计划，总督说服实业界，天皇家承担一千股，才勉强揽到三井及毛利公爵等二十四名股东开张的，而且还是总督府给该会社拿出了实缴资本百分之十三以上的六万八千元补助金。在上述治安措施得到成功、土地调查结束以后——当时也是以日俄战争的胜利和引进外资为转机的新的企业热的高涨时期——国内资本才正式开始进入台湾。自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〇年底，除上面提到的台湾制糖外，又陆续出现了盐水港、新兴、明治、东洋、林本源、新高、帝国等大会社。很快就在那一年组织起名为台湾糖业联合会的联合企业，达成了限制生产、统一价格和义务出口的协定。这些大会社从总督府得到各种补助金和奖金，或得到无偿提供的大片种植甘蔗的土地，还非法收买岛民的土地。当时警察还“劝说”岛民卖掉自己的土地，实际上是强迫岛民卖地等等，会社受到有形无形的各种无微不至的保护（《帝国主义下的台湾》）。

在日本的殖民地中，台湾的资本主义开发最为成功，总督府财政很快就独立，使得本国的大资本在这块土地上攫取了巨大利润，促进了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主要是趁该岛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程度远远低于朝鲜和满洲之机，依靠军队和警察的力量掠夺该岛人的土地，使他们沦为总督府及民间大会社的农业奴隶或半奴隶式的工人，从而进一步剥削他们才可能的。况且在占领厦门失败后，日本政府和陆海军不得不暂时放弃对中国南部的军事侵略，在开发台湾的

问题上也较之军事战略更重视经济方面的意见，军政开始不介入民政，这些都是经济开发“成功”的政治条件。自一九一九年十月至一九三六年九月一直由文官担任总督。

对库页岛的管理是日本殖民地中军事观点最少的，长官也如上述从第二任开始换成了文官。这是因为第一，这里的土著居民数量极少，不需庞大的兵力加以控制；第二，可以只考虑军事上这里对俄作战的用处，即使将来日俄再次交战，库页岛也不会成为主要作战地点，因此认为这里的防卫与其说在陆地上不如说是确保同本国交通的制海权更为重要。^①然而，这并非是说政府和军队在军事上不重视这里，而是说军事观点虽先于一切，但至少若干年后的一九三〇年具体考虑对苏作战以前，是无须为此牺牲经济观点的。

这里的主要产业是渔业和采伐纸浆原料的木材，还开采一些煤炭。因此到一九〇八年底，本国来的移民有两万四千多人，一九一八年竟达到近八万人。森林采伐及纸浆、造纸业为三井合名会社和三井系的王子造纸会社所垄断，开采煤炭和国营铁路也被三井系的资本最大限度地加以利用。说句极端的话，库页岛象是专为三井资本开发的。

统治朝鲜正如甲午战争后到合并这一段时间所清楚表明的那样，与统治台湾和库页岛不同，常常是军事、政治目的优先一切。朝鲜民族在合并时已有一千三百多万人，虽说经济上资本主义尚不发达，但已开始露出萌芽，并具有国家统一的悠久历史和独自发达的民族文化，因此朝鲜人民有强烈

^① 参看国境划定委员长大岛大佐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三日致陆相的意见书（载《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九卷《日俄库页岛国境划定一件》）。

的民族感。朝鲜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不同于台湾人那种冲动性的、地区性的反抗，而是整体的、系统的为保卫和恢复国家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首先要镇压这些，所以早在日俄战争中就将驻韩司令改为大将，位于公使之上。统监时代文官统监也有权调动驻军，所以合并之后的总督府官制上规定，总督在制度上也只能由武官担任。

在朝鲜相当于台湾民政长官的是政务总监。但台湾民政长官掌握警察，可任意行使民政而不受守备军的干涉，朝鲜政务总监则办不到。

到一九一〇年底，朝鲜警官人数有五千六百九十三人，受陆军大臣及朝鲜总督指挥的宪兵有两千零一十九人，而且每个宪兵有三名候补宪兵，所以就有六千多名候补宪兵。宪兵司令兼任总督府的警务总长，宪兵队长兼任各道的警务部长，整个警察机构受宪兵队指挥。台湾军在逐渐削减，朝鲜军则在首相、外相和陆相会议上内定如上述于一九〇四年八月将两个师及若干特种兵编成一个军，负责维持朝鲜治安和在必要时有进攻满洲或乌苏里地区的任务。由于预算原因增兵有困难，合并后就把一个半师的兵力分驻在一百处。五年之后的一九一五年，第三十六届议会通过了增加两个师的预算，实现了有两个师可以常驻朝鲜。这支军队同以前一样是镇压朝鲜民族的武装力量，同时又是侵略中国的先锋部队。朝鲜的铁路、港湾、公路、电讯、电话都是甲午战争时期陆续修建的，主要军事目的就是统治朝鲜和侵略中国。

即使用这般强大的力量，布下周密的军事、警察统治网，

也没能扑灭朝鲜民族武装反抗的怒火。武装部队以北部山区为根据地出击敌人，或越过国境进入中国的间岛地区和西伯利亚沿海地区，加强了抵抗思想和组织。人民的日常生活中经常出现充当总督府的小官吏和候补宪兵的人们被家庭亲属抛弃的现象。这种强烈的抵抗思想促使爆发了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独立万岁”的全国性大起义。

总督府在合并的同时彻底剥夺了朝鲜人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甚至解散了包括提倡日韩合并的一进会在内的十二个政治结社。不仅朝鲜语的报纸、所有报纸都被禁止发行，重新发行了总督府御用报纸日、朝、英文版各一份。还压制朝鲜人自办的私立学校和私塾，并于一九一一年制定“朝鲜教育令”，声称“教育须着重致力于培养品德和普及国语（日语），使学生具备帝国臣民资格与品质”，企图抹杀朝鲜人的民族性、民族语言和民族文化。然而，朝鲜人不愿上总督府办的公立学校，喜欢自办的设备简陋而民族内容丰富的私立学校和私塾。一九一八年，这种叫做“书堂”的私塾有两万四千二百九十四所（当时“面”——村的总数是二千五百零九个），而普通公立学校（小学）只有四百六十二所（《朝鲜近代史》）。

与台湾的“土地调查”基本相同的“土地调查令”和台湾所没有的“朝鲜会社令”成为总督府经济控制的基础。

合并前不久的一九一〇年三月，统监府开始着手准备进行“土地调查”。合并后的一九一二年八月总督府制定了土地调查令，开始付诸实施。这项工作于一九一八年十月结束。口头上说让农民进行手续复杂的申报是为了确认证明所有地

的土地所有权，而实际上是掠夺农民的土地。因为第一，朝鲜近代土地私有制本来并不发达，耕种者很难证明自己对土地的“所有”，所以无法证明的土地就被当作官地；第二，不是由耕种农民本人申报，而是由总督府的调查官、警官或其走狗朝鲜人面长及地主代表“代替”农民申报，所以当然对地主们有利。

由于进行了这项“调查”，第一，将朝鲜的旧贵族和官僚们的封建领地以近代土地所有的形式确定下来，保证他们从耕种者掠夺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使这个阶级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柱；第二，凡调查官认定是未开垦地、填海地、各种名称和形式的大部分旧公地、旧公田和无法证明是私有的土地全部划为公地；第三，把军用地、铁路用地等大片土地归为公有。而且和台湾一样，也在合并前后划定了公私所有的山林原野。林野的私人占有程度远不如耕地多，所以这一划分就使朝鲜林野总面积一千五百八十万町步^①中的七百七十万町步变成了公有。

这样到手的一部分公地当作政府的实物投资拨给或廉价卖给了东洋拓植株式会社（成立于一九〇八年，是公私合营的国策会社）。一九一二年，东拓才有水田三万二千八百九十七町，旱田一万一千六百五十二町，到了一九一九年，水田和旱田面积竟分别达到五万一千一百四十九町和两万零一百四十五町。令人惊讶的是虽然同时期朝鲜的水田总面积由一百零二万四千町增加到一百五十四万三千町，旱田由一百

^① 一町步约合九·九一八平方米。——译者

八十二万二千町增加到二百七十八万一千町，而东拓的水田始终保持着占整个朝鲜水田总面积的百分之三以上（《日本帝国统治年鉴》）。

日本这样从朝鲜农民手中掠夺土地，主要目的是让日本移民耕种这些土地，向朝鲜大批移居日本农民。企图通过这些名副其实的“殖民”为再次同俄国打仗及进一步侵略中国而在当地贮备人力。第二次桂内阁的外相小村寿太郎曾在一九〇八年九月内阁会议上提出并得到承认的“对外政策”里主张“帝国的百年大计”；为“对抗”清俄两个大国，“须尽可能将我民族集中于东亚一带，并须以确实保持其势力为不可动摇之方针。”要实行这个所谓的“满韩移民集中论”，先决条件就是要确保土地（《小村外交史》）。

然而这一企图以彻底失败而告终。合并时的一九一〇年底，居住在朝鲜的日本人有五万零九百九十二户，十七万多人，到一九一九年有九万七千六百四十四户，还不满三十五万人。而且其中农户在一九一〇年只有两千一百三十二户，一九一九年达到一万零二百一十户。这一年是在朝鲜的日本农民户数增加最多的一年，从这时起到一九三〇年就减少或停滞了。大多数在朝鲜的日本人不是商人、高利贷者，就是直接或间接领取总督府薪水的“公务自由职业者”（《日本帝国统计年鉴》）。在日本内地穷得想当移民的农民，因债务及其它情况与地主有无数瓜葛，不能移出。

“朝鲜会社令”于一九一〇年底公布。内容是在朝鲜境内创办会社要经总督许可，而且总督对已经许可办的会社也可下令停办或关闭。由于这个条令，朝鲜人办会社受到了压制。

一九一一年资金七百四十万元的朝鲜人会社到一九一七年资金几乎未变，而同一时期日本人会社的资金却由一千零五十万元猛增到九千五百万元。

朝鲜人办的会社是一些高利贷金融、商业和农产品加工的小会社，日本投资的会社也多是寄生于朝鲜农民的小型商业会社。在东拓、朝鲜银行（一九一一年前称韩国银行）、农工银行（一九〇六年分设十一处，一九一八年合并成朝鲜殖产银行）及其它与国家投资结合的特殊会社和大银行、具有左右朝鲜进出口能力的三井物产、还有进入北部森林事业的大仓组和片仓等少数财阀资本的控制下，朝鲜经济主要以半封建的地主制的农业生产为主。矿产资源丰富的朝鲜在一九三〇年以后才发展起工矿业，三菱资本的兼二浦制铁所（一九一八年六月开工生产）是这方面的唯一近代化的大企业。

总之，日本帝国主义对朝鲜的统治着重于：第一，在军事上、政治上确保朝鲜成为本国的外国阵地和扩大侵略中国的前进基地；为达到这个目的，第二，在文化教育方面彻底压迫朝鲜民族；第三，在经济上主要把这里当做廉价供应粮食、原料的基地及今后日本帝国主义的超廉价劳动力的基地，加以重点统治。日本帝国主义虽把朝鲜完全垄断成它的商品输出市场，却丝毫未使之发达起来或在某种程度上使朝鲜境内的产业得到发展。只不过是通过给总督府交税款和搞商业、高利贷资本或者作为地主来剥削朝鲜人。朝鲜的对日输出额虽然年年增加，却是一种饥饿输出。例如，大米是朝鲜的最大出口货，以一九〇八年至一九一二年五年平均产量为一百，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一年三年间平均增加到一百三十，其中对日出口也显著增加。与此成反比的是朝鲜境内包括日本人在内平均每人每年的消费量到一九一二年为止的五年平均每年是七十二点二升，到一九二一年为止的三年平均每年是六十七点二升，减少了约百分之七（农商务省《粮食调查资料》第一期、《粮谷统计》一九二二年）。

随着日本对殖民地统治的深入，在日本人中间渐渐产生了对台湾、朝鲜和中国人的蔑视观。例如，统治台湾、变朝鲜为半殖民地之后，国内劝业博览会于一九〇三年四月在大阪开幕，天皇也亲临了此会。会场设有“学术人类馆”，“展出”北海道的阿伊奴人^①、冲绳县人^②、台湾土著（帝国主义者所说的“生蕃”）及朝鲜人的活“学术标本”。当初还准备“展出”中国人，由于中国使馆的抗议才做罢。旅日朝鲜人对此也进行了强烈抗议，几天后终于使其停止展出。冲绳县人也十分愤慨，连续抗议了一个月，才算使其停止了展出。但是，对于阿伊奴人和台湾人却没有一个人为他们抗议，再没有比这些更能清楚地说明帝国主义是怎样地麻痹国民的人性了。而且，一向以基督教和人道主义者著称的国会议员岛田三郎也在占领台湾后不久所写的《台湾论》（载《太阳》一八九五年九月号）中就台湾的汉族论道：“对轻慆悍鸷之士著”不是使他们服从，而是“唯有驱逐之”。这种蔑视观随着殖民地化的加深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于是，随着朝鲜人和台湾

① 住在北海道、库页岛一带的虾夷人，是日本的少数民族。——译者注

② 这说明冲绳县人也与阿伊奴人和台湾土著一样被当时的日本人看作是不开化的殖民地人。参照大田昌秀《冲绳的民众意识》。

人的反帝斗争的发展，蔑视观又与恐惧感交织在一起，以致成为关东大地震期间受天皇制军部和警察的煽动而引起的大规模屠杀朝鲜人事件的基础。

3. 经营满洲与列强 以及中国民族

日本在战争中占领了继承俄国租借权的旅顺、大连地区，改称关东州。一九〇五年五月，由满洲军兵站总指挥建立的关东州民政署，负责当地的行政。朴次茅斯条约签订后，于九月二十六日制定了关东总督府勤务令，新设总督府于辽阳，翌年五月又迁至旅顺。总督直属于天皇，指挥指定的陆军部队和负责关东州的防卫与行政。首任总督由陆军大将大岛义昌担任，指挥两个师和旅顺及大连的要塞守备队与其它部队。关于满洲的日清条约生效后，仍由关东总督府继续实行军管，并管理南满洲铁路。

对南满洲实行军管，实际是无视日本政府战前及战时所申明的及朴次茅斯条约里所规定的关于门户开放、工商业上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企图阻止外国利用大连、大东沟等港口进行商业活动及由此到满洲内地的铁路货运，专门扶植日本的利益，只想为日本人取得财产权，甚至根本无视清国的行政权。对此，一九〇六年三月十九日驻东京的英国公使、同月二十六日美国公使分别按照本国政府的训令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美国公使甚至说：“深感失望者乃继俄国图谋

于该地（满洲）获取国家垄断实利之企图失败后，却扶植了与之相等之排外之日本利益。”在英美看来，英美在日俄战争中从财政和政治方面大力援助日本是为了打破俄国对满洲的垄断，向英美资本开放，而且平衡日俄在满洲的势力，不让任何一方进行垄断。现在，英美当然不能容忍日本把它们从南满洲排挤出去。

早在一九〇五年十月，美国摩根财团的铁路垄断资本家、应募过日本战时外债的哈里曼同桂首相之间，曾就管理日本从俄国继承的南满铁路和附属财产缔结了日美结成辛迪加的预备协约，规定日美对该铁路享有“共同和均等的所有权”。考虑到日本独自经营满铁资金力量不足的金融界对这个办法也表示欢迎。然而，开完朴次茅斯会议回国的小村外相马上坚决加以反对，终于使政府声明协约作废。哈里曼对日本当局的失信大为恼火，从此他和美国的主要金融资本为反对日本而开始致力于独自进入满洲。和会召开之前，罗斯福总统曾于一九〇五年一月向高平公使暗示过战后共同经营满洲（前面提到），和会期间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我始终是袒护日本的，但和会后完全改变了”，他也散布起德国皇帝宣传过的“黄祸论”来了。^①

关东总督府和陆军中央对这种国际关系毫无顾忌，想使军管尽量长久维持下去，以巩固陆军在南满的统治，使门户开放变成空头支票。政府内部外相加藤高明反对这种作法，他主张门户开放，同英美协调，但未被采纳。正在这时发生

^① 丹尼特：《罗斯福和日俄战争》，格里斯沃德：《美国的远东政策》。

了铁路国有问题，加藤因始终反对国有遭到失败，便趁此机会辞去了外相职务（一九〇六年三月三日，《加藤高明》）。此后不久，就接到了上述英美的抗议。

韩国统监伊藤博文和元老井上馨深感日本经济实力不足，离不开英美的金融支持，与加藤外相一样主张必须诚实地开放满洲门户，因而屡次向政府和陆军当局进行建议，但也毫无结果。最后伊藤要求召开元老、政府、陆海军最高首脑会议。因此，一九〇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首相官邸召开了“满洲问题协议会”。出席者有伊藤、山县、松方、井上、大山等全体元老和首相西园寺公望、陆相寺内正毅、海相斋藤实、藏相阪谷芳郎、外相林董、前首相桂太郎、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总参谋长儿玉源太郎。

伊藤首先发言，指责满洲军政当局的行动，主张日本需要英美支持，不开放门户、以英美为敌是“自杀政策”，而且日本在满洲的行动已经引起清国政府和人民的强烈不满，如此下去，“不仅清国北部，甚至导致清国二十一省之民心皆反抗日本”。山县、寺内、儿玉等人推托说：当地军人实行这种政策是为防备俄国的报复战争，虽多少有些过头行为，也微不足道。伊藤不同意，认为和约已缔结，和平业已恢复，对仍继续执行战时军管的错误进行了痛斥。会议结束时，儿玉几次一提到“经营满洲”、“将满洲主权委于一人之手……重新组织起指挥一切的官衙如何”，伊藤就大发雷霆，严加驳斥道：“儿玉总参谋长等人似乎完全误解了日本在满洲的地位”，“日本在满洲的权利只不过是根据和约从俄国承受的，即除了辽东半岛的租借地和铁路外别无他物。经营满洲这句

话是战争期间我国人说出来的，现在不仅是官吏，连商人也经常谈起经营满洲。但满洲决非我国的属地，而完全是清国领土的一部分。在并非属地的地方行使我国主权是没有道理的……经营满洲的责任应由清国政府承担为宜。”^①

会议做出了如下决议：“（一）全会基本观点一致；（二）基于上述意见采取今后政策；（三）将关东总督府机关改成平时组织；（四）依次废除军政署，但有领事地方应立即废除。”然而，陆军从再次对俄作战的狭隘军事观点出发，一心企图控制一个军事化的南满，所以实际上仍然无视伊藤的路线。

九月一日，废除了关东总督府，实行民政机关的关东都督府制。都督仍由陆军大将或中将亲自担任（海军将官也不行），直属于天皇，执行关东州的行政管理和防卫、南满洲铁路的守卫和监督南满洲铁路会社（后面提到），有统率驻满部队两个师及其它的权力，并在满洲铁路附属要地设置宪兵队，使之维持治安并充当军事警察。就是说，与关东总督府基本上大同小异，有靠军队和宪兵统治关东州和满铁附属地的全部权力。都督在政务上受外务大臣的监督，但有个重要例外，即根据外务大臣的“特别委任”，都督可以同清国的地方官宪办理交涉事宜。如果都督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个特别委任，领事的存在就有名无实。因此，在外务省与都督府之间无休止的权力争夺中，常常是都督府的实力占上风。

一九〇七年四月，都督府在把南满铁路交给后面提到的满铁会社的同时，把两个驻扎师减成一个，新成立独立守备

^① 《伊藤博文秘录》一书中有伊藤的秘书对这次会议所作的详细记录。《日本外交文书》里只摘录了伊藤演说的前一部分和最后的决定。

队六个营，分驻在满铁沿线的要地。这一军制改革进一步加强了都督统治南满的力量。驻扎师的军籍在本国，两年一换防派到满洲；独立守备队是从本国师独立出来编制成立的常驻当地的部队，是都督的直属部队。由于独立守备队遍驻南满各地，都督就不仅在统治南满上超过了外务省和满铁，而且同陆军中央串通一气，屡次要挟本国政府，成为后来的关东军的前身。

如果说把都督府比做日本统治南满的大脑，那么南满洲铁路株式会社（满铁）就是它的大动脉。日本政府敢于背信弃义地撕毁同哈里曼的协约之后，为了把东清铁路南满线和有关满洲的日清条约（以下简称满洲条约）里迫使清国承认日本有一定期间经营权的安奉线合并起来单独经营，于一九〇六年十一月设立满铁会社，资金为两亿元，其中一半由政府以实物投资。

同年六月公布了有关设立满铁的敕令：总参谋长儿玉任委员长，军人、官僚、财界等八十名巨头任委员。对总参谋长儿玉任委员长一事出现很多不同意见，但儿玉以“鉴于时势需要排除万难效忠国家”，经天皇批准后上任了。不久他就暴卒，由陆相寺内接替了他的职务。儿玉等借口“时势需要”是指估计俄国早晚会对日本进行报复战争，经营满洲应以防备此患为头等大事。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们奉行的满洲政策是：“第一，经营铁路；第二，开发煤矿；第三，移民；第四，畜牧等农工业设施，其中尤以移民为主……如以现在之铁路经营方式于十年内能将五十万国民移至满洲，届时俄国虽蛮横亦不敢轻易与我国开战”，应以此作为“经营满韩之大

局。”^①

从这个方针出发，不可避免地要由陆军首脑担任满铁创办委员长，由军人出身的关东都督掌握满铁的监督权，因而也就不能让外国人参加经营。然而，满洲条约中的第二条规定：日本实施从俄国接收的租借地和执行铁路的权利时，应遵照清国和俄国签署的原条约，“执行”这些权利。按照原条约，东清铁路应由清俄两国共同经营，因此政府鉴于制度上规定满铁的股东只限于日清两国政府或国民，表面承认清国方面参加，实际不打算让清国得到股份。八月二十四日，政府通知清国满铁股份开始公开招募。于是，清国政府于十一月十日向日本提出抗议，本应由日清合办的公司不该由日本单方决定创建和任用职员，满铁会社也不应经营与南满铁路无关的安奉线。驻清日本公使把这次抗议当做“纯系常识难以理解之空谈”（《日本外交文书》第三十九卷），完全不予理睬。而且这时日本方面规定的公开招募股份的期限已过，满铁股份按照日本政府的意图全部归日本所有。

虽说满铁的一半股份属于国民与天皇，但政府不但拥有另外一半股份，而且能够保证股息和社债的还本付息；经天皇批准任命总裁和副总裁，监督会社的业务，并在必要时可立即使用铁路和用地，所以满铁事实上已成国有企业。会社业务除经营铁路外，还经营抚顺和烟台的煤矿开采、水上运输、电气、货栈等许多附属事业，有权对铁路附属地的居民行使行政权和征收相当于捐税的附加费。在俄清条约里，守

^① 儿玉劝说后藤新平就任满铁总裁时的一段话（《后藤新平》二）。

护铁路是清国的义务或权利，而满铁线却如以上所说由日军守卫，这也严重违反了满洲条约。

第一任总裁由后藤新平担任。他同意儿玉经营满洲的基本方针，但在实行上则认为应首先使满铁发展成为日本在满洲经济控制的大动脉。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他在就职前就要求关东都督：满洲的一切军事、行政“形式上限制铁路事业，实际上应受铁路事业的限制。”都督口头上姑且不论，实际上不会接受这些，因而满铁一方面受都督的限制，另一方面还受外务大臣指挥。

满铁于一九〇七年四月开始营业，首先致力于整修铁路和港湾。这就是说军事目的帮助了经济基本建设。在整修铁路、港湾的同时，大批中国人由华北移居这里。由于他们的辛勤劳动，扩大了耕地面积，农产品也大量增加。特别是从一九〇八年开始向以德国为主的欧洲出口满洲大豆以来，大豆生产就成了满洲农业的基础。满洲主要是出口农产品，主要进口日本的棉纱、杂货等。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〇年，“日本帝国”（包括朝鲜和台湾在内）的出口贸易总额有百分之七点五以上是面向满洲。运输这些进出口物资的满铁、轮船公司、以三井物产为主的商社以及向他们通融资金的金融资本获得了巨额利润。满铁在开业当年就获得了扣去折旧费还超过百分之二的利润率，六年后达到百分之六以上，十年以后竟超过了百分之十。

满铁这个特大资本进入了除农业和金融资本以外的所有经济领域，因此涌进满洲的民间资本几乎都集中在商业和金融业，而这方面也是由三井、三菱和第一银行等财阀大资本

所垄断，其它不过是些想大捞一把的小商人。在工矿业方面，一九一〇年大仓组向本溪湖的采煤、炼铁业投资，翌年成立本溪湖煤铁公司，一九〇七年成立沈阳马车铁路会社，其它就不值一谈了。以满铁一九〇七年的事业费为一百，那么一九一六年则达到一千一百三十一。而同一时期除满铁外，南满的会社数量由十一家增加到三十家，但其实缴资金指数不过才达到一百五十五（《满洲开发四十年史》）。

这样一来，儿玉等人经营满洲的主要目的——移居五十万日本人也就和向朝鲜移民同样无法实现了。一九〇七年底在满洲的日本人（不包括军队）有一万一千四百六十一户、三万七千八百八十五人，十年之后也只有两万六千六百二十九户、不过约十万人，其中大多数是满铁职员和家属。从封建领主可以任意移民的想法出发，使更多的日本人定居下来，那么这个地区自然而然会成为日本强大势力范围，小村外相和儿玉大将这种从封建领主式的思想得出的政治军事移民论——移民满韩集中政策——与大学教授浮田和民的“伦理的帝国主义”一道，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规律面前彻底破产了。

满铁看到“集中移民”在原则上根本不可能，这样就举出了资本主义式的帝国主义成绩。尽管并非出自陆军和帝国主义官僚的本心，它最初的资金也几乎不得不全部依赖外国资本。满铁在开业第三个月就向伦敦募集了四百万英镑的社债。自那时起到一九一一年一月，先后四次共募集了一千四百万英镑（相当于一亿三千六百万元）的外债（一九〇七年满铁的事业费是一千四百零四万元，一九一一年是一亿一千五百四十五万元）。

日俄战争后，与甲午战争后性质不同的大规模会社企业成了热门（后面提到），资本输出也不仅仅面向台湾、朝鲜、南满洲。一九〇九年，向中国投资的政府与日本银行、正金银行及三井、三菱、第一、住友、鸿池等财阀大银行组成的辛迪加成立了资金一千万元的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一九一一年三月又组成承担中国京汉铁路一千万元公债的辛迪加。一九一三年成立了日中合办的投资会社中日实业株式会社等，正式开始向中国输出资本。据估计，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日本的对外投资和向外国政府提供贷款、向外国会社贷款及直接向企业投资加在一起共五亿元左右，其中向中国投资占百分之八十以上，其它是对夏威夷、菲律宾等地的农业投资^①（殖民地投资除外）。然而，这不是因为日本国内资本积累过剩，而是帝国主义利欲薰心，在缺乏资本的情况下强行推行的。与此相反，如表 13 所示又引进了大量的外资。

从该表来看，政府的外债逐渐减少，但社债和地方债却显著增加。一九〇四年以前没有社债，一九〇五年第一次在国外募集了九百七十六万三千元的社债，以后接该表年度（该表的社债不包括满铁等殖民地会社）。

就是说，作为日俄战费日本募集到巨额外债之后，在金融方面便依附英、美、法，特别是依附英国。这也难怪伊藤博文担心不要惹恼了财东。然而，在上述关于满洲问题的协议会召开以后，关东都督府在行政上明里暗里阻止开放满洲

^① 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研究》一书中有各种估计数字。

第13表 1906—1915年(年底)输入外资金额表

(单位千元)

年	向国外募集的公债	国外发行的国内公债(有背书)	流到国外的国内公债(估计)	向国外募集的地方债	国内社会在国外的募集的社债	外国人在国内的投资额(估计)	合计	与去年末比增减(▲)
1906	1,146,176	93,000	48,060	21,865	15,621	12,688	1,337,410	▲79,964
1907	1,165,701	93,000	57,260	21,841	44,910	17,934	1,400,646	63,236
1908	1,165,701	93,000	55,240	21,815	103,488	19,220	1,458,464	57,818
1909	1,168,676	93,000	89,260	85,015	108,738	34,324	1,561,012*	102,548*
1910	1,447,218	0	108,356	84,705	108,738	28,168	1,777,184*	216,172*
1911	1,437,449	0	68,565	84,628	147,790	28,112	1,766,544	▲10,640*
1912	1,427,684	0	72,122	177,253	147,540	29,521	1,854,119*	87,575*
1913	1,524,608	0	74,597	177,147	166,884	26,449	1,969,685	115,566*
1914	1,524,603	0	81,331	177,024	166,790	29,171	1,978,918*	9,234
1915	1,493,156	0	71,832	176,894	166,540	28,102	1,936,524	▲42,395

引自外务省《在日本的外国资本》。(·是按原文引用)

门户，政府以满洲条约附件的秘密协定为借口，继续垄断南满洲的市场和利益。例如，当一九〇七年八月清国想靠英国资本的帮助铺设新民屯——法库门铁路时，日本政府以违反秘密协定中禁止满铁平行线的条文提出抗议，使之成为日清两国的“悬案”。另外，日本对清国打算铺设新民屯——奉天的铁路和吉林——长春的铁路也大为不满，让清国必须将建设两条铁路的一半费用向日本借款（一九〇七年四月）。此外，对延长京奉铁路、抚顺和烟台的煤矿利权、间岛的国境问题等等，日本都以既得利益为根据加以夸大解释，要求新的利权，接连制造出“满洲问题”、“满洲悬案”。

这样一来，英、美同日本的关系恶化已经难以避免。英国因其帝国主义的主要“权益”在长江流域，只要日本不侵犯那里，在满洲与华北问题上就多少迁就日本。而美国在清国没有可用来同日本做交易的利权和势力范围，只好公开同日本抗衡。第一步措施是加紧排斥美国国内的日本移民。一九〇〇年，美国首先在加利福尼亚州排斥日本移民。到一九〇五年加利福尼亚、爱达荷、蒙大拿、内华达等各州议会要求合众国政府制定排斥日本移民法。一九〇六年十一月，加利福尼亚州开始实行隔离日本学童的措施。合众国议会一九〇七年二月制定的移民法禁止日本移民由加拿大或墨西哥移居美国。

这时，日美战争的说法很快在世界上传开了。一九〇七年三月，美国舰队以周游世界搞“亲善”为名开始了太平洋航行，这明显是在向日本示威。同年七月，罗斯福总统命令驻菲律宾的美军司令随时做好对付日本进攻的准备。当时德国

到处散布日本预备兵已伪装渔民在墨西哥登陆，正伺机进攻美利坚合众国等谣言（格里斯沃德，前引书）。

一九〇七年六月，日本同法国缔结了协定。法国承认日本由于与福建省及满洲、蒙古接壤因而在那里有“特殊的权益”，日本承认法国在广东、广西和云南也有同样的权益。这样，日本在英法加强合作对抗德国的时候被拉入英法阵营（《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十卷）。

翌月（一九〇七年七月）缔结了日俄战争后的第一次日俄条约。公布的条约正文上附有秘密协定，条约正文规定尊重清国的领土完整和各国机会均等的原则。而在秘密协定里，日本承认外蒙是俄国的垄断势力范围，明确划分了日俄在内蒙及满洲的势力圈（《外交年表》）。

这样一来，根据以前的日英同盟和新缔结的日法协定、日俄协约，日本这时已同迅速形成和强大起来的英、法、俄帝国主义阵营勾结在一起了。可是，日俄、日英的矛盾对立并没有彻底解决，只不过是暂时得到了缓和。唯独日美关系丝毫没得到缓和，但两国都无意认真考虑一场远隔太平洋的战争。况且对美国来说，在远东没有必要付出战争这样的牺牲来保卫权益。因此，日美间在一九〇七年底到一九〇八年初的一系列协定里就移民问题缔结了“君子协定”：日本对“工人”移民不发给护照，护照只发给那些现居美国的日本人叫家属去美国团聚的或做为农业主去的那些人（非农业工人）。在一般性的国际政治问题方面，驻美公使高平小五郎同美国国务卿鲁特于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签定了“高平—鲁特协定”，日美关系也暂时缓和了一些。

“高平—鲁特协定”的目的是为使日美两国“不受任何侵略倾向的影响”，“维持”太平洋的“现状”及“拥护工商业在清国的机会均等主义”，日美两国规定互相尊重对方的“领地”，支持“清国的独立及领土完整”。在帝国主义之间有关清国的所有协定里无一例外地写着清国的领土完整或各国机会均等的字样，却没有一个国家这样做过，只不过是互相牵制对方而已。高平—鲁特协定也是这样。一九〇九年九月，日本签定该条约还不到一年，就把新的有关满洲问题的日清协约和关于确定同朝鲜的间岛国境及日本人、韩国人在间岛的权利等协定强加给清国。前者规定清国事先不经日本同意不得建设新民屯——法库门的铁路，清国承认大石桥——营口的铁路是满铁的支线，而且承认日本开采抚顺、烟台煤矿的权利等等。

美国並沒有坐视日俄瓜分满蒙。一九〇九年三月，美国总统由罗斯福换为塔夫脱，由诺克斯任国务卿之后，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所谓“金元外交”。诺克斯于同年十二月向日、俄、英、德、法五国提议由六国资本组成的辛迪加把南北满洲的所有铁路买过来，六国在商业基础上共同经营这些铁路。这是个所谓“满洲铁路中立化”的提议。当然，在日本和俄国帝国主义眼里看来，这又是个太自私自利的美帝国主义的提案，两国都干脆地拒绝了。两国于一九一〇年七月缔结了第二次日俄协约，在秘密协定里规定两国结成政治同盟，共同反对第三国获得两国在满蒙利益范围内的权利，当两国的“特殊权益”受到第三国（包括清国）的威胁时，两国共同商量对策（协约文参看《外交年表》）。清国摸到底细后向两国提出过抗

议，但两国不予理睬。

美国垄断金融资本还是没有死心。一九一〇年十一月，根据美国的提议组成美、英、德、法四国对清银行团，向清国提供清国改革货币和振兴满洲企业所需的借款。借契上规定清国在有关满洲企业投资上给四国银行团以优先权，并在东三省征收新税，以烟、酒税作保。日俄两国共同抗议这份契约，破坏了借款计划。

这时，中国境内打倒清朝的革命（辛亥革命）蓬勃发展。以一九一一年武昌、汉口的军队起义为开端，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革命起义，清朝被推翻，一九一二年一月宣布成立中华民国。由于列强利用中国这场政治大变革，各自扩大自己在中国的势力，中国的政局尚未稳定，因而使日俄两国轻而易举地击败了四国银行团。而且日俄两国于一九一二年三月加入四国银行团，使之成为六国银行团。其目的不是为了共同剥削中国，而是为了防止银行团把手伸到两国已各自分好垄断区的满洲及蒙古。允许日俄加入四国银行团是美国资本的失败。美国资本改变了策略，于一九一三年三月声明退出六国银行团。

银行团借给清朝或袁世凯政权的款项名曰用于改革货币和产业建设，实际上只用于挽救专制统治者的财政危机。中国的革命人民猛烈抨击清朝及袁世凯政权的卖国行径，同时也强烈反对指使他们卖国的银行团。美国看到中国人民的这一行动，断定与其死抱着不能给日俄两国任何打击的银行团，招致中国人民的敌视，不如就此退出单独行动来讨好中国人民，这样对美帝国主义进入中国更加有利（康特罗维奇，前

引书)。美国一退出，六国银行团实际上已名存实亡(然而五国银行团一直维持到九月)。列宁对此评价说：“这个得到全世界劳动群众同情的年青共和国的巨大胜利，就是这个黑帮银行团的瓦解”。^①

六国银行团的垮台对日本是个不小的打击。日本看到实力雄厚的先进列强纷纷自由地进入中国，已不能不感到自己的竞争力太脆弱了。接着美国承认了中华民国（五月二日），这又使反对中国共和制的日本统治阶级深感失望。这样一来，日美关系一年年紧张起来，同时日英关系也日趋冷淡。一九一一年七月日英间缔结了第三次日英同盟条约，但条约里规定同盟的进攻和防守的对象不包括美国。这样一来日本只能寄希望于和俄国的同盟了。一九一二年日俄间达成了第三次日俄秘密协定，主要内容是补充第二次秘密协定，划定两国在内蒙古的势力范围。日本虽然同俄国缔结协定，却仍然视俄国为头号敌人（后述）。

日本同美国的对立日益尖锐，同英国的关系也渐趋冷淡，在对抗英美等国进入满蒙上只有同俄国紧密配合，但实际上又把俄国看作是主要敌人，这样在帝国主义之间很快就自己走向孤立。与此同时，同反帝的中国民族的矛盾也日益尖锐起来。一九〇八年发生的第二辰丸事件就是中国人民不顾清朝政府的压制针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最初的重要事件。

日本轮船第二辰丸在偷运武器的航行中，于这一年二月

^① 列宁：《中华民国的巨大胜利》，载《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19卷第9页。

五日在澳门港外被清国官员扣留。日本政府宣称是非法扣留向清国提出抗议，要求清国方面道歉，立即释放第二辰丸，由清国政府买下船上装载的武器弹药，並处罚该事件的肇事者，赔偿损失等五项条件。日本政府声称该船完全经过合法手续，由神户向香港运送武器，中途在澳门港外等待涨潮时受到了非法扣留。但是熟悉日本作法的中国商人们根本不相信这一套。清国政府最初态度十分强硬，但在日本政府最后通牒的威胁下接受了五项要求（三月十五日）。广东的中国商人和人民得知消息后，一同掀起抵制日货的运动，並迅速扩大到中国南部。五月，华中和汉口的中国人袭击了日本商店。六月，满洲也开展起排斥日货的运动，並从香港、马来半岛、爪哇、苏门答腊、婆罗洲扩大到遥远的悉尼的华侨当中。他们不顾清朝政府的镇压，一直坚持到年底（参照《清国官宪扣留日本轮船第二辰丸一案》，载《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十一卷之二）。据日本政府方面六月十五日公布的材料，这次排斥日货给日本贸易带来的直接损失约达三百万元（野依秀一：《财界三十年谱》）。一年前日本对中国的出口额（除了满洲）是八千五百万元，第二年便骤减到六千万元，其中这次抵制有很大影响。

中国的革命势力象其领袖孙文那样把日本当做亚洲的先进国来尊敬，希望日本对中国这个亚洲伙伴采取与欧美帝国主义不同的态度，但是日本政府多次使他们的幻想破灭了。那一面，上述中国人民大众的反日斗争的自然兴起表明，导致后来日本帝国主义垮台的矛盾这时已经清楚地出现了。

伊藤博文看到一九〇六年满洲问题协议会的决定根本没

能实行，便在任韩国统监期间的一九〇七年十一月从汉城向本国政府呈递意见书，论述了英、德、美同日本的矛盾，得出了如下结论：

“我当局者如不尊重门户开放与机会均等主义，一再坚持利己主义，则欧美诸国将对我国之诚信有所怀疑，甚至对我不信。其结果将使资本通融中断，经济社会将受直接打击，帝国政府之财政将遇严重困难”，而且，“在满洲实施利己政策，非但招致清人之反抗，且予第三者以煽动之机，最终将导致重演日清同一人种间之战争悲剧。……事如至此，则世之排日论者必将拍手称快。

综上所述，予以为帝国目前之地位乃当局者最应忧虑者。世界大势亦趋于使日本陷入孤立无援而后已。”

这种观点虽然对当时的局势过于担忧，但总的看来，在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时就预感到已经产生各种导致垮台的矛盾，特别是预感到这样下去会激起中国民族的反抗，日中战争就是日本走向灭亡的坟墓，这的确不愧是缔造“大日本帝国”的最高领导人的卓识远见。然而，无论伊藤怎样为避免日本将来的悲剧费尽心机，一个政治上不听他调遣的怪物已经开始掌握了实权。这个怪物就是“军部”。而且在它降生的时候，第一个助产士恰恰正是伊藤本人。

第八章

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时期 的政治结构

1. “军部”的形成

正如上一章所述，日本统治殖民地的最显著特点在于：不管是在台湾还是在朝鲜和关东州，都是以掌握军队指挥权的武官为最高当权者的直接的军事统治体制。在库页岛也是如此，可以委派守备司令任库页厅长官。这样一旦需要就能马上实行军管。这个特点是由国内外的三个条件形成的。

第一，日本得到这些殖民地的时候，人口稀少的未开发地区已经全部被先进列强占领，日本同清国、俄国这些已达到高度文明的大国经过战争，才把一些驱逐了清俄势力的地区（朝鲜）、对方的一部分领土及帝国主义的利权（台湾、关东州、库页岛、满铁等）抢到手。因此，日本统治殖民地必然是以对占领地区实行军管或者与实际占领相同的军事力量为后盾的统治（朝鲜）开始的。而且，受统治一方的必然反抗也与野蛮人无法相比，既强大又持久。不镇压这种反抗就无法实行帝国主义的统治。因此，在军管期间须继续使用大批的军队，军人的发言权也就会更有份量。在建立日本的

第一个殖民地台湾的统治机构的委员会上，陆军主张采用武官总督制，伊藤首相不顾其他委员的一致反对采纳了陆军的意见。这恐怕不仅仅是为了照顾陆军的面子，而是考虑到当时需要武力镇压岛民反抗的客观条件。

第二，按照天皇制，军队统帅权就是天皇大权。只有从政府里独立出来的军令机关才有权指挥和统帅军队。因此，只要统治殖民地需用强大的军事力量，那统治军队的军人的发言权不用说事实上，就是在制度上也超过他人。况且日本的经济力量不如其它各帝国主义强国那样雄厚，为了通过资本掠夺和奴役殖民地人民也必须靠军队、警察的暴力掠夺和压迫来弥补资本力量的不足。

第三，在世界史上的帝国主义阶段，日本的帝国主义者不仅仅满足于台湾、库页岛、朝鲜、南满洲的殖民地化，而是要以此作为跳板去获得更多的殖民地，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在这前进过程中日本的经济力量薄弱，不能不靠军事上的垄断和“掠夺中国等特别方便的垄断”来弥补或代替金融资本垄断的不足。鉴于上述理由，日本对殖民地的统治首先使用了军事统治的体制。然而，一旦形成了殖民帝国并开始扩张时，统治殖民地对天皇制和日本资本主义来说就成了政治上和经济上的“生命线”。这种对殖民地的统治又成为依靠军事力量的体制，因此不可避免地掌握军事力量的人要对整个国家政治有决定性的影响。不仅在日本，一般说来在帝国主义国家，军人对政治必然影响很大，军国主义或多或少成为国家政治的首要原则。这时如果是主权在民，在所谓文官统治的国家体制下，议会和政府统制武官，军人的专横在某种

程度上将受到压制。但是在天皇专制、统帅权从政府独立出来的日本，则与一般帝国主义国家的体制不同，而是建立了军人的政治势力。

天皇制早已规定：（1）统帅权独立，因而辅助和执行天皇统帅大权的参谋本部和海军军令部是对政府独立的；（2）陆海军大臣武官专职制；（3）在有关军令方面的问题上，不仅总参谋长和军令部长，连陆海军大臣在内都有权不经过内阁总理大臣而直接奏请天皇批准，即所谓的“大本营上奏权”。根据以上各项，陆海军在制度上对政府也是独立的。而且，内阁制度不是构成一个各国务大臣在总理大臣的指挥统率下互相负责的统一内阁，而是大臣的协议体，首相及各大臣分别由天皇直接任命，各自直接向天皇负责，即使首相辞职各大臣也不一定要辞职。这一制度使首相对各大臣、特别是对陆海军大臣的统制力就明显减弱了。按日本的政治习惯，通常是先由天皇选定总理大臣，然后再按其举荐挑选各大臣，大臣的辞职书须经过首相呈递天皇，因此首相辞职时各大臣也一同辞职。与其说这是惯例，不如说自建立内阁制度（一八八六年）以来绝大多数情况是这样，唯独陆海军大臣可以不辞职，继续留任在下届内阁。更换陆海军大臣不受内阁更换的限制，而是根据陆海军内部的情况而定（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集》一书中举出了所有这种情况）。

统帅权独立是一八七八年参谋本部从陆军省独立出来以后的事。陆海军大臣武官专职制，制定于一八八六年，一八八八年制定的陆海军省定员表规定：“大臣，将官。次长，将官。”即大臣和次长只限于将官担任。然而，一八九一年五月

第一次改组松方内阁时，由于陆军当局表示不答应军备扩张的要求就不推举大臣，有的阁员也提出实行陆海军大臣文官制，因而七月份改革官制时，删去了陆海军省定员表中由将官担任大臣和次长的规定。为此，政府和陆海军的最高一级官员众说纷纭，意见不一（但丝毫未走漏消息）。明治天皇便谕询伊藤博文对陆海军大臣文官制的意见。伊藤的回答是：掌管军政的大臣不能“让容易被政党或政治热摇撼之普通政治家担任”，“根据我国之宪政，理所当然应由武官管理军政，勿使政治风波轻易波及军事方面乃至为重要”（《伊藤博文秘录》）。以这一回答为契机，陆海军大臣武官制事实上已经确定。但当时不知是什么原因却根本没有记载于官制上，而是如上面所说，于一九〇〇年第二次山县内阁时才在法制上也明确规定只限于现役武官。

陆海军大臣的大本营上奏权也是内阁官制里一开始就规定的，而最初有些被滥用。因为军令事项与军政事项的区别不明确，陆海军当局尽量扩大解释“军令”，进行大本营上奏。因此，伊藤首相（第二次）于一八九六年四月训令陆相大山岩，要求“事关军机、军令上奏者应首先为属于军机、军令急需处理者乃自不待言。由于其界限不明，属于行政事项之事件亦进行大本营上奏而得到批准之现象亦往往有之。是与行政事项直接有关者或若不经阁议实有碍于保持行政各部之统一者，上奏前希事先经阁议商榷，务请妥善处理”（《明治军事史》）。伊藤制定了大本营上奏权的根源——统帅权独立的宪法，现在也开始为它伤脑筋了。

据说在出兵镇压义和团时，如前所述，想在阁议上讨论

出兵的兵力问题，总参谋长以事关统帅为由而予拒绝。另外声称出兵厦门与阁议无关，由山县首相和陆海军首脑机构自行处理等等，陆海军的这些一味的独断专行致使开始发生危及国家的事情。

到日俄战争前夕，大体说来一直是由政务指挥军事的。在甲午战争的大本营里，文官伊藤首相列席会议，在政务优先的情况下实现了军事与政务的统一。日俄开战是不管参谋本部的部长们怎样吵闹也没受其影响，仍然按照元老和政府的政治判断决定下来的。然而在日俄战争期间，伊藤等人也同意置驻韩军司令于公使之上，军事从此开始优先于政务了。而且，后来随着殖民帝国的形成、对殖民地的统治开始制大日本帝国之死命，殖民地总督和垄断它的陆海军政治势力变得更加举足轻重了。当时，统治台湾几乎不与第三国发生关系，另外台湾人的民族形成也很晚，所以当地总督不会影响日本的国际政治路线。而对朝鲜、关东州和南满的统治则不同。朝鲜人和中国人的民族形成得早，日本不得不随时对抗民族运动，而且还有清国或中华民国这样的本国中央政府。日本要同其政府发生关系，还要经常同俄、美、英及其它列强帝国主义发生复杂的关系。所以，在这种地方实行不听政府调遣，直属天皇的军人政治，意味着军队成为日本对朝鲜和中国政策的主导力量。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日本的国际政治的基础始终是围绕着对中国政策产生的同中国的民族及政府的关系和同列强帝国主义的关系，因此陆军成了中国政策的主导力量，直接给日本的国际政治带来重大的影响。

接着，一九〇八年十二月重新制定了参谋本部条例，删

去了条例中的第三条：“总参谋长起草国防计划及有关用兵命令，经天皇批准后交给陆军大臣”，参谋本部的任务规定只有第一条：“参谋本部乃掌管国防及用兵事务之机构。”象这样一般地概括了参谋本部的任务，实际上是扩大了它同政府闹独立的权限。

这样一来，统帅权、大本营上奏权和军部大臣武官制就有了与前不同的政治意义，即不仅保障陆海军在军事上独立于政府、议会及其它外部势力，而且保障陆海军不论在战时还是平时都与政府平起平坐、抗衡，并经常胜过政府，成为操纵国政的最大政治势力。正如上一章所述，甚至以天皇最信任的伊藤博文的阅历和实力都已经压制不住陆海军，特别是陆军的专横了。

陆海军的专横也是由日俄战争时期的思想政策造成的。军队不认为在日俄战争中取胜是国民的力量，自以为是地认为只是自己的力量；不考虑在战争中付出的牺牲是国民的牺牲，而以为是军队本身付出的牺牲，把满洲看作是靠军队的力量、军队的牺牲换来的军队的新领地。而且，政府和所有统治阶级为了挑起国民的战争情绪，过分地强调和夸大宣传军队的光荣、军队的伟大和军队的牺牲，并使国民完全相信这些，因此军队更加洋洋自得，坚信以上这一套，一味专横起来。

加之一九〇六年二月制定“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制定要领”，一九〇七年四月制定“帝国国防方针”及其它，同年九月制定了“军令”，不论在制度上还是国家政策上都确立了陆海军特别是陆军的政治势力。

“帝国陆军作战计划制定要领”的内容是把到日俄战争前夕的日本守势作战计划改成攻势作战，主要假想敌人是俄国，“主要作战在满洲进行，攻击敌人的主力，尽快抢占哈尔滨，以切断乌苏里地方同俄国本国的主要交通线”（《明治军事史》）。这当然属于军令事项，政府完全无法知道，但上一章已经提到，日本在关东州和南满的行政、经营满铁及所有政策都必须服从这一作战计划。

“帝国国防方针”与上面所说的作战计划出自同一设想，是山县元帅于一九〇六年十月向天皇提出“帝国国防方针的个人方案”时制定的。天皇把山县的方案下交元帅府（于一八九八年成立，是天皇在军事上的最高顾问机构）征询意见。各元帅回答说，希望把山县的个人方案发给总参谋长和军令部长，由陆海军方面协商起草帝国国防方针。于是，总参谋长奥保巩、海军军令部长东乡平八郎，于同年十二月奉旨开始讨论制定国防方针，于一九〇七年二月向天皇解答了“帝国国防方针”、“国防所需兵力数量”、“帝国军队用兵纲领”的方案。直到这时，天皇才第一次仅把其中的国防方针方案交给首相（西园寺公望），命研究审查，并且根据天皇的特别旨意允许首相只“秘阅”“国防所需兵力数量”方案（连“用兵纲领”都不许秘阅）。首相于同年三月向天皇答复了如下意见：“予以为国防方针甚妥，唯国防所需兵力目前尚无法立即全部付诸实施，是以望暂待时机，结合国力权衡缓急。”因此，总参谋长、军令部长的谋略全部为天皇所采纳，作为高于法律的天皇的意愿正式成立（《明治军事史》）。

这样，首相即政府在决定国防方针这一关系到国家存亡

的最高政治方针的问题上只能参与到如此程度，实际上等于不得不事后承认陆海军的决定。至于议会不仅完全不得参与，也不知道已经决定的方针。从这里可以看出：军事统治政务已经确立，陆海军已决定性地超越政府了。而且，国防方针在天皇（即实际上是陆海军）认为需要修改以前，成了一贯的方针，它牢牢地束缚着历届内阁。这样的事情是前所未有的，这里初次作成的。此后国防方针又于一九一八年六月、一九二三年二月及一九三六年五月先后作了三次修改，而每次都与第一次政府参与制定的作法和程度相同。

我不知道这份国防方针的正文，但估计它与山县元帅第一次提交天皇的“方案”大致相同。山县方案规定：“一、我国国防之特长在于靠陆海两军之诚恳协作，战争伊始即采取攻势作战”，“二、将来我国国防之主要假想敌国为俄国”，同时还以美国为敌，另行制定作战的基本方针。不仅如此，第“五”条还规定了纯属政治问题的日本的国际路线，“将来我国国利、国权之扩大以面向清国为有利”（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日本外交史研究》，载《日清·日俄战争》、大山梓的介绍资料）。

为达到“国防方针”所需的兵力数量，陆海军都差不多是日俄开战时的一倍，陆军平时是二十五个师，战时是五十个师；海军是以八艘战舰、八艘巡洋舰为主力的所谓八·八舰队。在其后的十年中，日本国内最大的政治问题是，围绕着按照天皇的意志即唯一的最高国家意志制定的扩军，在政府、陆军、海军，而且在议会、实业界与国民之间进行的错综复杂的斗争。“用兵纲领”规定对俄作战是陆海军协同作

战，对美作战是海军单独作战（贵岛武治：《日本的国防方针、用兵纲领》，载《国防》杂志一九六一年十一期）。

同年九月，将“有关军令事件”制定为“军令第一号”。第一条“事关对陆海军之统帅，经天皇确定之规定称之军令”，第二条“须公布于众之军令上奏天皇，经亲署后钤御玺，由主管之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副署填写年月日”。这样“统帅权独立”已经完成了其履行手续。陆海军大臣连什么是军令，军令和军政的区别以何为标准都分不清，就声称军令，滥用了“大本营上奏权”。而且“军令第一号”本身是根据“军令”制定的，即排除政府和议会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其中第一条正如上面所提到的那样，怎样解释这些条文也是由军部说了算，所以等于只要陆海军当局想当做军令，什么都可以变成军令。从制定军令第一号的这种作法来看可以说是违反宪法的，但这是根据超越法律的明治天皇的判断，作为天皇的意志制定的（摘自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备忘录》（一），载《法学》十二中的三、四）。因此能与之较量的只能是能与陆海军对抗的政府、议会的实力，而不是宪法理论等。这种实力又只有根据政府和议会能把人民的力量民主地团结到什么程度来决定了。

这样一来，陆海军的地位便在国民力量达不到的情况下得以确立，在制度和最高的国家政策上都独立于政府，并优越于政府。尤其是陆军不是专心致志于军事，而是竟至于干涉国政。当时的进步势力谴责成为这样一股政治势力的陆海军为“军阀”、“阀族”，而这不过是从后来的一九三〇年起就擅自独裁、国民或军队自己称之为“军部”的怪物正在开始

形成而已。从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三年陆军内部有名的“大正政变”的时候起，“军部”这个词本身，指的是对政府而言的陆海军。

田中义一陆军少将于一九一三年二月二日写给寺内正毅大将（朝鲜总督）的信（现收藏在宪政资料室、寺内家文书），虽很难断定是不是这个词的最早用例，但似是早期的例子。田中当时是第二旅旅长，曾与前任军务局长、当时的军事课长宇垣一成大佐一道在增设两个师的问题上使西园寺内阁垮台。田中是陆军政治活动的推动者。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议会和国民谴责西园寺内阁之后的桂大将内阁和“军阀”的蛮横——大正政变——的最高潮。田中的信里写道：“予以为在今日之情况下最须注意者乃军部之态度。万一海军形成如政友会、陆军形成如新政党（桂正在组织）之势力范围，实为国家之一大忧患”。

宇垣一成军事课长于同年“初夏”的随感录里写道：陆军推翻西园寺内阁“以吾人之见乃单纯揣测军部之意图”，考虑到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即便对运用宪政多少有些障碍，此项修改将对军部产生影响，”对国家是弊多利少。此外还可以看到“军部之重要地位”、“军部之大臣”等词（《宇垣一成日记》）。

据认为是一九一四年的陆军内部“绝密文件”《鉴于时弊关于拥护军令权独立之建议》^①里这样写道：“有关国防事宜

^① 该文件曾在小林幸男的《海军大臣事务管理问题始末》（摘自《法学》十三之一）一文里提及。文件里提到“本年召开议会以来……或有人倡导国防会议之必要”，由此估计是一九一四年的文件。

除政务之外由超越一切之总参谋长及海军军令部长等担任辅佐……唯有作出适合机宜之计划奏请天皇决定。不须玩弄如军部亲自将其诉诸舆论以得到支持之权术”，关于扩充陆海军，“首先经参谋本部军令部磋商后，按统一意见向行政部交涉，以拥护军令权之独立……若行政部财政情况无法满足军部之要求，双方亦应再次磋商，自行定出缓急顺序，决不应向内阁求成”，把“军部”放在与“行政部”对等的位置上。这位作者把政府叫做“行政部”，大概是为了避免在“政府”一词上给人以国政的最高机关的印象。由此也可以看出军部一心想使自己受到重视。

军部单独的政治活动典型地集中地表现在对满洲和对中国东部的活动上。朝鲜总督干涉国境那一边的满洲问题，关东都督、北京公使馆武官和驻清日军同本国陆军中央联系，置当地领事、公使的权限和本国政府的意图、政策于不顾，单独进行政治活动。这样一来便加剧了军部特别是陆军同外务省的“二元政策”的分裂。在外国看来，这只能说是日本的“双重外交”、“两面手法”。最集中的表现是在一九一一年至一九一二年的中国辛亥革命时期。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辛亥革命的开端——武昌的清国军队一起义，陆军和海军就马上互相交换了情报和意见。参谋本部立即向南京、上海、汉口及长江流域和以北京为中心的华北以及福州、云南、广西省梧州、陕西省方面及满洲、蒙古等整个中国领土赶派了军官，布下谍报、特务工作网^①。

^① 栗原健编著的《对清蒙政策史的片断》一书中有派遣人的姓名、目的地和任务的一览表。

因为陆军不管政府的政策如何，已准备趁“清国动乱”之机扩大日本的利权和势力，必要时甚至不惜采取军事行动。

政府（第二次西园寺内阁，政友会是执政党）面对着辛亥革命竟制定不出一个明确的有远见的政策。无论政府还是元老最初都本能地想支持清朝，抗拒革命。因此在暗地里接到清国政府提供武器援助的要求后，政府于十月十六日决定了武器援助的方针，并于二十三日作为大仓组和清国陆军部签订的合同提供了第一批武器。然而，与此同时参谋本部也在向革命军提供武器，陆军省对此表示反对。在政府内部，内相原敬认为“当今局势，叛徒与官兵结果将如何，尚完全无法逆料，因此外交上之一边倒理论实难避免于我国不利”，主张向任何获胜一方靠拢的骑墙政策。这种意见很快便在阁议中占了上风。陆军省也并非反对向革命军提供武器，而是对参谋本部不通过陆军省就单独行动感到不满（摘自《原敬日记》十月二十日、二十四日）。十月二十四日，阁议又决定了如下“对清政策”。

“延长满洲租借地之租借期限，决定有关铁路之各项问题，进一步确定帝国在该地区之地位，因此使满洲问题得到根本解决”就是“待机会于我最为有利并有十分把握时始开始实行”，并且意识到日本这个东亚的列强帝国主义宪兵和中国反动势力的支柱对中国本部所起的作用，“今后应特别致力于扶植中国本部之势力，并设法使他国承认我国在该地区之优势地位”（《外交年表》）。

这里面充满了帝国主义野心，却根本没有提到对当前的辛亥革命应采取的具体对策。不光是日本的驻中国外交官和

军人，包括整个统治阶层、那些所谓的“中国通”和“汉学专家”在内，都完全沉醉于帝国主义的优越感，因此轻视中国，看不到中国民族的力量，想象不到中国正在掀起的民族主义高潮将长时期成为中国和东亚的主流，无法从矛盾交错的各种情报中预见到清朝政府和革命派哪一派占优势。加之，君主国日本的统治者出自厌恶反君主制革命的本能，难以下决心支持占优势的革命派，又难以支持处于劣势的一派，而犹豫不决。因此才出现上面提到的对各派都表示好感的紧急对策。

中国革命在此期间迅猛发展。十一月袁世凯组织内阁，想利用君主立宪制的幌子摆脱革命。日本政府一方面向袁表示愿意帮助袁改革清朝为君主立宪制，另一方面又向英、美等国提议进行共同干涉，以使清国实现君主立宪制。然而英国远比日本估计得正确，认为清朝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无关紧要，正在斡旋袁与革命派的协商，对日本的提议未予理睬而是把袁紧紧抓在手中。袁与英国很快看出在君主立宪制上无法与革命派达成妥协，就赞成共和国，听任清国灭亡，袁在共和制的中国逐渐掌握了全权（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成立中华民国，二月十二日宣统皇帝退位，清朝灭亡，袁掌握实权，于三月十日就任临时总统）。日本拉拢袁失败后，从十二月下旬起一方面想同俄国合作出兵满洲，占领满洲和蒙古，另一方面也“援助”革命派，想得到长江一带的利权，于一九一二年一月通过大仓组和三井物产向革命军提供了大量的借款和武器。这时，在政府和陆军里实力都雄厚的元老山县有朋抱着绝不容许清国变成共和制的想法不放，主张趁此机会出兵满洲，将南满洲完全据为日本所有，同时给革命派以打

击。外务省和陆军省都倾向于这一主张。另一方面，关东都督、驻华陆军和海军以及参谋本部派往各地的谍报、策划阴谋的军官们各自恣意行动起来。

正当政府进行出兵满洲的外交准备时，一九一二年二月三日，京奉线山海关北部的大桥被炸，死伤人数极多。这里是日军的守备区，这次爆炸规模很大，无疑是专门的工兵队搞的。当然不光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各国也都怀疑是日本。驻天津的总领事小幡酉吉在给外务省的报告中也说：“若我陆军当局者关于出兵满洲有以上计划，亦须在绝密中实行”，暗示是日军的所为（《日本外交文书》第四十四、四十五卷分册《清国事变》）。可是，由于这一阴谋不合时机，反而引起国际舆论的谴责，政府不得不压制陆军，停止向南满大批出兵。

正当日本政府向长江流域的革命军提供武器的时候，日本海军和关东都督联合起来于二月二日在辽东半岛的一角登陆，向想一举进逼北京的革命军提出了“这里是中立地区，必须撤离”的强硬要求，于二月十三日把都督的驻军师的一部分派往该地区。革命军在这一武装干涉下被迫撤离。

另一方面，所谓“支那浪人”川岛浪速等人与参谋本部串通一气策划“满蒙独立”。这一阴谋即指他与参谋本部派来的高山公通大佐等人的军官团及北京守备队长菊池武夫等人，企图帮助清朝皇帝的直系肃亲王逃出北京（二月二日），拥立他在满洲举兵；同时由日本军人和日本平民领导内蒙古的喀喇沁部落的头领（喀喇沁王）和巴林部落的头领（巴林王）举兵并供应他们武器，一举实现“满蒙独立”，使之实际上成

为日本属领。朝鲜总督寺内也暗地里支持他们。可是驻满洲的领事反对此事，满铁也在支援革命军。就是说，政府虽然同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经过磋商暂时停止了这场阴谋，而参谋本部却根本没有放弃这一计划。一九一五年，他们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大好时机开始更大规模地更有计划地策划第二次“满蒙独立”。本书篇幅有限，不能在此介绍其内容，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看《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田中义一传记》、《葛山鸿爪》（小矶国昭自传）等书。一九三一年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发动的“满洲事变”不是灵机一动想出来的，而是二十年前就策划过的阴谋的逐渐发展，并且遇到了时机。

正如这些事件所表明的，政府和军部没有任何统一的政策，没有双方共同的国策，双方都是各自或者利用反革命派，或者利用革命派。所以，日本帝国主义者当中最坚决主张侵略主义的桂大将的智囊德富苏峰才叹道：“右手欲为之事被左手打落，终于不能取得任何值得一提之成功，到头来得不到中国任何一党派之感谢，只不过受各党派怨恨和轻视而已”（德富《大正政局史论》）。可是对日本帝国主义史来说重要的是已经形成了这样一种政治机构：即使陆军完全无视政府、任意采取侵略中国的政治、军事行动，也不会受到任何惩罚，甚至不会在公众面前受到政府公开的责备。虽然在军部内部里陆军和海军不一致，在陆军内部参谋本部和陆军省也未必一致，驻外的各机关里也都有对立，但对外方面军部是互相拥护的，从整体来说军部成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火车头。

而且，无论政府和军部之间有多大的摩擦和对立，政府都会把军部侵略中国的任何阴谋对国民大众绝对保密，中国

方面对军部驻外机关的非法行动进行的正当反击，政府也同军部一致说成是中国排日侮日，利用它煽动国民的沙文主义和侵略主义的狂热情绪。

如一九一三年中国二次革命时期发生的“汉口事件”。八月十一日驻汉口的西村少尉被中国军队逮捕，并被没收了军刀和衣服监禁数小时。政府和军部向国民宣传说这是对日本陆军和日本国的严重侮辱，煽动侵略中国热，要求中国方面不仅对肇事者进行法律制裁，而且要撤换上司和赔礼道歉。陆军借此机会强迫将汉口的日军驻地改为日本租界，并要求设立军用无线电信。实际上这次事件是这样的：西村少尉进入中国军队的防线刺探情报，中国的值班军官劝其离开时，日本兵却突然拔刀刺伤了军官的手臂，因此中国方面逮捕了西村少尉等二人，剥下衣服进行了暂时监视。连驻汉口的总领事芳泽谦吉也告诫说这种侦察外国的军事基地是“欺对方为弱国而采取不顾哨兵警告之行动”。

军部干了好几次这种类似的事件，其中最大的是一九一六年八月的郑家屯事件。

中国军队二十八师的士兵看到一个日本人在镇上的鱼店非要廉价买鱼不可，甚至想把鱼抢走，所以深为不平，于是把日本人揍了一顿。日本人向日本警察川濑控告了此事，川濑警察立即来到中国营地，要逮捕“犯人”而与门卫争执起来，接着便向日军守备队求援。守备队的松尾少尉带领二十名士兵赶来，同门卫口角一番后，松尾突然拔出军刀砍断了对方的右手。营房里的中国士兵立即出来与日本兵互相开枪射击，川濑警察及八名日本兵被当场击毙。中国士兵有四人死亡，十四人负

伤。第二天，日军一个骑兵团和一个步兵营进攻中国兵营，但中国方面奉上级命令撤出了兵营（《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

随后，日本政府与中国政府（袁世凯政权）转入外交交涉。日本不仅要求中国方面惩罚当事人和赔礼道歉等，还要求在南满洲和内蒙古东部的中国各个部队里设日本军事顾问、中国军官学校雇用日本教官、同意在日本认为必要的南满和东蒙驻扎日本警察、在南满的中国警察里设日本顾问等等。其实日本早就蓄意制造一个提出这些要求的机会了。日方奉命前去进行外交交涉的林权助公使是个有名的国权主义者，虽然他很清楚本来在这一事件里日本无理到什么程度，但由于外务省竭力煽动日本国民的沙文主义，声称都是中国方面的过错，并督促说“国民舆论正在沸腾”，要尽快解决，使林感到束手无策。中国方面在报纸上透露出日方的要求，一方面争取美国的外交援助，另一方面也燃起了中国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这样日本外务省、军部也不得不缓和和要求，以警告二十八师师长等条件在年底解决了这个事件。但是，日本方面当时就以“谈判记录”形式向中国递交了在中国的警察和军队里设日本顾问等三条“希望”，声称对此并不必答复。军部和政府大概是为了在日本国内保全面子才不得不干出这种不干脆的事的。

以上的汉口事件和后面的记述都摘自各年度的《日本外交文书》，当时朝鲜总督寺内大将的智囊西原龟三受寺内的委托调查了满洲、华北的实际情况，把日军如何恣意横行到处制造“事端”详细记述了下来（摘自《如梦的七十余年——西原龟三自传》）。不仅军部，连政府、外务省也向国民歪曲事

实真相，大肆宣传中国排日侮日，煽动国民侵略中国的情绪，并在“外交”上加以利用。因此，在国民眼里看来外务省也与军部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不论是在军部与政府、外务省的不同性和一致性这一点上，还是在由于这些军事阴谋、校官级的所谓中坚军官不顾参谋本部、陆军省最高首脑部的意图制造事件，使上级事后承认这一点上，总之，从一九二八年关东军炸死张作霖到三一年的所谓“满洲事变”，一个完整的进一步侵略华北、侵略中国的精密雏型，在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军部形成的同时就已经做成了。

至于军部在内政上如何打着扩充军备的旗号插手国政将在下一节谈到。这里只简单提一下军部，特别是陆军想在国民当中扶植其势力，由军部统率国民，即组织在乡军人会和青年团的事情。

日本这样的小国想要同中国或俄国这样的大国进行战争，并以“国防方针”的名义将侵略大陆定为最高国策，就必须在平时准备好庞大的预备军。日俄战争使陆军当局对此深有感触。据说最先提出此事的是田中义一，但陆军省里主要是在研究德国的例子后、一九〇六年十月寺内担任陆相时，制定了将复员军人组织成在乡军人会的规章草案。当时的目的是使受过军队教育的士兵在返乡后也能保持和提高军事知识、技术，特别是坚持“军人精神”，并在国民当中广泛普及、培养和保持一个庞大的后备军。陆军省就这一草案同海军省商议时，海军说：“时期尚早”。恐怕作为海军来说是不喜欢这样一个会进一步扩大陆军势力的组织的。而且从单纯军事观点来说，这种组织对于海军也没有必要。

由于海军不同意，当时只好把成立在乡军人会一事暂时放下等待时机。不久，一九〇九年一月田中义一中校担任陆军省军事课长，他对士兵及一般民众的思想逐渐“恶化”，即工人和农民开始反抗资本家和地主、批判军国主义的倾向日益增强深感忧虑，他按照自己的“良兵就是良民”、反之“良民就是良兵”的一贯主张，为实现良兵与良民的统一而积极筹划成立在乡军人会。因此，陆军省于一九一〇年七月，即幸德秋水等人由于所谓的大逆事件被逮捕的第二个月，重新制定了在乡军人会的规章草案，同海军省协商，海军再次推说时期尚早。

可是这一次“因时机一日不容耽搁，决定先由陆军自己建会”（《明治军事史》）。大概是国内大逆事件造成的恐怖和国外即上一章详细谈到的朝鲜、中国国内的民族运动 and 同列强对立的尖锐化才使陆军当局决心单独建会的。陆军大臣将此草案上奏天皇得到批准，于同年十一月三日（明治天皇诞辰）举行了“帝国在乡军人会”的成立典礼。

在乡军人会的总部和支部分别设在中央和团管区司令部，分会和联合分会分别设在各市镇村和各郡。总部总裁由皇族担任，两名称做“会老”的陆军高级将官担任顾问，陆军大臣和师长（殖民地是相当于长官的军人）分别监督总部和支部，分会也受团管区司令的监督。靠这个仿效陆军编制、单方面由上到下指挥命令的军事组织把复员的军官、下士官和士兵强行编入。当然士兵的组织是其重点。分会定期对会员进行军事训练和作军事报告。这样，会员将会以天皇陛下的忠实士兵所具有的觉悟，以“军人精神”“在勤奋家业的同时为地方公共事业尽力”，站在“一个乡党的模范和指导者应

站的立场上”。

田中或者说陆军当局不仅把这个组织当作军事上的后备力量，而且在政治思想上努力将它建成军人掌握国民的组织。在前面部分引用过的一九一三年二月田中给寺内的信中这样写道：建议为了对付舆论对陆军的猛烈攻击，加强参谋本部，“从大局考虑，吾以为将来最应加以注意者乃六、七年之后妥善领导已达约三百万人之在乡军人会，并将其推广至一般青年之中，使国民思想健全发展，以巩固国家（等于叫军部）之基础。”他们所着眼的在乡军人会的政治意义在此已直接阐明了。而且这个目标已基本获得成功，在乡军人会成了反动的军国主义的最大组织（一九一四年六月海军也加入了在乡军人会）。一九一八年米粮暴动的时候，在乡军人会也在各地发挥了军队和警察的最好的助手作用。

一九一五年，田中还是参谋本部的少将时，他用国家权力将青年团这个全国青年的自治性的自由组织改编成全国统一的青年教育训练团体，使之同在乡军人会直接联系，制定出进行军事预备教育的草案，并在军部的威力下终于强迫政府通过了此案。同年九月，以内务大臣和文部大臣给地方长官的联名训令和通牒，按照田中的提案强行改编了青年团（摘自《田中义一传记》上）。

2. 垄断形成的开始及政党与民众

在陆军的政治势力强大起来，逐渐形成军部的同时，国

民开始反对“军阀跋扈”、攻击统帅权独立和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的声势也日益强大起来。其根源是经济结构和阶级关系有了这样一种新的发展：与成立军部同样，由于形成了殖民帝国，日本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发展，开始形成垄断阶段，大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得到加强，中小资产阶级也形成了单独的政治势力，新的小资产阶级中层广泛形成，工人、农民阶级与资本家、地主阶级的矛盾尖锐了。而且大小资产阶级的力量在政治上集中表现为政党势力的发展。

如前一章所述，资本主义产业在大资本从日俄战争中获得巨大的战争利益、大片殖民地和势力范围、以及在战后国家需要因军备扩张而增加的推动下，和庞大外资输入的帮助下，迅速得到投机性的发展。不同产业的会社数和已缴资金额如表14有了增加。

第14表 各产业会社数、已缴资金额增加表（1903—1914年）

		总 计	农 业	水产业	矿 业	工 业	商 业	运输业
1903	会社数	9,247	186	84	125	2,327	5,786	739
	缴纳资金 (千元)	887,606	2,307	1,590	23,297	148,396	449,058	262,956
1906	会社数	9,329	188	91	134	2,407	5,785	724
	缴纳资金 (千元)	1,069,706	2,943	4,733	47,432	198,567	498,014	318,017
1909	会社数	11,549	264	131	178	3,262	6,869	845
	缴纳资金 (千元)	1,367,164	7,999	9,205	175,508	367,277	630,848	176,327
1914	会社数	16,858	339	175	197	5,046	9,909	1,192
	缴纳资金 (千元)	2,068,786	14,644	18,104	165,546	662,510	973,854	234,128

摘自内阁统计局《企业发展和资本集中》。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农林、水产、矿业的资金率明显增

加，在小规模企业较多的农林和水产业，资本主义也有了发展，矿业已大规模化起来。而且，在一九〇三年还不到商业会社资金的三分之一的工业会社资金到一九一四年就达到了三分之二以上。

在工业当中以纺织业为主的轻工业也继续向前发展。平均每天纱锭的运转数由一九〇三年的一百二十九万锭，达到一九一四年的二百四十一万锭，产量由八十万捆达到一百六十七万捆。同时期里缫丝业机械产丝增加一倍以上，手工产丝减少，该部门也确立了机制工业。对满洲市场的垄断和因华北来满洲移民的大量增加而产生的对棉织品需求的增加是棉纺织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轻工业依然是工业的主力，但这一时期电力、煤气、自来水和造船、炼铁、机械器具等重工业也开始发达起来。尤其是电力业从一九〇七年开始了跃进。这与日本也掌握了高压、远距离送电技术和动力用电需要的大幅度增加有密切关系。一九〇七年工业电气化率是百分之八点八，蒸汽力率是百分之八十一·一，到一九一四年分别是百分之三十·一和百分之四十·九。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电气化率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工业电气化是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的一大标志（上林贞治郎《日本工业电气化发展史》，载小山、上林、北原《日本产业机构研究》）。

在炼铁方面，国营八幡制铁所自一九〇六年以来得到大规模扩建，一九〇七年由海军和三井资本及英国资本三家联合在室兰建起日本制钢所。此外，铃木商店、三菱、住友、大仓等财阀资本的制铁所也在日本国内或殖民地相继办起，

但日本百分之七十以上的铁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钢都产自八幡和日钢，而且几乎全部是军用。造船业以造军舰为主，由于海军的指导和帮助在重工业当中得到惊人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百分之八十的海军军舰是国产。民用造船也随着贸易和航运的发展而得到发展，到一九一一年，日本的船只保有总吨数为一百三十七万多吨，居世界第六位。只是钢材都是进口货，发动机也绝大多数来自进口。

在机械器具工业方面，车辆和电动机生产多少得到一些发展，电动机业自从一九〇九年东京芝浦制作所引进美国通用电机的资本和技术以来大量引进了外国的资本和技术。机床和纺织机及其它产业的机械生产尚不发达。

日本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在这段时期里开始形成。一九〇七年世界恐慌的影响引起了日俄战争后的反作用恐慌。正常的资本主义景气循环应该是恐慌——萧条——复苏——繁荣，而日本从这段时期到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一直处于慢性萧条，没有恢复到繁荣阶段。这是因为靠重税和国内国外债务而实行的庞大战费支出及战后继续进行的扩军、殖民地统治使政府增加了新的支出，结果战后的繁荣变成了趁物价昂贵进行的投机性的企业热。这样一来生产力虽然急剧膨胀，但是占人口百分之五十以上的农民及国民大众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比战时更加沉重，国内市场的发展受到阻碍。在殖民地管理上是军事优先于经济开发，即使在台湾那样经济开发先进的地方也是一种对当地人“只索取而不给与”的掠夺，不能使殖民地市场按照本国的生产力水平发展，加之仅支付外债的利息每年就达一亿元以上，贸易连

年出现巨额逆差，因此无力恢复繁荣。

资本在这场恐慌和慢性萧条中进一步集中，开始形成垄断阶段。除了最初就是财阀大资本垄断的电力业、重工业、海洋运输业外，在煤炭、铜、石油、白糖、肥料、造纸、啤酒等部门企业联合也在发展。在纺织业，一九一三年以三井系的钟渊纺和三菱系的富士瓦斯纺为首的七家会社就占了纺织联合会各社总资本的百分之五十七点四，纱锭数的百分之五十八点七。在制麻业，仅帝国制麻一家就占同行业投资总额的百分之九十六。大会社之间的价格协定、生产协定、联合出售等卡特尔活动频繁起来，而且最大的会社破坏协定使弱小会社陷入困境、不久便将其吞并的现象已屡见不鲜（美浓部亮吉《托拉斯·卡特尔·康采恩》〔改造社《经济学全集》〕。大岛清《日本恐慌史论》上）。

这种最初的垄断是由财阀系的银行和三井物产那样的垄断商社强行推行的不伴随生产集中的资本集中。财阀大银行在银行业的比重和支配产业界的力量更大了，而且到了一九一〇年，十六家大银行组织了认购国债的辛迪加，划时代地加强了对国家财政的发言权。关于银行团为向中国投资成立的辛迪加的情况已在上一章讲过。

在此期间，财阀新组织了统辖金融业和一般产业企业的最高机关，形成了垂直的康采恩。三井于一九〇九年把三井同族会改组为三井合股公司，使之变成持股公司，把下面以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为主的同族会经营的合股公司变成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三菱历来在三菱合股公司里设各项事业部，但从一九〇八年到一九一一年把银行部、矿山部、矿井部、

造船部、营业部和地产部相继改成独立核算制，实际上变成了由总社管理的康采恩（表面上改革是在一九一七年）。而且一九一二年，由于安田创建了合股公司保全社，住友把银行部从总公司分出变成独立的股份有限公司，加快了康采恩的形成。这些财阀的总公司或持股公司的资本为财阀本人和其家族所有，各直系会社的股份又全部为其股份公司所有，于是形成了一律不对一般市场公开的闭关的家族康采恩，这些会社又进而拥有有关产业的大会社的公开股份，或者对它通融资金，变成其傍系会社。

一九〇六年铁路国有有力地促进了形成财阀康采恩的垄断。当时除国营铁路外，主要的私营铁路会社包括干线在内共有三十余家，把它们都统一经营起来提高运输能力，这在经济上对发达的资本主义是必不可少的。不仅如此，把该铁路同朝鲜纵贯铁路及南满铁路连接起来，确立起一贯经营的军事输送网也是日本向中国的帝国主义的发展的当务之急。所以军部渴望已久的铁路公有便坚决实行了。政府花了将近投资一倍的四亿七千万元才买下以三菱、三井系的会社为主的三十二家私营铁路，付给会社利息为五厘的公债。这笔公债对投资的实际利率平均高达九厘六。特别是对山阳铁路和九州铁路等生意兴隆的财阀系铁路的买价高于其它，公债的利率也就更高了。这次卖得的钱又成了帮他们一举扩大事业、大大提高金融产业能力的资本。三菱的女婿加藤高明外相坚决反对这次铁路公有，加上他对无力控制军部介入外交感到不满，因而辞去了外相职务。尽管加藤或三菱不想把这种赚大钱的事业撒手，资产阶级一般说来却都欢迎国有

(大岛藤太郎《国有铁路的历史性发展》。原田胜正《国有铁路的成立》，载《近代日本的争论点》中卷)。

最初在这里形成的垄断是以闭关的财阀康采恩为首、同天皇制权力结合在一起的早熟产物，缺少近代金融垄断资本的主要特征——发达的重工业的基础，在轻工业也如在棉纺和棉织品的关系中所常见那样大机械工业与工厂手工业、家庭工业结合在一起，而且后者的产量在一九一〇年竟占整个工业产量的一半以上，^①而且其工业仍与半封建的寄生地主制密切相关。因此，还不能说这是正式的垄断资本主义，而只是它的开始。

这种资本主义也如上一章所述，一面引进庞大的外资，另一面又很快与国家资本结为一体急于输出资本，充分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性质。当时没有大资产阶级的帮助就无法顺利实行政府的财政政策。因此人们甚至说：“从日俄战争当时来看，掌握民间财权、有金钱力量的银行家们甚至在政治上形成一个势力集团，对第一次西园寺内阁（一九〇六年一月至一九〇八年七月）和第二次桂内阁（一九〇八年七月至一九一一年八月）来说，这些银行家是否满意内阁的呼声几乎成了直接决定内阁命运的神意天律”（摘自《内阁更迭五十年史》）。这一评价虽然是片面的，但第一次西园寺内阁倒台的重大原因之一就是受财界摒弃。继任的第二次桂内阁刚一组阁就在全国票据交易所联合会详细阐述了财政计划，要求给予支持，金融界对此表示欢迎。事实上，有了金融界的支持

^① 古岛敏雄《资本主义的确立》（载岩波讲座《日本历史》近代4）。

内阁就能继续存在，而一旦金融界反对就会自然垮台。

可是这些大资产阶级不仅在历史上受到天皇制权力的保护而成长，在进入垄断阶段时，尽管资本力量不足，靠天皇制的政治军事上的保障也能在殖民地或中国活动下去。因为在不断扩大的军需上找到了特别有利的源泉，所以他们虽然多次反对过于庞大的军费妨碍资本的积累，但也不是在根本上与天皇制对立，只是为了找到更好地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改良方法。处在这个阶段的日本资本主义在资本积累方面已经很少依靠半封建寄生地主的投资，而且其投资也在逐年减少；但作为保障工人的低工资，作为社会秩序的堡垒，它与寄生地主制又有利害一致的地方。所以大资产阶级在前一段时期继续拥护地主制。例如一九一一年关税自主权得到完全恢复，正式开始用关税保护国内产业。当时在对进口大米是否课税的问题上发生了激烈争执。一般说来产业资本家付给低工资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希望降低米价，因而反对课税；而财阀垄断资本则支持和帮助实现了地主阶级强烈要求的进口米关税。

日俄战争之后，寄生地主制继续扩大。二十世纪一十年代时全国百分之五十以上的水田变成了佃耕地，全部耕种户当中有百分之二十八是纯佃耕户，百分之四十是佃耕兼自耕，纯自耕只有百分之三十二左右。在经营面积中，一九一〇年耕种不足五反者占百分之三十七，耕种五反——一町者占百分之三十三，耕种一町——两町者占百分之十九，耕种两町以上者占百分之六，耕种三町以上者占不到百分之三，耕种五町以上者以北海道和东北地方为主在全国占百分之一二——一点三。后来全国的趋势是，五反以下的耕种者的比率

和实际数字都逐渐减少，两町以上者的比率也有所减少，实际数字却基本未变，五反至两町者增加了。然而单从自耕农来看，耕种五反至两町的农户也有减少的趋势。

政府的农业政策主要是增产粮食和保护地主制。前者是靠警察和村公所的力量强迫农民用盐水选种、共同秧田、秧苗条植等，靠加大劳动量的“改良耕种”实现每反增产；后者有上述进口大米关税和府县经营的强制性的粮谷检验制度，“改良耕种”也主要是为地主的利益而进行的。粮谷检验是检查米的质量、干燥程度、一袋的容量、包装好坏等等分出等级，为地主提高地租米的商品价值，而且使地主用检验手段强迫佃户获得好收成。有的地方的地主们商定对不合格米实行“罚米”，实际是增加征收地租。

小农和贫农越发贫困了。长冢节的小说《土》（一九一〇年）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于农民贫困，体质下降^①，思想“恶化”，影响了“良兵”的来源。军事当局和政府都很重视这一点。但政府的首要使命是拥护地主制，因此拿不出任何制止农民没落的政策。

随着产业的大规模化及其全国性的发达，工人的阶级联合和团结也发展起来。一九〇六年一月——二月，大凑的海

① 据一九〇七年千叶县佐仓联队区管内的征兵体检，在一万一千五百七十七名壮丁当中，有四千零七十三人是沙眼患者（占百分之三十五点二），为此而失明的有四百三十六人（占百分之三点八），因身材短小不合格的一千一百八十四人当中，有九百三十五人是直接不纳税者或是五元以下的纳税者，甲种合格者有百分之五十属于五至二十元的纳税者，五元以下和四十元以上的纳税者占百分之四十左右。这位调查者得出结论说：“国军素质之中坚乃国民之中等阶级。”（田边元二郎《帝国陆军史》，一九〇九年）。

军修配厂（一月）、东京石川岛造船厂（二月）、东京炮厂（八月）、吴海军工厂（八月）、大阪炮厂（十二月）和日本最早大工业化的、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最为重要的国营军工厂接连爆发了大罢工。大阪的一万六千名工人举行了持续十天的有秩序的罢工。在一九〇七年的恐慌的年月里，大工潮也集中发生在造船厂、军工厂和矿山。其中二月的足尾铜山的工潮是四千名矿工的武装起义，用三个连的军队才在第十天把它镇压下去。对六月的别子铜山的矿工起义也出动了军队。领导了足尾斗争的南助松夫妇是因在北海道夕张矿井领导罢工而被开除，来到足尾组织了工人团体“大日本劳动至诚会”的人物，他们与后面提到的日本社会党也有联系。从这些工潮当中可以看到工人开始作为一个整个的阶级跨越地区联合起来。

越来越多的农民也开始起来斗争。一九〇七年广岛县下四郡的佃户掀起了反对强迫“改良耕种”、要求减租的大规模斗争。各地还掀起了反对验米的斗争。宫崎民藏组织的主张把土地平均分给耕种者的“土地复权同志会”在他的家乡熊本及九州各地、山梨、长野、新潟、富山、三重、和歌山各县均有所发展。

自从反对朴次茅斯条约举行的火烧全东京警察署的大起义以来，各地纷纷爆发起义，城市的下层劳动人民也不再象从前那样在权力面前俯首听命了。例如从一九〇六年三月起东京市民反对市内电车票价涨价的斗争，坚持进行了近半年之久。

在工农、市民斗争的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思想和运动

也活跃起来。群众斗争一开始采取类似起义的激烈形式，以往的所谓的社会主义者当中，人道主义者和社会政策论者就后退，堺利彦和幸德秋水等马克思主义者则在思想上得到进一步成长。一九〇六年二月，组成了以堺为首的“日本社会党”。当时的首相西园寺公望稍微做出一点自由主义的姿态，政府同意社会党在“国法允许的范围内”活动。登记党员仅有二百人，但警察估计赞同者在全国有这个数字的几十倍。社会党通过领导上述反对东京市内电车票价涨价的市民斗争和支持足尾铜山的工潮等等，从单纯的思想宣传团体向领导群众运动的组织迈出了第一步，并于一九〇七年一月发行了日刊报纸《平民新闻》。

一九〇七年二月召开了第二次大会。在这之前曾去美国受到无政府工团主义影响的幸德秋水刚刚回国，他看到大会前夕爆发的足尾起义，一方面为“直接行动”的威力所感动，同时又深感专制天皇制下的议会主义的软弱无力。因此他在第二次大会上主张大罢工和工人的“直接行动”是革命的唯一道路，与一直主张获得普遍选举权和议会主义的片山潜等人形成尖锐的对立。大会虽以抽象的决议避免了分裂，但不久便被禁止结社，四月十三日《平民新闻》也被停刊。

后来，以幸德、堺、山川均、荒畑寒村、大杉荣等人为首的直接行动派日趋激进，片山等人则更加改良主义化。而且前者的势力有了发展。一九〇八年六月在欢迎社会主义者山口义三出狱的会上，当大会结束时，大杉、荒畑等人突然挥舞起写着“无政府共产”白字的红旗与警察激烈争吵起来，除大杉、荒畑外，堺等干部全被逮捕。政府把它作为重大

事件，分别对大杉判处了两年半，对堺、山川判处了两年的重刑。两个月后，天皇颁布了劝戒国民思想的诏书（戊申诏书）。

山县有朋等反动分子早就要求政府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和工人运动进行无情的镇压，这次所谓红旗事件——实际是大杉的恶作剧的举动，政府却故意把它搞成重大事件——更加深了他们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和憎恨，因此严厉谴责政府。当时，西园寺内阁因无法消除恐慌被金融界摒弃而无法下台，正好借这一事件辞了职。社会主义的势力和工农运动在客观上都只是一个小小的萌芽，但天皇主义者却常常为它将来发展的必然性深深担忧，把它作为最大的敌人。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当时的运动在政治上的重大意义。

镇压越残酷，真正的革命家斗志就越旺盛。幸德的妻子管野清和工人官下太吉等人认为天皇是压制革命的真正凶手，剥削的祸根，道德败坏的根源，计划暗杀天皇。政府很快就得知了消息，于一九一〇年五月到六月把管野、官下和他们的思想上的指导者幸德等当时在狱外的主要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一齐逮捕。完全以秘密审判形式，指控幸德是企图暗杀天皇的首犯，以“大逆罪”宣判了二十四人死刑，于一九一一年一月二十四日将幸德夫妻和官下等十二人处死（其余十二人减成无期徒刑）。政府把它宣传成“大逆事件”，以使对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恐怖和憎恨渗透到国民当中。政府还借此机会在警视厅设置了专门镇压革命运动、工农运动的特殊政治警察机构“特别高等警察”。特高警察制

的建立说明，即使这还是一个很小的机构，也在国家制度上表现出统治阶级和争取对当时的国家和社会实行根本革命的思想、运动是针锋相对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成立时期捏造出“大逆事件”并非出于偶然，它表现了帝国主义阶段最基本的阶级对立。

另外，“大逆事件”恰好发生在合并韩国的三个月前也不是偶然的。幸德等人曾于一九〇七年七月做出了如下决议：“我们尊重朝鲜人民的自由、独立和自治的权利。我们认为帝国主义的这种作法是违背全世界平民阶级的共同利益的。因此希望日本政府忠实于自己保障朝鲜独立的诺言”。尽管由于当时社会主义者的软弱，没有按照决议在民众当中广泛进行反对合并的宣传，但对政府来说，在即将合并朝鲜的时候是不能容忍一群具有这种思想的人存在的。

政府、统治阶级出于对亲手制造的大逆事件的恐怖，连“社会”这两个字也害怕起来，甚至禁止发行一本名叫《昆虫社会》的生物学书。幸德等人的死刑执行之后，天皇马上下达了关于“救济贫民”的敕语，并赐款一百五十万元作为成立“恩赐财团救济会”的事业费，想让国民感激天皇的“仁慈”。议会正好在本月把国家审定的历史教科书里对南北朝同等看待一事作为大问题提了出来。山县元老等人深为忧虑的是如果南北朝同等，那么楠正成也不成其为“日本的一个忠臣”，足利尊氏也不成其为“反贼”，国民的忠义观将根本颠倒，造成思想恶化的根源。最后，按明治天皇的圣断，教科书改成南朝是唯一的正统——尽管天皇是北朝的子孙——将原教科书的主编撤职“了结”了此事。这是继戊申诏书之后在日本帝

国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核心强制推行绝对无条件尊崇天皇政策的一环。

政府用最残酷的镇压使社会主义者们暂时沉默下去，但工人阶级的成长是压不住的。一九一二年正月，东京市内全线电车的六千名工人开始了井然有序的罢工。诗人石川啄木看到这一切，在日记里写道：“从保守的日本眼里看来，国民懂得团结就会胜利、人多就是力量一定是极端危险的”（一月三日）。这是片山潜和门生藤田浪人等人组织的斗争。同年三月末到四月，吴海军工厂也举行了七天大罢工，这次动用了海军部队才镇压下去。八月，基督教的改良主义者铃木文治等人组织了靠工人的修养和团结争取提高地位和互相帮助的“友爱会”。这是彻头彻尾的劳资妥协主义，但作为工人自己的唯一为工人的组织仍然迅速发展起来。建会时仅有十五人，四年之后便拥有两万名会员，在全国的工业区设立了支部，并具有了阶级的工会的性质。

在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这个帝国主义阶段最基本的对立产生的同时，以独立的产业资产阶级和中产阶级为基础的具有民主倾向的思想和势力成长起来，开始要求改革“军阀”和官僚专制。

一方面与特权大资本家抗衡的独立的产业资本家队伍在这一时期里扩大了。从前面提到的会社表（表14）里可以看到，一九〇三年有九千多家会社，到一九一四年增加到近一万七千家。当然会社职员等新的中间阶层也相继扩大，教师、医生、技术专家、报纸杂志记者、律师、艺术家等从事脑力劳动的人和受过中等以上教育的人形成了一个社会阶层。报

纸和杂志的发行量也由一九〇三年的一千四百九十九种增加到一九一四年的两千七百十九种，同时期内图书出版的数量由两万四千七百五十五种增加到四万六千五百六十三种。一九〇三年，师范学校、中学、女子中学的本科毕业生约有一万八千人，十年后超过了三万七千人，而且这个数字在逐年剧增。他们是地区的骨干分子。儿童义务教育的就学率在一九〇〇年就超过百分之七十，一九一〇年达到百分之九十八，学习年限也由四年延长到六年。初等教育的普及水平在这个时期已经达到了世界第一流（《明治大正国势总览》）。

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情况下，虽然有教育敕语在思想上的严厉控制，但言论的自由、议会政治的主张、对家长制的批判、个人主义、对穷人和受虐待的人的同情、人人平等的思想还是逐渐发展，并从一九〇七年起开始要求在政治上对天皇制进行民主改革。一九〇〇年前后出现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者起了先驱作用，日俄战争后从火烧整个东京警察署开始，民众的激烈斗争又使知识分子受到了震动。曾在二十世纪一十年代的下半期到二十年代的上半期成为民主改良派的理论指导者的东京帝大教授古野作造在一九二八年写的论文里，以自己的思想经历为例证明：“近几年民主的政治思想的开路人无论怎么说毕竟是一群社会主义者”（吉野《民主主义鼓吹时代的回顾》，载《社会科学》杂志社会主义专集）。

改良派的主要要求是男子普遍选举权、议会政治、反对藩阀官僚和军阀的专制。伊藤博文辞去自己组织的实为官僚御用党的政友会的总裁职务（一九〇三年）、西园寺当上总裁之后，特别是日俄战争以后，地方的资产阶级在阶级、政

治上的发展集中在地方支部，也反映到中央，给该会涂上一层非官僚的改良派政党的色彩。^①原敬等党的高级干部压制了青年议员的“激进”行动，他们所依靠的特权大资本——例如原本人也是古河财阀的大干部——也都希望对天皇制进行一定的改良。宪政本党于一九一〇年三月纠集反政友会的各派改组成国民党，但这个党从其前身改进党起就是反映大资产阶级要求的不彻底的改良党派。

在一九〇九年到一一年的历届议会上，政友会少壮派议员都提出男子普遍选举权法案，并在众议院第二十七届会议上通过（一九一一年三月）。然而在贵族院，却以“给穷人选举权等于背叛国家”，“普选是根据天赋人权论提出的，不符合我国的体制”等理由被全会一致否决。政友会和国民党的干部敢于允许该案在众议院通过，大概是早已料到该案会被贵族院推翻，只是为了给因“大逆事件”和继它之后的思想镇压而造成的令人几乎窒息的社会一线希望而已。从此，政党直到第一次大战后对普选没有再提一个字。政党干部已经变得如此改良了。

社会上对陆海军的攻击也越来越厉害。一九〇九年二月二十日至二十四日的《读卖新闻》具体而激烈地揭露了“陆海军内部的黑暗面”：“表面上假装廉洁，背地里干尽肮脏勾当，购买大量军需品经常勒索不少手续费，暗暗从中得到好处”。这里揭露出来的海军购买军舰时主管官员与订货社会的回扣交易，成了类似一九一四年导致内阁垮台的西门子事

^① 在山本四郎的《桂园时代的官僚和政党》（载《华顶短期大学研究纪要》第七期）一书证实了政友会的变化。

件^①式的政治问题和司法问题。预备海军上校太田三二郎于一九一一年在名古屋召开“海军讲演会”，从战略的观点批评了当时海军制订的扩充海军计划，断定它对日本的防卫毫无用处，而且揭露了海军内部的腐败，主张为了挽救这一切，“（一）取消只限现役将官担任海军大臣之军刀主义，应同各国一样由文官担任；（二）在军需部内应设军需官以外人员；（三）效仿陆军隐瞒定员人数虽系战略上提防外国，但此举既滑稽、又实际系不经法制局即进行大本营上奏之卑鄙行为。”《东京每日新闻》（八月六日）详细报道了这次讲演。

制定上述“帝国国防方针”时，陆军在日俄战争中已增设四个师，战后又继续增设两个师，这样共有十九个师。预定另外增设的六个师作为国防所需兵力，目前强烈要求先增设两个师，但每年都因财政困难未被批准。海军要按照“国防方针”组织八八舰队，仅第一期就需要五十万吨的舰艇。而且现有舰艇又落后于世界军舰的飞速发展，舰龄也老，必须逐渐更新舰艇。暂时要求从一九〇七年起按照八年计划建造一艘两万吨级的战舰、三艘一万八千吨级的装甲巡洋舰等共计二十五艘军舰十万一千七百吨和六只潜水艇。按一九〇七年度预算，舰艇补充费两亿五千万日元被批准，一九一〇年又被批准进一步增加。陆军对此非常窝火。

这时陆军和海军在争夺军备扩充预算上尖锐对立，陆军提出要防备俄国的报复战，需要控制朝鲜等，大肆宣传只有进入大陆，日本才能与列强竞争，所以首先应扩大陆军的军

^① 一九一四年议会揭发德国西门子公司行贿政府高级官员，当时的山本内閣因而辞职。——译者

备，海军只要能确保连结日本和大陆的海上制海权就足够了，德富苏峰等御用记者更是加倍卖力（《时务一家言》及其它）。海军不愧为海军，还要求大力扩军。一九〇二年十月，海相山本权兵卫曾在向天皇诉说扩大海军当务之急的“帝国国防论”中只要求军备能够防卫日本国土，而现在则要求能与美国海军在西太平洋决战的“制海权的军备”。佐藤铁太郎上校在海军大学上课时讲到：现在的国防应靠“移动性的军备而不是固定不动的军备”，现在是日本进行全球性发展的时候，为此必须首先发展海洋，这篇讲稿后来以《帝国国防史论》的题目公开发表（一九〇八年）。竹越与三郎在民间充当了散布南进论、扩充海军论、增设陆军师无用论的先锋（竹越《三叉文钞》及其它）。

陆军以防备俄国的报复战和统治朝鲜为由提出增设陆军师的要求没有说服力。因为事实上当时正在同俄国加紧协商，在朝鲜又有了一个半师的兵力和两千人的宪兵队。相比之下，由于当时正处在巴拿马运河通航、日美间加剧对立的时期，资本家和社会舆论都对海军的要求抱有好感。陆军难以容忍下去的是当第二届西园寺内阁依仗执政党政友会所占的绝大多数，按照资产阶级的强烈要求，于一九一二年秋制定明年度预算时竟要求缩减陆军费百分之二十，而陆军省预算实际上不仅没有缩减，反而要求再增设两个师。首相确信会得到资本家和国民的支持，因而拒绝了陆军的要求。

如果在从前，陆军也就会撤回要求了。但这次不仅没有撤回，而且在山县元老等人的支持下继续坚持。大概他们认为朝鲜合并后的形势必须加强军事控制，而且这次是出于想

趁辛亥革命之机占领满洲的野心，所以不肯再让步了。此外，与海军的对抗意识也起了很大作用。结果，军务局长田中、军事课长宇垣等人逼迫陆相上原勇作不经过首相直接向天皇提出辞呈。他们还说服山县和桂等陆军的长老，不让他们推荐后任陆相。为此，西园寺内阁不得不一齐辞职。军部的大本营上奏权和大臣现役武官作制为倒阁的武器发挥了威力。

对军阀蛮横的谴责马上在全国掀起。在此之前，明治天皇于一九一二年七月病逝，由智力差的大正天皇即位，桂太郎当上了内大臣兼侍从长。但西园寺内阁一倒台，桂便奉诏出宫担任新内阁的首相。诏书是由内大臣起草的，所以桂是以天皇的名义自己把自己任命为首相的。

这件事对国民反对桂和他背后的军阀等于烈火上烹油。海军军阀见此情景认为削弱陆军军阀的良机已到，拒绝出任海军大臣。桂又请求颁发留任前海相的诏书，勉强组成了内阁。接连的诏书政治越发使舆论沸腾起来，掀起了空前的“拥护宪政、打倒阀族”的国民运动。不过“拥护宪政”实际上还是有待今后争取的事。

以《万朝报》、《东京朝日》为主的全国进步报纸站在运动的最前面。一九一三年一月十七日，从北海道到九州的全国四百余名新闻记者代表聚集东京，召开全国新闻记者同盟大会，发出“拥护宪政、督促国会、扫荡阀族”的宣言，制定了运动方针。这时，政友会的尾崎行雄、国民党的犬养毅等人见有机可乘，也公开声讨内阁，想把这场运动变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庆应大学出身的大资产阶级为首的俱乐部“交询社”也出钱资助尾崎、犬养等人。运动真正成了全民性的了。

新闻记者同盟与这些组织结成联合战线，但看出这场斗争有被利用为政党野心的跳板的危险性，《大阪朝日》十七日的社论指出：政友、国民两党“倘若中途变卦，不真正尽力拥护宪政、消灭阀族，彼等亦将与阀族相同皆为国民之公敌”，并指出如果这样，报纸将诉诸民众，与民众一道彻底攻击他们，使他们在自己的选区威信扫地（朝日新闻社编《明治大正史》言论篇）。

把这次所谓的第一次拥宪运动的主力 and 领导力量说成是交询社的大资产阶级和尾崎、犬养等政党的“进步派”是完全错误的。他们不过是利用了进步的报纸和民众运动。西园寺和原敬等政友会的首脑是在看到国民运动高涨之后才决心打倒内阁的。国民党中的大多数人此时已被桂收买。桂企图以此为中心组织新政党，“中央突破”议会。这笔资金主要是由三菱出的。

二月五日，在议会上提出了尾崎等人声讨内阁的决议案。政府命令休会，此期间桂在宫廷活动，请天皇命令政友会的西园寺总裁支持内阁。西园寺是公卿侯爵，因此无法再活动，但他非但不压制党员的活动，反而暗中鼓励“各位要尽到代表国民的议员的责任”。这样民众的呼声和进步的报纸战胜了诏书。当二月十日议会复会时，无产阶级劳苦大众、青年、学生及小商人等几万名群众从清晨起就涌向议会。政府出动了五千名武装警察，围成几层企图阻止民众接近议事堂。于是走在民众前面的议员怒斥道：“不让议员出席议会吗？”带路让民众包围了议会（今井清一《大正民主》）。当时的议员虽然远非革命家，但也不是仅从车上向包围议事堂的民众挥手

致意“辛苦了”的那种人。桂首相决定解散议会，把此事通知给议长大冈育造。大冈指着议长室窗外的民众对桂说道：

“就在议院门前骑兵已把民众蹂躏，正在制造流血事件，若再解散议会说不定群众会造反，桂首相必须承担这一责任”。

桂害怕引起内乱，决定辞职。原敬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事到如今桂首相除辞职外已走投无路，若再不辞职将引起革命骚动”。

已决定辞职的桂又休会三天作准备工作。民众不明休会的真正原因，误认为是桂的反扑，情绪更加激昂，分成几路涌进市里，放火烧了《国民》、《大和》等几家桂的御用报社。首都的民众起义很快发展到大阪（十一日）、神户（十三——十四日）、广岛（十六日）。特别是在十七、十八、十九日的三天里，京都发生了激烈的骚动。而且这时桂已于十一日宣布了辞职。由此可见，桂如果解散议会不知会闹到什么地步。如果有敢于起来领导的组织，会给军阀以致命打击，实现政党内阁、议会政治的改革也会容易起来。然而，政友会干部最害怕革命，犬养等国民党的残余虽然也痛恨桂，但做梦也没想到去革命。

大正政变因为是民众运动在进步的报纸领导下自己打倒了内阁，在日本历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八年前火烧东京警察署，当时的民众曾受到军国主义煽动者的利用，而大正政变则是自始至终的民主化斗争。可是报社不能成为政治变革的领导，进步的记者们也无法脱离报社，拥有一个单独而持久的组织，因此整个运动成了现有政党特别是政友会挤进下

届政权的跳板。后来在元老的推荐下，由海军大将山本权兵卫组阁。政友会成了执政党，继西园寺之后担任总裁的原敬也参加内阁，当上了内相。

从大正政变到山本内阁时期，攻击保护军部的堡垒、统帅权的独立和陆海军大臣武官制的舆论更加高涨。田中义一少将在政变时期的二月二日写给朝鲜总督寺内的长信中（前面已引用过）劝说，这时陆军和海军应紧密团结在“军部”周围共同对付政府和议会、政党，接着说到桂的新党“却主张改革有关陆海军大臣方面的官制，真令人担心”。连桂都受到如此看待，可见国内反对军部大臣武官制的舆论有多么强烈。田中预料到武官大臣制总有一天会被废除，写下了对策：“此时特别需要参谋本部之活动。而且考虑到今后之趋向，予以应一如既往将动员编制（从陆军省）转至参谋本部，以确立坚固基础于政界斗争之外尤为重要。否则将有遗恨千古之虑。”

山本内阁在这种形势下成立，于是不能不面对社会舆论做某些妥协的改革。即第一，把陆海军大臣的任用资格由现役将官放宽到预备役；第二，修改文官任用令，把包括警察总监和内务省警保局长在内的一部分高级官员改为自由任用制；第三，实行精简行政，在一九一三年度岁出预算上比前内阁方案消减了百分之十三。

不过因此就说这是山本内阁特别是原内相的功绩或山本内阁相对地进步，那就错了。无论谁在这个时期组阁，不做些这一类的事是安抚不了国内的。而且山本内阁虽然把军部大臣的任用范围放宽到预备役，正象田中对寺内所说的那样，

由于把编制及动员等业务由陆军省转到了参谋本部，“从此总参谋长的势力更大了”（摘自《田中义一传记》下）。当时有个预备役军官名叫西本国之辅的，是废除统帅权独立的热心主张者，他在进步的国家主义者杂志《日本及日本人》（一九一三年七月一日刊）上写了题为《改革贻祸的军相官制》的文章，严厉批评说：山本内阁所推行的上述对军部大臣制的改革与加强参谋本部结合起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提高了军部的独立性，留下了后患。法学家林毅陆也在七月十五日的同一杂志上指出：尽管放宽了陆军大臣的资格却缩小了其权限，加强了对政府和国民不负任何责任的参谋本部，那正好反过来了。应该加强大臣的权限，加重他对政府和国民的责任，并尽量缩小象参谋本部那些不负责任的部门的权限。

尽管内阁缩减了预算，却不废除民众久已盼望废除的在日俄战争的紧急特别税中的称之为苛税的纺织品消费税和通行税，也根本不听取小工商业者坚决废除营业税的要求。缩减预算只是在公债的升值上使银行满意，对民众没有任何好处，而且在这次缩减当中只有首相麾下的海军的扩充预算全部通过了。

总之，在群众眼里看来，山本内阁不过是由萨摩的海军阀代替了长州的陆军阀的内阁。进步的报纸对这个内阁也始终没有停止打倒阀族、拥护宪政的斗争，它与中小工商业者要求废除营业税及其它苛税的斗争结合而形成的群众运动随着一九一四年议会季节的到来更加活跃起来。据江口圭一的详细研究，^①同年一——二月以废除营业税的要求为主，同时

^① 江口《一九一四年的废税运动》（载井上清编《大正时期的政治与社会》）。

要求废除纺织品消费税、通行税的集会和决议在全国竟达六百多次。主力是团结在各个同业公会的小业主，而曾在这次运动的第一次高涨时期的一八九七年领导过运动的大中资本家这时却十分消极，想使运动停留在单纯地要求政府减税的交涉上。小业主阶层的群众却迈开大步，向争取彻底废除的斗争前进，并开始对课以这一重税的“阀族”的军国主义进行批判。拥护宪政的运动在这一巨大动力的推动下向前发展了。桂太郎于前一年秋天刚刚组织了新政党“同志会”就病逝，加藤高明继续搞，于同年末成立了“立宪同志会”。现在这个党作为在野党也高呼“打倒阀族”，而前一年他们还在为最坏的阀族桂等长州军阀效劳。去年还十分英勇的政友会今年成了山本内阁的忠实的执政党，国民党的首领犬养也与山本串通成一气。

这时，海军部内部多年来在订购军舰及其它军需物资时受贿一事被揭露出来（西门子事件），整饬海军与打倒阀族联系起来，二月十日劳动人民、青年、学生、小工商业者等几万名群众与前一年同样包围了议事堂。议会绝大多数作为执政党的政府派出四千名警察和一个营的陆军部队驱散了群众，而且将在野党的弹劾内阁案和撤销营业税法案等全部否决。政府、执政党就这样践踏了民众的要求，但在它刚刚宣告胜利时，阀族内部陆军、山县派的官僚同海军、非山县派的对立变得激烈化，山县等人指使贵族院否决了预算案，因此山本内阁被迫全体辞职。

后来山县等元老们决定让山县直系的官僚清浦奎吾组阁。海军军阀猛烈反对，终于使组阁失败。首相候补人选已

找不出来，组阁者也陷于困境。最后，他们决定让伯爵大隈重信组阁，利用他来要求增设两个师。大隈曾经是政党的首领，在民众当中有些威望，也有当过首相的经历。大隈当了首相，立宪同志会的总裁加藤高明任外相，使该会成了执政党（一九一四年四月）。

民众的力量在去年成了资产阶级、地主阶级的政党和海军军阀的跳板，今年又被陆军和最反动的官僚派利用来打倒内阁。但重要的是在这些事件中，民众作为动摇政局的政治势力登上了政治舞台。虽然由于民众还没有自己的指导机关，这种力量成了无节操的政党的跳板，甚至被民众的敌人——军阀所利用，但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用说政党，就连“阀族”，若不设法利用民众运动，也不能贯彻自己的政策，打倒政敌。

一方面军部的成立使它能在最高处指挥日本的政治；另一方面民众的政治势力具有了上述意义。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的反动，是自由和民主的对立物，而同时在帝国主义阶段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对民主主义的要求必然会高涨和增强，这就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规律^①在日本帝国主义成立时期的表现。在这种情况下，政治上的反动不是表现在成熟的金融寡头制上，而是在军部的成立上。在民众方面，无产阶级虽然起了先驱作用，但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阶级的政治势力，还只是作为“民众”的一部分出现，因此才有前几章探讨过的日本帝国主义成立的方式和日本在垄断资本主义的最

^① 参阅列宁《论对马克思主义的讽刺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版第二十三卷）。

初形成阶段很快就在政治上成了帝国主义等政治表现。金融寡头制和无产阶级领导的明确化是在正式确立金融垄断资本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

结 语

日本帝国主义的确立 及其各种矛盾

1. 第一次大战与日本帝国主义

在反对军阀官僚专制的民众斗争的高潮当中，作为元老们的穷极之策而成立的大隈内阁，以其首相的经历与为人，使民众怀有这样一种希望：本届内阁不是萨长藩阀的政权，将会推行立宪政治。然而大隈内阁却辜负了这种希望。这时，大隈本人正在为不放弃这种意外到手的政权而专心致力于争取井上馨和山县有朋等元老们的支持。相当于副首相的外相加藤高明曾抵制过元老们介入外交，但其目的并不在于实行国民外交，而只不过是出于外务官僚的一己之见而已。而且，内阁的实权掌握在警官出身的山县派的农商务相（后为内相）大浦兼武等手中。

大隈内阁的主要施政纲领是“清除弊政”，“充实国防”，“减轻国民负担”。但第一条意味着击败井上和山县所需要的政友会；第二条是增设陆海军所要求的二个师和加强军舰。这种扩军与减轻国民负担格格不入；第三条政策无非是拢络人心的谎言而已。而且，这届内阁首先着手作的重要事情，

是设置一九一四年六月的“防务会议”。这是由首相与外相、藏相、陆海相、总参谋长、海军军令部长组成的“审议有关陆海军备设施的重要事项”的机关。设置的目的是为了在谋求陆海军备同财政、外交之间的协调的同时进行扩军。

在大正政变期间，桂首相与井上馨等为谋求财政与军备的协调曾设想“国防会议”^①。桂设想的具体内容尚不清楚，但据推测，他在反对军阀横暴的民众舆论的压力下，并不仅仅将“国防会议”作为使军部的要求得以顺利通过的机关，而且似乎有着加强政府对军备的发言权的意图。关于这一点，在前面引用过的田中少将给寺内大将的信中，有过这样的话：桂正在组织的新政党“有导致主张（改革）陆海军大臣官制之虞，眼下桂公虽称意不在此，但实为将来不可逆料之事”，假如桂对军部大臣武官制有所动摇的话，那么他所设想的国防会议便有可能也考虑到多少压制一下军部，以缓和民众的舆论。

另外，在政党方面，大正政变的主要人物之一的犬养毅等所谓护宪派，在一九一四年一月的第三十一届议会（山本内阁）上提出过“关于开设临时国防会议建议案”。提案说，既然身为首相，便不应该对整个国防计划一无所知，应设立直属天皇的谘询机关以便政府与军部共同研究整个国防计划。

这些，在当时的情况下，政府如果凭借民众舆论决心着手解决的话，是可以办到的。但大隈内阁的防务会议，看起

^① 小林幸男《举国一致论备忘录》（载《法学》十二之三、四）。

来似乎同犬养等人提议的“国防会议”相似，而实际上则完全不同。它同策划制定国防方针本身全然无关，只不过是根据军部制定的国防方针来由首相、藏相、外相同军部协商如何实现军部所要求的增强军备，只不过是给军部的专制加上薄薄的一层面纱而已。与此相比，桂的设想反而好一些。

而且，在设立防务会议的同时，根据其决定，向当时召开的第三十三届临时议会提议并通过了海军军备补充追加预算。增设二个师的方针也在防务会议上决定下来。这如果向议会提议的话，那末政府便可能由于在野党政友会控制众议院半数以上的席位这一点而面临困难。考虑到财政，扩军也是无法办到的。

当时国家财政濒于崩溃。一九一四年末外债额约二十亿元，超过同年租税收入的六倍，日本甚至都难以支付其利息。贸易连年入超，正币的现有额，从一九〇六年的四亿九千五百万元减少到一四年的三亿一千四百万元，而且其大部分都在外国，政府手中的正币仅为八千几百万元。经济界苦于慢性萧条，一九一三年，几家中小银行倒闭，就连半官半民的日本兴业银行也趋于倒闭。一四年八月，作为大阪的股票、米、三品（棉花、棉纱、棉布——译者注）交易所的机关银行的北滨银行也处于停止付款状态。其后名古屋市的三家银行也发生挤兑，由于日本银行的救济声明，才没波及到其它银行。

以这种经济状况为背景，人民群众强烈而普遍地要求废除营业税及其它杂税。自一九〇五年火烧东京警察署以来，不堪忍受日俄战争以后变本加厉的压迫和剥削的民众，以在

大正政变、西门子事件中所表现的那种激昂情绪，一遇机会，就冲上街头争取实现自己的要求。就在名古屋银行出现挤兑后的九月份，发生了不满市政腐败、反对电车车票涨价的五万名名古屋市民纵火烧毁电气铁道公司车库和大股东住宅的事件。

并且，在国际上，如上一章所述，同美国的矛盾以及同中华民国、朝鲜、台湾的民族运动的矛盾日益尖锐。

这不仅仅是一个大隈内阁，而且是天皇制与整个统治阶级所面临的深刻僵局。这时，一九一四年八月四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五天后，元老井上在写给大隈首相和元老山县的信中说道：“此次欧洲大难对日本国运之发展乃大正新时代之天佑，日本国必须以举国一致之团结享此天佑”，停止一切减税、废税等一党一派的利益之争，巩固财政基础，团结英法俄三国，“确立日本对东洋之利权”，“怀柔中国统一（论）者”，以取得同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的世界地位。无论大隈、山县还是其他元老、将军都对此表示“深有同感”。

实际上，日本的统治者们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场人类的灾难，打开了他们的深刻僵局，确立了帝国主义。

政府于八月四日接到英国希望在威海卫和香港受到德军攻击时提供援助的请求之后，以为良机已到，便于八日在政府、元老会议上决定对德宣战。这样一来，英国担心日本的参战反而会损害英国在中国的权益，便反对日本参战，同时取消了先前的求援请求（十日）。然而日本政府认为不能取消参战的决定，强行参战，八月二十三日对德宣战。

对于日本的参战，《东洋经济新报》杂志表示反对，更多

的人即使不表示反对也持怀疑态度或认为是拙劣的策略。而且，宣战后的第三十四届临时议会的预算委员会强烈反对把本来应包括在上届议会提出的海军补充计划中的驱逐舰建造费列入临时军费，这里面含有反对大隈内阁、反对参战的真实意图。对此，大隈内阁诈称：“决不强求举国一致，对此若同意则要一致同意，若反对则须一致反对”，因而，甚至出现了不信任首相的呼声（大日本帝国议会志刊行会《大日本帝国议会志》第九卷）。最后，虽然委员会和国会也都全场一致通过了临时军费预算，但在天皇宣战之后却仍然出现这种情况，这在帝国议会上则是空前绝后的。

日本参战的目的在于：消灭山东省的德军，夺取该地的德国利权，夺取德属南洋群岛。但其更大的目的，则是企图趁此机会将南满洲、内蒙古变为事实上的殖民地，进而在中国全境确立日本的帝国主义势力。于是，在攻下青岛的德军要塞、接收从胶州至济南的铁路与矿山的德国利权之后，非但不撤军，反而增强兵力，在这种恫吓之下，于一九一五年一月将臭名昭著的、分五项共二十一条的要求强加给了中国的袁世凯总统。关于二十一条，现在一般概论书上都有记载，而这里急待作出本书的结论，所以其内容和交涉过程便不得不省略了。堀川武夫的《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论》详细叙述了其交涉经过。第一项是继承山东省内的原德国利权及其它共四条；第二项是将内蒙东部与南满洲变成事实上的日本殖民地，共七条；第三项是日中合办汉冶萍公司；第四项是不割让中国沿岸及岛屿给第三国；第五项是在中国政府的军事与财政部门设日本顾问，日中合办中国警察，日本垄断中国军队的

武器供应，日本人取得在中国的土地所有权、传教权、铁路和港口的利权要求等共七条。

第一项到第四项便已是在此以前的任何帝国主义都没有要求过的内容广泛的条款，而第五项则企图将中国全国的军队、警察与财政置于日本人的支配下，剥夺中国民族的主权的实体。这项条约摆在袁世凯面前时，他对日本人顾问“以颇为愤慨的语气说道，日本应以平等友邦对待中国，为何常待之如猪狗、如奴隶？”这种说法也是理所当然的（《远东国际政治史序论》）。就连卖国的袁政府也感到难以全部接受，便向英美透露了情报。英美政府也向日本提出了强烈抗议。中国人民大众的反对则更为激烈。日本在向外国辩解说第五项不是“要求”，而是希望的同时，仍企图坚持不肯让步，但因中国强烈抵制，只得将第五项撤消，而将其它条项，以最后通牒的方式威吓，终于强加给了袁政府。之后，中国人将袁政府被迫接受该条约的五月九日长期作为“国耻纪念日”，坚定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决心。以美国为首的列强帝国主义对日本不信任与反对的情绪，也因此而进一步强烈起来。

在日本国内，没有任何人对这种骇人听闻的帝国主义要求，而且是以趁火打劫的方式强加于人的事件在原则上表示反对。曾经反对日本参战的《东洋经济新报》的社论等，虽然也曾嘲笑第五项要求及其撤销堪称为缺乏外交技术常识的愚蠢，但在原则上并没有反对。即便是当时就已经对民主舆论的形成起很大作用的东京帝大教授吉野作造，竟也支持政府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的决定。他说“事已至此，除发最后通牒之外无其它手段可取”（吉野《对华交涉的真正批判》，载

《中央公论》一九一五年六月号)。他在这一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中还说道：“在列国竞争中国的大势”中，必须承认日本也切实需要“加入扩张势力范围的竞争国伙伴中去。”（吉野《日华交涉论》），但因一九一五年列强竭尽全力应付大战，已顾不上瓜分中国了。

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袁世凯威信扫地，与之同时反对他企图当皇帝的中国革命派与反袁派的共同斗争，在一九一五年末发展成为武力倒袁运动。日本政府见到这种形势，于一九一六年三月七日在内阁会议上协商了对华基本政策，认为“此时帝国应采取之方针，在于确立优势于中国，使该国民认识帝国势力，以此为日中亲善（中国隶属于日本）之基础”。这样就必须将袁逐出权力范围之外，但日本政府不便从正面向袁施加压力，因此决定援助中国反袁派（其具体政策亦已决定，这里省略）。同时决定：“帝国民间有志之士中，有以排斥袁氏为目的而同情并欲通融金钱财物与中国人者，帝国政府对此在不负鼓励责任之同时而默认之，此乃符合上述政策之举。”在这次内阁会议期间，法相尾崎行雄极力主张“关于中国问题，不应受列国协调之束缚”（《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但必须看到无论是他，还是犬养，所谓拥护宪政派虽说曾经攻击军阀，反对扩军，然而他们的帝国主义性却都不亚于任何军人。

政府的这一方针鼓励了所谓“大陆浪人”和参谋本部在满洲的侵略行动。关东都督府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一方针。从此，参谋本部阴谋实现前边提过的第二次“满蒙独立”，土居市之进上校和小矶国昭少校被特意从中央派往满洲，国都督府协

力负责宗社党的起兵准备工作。但外务省为了排袁和“满蒙独立”的同一目的，则认为应该利用奉天军阀张作霖而干扰土居等人的活动，关东都督下属的独立守备队长和驻满师长也主张利用张。不仅如此，即便在参谋本部，也是众说纷纭，上原总长与福田第二处长企图利用宗社党，而田中参谋次长则要利用张。五月二十七日，宗社党利用派图谋炸死张，但没有成功。张对日本的真意究竟在何处感到怀疑。不料六月六日袁病死，黎元洪继任，因此，参谋本部与政府协商，决定中止一切“满蒙独立”运动。然而土居等人依然利用宗社党与蒙古的巴夫查布部族策划起兵，八月十四日在满铁沿线的郭家屯集结。但他们于九月二日按照日本政府、军部的要求悄悄地解散了（《日本外交文书》大正五年第二册。《对满蒙政策史的一面》）。十二年后张作霖被炸死，又过了三年，关东军与参谋本部发动了所谓“满洲事变”这一占领中国东北地区的战争。当时的主要人物之一就是小矶国昭，也就不是偶合了。

日本以大战为良机，这样一步步地推行着对中国的侵略。在这期间，加藤外相由于在强加二十一条时表现不力，同山县的关系日益恶化。加藤本来就盲信日英同盟，而山县等则看穿在日本同美国的对立加深时势必产生同美国盟友英国的对立，并且英国国力已不比以往，每况愈下，主张对日英同盟能利用多少就利用多少，和俄国签订协定以进一步瓜分中国，因而同厌恶俄国的加藤处于对立状态。结果，加藤于一九一五年八月辞去外相职务，由石井菊次郎继任，并于二六年七月，缔结了第四次日俄协约。前三次协约为瓜分满

洲与蒙古的协约，而第四次缔结的则是以全中国为对象，同美国侵华相抗衡的日俄秘密军事同盟。

这时，大隈内阁已增设了两个师（一九一五年六月），日俄协约亦已签定。本来就不喜欢大隈内阁的山县等人感到他已没什么用处，便操纵贵族院于一六年十月迫使其内阁总辞职。之后由山县嫡系寺内正毅大将辞去朝鲜总督职务而组织了纯官僚内阁。当时的日本正处于大战繁荣之中，没有废税、减税等民众运动。政党方面，政友会与国民党热中于推翻大隈内阁及其执政党宪政会（同志会的前身，总裁加藤），宪政会则致力于谴责政友、国民两党，甚至都没有打出“拥护宪政”的旗号以阻止寺内军阀内阁的成立。《朝日新闻》等也只是攻击元老与新内阁而已。

寺内内阁乘中国当时正出现的军阀割据的混乱状态，为使黎元洪大总统的国务总理段祺瑞成为日本的傀儡，从一九一七年六月至一八年九月，向段政府提供了总额为一亿八千六百万元的借款，名义上是建设铁路和救济水灾，但实际上是政治、军事资金，而且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抵押。作为寺内首相的个人使节从事借款谈判的西原龟三在其自传中说，这才是日本没有任何私欲的、纯粹为了日中亲善的借款。但寺内内阁在一九一七年一月九日的内阁会议上决定的对华政策则是：“为使中国维护其独立及领土完整，改善一切政务，帝国应以诚意指导、启发，以增进两国亲密交往”。这完全是蔑视中国，说明日本的绝对优势是不言而喻的。而且认为“帝国除在中国有特殊利益的地域的问题之外，应尽量在同各国保持协调的同时，努力使各国逐渐承认帝国的优越地位”。

其基本政策是，除确保对日本有“特殊利益的地域”（主要是满蒙与山东省）的垄断之外，要在中国保持对列强帝国主义的优越地位和势力。所谓西原借款就是按照这一政策，已成为战争暴发户的日本由于手头富裕，而拙劣地投入的对段政权的收买费。

如果说借款是胡萝卜政策，那么还有大棒政策。即，一九一八年三月，交换了关于《共同防敌》的日中公文。根据这个换文，五月陆军与海军分别将《日华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强加给了中国。协定规定：日中两国基于其“地位与利益平等的观点”，两国“共同防卫远东”，两国军队“共同作战”，为此，日本在中国军队内设置“联络员”，日中共同在中国领土内建设、使用军事基地；其目的在于攫取对中国的军事领导权。这一点对于在日美安保条约下生活的现代日本人来说，是容易理解的。另外，这项条约当时还策划了日本为干涉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而占领西伯利亚的战争，因为这场战争可以和使用中国领土与中国军队的方针结合起来。中国的学生、工人、商人认为这是卖国协定，予以强烈反对（井上清《干涉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战争》，载《日本的军国主义Ⅱ》）。

日本帝国主义如此深入地在中国扩张势力，这必然使中国的反日民族斗争发展壮大起来，同时也加深了日本与美国等其它列强帝国主义之间的对立。但日本的老竞争对手俄国在大战中连吃败仗，并且国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迅速发展，无论如何也不再具有同日本竞争的能力，反而向日本乞求武器、军需品和战费的援助，日本也向其提供了这些，并缔结了上述的日俄协约。之后，俄国在一九一七年发生了三月革

命，沙皇被推翻，成立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临时政府请求日本认购一九一七年九月发行的一亿五百万元的俄国财政部证券，寺内内阁满口答应（黑田甲子郎《元帅寺内伯爵传》）。对维护君主制、哪怕是外国的君主制也特别敏感、热心的日本统治阶层，向三月革命后的俄国的反革命临时政府提供如此巨额借款，这说明日本政府对支持俄国反革命政权是何等的积极。所以说，日本同俄国之间，在十月革命胜利、苏维埃政权成立之前，是没有任何对立的。

英国虽然很不愉快地注视着日本对中国旁若无人的入侵，但由于全力应付对德作战，甚至不得不请求日本海军援助进攻地中海的德国舰队，因此根本不可能采取手段来对抗日本。不仅如此，英法还无可奈何地承认在协约国战胜时将日本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原德属南洋群岛，作为日本小舰队出动地中海的代价而划为日本属地。

日本的最大敌人是美国帝国主义。在得知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时，美国舆论便一致谴责日本，威尔逊总统甚至还准备出头援助中国。后来认为在表面上直接干涉日本有些不利，便暗下决心在适当时期坚决干涉日本，暂时先注视事态的发展。

在这期间，大战变成了交战国当初丝毫没有预想到的长期消耗战，美国通融给协约国的二十亿美元的回收也令人担心。而且，在俄国，革命运动向前发展，沙皇制度濒于危机；在英、法等国，革命运动也在发展。美国断定为了压制革命，维持帝国主义的世界体制，就必须尽快使协约国军取得胜利，便于一九一七年二月同德国断交，在俄国三月革命

后的四月六日宣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是美国也没有了为阻止日本入侵中国而进行干涉的余地。于是，美国政府在参战时就将中华民国政府拉了进来。美国企图使中国成为协约国的一员而将其在国际会议上置于与日本同等的地位。察觉到这一点的日本政府猛烈反对中国参战，最后，协约国以承认日本继承山东省的原德国利权的秘密条件同美国交易，承认了中国参战。中国于一九一七年三月同德国断交，八月十四日宣战。

参战后的美国，愈加不能与日本较量了。于是，一九一七年十一月，日本代表石井菊次郎驻美大使同美国国务卿兰辛交换了关于中国的公文（石井·兰辛协定）。据此，美国承认“日本国在中国具有特殊利益，在同日本领土接壤的地方尤为如此”。但据说这并不具有损害中国的独立或领土完整的目的。至于如何解释、运用这项暧昧的换文，则只有根据日美两国的实力了。美国虽暂时对日本作了表面上的让步，但却企图在日后有机会时再捞回来，大战只不过是將日美两帝国主义围绕中国逐年增大的矛盾、对立暂时变得有利于日本而已。

在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日美的对立又发生在干涉苏维埃俄国的战争上。虽然美帝国主义也希望干涉苏维埃俄国，但从远东西伯利亚方面的干涉不得以日本为主力，这有等于将满洲与西伯利亚送于日本手中的危险（他们就没想到干涉会失败）。因此，美国最初就反对由日本担任主力从西伯利亚方面进行干涉。但是，当它看到日本将要不顾美国的反对而干涉的形势后，于一九

一八年八月，美国也出兵进行联合干涉以牵制日本。所以出兵之后，美军与其说是同苏俄军队、游击队、人民作战，倒不如说是竭力监视日军（《干涉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战争》）。

2. 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

世界大战不但使日本帝国主义肆无忌惮地在中国扩张势力，夺取南洋群岛，甚至敢于藐视美国，而且在经济上为日本开辟了空前繁荣和资本主义大跃进的道路。这是众所周知的，无须在这里详细论述。从大战开始的一九一四年到大战结束的一九一九年，农林、水产、矿工业的总产量，折合金额增加两倍以上，特别是工业生产增加四倍以上，其在总生产额中所占的比率从百分之四十四点八上升到百分之五十六点八。造船、炼铁、机械工业以及化学工业飞跃发展，重化学工业也确立起来。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日本都成了工业国。只是钢铁的自给率在一九一八年仍仅为百分之四十八，精密机械和大型机械也仍然依赖进口，重化学工业在技术上则全面依赖欧美。在这期间，工厂工人数量从约九十五万八千人增加到一百六十一万人。由于出口、海运以及贸易外收入的猛增，日本从一九一三年债务总额为十二亿二千四百万元的债务国，到一九一九年成为十三亿七千一百万元的债权国。尤其是以纺织资本为主的企业资本在战争期间大量进入中国。据樋口弘的调查，一九一三年对中国投资的总额为四亿八千五百万元（其中直接企业投资为三亿八千五百万元），

而在一九一九年则为十四亿三千九百万元（其中直接企业投资为八亿八千五百万元）（《日本对华投资的研究》）。

与此同时，资本大量地积累、集中起来，大产业资本与大金融资本结合而成的金融垄断资本主义，以四大财阀为先导迅速成长。垄断资本进一步向前发展，但在战争期间投机式地膨胀起来的企业由于一九二〇年战后最初的大规模经济危机却大量没落下去，日本资本主义进入了真正的垄断阶段。关于这方面的详细情况，请参照井上晴丸《垄断资本主义的确立》（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现代2）、守屋典郎《经济史》（东洋经济新报社《日本现代史大系》）、大岛清《日本危机史论》下，等。

随着资本主义的跃进，农业也发生了重要变化。在大战期间，由于蚕茧的涨价与以产量激增为中心的收入的增加，农村也在讴歌其繁荣景象。在农家经营方面，不足一町、特别是不足五反的耕作者逐渐减少，而一町以上、二町以下的经营增加了，作为二町以上的日本农业，富农经营也多少有所增加。在养蚕、畜产、蔬菜和果树栽培方面，富农经营的增加相当显著。然而，这些仍然是一小部分，绝大多数并没有改变小农经营、零碎经营的日本农业的基本状况。大米生产方面，脱粒作业普遍采用了脚踏脱粒机，德川时代以来的手摇式脱粒机已不复见。碾米也开始部分使用动力机，在肥料方面，化肥已占主要地位。用于自给的家庭手工业几乎消失，自给自足经济彻底地崩溃了。

在战争当中，农户数和战前一样连年增加，以一九二〇年的五百五十七万三千零七十九户为顶峰，其后农户经济因

这一年深刻的经济危机而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从农业转行的农户增加了。农户数在一九二一年大约减少三万三千户，翌年也稍有减少，从二四年才又转而逐渐增加。但农户在全国总户数中的比率，自明治以来一直在减少，特别是在资本主义飞跃发展的大战期间减少的比率，比战前战后都高。即其比率为：在大战前一九〇八年至一四年的六年期间里，从六十点三三降到五十六点九九，而在大战中的一九一四年至二〇年降低了四点五五，而为五十二点四四。在战后的一九二〇年至二六年降低了三点一三而为四十九点三一。从农户数的自耕、佃耕、自佃耕分别增减的情况来看：自耕户数从一九一五年至二二年出现逐渐减少的倾向，自二三年又转而渐增；佃耕户数以一九二〇年为顶峰，以后渐减；自耕兼佃耕则一贯渐增。再看一下土地的自耕地、佃耕地比率的变化：明治以来自耕地率渐减（佃耕地率渐增），一九二三年为五十三点五〇（佃耕地率为四十六点五〇），从翌年开始自耕地率稍有增加。另外，在第二次大战前，全国（包括冲绳县）耕地面积最多的是一九二一年的六百一十六万二千余町，占整个国土面积的百分之十五点八。（《明治大正国势总览》，《日本帝国统计年鉴》）。

以上农户数与耕地比率的数字，表明在一九二〇年经济危机之后，寄生地主制停滞不前，尽管是极为缓慢的、然而已开始衰退。从农户数与土地所有者阶层分别增减的情况来看，五反以下的零星土地所有者与十町以上的大地主在大战期间增加了，而大量中间阶层的数量却在逐渐减少。这恐怕是由于用卖掉自耕地的钱从事农业以外行业的农户增加的缘

故（这与自耕农户的减少倾向是一致的）。其土地的一部分集中到大地主手里。因而再也没有比大战期间大地主（十町以上、五十町以下的土地所有者）与特大地主（五十町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增加得更为迅速的时期了。大地主增加百分之十三，为四万五千九百七十八户，特大地主增加百分之四十二，为四千二百二十六户。但以二〇年经济危机为分界线，其后一町以下的零星土地所有者增加，而包括大地主和特大地主在内的一町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却开始减少。

另外，在全国平均收入中地租的比率虽然随着生产力的增加而逐渐减少，但其实交额在一九二一年以前增加，从翌年又转而减少。这是由于下面将要谈到的佃户与地主的纠纷的激化，以佃农为主的农民协会的发展所致。换言之，农民所取得的减租胜利给予寄生地主制以沉重的直接打击，使地主制走向衰退。同时，随着资本主义产业的高度发展，贫农、佃户从农业改行或兼作农业以外工作的机会多了起来（在一定时期内所表现出来的农户数的相对增加与绝对减少，反映了这一点），这成为削弱骑在不得不把自己束缚在一小块土地上的广大贫农头上作威作福的寄生地主制的条件。不仅如此，因二〇年的经济危机而于上一年还一直上升的耕地价格也急剧跌价百分之十五，在此后的二二年与二五年虽有一点点回升现象，但除此之外则连年跌价。其重要原因也是由于佃户与地主纠纷的激烈化（小峰三子男《日本耕地价格的研究》）。

寄生地主制对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即垄断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意义，同对于成立时期的日本资本主义所具有的意义有

了不同。资本积累来源的绝大部分来自资本主义生产内部（包括对殖民地的剥削），而不再依赖转化为资本的地主的地租收入。另外，在劳动力这点上，垄断资本的重工业、化学工业、交通运输业等同纺织业不一样，不是依赖贫农子女的不熟练劳动，而是需要经过训练和有多年连续工龄的工人。以前，资本家通过寄生地主制的高额地租把农民大众压榨到贫困的深渊，以此来寻求其所需要的低工资工人的来源，高额地租与低工资的结合成了日本资本主义发达的最重要的条件，而现在以低工资为基础的低米价则有了更为重要的意义。一九一八年席卷全国的米骚动就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低米价虽有损于寄生地主的利益，但是，低米价可以从殖民地朝鲜与台湾得到保障。

一九二一年的米谷法表明，政府的米价政策虽然并非无视地主制的利益，但更多考虑的则是资本主义的利益。该法允许政府以特别资金调整米价，为的是一方面防止由于米价的急剧下降造成地主与上层农民的损失，制止小农、贫农的激进；另一方面防止米价高到威胁低工资者的基础的程度。这同米骚动前基本在于避免米价的暴涨但将其维持在高水平的米价政策，其方向是不同的。另外，在一九一九年朝鲜民族的伟大独立斗争三·一起义之后开始的朝鲜产米增产政策，也是为日本资本主义保障低米价的政策之一。

这样，地主制与资本主义携手发展的阶段已告结束，开始了垄断资本使地主制从属于自己的阶段。但是，即使对垄断资本来说，将半封建的地主制作为反动秩序的堡垒加以维持，这在政治上是绝对必要的，而且在经济上对整个资本主义

来说也是必要的。因为若使大量贫苦农民存在于地主制之下，则农民偏低的生活水平将作为不断压低工人工资水平的力量而发挥作用，并且依然成为大量需要的纺织、缫丝女工和土工、搬运工等劳动力的来源。在社会方面，地主制与小农经营作为必要的家长制家族制度的基础，对资本家也仍是必要的。因此，垄断资本家阶级依然将地主制与地主阶级作为同盟者而维持下去。与以前不同的只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是首先贯彻资本家的利益而已。

3. 各种矛盾的展开

日本帝国主义通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确立了它的经济基础——垄断资本主义，在对外方面，如前节详述，在帝国主义世界中确立了独特的地位。

这时，资本主义世界已经由于帝国主义本身必然产生的世界大战而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占地球陆地面积六分之一的俄国，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被切断了其世界锁链的一环。十一月（俄历十月）的社会主义大革命，是资本主义世界的命运的根本性转折的开始。资本主义已经不再是支配全世界的唯一制度，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并存而且日益发展。它给予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及以农民为主的一切被压迫被剥削人民以革命影响，使殖民地、附属国的一切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飞跃发展。这样，它开辟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各国的工人阶级的斗争与殖民

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的斗争联合、统一为反对帝国主义世界体系的共同斗争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在这样的世界史阶段上确立起来。但同欧美帝国主义相比，日本帝国主义的结构是脆弱的。第一，在经济基础上，虽说利用第一次大战确立了垄断资本主义，但在工业生产方面，轻工业仍然比重化学工业优越，近半数的人口仍被束缚在半封建式的小农经营上。也就是说，作为一个整体，它的资本的有机构成低，生产性也低，国际竞争力也就弱。日本商品只是在日本的竞争对手在世界大战中不能脱身的特殊情况下才进入整个世界，赚取了意想不到的巨款。但是战争结束后竞争对手卷土重来。一没有战时的特殊需要，炼铁、造船、机械等重工业便受到沉重打击，贸易从一九一九年出现大量逆差，不得不全部拿出战争期间积蓄的资金。以对华投资为主的日本的资本输出在一九一九年至二四年的五年时间里也几乎停滞下来。其后虽又重新投资，但在这期间外资输入增多，据估计，一九一九年拥有十三亿七千一百万美元的债权国的日本，在十年后的二九年变成了负有七亿九千万美元的债务国（《日本对华投资的研究》）。日本在大战后又回到金融上依赖英美的那种战前的情况。

第二，为了以军事力量弥补经济上的软弱而经常保持对经济力量来说负担过重的军备，因此资本积累受到军费的妨碍。并且日趋残酷地对国民进行掠夺和压制，阻碍了国民大众生活的提高，国内市场的发展速度也不得不降低下来，阻碍了经济发展。而且，尽管国内人民的反抗可以用强权压制，以教育敕语在意识形态上加以束缚，但却培养不了国民对统

治者的信赖。即，以军事、警察力量来弥补经济上的软弱的结果，妨碍了充实经济力量。在政治上国民不能自觉地团结在政府周围，因而愈加依靠军事、警察力量。这种恶性循环便进一步扩大、反复。

第三，由于经济力量、资本力量软弱，因而在对台湾、朝鲜、满洲等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统治上也首先依靠军事、警察镇压，进行“只索取不给予”式的掠夺。这也就必然加剧了这些被压迫、被掠夺民族的反帝斗争。况且无论是朝鲜民族还是中国民族，都是具有古代文明，自古以来就过着国家独立生活的民族，因此其对解放的要求和斗争能力都很强烈。在这里也就发生了军事镇压——被压迫民族反抗的升级——进一步镇压这种恶性循环。

第四，这样，由于实行军事第一主义，在日本的政治结构中，以军部为支柱的天皇制一直掌握领导权。在经济上形成垄断资本主义，因而垄断资本的利益尽管走了不少弯路，但归根结底仍然不能不予以贯彻。在这个意义上，虽然权力的阶级内容是资产阶级性质的，但行使其权力的政治首脑却拥有绝对主义机构，由于这一矛盾，其政治也就难以避免各种各样的分歧和混乱。大战后，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政治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从而得以将地主阶级作为从属性的同盟者，在某种程度上使官僚也听从摆布。对军部也施加压力，废除殖民地统治的军部独裁制，对军部大臣武官制也给予一定的攻击，并在一九二二——二五年，加上来自国际上的压力，大规模地缩减了在此以前一味扩充的军备。尽管这样，军部的垄断地位慢说废除，就连改革也未能做到。

而且，军部同垄断资本力量越来越增大的政党及政府之间的对立进一步潜在地深刻化。与此同时，前面（参照本书第285页）说过的军部内部的对立也在深刻化。这些对立，在外交方面成为对中国政策中出现的那种典型的双重以至三重、四重外交而反映出来。这使列强对日本的不信任和警惕、被压迫民族的反抗，进一步加强，使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际上愈加孤立。

这种尽管外表上看起来似乎强大然而在经济上、政治结构上有着弱点的日本帝国主义，由于它是在帝国主义世界体制已被上述俄国社会主义大革命打开了一个无法修补的大缺口，而且其基础是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受到震撼的阶段上确立起来的，因此，日本帝国主义的各种矛盾是深刻的。

一般来说，帝国主义有三大矛盾：（1）该国的以工人阶级为领导阶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全体人民同以垄断资本家为司令部的统治、剥削阶级之间的矛盾对立；（2）同殖民地、附属国的民族解放斗争的矛盾对立；（3）同其它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对立。俄国革命以后，又产生了（4）同社会主义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为社会主义世界体系）的矛盾对立，以前的三大矛盾因此也就更加深刻，而且带有新的性质。这四大矛盾相互交织，相互作用，日益激化。其矛盾的到达点就是第二次大战。这场大战比第一次大战更为激烈，规模更为巨大，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全世界性的、而且同第一次大战那种只是帝国主义国家相互间（在这个意义上性质是单纯的）的战争性质不同的、四种性质的战争混在一起的大战^①。这

四种性质的战争的混合恰恰就是四大矛盾相互交织的表现。

日本帝国主义确立后的历史，也无非是这四大矛盾展开、激化的历史。一九一八年七月至九月发生的米骚动就是第一种国内矛盾最初的大爆发。

众所周知，米骚动是从七月二十三日富山县鱼津镇的女工们提出的阻止外运县内产米的要求开始的，不久，要求降低米价，救济穷人的群众运动便在该县所属各地扩展开来，并日趋激烈。从八月十日到十六日，在京都、名古屋、大阪、神户、东京、横滨等几乎所有大中城市里，都发生了数千人至数万人、十几万人的民众大起义。他们在捣毁囤积居奇的米店和高利贷的同时，甚至无所畏惧地同警察或军队发生冲突。接着，从十六日开始扩展到小镇和各村，在山口县的宇部煤矿和九州的十几个煤矿，手持炸药的矿工们同军队发生对抗，一直到九月上旬才逐渐平息。

成为事件直接起因的米价暴涨与群众生活的急剧贫困，其根源在于同半封建地主制相结合的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的经

① 从构成第二次大战的战争所发生的时间顺序来说：（1）日本侵略中国、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开始的帝国主义同被侵略民族之间的战争；（2）德、意同波兰、英、法等国的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亦包括日本同英美的战争）；（3）德意法西斯联合（帝国主义）侵略社会主义苏联的战争与苏联方面的社会主义自卫战争；（4）帝国主义国内的法西斯（帝国主义）统治者同以工人阶级为主力的反法西斯的人民之间的内战（其典型如法国、意大利等），与反对日德意法西斯联盟的全世界反法西斯联盟的战争合为一体的复合战争（日苏战争也是其一部分）。美英等帝国主义国家对日德意的战争，在同以苏联及中国为首的反帝民族战争联合这一点、也仅仅在这一点上，它既是帝国主义相互间的战争，同时又具有反法西斯联盟与法西斯联盟战争的性质。

济结构与帝国主义政治结构的不合理。也就是，尽管形成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对米的需要激增，然而地主制下的农业生产力却不仅跟不上这种需要，一七年的大米产量反而比上一年减少了百分之六点六。于是，地主囤米不卖与大商人的投机便猖獗起来，使米价暴涨。可是，政府却将地主阶级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没采取任何抑制暴涨的政策。而且，七月中旬政府决定出兵西伯利亚干涉俄国革命，使人预料到将大量需要军用米，这就使米价几乎直线上升起来。

米骚动之所以一波动万波随，很快普及全国，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到形成垄断的阶段，连接全国的交通、通讯手段——铁路、电报、电话、报纸等——随之发达起来，并且在群众的生活范围扩大，同各地人的来往机会增多的情况下这才成为可能的。而且，资本主义的发达具有将全体国民（特别是市民）的生活划一化的必然倾向，因此全国任何一个城市里的劳苦大众都处于因生活的贫困而怒不可遏、一触即发的状态之下，这是米骚动几乎同时爆发的基础。另外，在劳苦大众中间，自日俄战争后，郁积着一种气愤情绪，一遇时机，便要闹事（参照本书第318页）。说明这一点的典型，是在各地米骚动中充当起爆剂和主力的被歧视部落民对军队、警察、学校和报纸等对他们的歧视而进行的群众性抗议斗争也频频发生（具体事例参照井上《部落问题的研究》）。这种在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所郁积的矛盾，便成为全国规模的米骚动爆发出来。

另外，尽管是处于空前的大发横财的繁荣景象之中，然

而大工厂的熟练工人的工资和待遇却从一九一七年前后低劣起来。因此，罢工次数与参加工人数从一九一六年的一百零九起、八千四百一十三人一跃上升到一七年的三百九十八起、五万七千三百零九人。友爱会会员于一七年已达到三万人。此外，工人组织也大量成立起来。与此同时，因大逆事件而消声匿迹的大杉荣、堺利彦等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的活动又逐渐恢复起来。以吉野造作为首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运动也在反对寺内“非主宪内阁”中蓬勃发展。这时，俄国一九一七年三月与十一月连续革命的思想也不知不觉地波及到日本。一九一八年五月，寺内首相在地方长官会议上训示说，由于“资本家与工人隔阂甚大”，民众生活困难加深，因此要警惕因“外国的影响”而正在发生的“与国体不符的国民思想的变化”。米骚动就是在其两个月后爆发的。

米骚动的主力是日工、搬运工及其他各种力工、街道工厂工人、被歧视部落民、贫农、农村无产者等。在无产者大众中，也是劳苦大众居多，而大工厂工人则极少。据神户的调查，其原因多在于大工厂的工人在工厂里团结起来同资本家交涉，取得了增加工资、降低米价的胜利，或者资本家方面在察觉不稳情况时事先改善待遇而预防了工人参加骚动。但是海军工厂的工人成为吴、舞鹤骚动的主力，神户的两名车工（一名是川崎造船厂工人，一名是由川崎转入街道工厂的工人）充当了烧毁铃木商店的带头人等，他们发挥了近代工厂工人的先驱作用。据称，神户这两人中的一人，在工厂也经常是在休息时间看书，米骚动一发生，便向同伴说道：“一

发生这种事情，社会便会好起来”。^①

在骚动当中，虽然有现场指挥者，但没有事前的计划与组织，民众中也没有产生出从政治上解决问题的方向。但在名古屋市的讲演者当中，有的提出要追究寺内内阁的责任，有的要求知事、市长予以解决，有的要求资本家大幅度增加工资；在福井市，民众涌向知事官邸，追究其责任。这些虽是零星发生的事件，但以此可以察觉出在民众当中从政治上理解、认识米价问题的因素正在成长。

然而，还没有任何组织来迅速培育这种因素，并从政治上对其加以引导。民本主义者同情骚动，多数报纸也支持民众的立场，刊登了记事，富山县的《高冈新报》等，在骚动还只是在富山县内、并且不甚激烈的八月七日的社论中，便很快作了正确解释，从骚动中看出革命的萌芽：“俄国革命从炉灶中升起来了。德国军国主义近日也逐渐从这一炉灶中受到诅咒，令人震惊的社会烽火已被东西水桥或滑川的贫民起义点燃起来了”。其它地方报纸也有几篇同样的社论，但这只不过是作为旁观者的解释。以《大阪朝日》为首的民本主义色彩浓厚的报纸，最大限度地利用这场骚动，为打倒内阁、保障言论自由、确立宪政而全力以赴，但也没有作出直接领导民众斗争的姿态。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将这场骚动作为革命的行动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这也只是局外的评论而已。

尽管米骚动没有政治领导势力，但其政治收获是巨大的。

^① 神户史学会《历史与神户》创刊号转载《生活时报》社座谈会《米骚动期间》。

第一，米骚动不仅使寺内内阁不得不辞职，而且使原敬的政友会内阁在其后得以成立（一九一八年九月）。在这以前绝对反对政党内阁的山县，同意把不是华族（曾有过首相只能是华族的惯例）而不过是众议院多数党总裁的原敬推上首相宝座，正是由于他是政党总裁。山县之所以同意，是因为他完全被米骚动吓慌了手脚，这时已认识到官僚内阁是行不通的，而必须让掌握民众的政党来组织政府。原内阁也绝对不允许由党员担任陆海军大臣，因此严格地说虽然不能称其为政党内阁，但就是这种带有日本式局限性的政党内阁也是由于米骚动的力量才得以成立的。

第二，米骚动大大加强并普及了民主主义思想。例如，经济学者福田德三论述米骚动时说，人在生活陷入极度贫困时具有超越一切法的生存权利，即有“极穷权”，他认为米骚动就是其实践。同样的看法此外还有生存权优于一切的思想，在日本开始树立起来了。又如，在全国一百零七处出动了军队，多时达二万人以上。在米骚动整个期间，据推测动员了五万人来镇压饥饿的民众，在宇部、吴、神户及其它地方至少杀害了三十人，这使国民体验到了军队的本质。骚动时期正与西伯利亚远征部队的出发时期相同，国民对这种出兵极为冷淡，在大阪等车站，民众几乎没有出去欢送部队，国民用实际行动否决了军国主义。就是对因骚动感到惊慌的天皇所“御赐”的“抚恤金”，国民也并不感谢他人的恩惠，并产生了不少批评说，有权要求使生活安定的政治。“天皇陛下的仁慈”已欺骗不了国民了。

第三，最重要的是，人民大众一方面认清了军队、警察

等的本质，一方面觉悟到了大众行动的实力。这一点也是政府、资本家、地主最害怕的。政府方面哀叹道，发生了“以暴力打倒富人的思想”，而民众则开始说：“只有和他们干！”。这一点还加强了民众正确理解俄国革命的基础和接受革命思想的素质。骚动后担任首相的原敬在日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三日）中叹道：“人民不知何时沾染国外空气……社会主义之传播如今骤然成为对其无计可施之势。”这种民众的觉悟后来成为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部落民运动、妇女运动及其它一切社会运动和人民解放运动的动力。^①

经过米骚动的民众已经不再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进步派每当有事之时所利用和动员的“民众”、“庶民”、“群众”了。“民众”成为具有阶级觉悟的独立势力。随着达到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以数量日益增加、质量上也提高了组织性的工人阶级为先锋，农民及其它人民各阶级、各阶层都在展开独自的自我解放的斗争。在这运动的发展过程中，为了将全体人民从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与其同盟者地主阶级及其政治首领天皇制之下解放出来，工人阶级的先锋势力成长起来了。

日本帝国主义的第二个基本矛盾——同殖民地半殖民地之间的矛盾的最初大爆发有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开始的朝鲜民族的三·一起义；有同年五月四日开始的中国青年、学生、工人的五·四运动。第三个矛盾——帝国主义相互间的矛盾已经在一九一九年巴黎和会上作为日本同英、美、法之间围绕

^① 关于上述米骚动的记载，无特别说明者均据井上清、渡部彻编《米骚动研究》第五卷。

瓜分战利品的对立而表现出来，但决定性的是一九二一——二二年的华盛顿会议（海军裁军会议与关于中国的九国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围绕在第一次大战中被搁置起来的中国问题，日美对立和日英对立都趋于表面化，英美攻势强大，日本成为在帝国主义世界中没有任何同盟国的国家。这是日本孤立的开始。并且在俄国苏维埃革命胜利后仅六十五天的一九一八年一月三日，日本即以保护侨民的名义向海参崴派遣军舰，第四个矛盾——同社会主义苏联的对立从此开始。

至于这四大矛盾后来是如何错综复杂地发展的，在其发展过程中金融寡头是如何强大起来并强大到何种地步的，与此同时日本帝国主义的权力机构——天皇制是如何发生变化的（军部一时后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成立贵族院地位的下降等），以及其阶级作用是怎样的，这些具体问题，当另书论述，本书《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至此结束。

参考文献说明

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综合性的历史研究，不得不涉及日本近代史整个时期。这里，除帝国主义通史外，本书中所使用的是以甲午战争后到第一次大战结束期间为主要对象的日语研究书籍，其中只列举了同主题直接有关的和我认为合适的书籍。杂志论文除收于论文集者外均从略。史料集在原则上也不列举。此外，这一时期的政治史与经济史虽都具有帝国主义史的一面，但因不胜枚举也从略。当然，这些我所参考而没有在此列举的论文、著述均在本书正文中提到过。用以说明的书籍上注明的年代为出版年，而不是著作年。

1. 在帝国主义的理论研究中包括日本帝国主义论者：

- (1) 神山茂夫《关于天皇制的各种理论问题》（一九四七年，民主评论社），《为加深革命理论》（一九四九年，晓明社）
- (2) 志贺义雄《世界与日本》（一九四八年，晓明社），《国家论》（一九四九年，料学社）
- (3) 杨井克巳、大河内一男、大冢久雄编《帝国主义研究》（一九五九年，岩波书店）
- (4) 石井金一郎《日本帝国主义的权力与机构》（一九

六六年，三一书房)

(1)与(2)是从列宁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论”的解释出发来论述日本帝国主义的性质，以“神山、志贺论战”闻名的论战著作。神山认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是在绝对主义权力的末期所出现的权力，说日本帝国主义是军封帝国主义与近代帝国主义的“双重帝国主义”；志贺认为军封帝国主义是在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阶段成为绝对主义的权力的；(3)在多数人的论文集中，众说纷纭；(4)以马克思主义国家论为基础阐述了作者的理论见解。

2. 日本帝国主义通史或与其相近的论文集：

(1)井上清《日本的军国主义II——军国主义与帝国主义》(一九五三年，东京大学出版会)

(2)小山弘健、浅田光辉《日本帝国主义史》全三卷(一九五八——六〇年，青木书店)

(3)岩波讲座《日本历史》现代1、2、3、4(一九六三年，岩波书店)

(4)家永三郎、井上清等编《近代日本的争论重点》中、下(一九六七——六八年，每日新闻社)

(5)藤原彰《日本帝国主义》，《体系·日本历史》第六卷(一九六八年，日本评论社)

(1)是三篇论文集：《征韩论与军国主义》、《日清、日俄战争的性质——日本帝国主义的成立》、《干涉社会主义大革命的战争》；(2)是站在“双重帝国主义论”立场上写的通史，是综合了政治、经济、军事的帝国主义论；(3)是多数笔者从各自的立场出发就帝国主义时代的日本历史的各

种问题所写的论文集。其中4中亦有研究史与主要书籍、论文的解说，有利于取得研究的线索；（4）是六十八篇论文集，提出了自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至一九三〇年前后日本历史的大小分歧点，其中多数是关于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前途、性质的论文；（5）是笔者一人写的通史，泛泛地叙述了各个事件。

3. 国际关系

在帝国主义史中，国际关系史成为主要方面，但没有找到从帝国主义论的观点出发对此进行综合研究的书籍或论文集。以下列举的是有关所谓外交史的著作：

（1）日本国际政治学会编《国际政治》（季刊、有斐阁），该刊就特定的问题每次集中编辑论文，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外交史的特集也不少，其中常刊载介绍新史料的文章。

（2）外务省编《小村外交史》上、下（一九五三年，新闻月鉴社，后更名为原书房）

（3）栗原健编著《对满蒙政策史的一个侧面——日俄战争后至大正时期》（一九六六年，原书房）

（4）堀川武夫《远东国际政治史概论》（一九五八年，有斐阁）

（2）是外务省修订的信夫淳平著的《小村寿太郎侯爵传》；（3）收集了（1）及其它杂志所发表的编者等四人的九篇论文，附有资料介绍，专以外务省、旧军部文件为史料；（4）根据内外文件，周密地考证了关于二十一条要求的对华外交谈判。但其视野没有扩大到当时日本的阶级关系和政

治、经济结构，是一部政府、军部的政策史。

此外，作为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基本文献，还有一本与其说是学术著作，毋宁说是一部史料集的珍贵的书。即：

- (5)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上、下（一九五五至一九五六年，日本国际联合协会，后改名为原书房）。

不少秘密条约的日文正本都在该书中公开了出来。成为该书基础的日本外交文书集也作为外务省编的《日本外交文书》，现在公开发行了明治元年（一八六八年）至大正六年（一九一七年）部分。下面列举的两册日译本，是在远东国际关系史上同日本关系最深的俄国与美国方面根据它们的观点写的书，战前出版，也许难以查到：

- (6) 康特罗维奇著，广岛定吉、堀江邑一译《称霸中国之战与太平洋》上、下（一九三八年，生活社）
(7) 格里斯沃德著，柴田贤一译《美国远东政策史》（一九四一年，钻石社）

4. 军事关系

为方便起见，从国际关系史中特别选出战争部分，因与此有关，这里将军事史归纳列举如下：

- (1) 中冢明《日清战争的研究》（一九六八年，青木书店）
(2) 信夫清三郎、中山治一编《日俄战争的研究》（一九五九年，河出书房）
(3) 古屋哲夫《日俄战争》（一九六六年，“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

- (4) 谷寿夫《机密日俄战史》(一九六六年,原书房)
- (5) 岛田俊彦《关东军——驻满陆军的独断专行》(一九六五年,“中公新书”,中央公论社)
- (6) 藤原彰《军事史》(一九六一年,《日本现代史大系》,东洋经济新报社)
- (7)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集》(一九三八年,育生社),《明治军事史论》上、下(一九五六年,有斐阁)
- (8) 陆军省编《明治天皇御传记资料明治军事史》上、下(一九六六年,原书房)
- (9) 海军省编《山本权兵卫与海军》(一九六六年,原书房)

(1)是从日清战争的原因到结果的政治、外交、经济的综合研究,只是有关战斗与军部的记载少些。(2)是多数笔者的论文集,涉及日俄战争的政治、外交、国际形势、经济、思想各个方面。虽是笔者们的共同研究成果,但其见解并不见得统一。(3)从帝国主义论的角度综合了政治、外交、军事,在军事方面也作了很好的分析。(4)是作者一九二五年在陆军大学校专攻科讲授的关于日俄战争的最高战略、政略,它同一般战史不同,是一本地地道道的机密战史。另外,在以战斗为主的战史方面,有沼田多稼藏的《日俄陆战新史》。(5)是关于关东军从发展到灭亡的概说。(6)是从明治初年到战败的军队史概说,政治、社会同军队的交涉从简。(7)这本《论集》收集的不仅有军队制度,还包括军队介入政治的实例,“论”主要是军政、军令的法制史论。

(8) 与 (9) 虽不能说其为学术著作，但作为完整的基础史料集有重要价值，特此列举。

5. 殖民地关系

在日本帝国主义研究当中，最大的弱点是殖民地研究。战败之前，这一点作为触及日本帝国主义的要害同触及天皇及天皇制的问题一样而被禁止研究；战后，日本失去了所有殖民地，研究人员大概因此也就没予以关心。而且，还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就是在史料上，殖民地研究几乎全部依据身为压迫、掠夺者的日本及其它帝国主义方面的史料，而不能利用殖民地民族方面的研究与史料。只是关于朝鲜，最近才好容易可以学习一点朝鲜方面的研究。即便是为了研究日本近代史，也不能不渴望早日恢复日本同朝鲜、中国的邦交，实现南北朝鲜统一和中国解放台湾。下面列举的是先驱的研究：

- (1) 细川嘉六《殖民史》（一九四一年，《现代日本文明史》第十卷，东洋经济新报社）
- (2) 矢内原忠雄《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台湾》（一九二九年，岩波书店。一九六三年，《矢内原忠雄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
- (3) 山边健太郎《日韩并合小史》（一九六六年，《岩波新书》、岩波书店），《日本并吞韩国》（一九六六年，太平出版社）
- (4) 林光彻《朝鲜历史读本》（一九四九年，白扬社）
- (5)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旅日朝鲜人科学家协会历史部译《朝鲜近代革命

运动史》(一九六四年,新日本出版社)

(6)渡部学编《朝鲜近代史》(一九六八年,劲草书房)

(7)C. F. 雷玛著,东亚经济调查局译《列国对华投资》上、下(一九三四年,满铁东亚经济调查局)

(8)樋口弘《日本对华投资研究》(一九三九年,生活社)

(9)矢内原忠雄《满洲问题》(一九三四年,岩波书店。一九六三年,《矢内原忠雄全集》第二卷,岩波书店)

(10)矢内原忠雄《南洋群岛的研究》(一九三五年,岩波书店。一九六三年,《矢内原忠雄全集》第三卷,岩波书店)

(1)是在战时冒险写下的日本统治台湾、朝鲜、满洲的历史。关于库页岛与南洋群岛一篇,由于篇幅的关系省略了,还有因检查而被删掉之处。关于民族运动几乎没有写,这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迫不得已的事情。(2)一直到今天仍是研究统治台湾的最好著作。(3)这两本书虽有重复,但互为补充,以确凿的史料概观了从明治初年的征韩论到合并期间的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和朝鲜民族的反抗。(4)这部著作是当时旅居日本的朝鲜学者所写的朝鲜史概说,近代部分居多。(5)如标题所示,是朝鲜人民方面的研究,在史实和对朝鲜近代史的看法上多有教益。(6)表明了日本学者明确地站在反帝立场上进行研究的最新著作。(7)和(8)作为标题所示方面的基础研究,至今仍无与之类似的书籍。

(9) 是有勇气的名著，它在日本对中国东北进行侵略战争(所谓满洲事变)时，分析了在满蒙的“特殊权益”、满洲国傀儡政权的来历与实际情况，阐明了其帝国主义的实质，对研究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期也有参考作用。(10) 详细阐明了南洋日本托管区的土著社会的状况与日本的统治结果。作者没有对帝国主义进行批判。

除上述者外，在“通史”项目中列举的岩波讲座《日本历史》也有关于殖民地的好论文。至于可以作为史料利用的帝国主义者自我吹嘘的书及很早以前的著作，这里就不再列举了。